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新年献词 (1)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来
 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 (4)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行动的总方针
 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6)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
- 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 任弼时 (8)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 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任弼时 (26)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等问题
 给陈毅、饶漱石的指示 (49)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发表宣言的指示 (51)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 总政治部关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工作
 给野战政治部的指示 (54)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闭幕词 林伯渠 (56)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
-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 (61)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
- 肃清军阀主义倾向 谭政 (65)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 (80)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 毛泽东关于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
和平局面给彭德怀的电报 (83)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
爱护人民的决定 (86)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 邓小平 (90)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 (101)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 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 彭德怀 (106)
(一九四三年一月)
- 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111)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 毛泽东等关于加强统战工作给各战略区域的指示 (116)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
- 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 邓发 (117)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
- 毛泽东关于总结整风学习经验

-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121)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
- 军委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 (123)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
方针的决定 (126)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 高干会与整风运动 (129)
(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 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 何克全 (134)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陈 云 (147)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山东工作的指示 (155)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毛泽东 (163)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 我的修养要则 周恩来 (167)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 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 刘少奇 (168)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171)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
-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周恩来 (177)
(一九四三年春)
- 周恩来给柯棣华大夫家属的慰问信 (189)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 出发归来记 张闻天 (191)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 (213)
（一九四三年三月）
- 六年来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 刘少奇 (216)
（一九四三年三月）
-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274)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
- 毛泽东、朱德为感谢印度医疗队援华
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279)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 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 朱 德 (280)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韩德勤合作问题
给陈毅等的指示 (284)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
- 附一：陈毅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 (285)
（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
- 附二：陈毅等关于释放韩德勤的经过
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并中央的电报 (287)
（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
-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周恩来 (294)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
宣传工作的指示 (299)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 …… (301)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 …… (305)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
-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 …… (310)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
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 (316)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 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 (319)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
-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 毛泽东 (324)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 …… (328)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
宣传工作的指示 …… (329)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 (330)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现状和我党工作方针
给彭德怀的电报 …… (336)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 周恩来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对我方针
和我们目前对策给毛泽东的电报 …… (338)
(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
- 毛泽东关于民主教育谈话给彭德怀的信 …… (340)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342)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 对华中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 (347)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
-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349)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 刘少奇关于对付国民党的特务政策
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356)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 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任弼时 (358)
（一九四三年六月）
-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 毛泽东 (363)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
-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毛泽东 (369)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
-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 (370)
——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381)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坚持的 薄一波 (392)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刘少奇 (401)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 朱德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 (412)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 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 朱 德 (413)
——为抗战六周年而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 新四军在华中 陈 毅 (421)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 (433)
——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 朱德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 (444)
(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
- 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 刘伯承 (446)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 克服困难，迎接胜利 徐向前 (456)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 加强团结，准备反攻 贺 龙 (462)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决定发动
宣传反击的指示 (468)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
- 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
教育的通知 (470)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
- 质问国民党 毛泽东 (473)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迅速
破产的原因给彭德怀的电报 (480)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

-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 …… 秦邦宪 (482)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付国民党各派军队的原则
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 …… (487)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
- 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 …… (488)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 毛泽东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给董必武的电报 …… (492)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 刘少奇关于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
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 (494)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 论时局 …… (496)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时评)
- 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斗争的
八项政策给彭德怀的电报 …… (503)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
大会的通知 …… (505)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
-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 …… 周恩来 (507)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 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
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 …… (516)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毛泽东 (518)
(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

-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
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 (526)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
- 毛泽东关于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等问题
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528)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
- 毛泽东关于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的形势
和我党政策的指示 (529)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531)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 周恩来 (538)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 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 朱 德 (553)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
- 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 (557)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 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 (562)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 毛泽东关于消灭党内外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
各种错误思想的指示 (569)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570)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锄奸的群众路线
给邓小平的指示 (577)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

-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各党派不要受蒋介石欺骗
等问题给董必武的电报 (579)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董必武关于国民党拉拢小党派问题
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579)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
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582)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毛泽东 (586)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 毛泽东关于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
给董必武的电报 (599)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附：董必武关于同王世杰会谈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 (600)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和印发《评国民党
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问
题的指示 (602)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 毛泽东 (603)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
- 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 朱 德 (611)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
- 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620)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 (621)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 论敌后抗战 聂荣臻 (624)
(一九四三年十月)
- 毛泽东关于认真执行中央审查干部决定
给邓小平等的电报 (630)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632)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
-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635)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组织起来 毛泽东 (638)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
机会主义》的通知 (646)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 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 (647)
-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
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 (670)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规定旧历正月
为拥政爱民月和拥军月的指示 (672)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
- 毛泽东、彭德怀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及
对中国时局的影响给邓小平的电报 (673)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 (675)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 毛泽东等关于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
大部不捉方针给华中局等的电报 (681)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
机会主义》的指示 (683)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
主义路线错误给饶漱石等的指示 (686)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新年献词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新年——一九四三年，已经到来了。值兹元旦，本报对于在我国正面战线及敌后战场上英勇抗战的将士，对于在全世界各个战场上与法西斯野兽战斗的盟军将士，对于全国抗日同胞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敬贺新年，祝大家的健康，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祝人类正义的胜利。

过去一年——一九四二年，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伟大团结英勇战斗的一年。英苏和美苏协定，结成了英苏美三大强国的战斗同盟，使反法西斯阵营更趋巩固，发挥它的伟大力量。在世界各战场——苏德战场、北非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亚洲战场上，处处充满了同盟国军队为保卫人类正义，奋不顾身和法西斯野兽坚决搏斗的光辉战绩，特别是斯大林格勒的战役，苏联红军创立了空前未有的英勇范例。在同盟国家的后方，各界人民皆以战斗的姿态，努力生产，为供应前方而工作。正由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战斗，所以一九四二年才成为伟大转变的一年，纳粹德国已精疲力竭，转取守势，同盟国家获得了世界战争的主动权。

我们热烈地希望，在一九四三年，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将比往年更加亲密团结，对法西斯野兽进行更加英勇的战斗，对法西斯阵营举行坚决的进攻。今天在红军攻势锐不可当之时，纳

粹魁酋正嚷着“一切决定于东线”，这是盟国在欧陆建立第二条战线的极好时机。我们相信，英苏美的加紧团结，红军的继续进攻，和第二条战线的及时建立，将使一九四三年成为同盟国对轴心进行胜利反攻的一年。

在我国，过去的一年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全国上下坚持抗战，力图加强团结的一年。敌寇企图以切断滇缅路扼死我国的阴谋，完全破产。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我国愈战愈强，屡次击退日寇的正面进攻（如浙赣路之役、滇边之役等）与粉碎敌后无数次“扫荡”。我国乃能屹立于亚洲大陆上，配合同盟国作战，并进行反攻的准备。过去一年来国内共同团结精诚无间的重要，已愈益为全国有识人士共同认识。中共中央七七宣言说：“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该是团结的”。中国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云：“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这种共同的认识奠定了调整两党关系与加强国内团结之基础。

一九四三年将是我国更加接近胜利的一年，但同时也将是我国遭遇到空前困难的一年。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同盟国，日寇进退维谷之时，日寇对我国的进攻，不但不会放松，而且必然是会加紧的。可是不管日寇怎样凶暴，只要我国进一步加强团结，即就一定能够击败日寇，并且顺利地准备反攻，与盟国配合，完成驱敌出境、建立强盛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任务。我们热烈地希望：一九四三年将是全国更趋团结，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一年。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年来的环境，是更加困难了。但是由于党中央七七告敌后军民书中所指示的各项政策的执行，和敌后军民一致团结、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战争仍然坚持下去。一九四三年的敌后斗争，其困难必

然加甚。但是我们深信，只要坚决执行正确的政策，加强根据地内部团结，和全国配合作战，那末历年来表现了无限的英勇和坚忍精神的敌后军民，必定能够经得起最严厉的考验，坚持战斗，渡过难关，一直到最后胜利之日。

最后，在陕甘宁边区——一个比较处于后方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生产，加强教育”，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心任务，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在兹新年开始之际，我们谨祝这一任务的光荣完成，在农场上，在工厂里，涌现无数的劳动英雄，无数的吴满有和赵占魁，这样使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巩固和繁荣，粉碎日寇对我的封锁，屏障西北，并支持华北敌后的艰苦抗战。

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了。让我们鼓勇前进，来达到胜利的目标吧！

根据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 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

抗战五年半以来，我们的党和军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巩固；创造了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坚持了极端残酷的敌后斗争；形成了今天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这些辉煌光荣的事业中，我们的党政军民全体干部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我们必须有最大的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延保留与学习。在敌后发展的顶点，早经过去。由于根据地和军队的继续减缩，我们的干部，在数量上亦允许从现在工作中抽调一部出来。而部分的干部，由于长期的艰苦奋斗，身体条件亦有不适于继续敌后工作者，因此中央特有如下决定：

(一) 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

(二) 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着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的选送质量好的干部。

(三) 选送的干部，军队中应该是营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地方应该是县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山东及华中因为交通更困难，故选送干部的质量，应更好些。

(四) 老弱伤病及妇女干部，不宜在敌后而必须送来延安者，其条件可酌予变更，但必须解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来延后多数干部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自给自足的生产工作，以便共同努力渡过难关。

(五) 专门家及优良技术干部，亦应酌量情形尽多送来延安保留培养，和更有效地发挥其特长。

(六) 送来的干部应该是政治上纯洁的。如有个别政治上有问题而必须送来延安者，则应将其政治问题及你们的意见详告我们。

(七) 各地抽调干部的数量与来延路线均由北方局和集总及华中局和军部负责进行之。

(八) 为保证干部来延的安全，应保持高度秘密与审慎，以防遭受不应有损失。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行动的总方针 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

陈饶：

来电⁽¹⁾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四十余师，包围德军二十二个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三十一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少奇⁽²⁾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泽东

一月五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和曾山就对付敌寇“扫荡”华中的方针及部署给毛泽东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

〔2〕即刘少奇。

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任 弼 时

党中央所发布的“九一决定”⁽¹⁾，就是要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中央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里面，像这样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还没有普遍地完满地建立起来，党政军民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比如有某种部门工作向党闹独立性的，有下级向上级闹独立性的，有某些个别同志对于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的。这些情形，如果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对于我们坚持抗战以及进行根据地建设，都会有很大的妨碍的。

陕甘宁边区的情形怎样呢？应当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还存在着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比如，在军队方面，对于党的尊重是不够的，自以为与党是平列的，甚至觉得比党还要高一些、大一些，认为自己是中央的军队，就不把自己的工作时常提到西北局去讨论，对边区党的决议也没有认真去执行。在政府工作方面，前

* 这是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讲演的第一部分。

一个时期，有某些政府里面工作的同志对西北局的决定不很尊重，没有认真按照决定办事，如发票子、运盐等问题，到了后一个时期，又发生了政府工作中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团也不大尊重的情况。在群众团体方面，曾经有一个时期，青年团体向西北局闹独立性，走到“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这次大会中有个同志指出，除了政府以外，青年都单独有一套，如青年农场、青年运输站、青年商店、青年食堂和青年武装等等。而究其实际，边区青联又何尝不是青年政府呢！政府管不到，党也管不到，公开向党要求尊重青年运动的独立性（并不仅是青年团体组织上的独立性），甚至在青年的会议上对党表示反抗，闹得多么严重！西北局向这种青年运动中闹独立性的倾向曾经作了斗争，严正地指出了它的错误，以后的情形是改善了许多。此外，在党部方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党部，它知道成立了西北局，就不仅是领导边区内党的工作，还要领导整个西北范围内党的工作，而它觉得西北局的成分，似乎没有能力来领导友区内党的工作。这些不尊重西北局领导，向西北局闹独立性的事实，就不能不给边区工作以很大的损害。这次会议中，大家揭发了这些现象，分析了这些现象，一致认为它不只是简单的不服从党的组织，不服从党的决定而已，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某些同志在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以及对党的认识上，有着原则上的差别。这就是说，边区党内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在某些同志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同志们，没有思想和意志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因此，我们今后要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就必须揭发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克服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我们的大会，在这方面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一 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

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就是对党的认识是模糊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央“九一决定”都指出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是由无产阶级里面最先进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因此，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在我们边区说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党的领导机关——西北局，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政府、军队、各种群众团体、合作社和学校等。这是就党与其他革命组织的关系而说的。至于在党内关系上，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它的。自然，这个集中制又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这样一个党的最高原则，我们的某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是否真正的了解它，奉行它呢？事实证明，某些干部并没有真正了解它，他们还没有在实际行动中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西北局是边区的领导核心。相反的，他们把自己所领导的某一部门工作，看成为与党是并立的，平行的，甚至是高于党的，似乎没有“责任”一定要接受西北局的领导，似乎没有“责任”一定要按照西北局所决定的一切政策去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地”去进行他们所领导的某一部门工作。

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对党的地位与作用有一种不正确的

见解。他们怀疑党的主张与政策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尽管是最革命的最为谋利益的政党，总不能说党的主张全等于人民的主张。也有同志认为，在有政权的地区里，只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那里有没有党员和党的组织，那里政权中多几个党员或少几个党员，都是无关重要的。也有同志认为，如果某一政党在政权机构中占优势，就等于某党独霸了政权，因而我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就不必要有优势。也有同志认为，对于政府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它们所执行的政策与进行的工作，党没有事先研究讨论与决定的必要。他们把党对这些组织的领导作用，看做了党的包办。同志们，把这许多观念联结起来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如何否定了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这一最高原则，如何取消了党的领导作用。

我们说，我们的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政策的，而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利益，又是与全民族解放的利益一致的。比如，我们党今天所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社会政策，像减租减息又要缴租缴息，像改善工人待遇又要资本家可以赚钱牟利，以及前年西北局所发布的“五一施政纲领”，这许多主张和政策，是不是代表人民的意见，是不是为人民所需要的呢？我们应该给以肯定的答复：是的。我们的这些具体政策，都是从照顾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同时也照顾了少数地主资本家的利益；照顾了现在也照顾了将来的。因此，笼统地提出党的主张不全等于人民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才能使党的主张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见呢？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这就是说，主观主义者不根据具体情况，不根据群众的需要和经验而提出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张，是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的。这种情形，在我们党内是曾经发生过的，恐怕今天某些个别工作部门也还会存在着的，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不应有的现象，是一种特殊的“例外”，不能从这些“例外”的情形而做出一般的结论，说什么党的主张不全等于人民的主张的论调。

由于这种模糊的认识，自然会产生忽视或者否认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作用这个错误思想，认为在“三三制”政权中，我们党没有取得优势的必要。我们提出了政权的“三三制”，提出了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的数量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有时超过了还要退出，另选非党人士补充，这个办法是正确的。但并不是说，我们党在政权中不要有政治上的优势；相反的，只有保持党的政治优势，才能够保障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建立“三三制”政权并不是要放弃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相反的，我们要巩固这种领导。我们所说的“三三制”，是除了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外，其他三分之二，要保证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人民中的进步分子（赞成抗战与民主）和中间分子（赞成抗战，对民主也不坚决反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政治优势。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三三制”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因此有个别地方，把一些很坏的人随随便便请到“三三制”政权里来凑数。这样，党的政治优势就会要丧

失，党的领导作用也就会被取消。

由于这种忽视或否认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作用，就可能产生认为在有政权的地区里，有无党员和党的组织是无关重要的错误思想，这是一种取消党的变相说法。在我们看来，每一个乡，每一个行政村里，有很好的党员，有党的小组和支部，就更可能保证党的主张的实现，以及政府法令的贯彻执行。由于忽视党对政权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就可能产生政府的政策和设施不必经过党去研究、讨论与决定的错误思想。我们知道，党有责任领导一切革命组织，并不是一句空话，就是要争取这些革命组织（如政权、群众团体等）能够实现党的主张，执行党的政策，就是说，党的主张与政策要通过这些革命组织来实现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些革命组织所执行的政策和所进行的工作，党必须加以研究、讨论和决定，以负起领导的作用。自然，这种决定并不是直接命令这些组织里的工作者去执行，而是经过这些组织里面的党员的活动以达到目的。如果这些组织里大多数人不能同意党的主张，那么，党是不能命令它的，应当尊重这些组织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仍须采取民主的决定。而另一方面，这些组织里的党员，在其组织内部，仍然必须努力解释党的主张的正确性，继续争取其组织能够接受党的主张，因为党员应该绝对服从党的决定，这是一个党内纪律的问题，“九一决定”中已经规定的了。这种依靠党的主张的正确性，依靠党员活动的积极性而产生的党的领导作用，决不能称之为包办。什么才是包办？就是事无论大小，党都要去干涉，比如征公粮的时候，乡村支部里秘密的决定了那个派多少，这个派多少一类的事情，这是要不得的，它是有弊无利的，我们应该反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包办而认为党的正确领导也与包办无异，一直走向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

抱有上述错误认识和思想的同志，自然就不会尊重党的领导，自然要向党和党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这是由于缺少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产生的。这种思想上对党的模糊认识，就会妨害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的领导的建立，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二 对边区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

还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就是对陕甘宁边区民主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我们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还存在着某些缺点，但一般说来，它早已是民主的政权，是中国最进步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已经直接参加政权的管理。另一方面，人民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又是为人民办事的，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因为边区占一半人口的地区里曾经实行过土地革命，农民分得了土地，有田可耕，而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里正在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以改善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因为边区人民已经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一直到组织人民武装的自由。像这样的政治，可以肯定地说，已经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政治。但是有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认为边区的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的政治，离开人民自己作主的境地还很远，似乎现在的政府，并不是由人民自己产生的，而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一种“治者”。这种估计是不合事实的，它与党的估计是有原则的差别的。

说边区政治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并没有否认它在形式上、内容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比如说，被选到政府中的人

员，有些还不是选举得很好，还不能真正替人民办事。也有个别的人员，本来是工人农民出身，但他被选到政府机关中以后，并不真正为群众谋利益，反而沾染上了统治阶级的剥削意识，利用其地位以剥削与欺压老百姓。也还有个别的反共特务分子钻进了政权机关里，利用时机以进行一些破坏与暗害工作。这些人都需要从政权机关中清洗出去。其次，某些地区的下层政权还被地主阶级把持着，减租减息也没有认真执行；那里党的组织力量还很薄弱，群众的斗争热情还没有被鼓舞起来。对这些地区的政权及其所执行的政策，必须加以改造，必须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来加以改造。最后，政权机关里的一个比较普遍严重的缺点，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兴风作浪。这次精兵简政中的最后一条，就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对于这种脱离群众与违反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倾向，我们必须开展群众的斗争去克服它。我们要使每一个政府工作者能够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映群众的要求，真正为群众办事，以达到政权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目的。因之各级政权在一定期间的改选，自然是必要的。这便是我们对边区政治所应有的认识与估计。

认为边区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政治的同志，他们确实是看到了上述边区政治中的一些缺点，深恶痛绝，而想要改正这些缺点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把这些不好的现象和边区政治的本质区别开来，没有把这些缺点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反而被这些不好的现象，或者在个别地方发展得很严重的不良现象所蒙蔽，把它扩大起来，就认为边区政治距离民主政治还有天远。这种不合乎真相的说话，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它适投反对边区政治者之所好。

这些同志既然否认了边区的民主政治，就大大提倡“不断

选举”论，似乎民主的主要内容就是选举，似乎不断选举就是改进边区政治与保卫边区的唯一法宝。在他们看来，边区之所以有力量自卫，日寇与反共分子不敢来摧毁边区，就是因为边区真正进行了“不断选举”似的，这是如何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呀！他们没有看到不满意革命的民主政权的人们，正在利用“不断选举”来企图改造边区政权，以求适合于他们的利益与要求。不仅如此，他们根本不了解边区的民主主义不仅限于选举，尤其重要的，在于选出的政府真正能为人民大众办事情，谋利益。在他们眼里，只看到了一个选举，而不知选举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单单只有选举一项，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

把选举偶像化、神圣化的同志，认为今天边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选举。请看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颁布的选举指示信里所说的吧：“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同志们，这两个“等于”不晓得把好多党员及革命群众都送进“不要革命”的营盘里了。在“选举第一”论者看来，选举就是一切，边区之所以能够保卫，能够巩固，能够发展，并不是由于我们有能够打仗的军队，并不是由于边区老百姓的努力生产建设，并不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而只是由于“不断选举”的结果。存在着这种错误观点的同志，自然不去注意研究边区党的各项建设政策，不去注意组织边区人民的生产事业和军事建设等工作。

同志们，必须认识，今天边区民主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选举第一”，而是如何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这就是说，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发动人民大

众的积极性，使每户每人都积极地劳动，参加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战争需要，造成行动的民主，这便是边区民主政治中的中心任务。如果有人问，在边区党和政府最中心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答复应当是：如何组织每户每人的劳动生产，定出他们的生产计划，使男女老幼都来参加生产事业；如何组织变工队，使有劳动力者，缺少劳动力者，或是缺少耕牛的农民，互相调剂他们的劳动力，使每一个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发扬互相帮助的精神；如何组织合作社，使所有合作社的每一个社员，都能像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社员一样地享受一定的权力和许多实际的利益；如何组织运输合作社，合理地使用民间的运输力量，把“三边”的食盐运销到边区以外去；如何组织妇女纺纱小组，使妇女在纺纱中能获得一些经济权益，更加改进她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如何移民开荒，兴修水利，以增加人民的收入；如何发展植棉、纺纱、畜牧、养蚕等事业，使人民可以获得廉价的布匹以解决被服问题；如何改进学校教育，使乡村儿童乐于读书，并逐渐消灭文盲。所有这些都是今天急于要做的工作，党和政府要善于组织这些事业，各级政府与参议会要经常讨论这些问题，订出具体的计划，认真执行，并按期检查，和全边区的老百姓一起来办好这许多事情，这就是边区民主政治的实质。只有在进行与领导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才能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民主内容丰富起来。也只有在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

由于对边区今天的民主政治的中心内容认识之不一致，就产生政策上的分歧。“选举第一”论者认为边区的中心工作就

是选举、选举、不断的选举，使之与党所提出的生产建设的中心任务相对立，要求党和政府以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办选举，而把生产建设事业这个中心任务放在一边，不去过问。对西北局关于生产建设一类的决议，不去详细研究和讨论，不想出具体的执行的办法，而采取消极的态度。由此可见对民主问题认识的不一致，对现行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也必然要造成不尊重党和闹独立性的恶果。

三 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

再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发生在某些军事工作的干部中，就是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认识是模糊的。由于这种模糊的认识，就产生了一种军阀主义的倾向。

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它是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是人民当中比较觉悟的分子所组成的，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它对敌人是毫不留情的，是需要霸道主义的，打起仗来，冲锋陷阵，杀死敌人，以求自己的胜利。但是它对于人民就不应该霸道，而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并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战斗。对于地方党与革命的政权，应该是尊重的，接受他们的帮助和批评。我们的军队必须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和打扫战场，有缺额或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我们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老百姓依靠军队来保持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既得的果实，军队也必须依靠老百姓才能生存、巩固与发展。因此我们党自有武装以来，从很小的游击队到大规模

的红军兵团，以及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与老百姓及地方的党政机关建立着亲密的联系。我们时常把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比做鱼与水的关系，就是说鱼没有水不能生存，军队没有老百姓也是不能生存的。

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军队，其另一表现，就是军队内部的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的打成一片。指挥员经常关心战斗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战斗员也是自觉地参加部队，自觉地服从指挥员的行政和作战的指挥。因此指挥员和战斗员共甘苦，同患难，衷心地团结一致，没有什么隔膜，绝不像军阀部队中那样上下隔膜甚至是互相仇视的官兵关系。

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我们军队内部，建立了优良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不断地加强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提高一般指战员的觉悟程度，使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在战斗中成为英勇坚决的战士，而且还要他们懂得党的基本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我们的军队是有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机关和部队中的党，有其极高度的政治威信。

同志们，我们今天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虽然一般地还保持着过去的优良传统，但是在某些干部和某些部队中，产生着一些严重的现象，它对于过去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和摧毁的作用，这种现象，就是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就成为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必须认识，必须警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虽然它还只是一种倾向，但它却在发展着，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它，防止它发展，然后才能巩固我们的部队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当然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只是一种倾向，还没有成为军阀主义，还没有成为一种军阀主义的体系。但是如果任其发

展，那是非常危险的，张国焘主义就是发展到最高峰的军阀主义，他利用党的武装力量，公开反对党，分裂党，因此值得我们警惕！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有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的坏想法。他们要想自己培植一个系统，造成一种势力，用一些不正确的办法，拉拢一些干部，若要调动他部队中的人员或干部，他是不愿意的，若要他自己离开原来的部队，他更是不愿意的。在对党的关系来说，往往是利用他在部队中的地位与势力和党对立起来，在他的脑筋中，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样他就会对党的领导不尊重，对党的政策不研究，更不必说去坚决执行了。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某些部队内，干部和士兵之间的关系，较之红军时代，起了一种变化。今天的留守兵团中，一般地说，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关系比之红军时代，恐怕要差一些。某些部队中的某些指挥员，产生一种脱离战士群众的严重现象，产生一种只图自己享乐的腐化思想。他们破坏了革命军队过去所建立的各种严格的优良的制度，甚至于浪费和贪污的也有。这种人的思想和品质是在逐渐蜕化着，他们已经不会真正去照顾士兵的生活问题，已经有着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即使有时对士兵实行打骂，他们也认为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些干部之间的关系，也从正确的原则关系变而为无原则的拉拉扯扯，互相包庇，瞒上欺下，勾心斗角，以至互相排挤，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却起着一种腐蚀和瓦解革命军队的作用。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军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

作之松懈与削弱，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与威信也日渐降低。对部队中所发生的一些不良倾向，不去作积极的斗争和纠正，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这样就使一些不良倾向更加滋长，如嫖、赌、贪污、逃亡的现象，在某些部队中相当严重。有几个人集体贪污的，有花费十几万元开赌场的，逃亡的数目也相当大，几年来干部逃亡的也不少！在这些不良倾向较为严重的个别部队中，是邪气胜于正气的。同志们，这种不良倾向还不够严重吗？这不是说明革命军队的纪律松弛了吗？这不是说明部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是被削弱了吗？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种不良倾向较严重的个别部队里，简直是没有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地位了！

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较之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一般地说，是差了一些。军队照顾人民的利益和帮助老百姓做事是不够的，而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欺压老百姓的事情，甚至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工作人员的事情发生得相当多。军队遵守政府法令的精神不够，而破坏政府法令的现象却不少，比如私用法币，包庇走私，偷漏税收等。甚至有人这样说：“有政策就是有违反政策的，有纪律就是有破坏纪律的，不然个个都是布尔什维克，哪儿还有开除党籍的人？”同志们，这就是他们“坦白的”说出了他们对党和党的政策所采取的态度！军队中有些干部骂政府，甚至骂到边区政府的头上。他们对政府的一切法令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的。无怪乎有人这样说：“政府的法令，只能够拥护，不能够执行！”这便是某些部队对人民、对政府采取军阀主义倾向的结果。至于过去政府对军队的照顾不够，优抗工作也做得不够，这也是事实，在这里我不打算来谈它了。

以上种种，都证明在留守兵团的某些部队中，是生长和发

育着一种军阀主义倾向的。自然我们还不能说在留守兵团里已经有了严重的军阀主义路线，也不是说我们军队的本质是差的。相反的，我们军队的本质是很好的，基本上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和战士都是经过长期的战斗生活的；在有一些部队中，是很少或者是没有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的。而且几年来留守兵团是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并且在经济的自给自足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解决了许多困难，这许多成绩是值得表扬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军阀主义倾向的产生，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我们不严重地提出这个问题，不想办法去克服它，任其自流地发展下去，那是可以使我们的军队逐渐变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说，某些个别的干部，在这种倾向的滋长中，是已经开始起着质的变化了。

产生这种军阀主义倾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客观上军队的地位很重要。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武装斗争，今天我们是处在民族抗战的战争环境中，军队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这样就使某些军事工作干部，主观上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自高自大的心理，以为自己了不起，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高，似乎他真有了不起的本领，天下都是他打出来的，甚至党和政府都是他一手创造的。另一方面，在长期统一战线与和平环境中，有些干部失掉了警惕性，反而沾染了中国社会中的军阀主义的恶习，忘掉了自己是革命军人，模糊了对革命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认识。此外，在几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下，各部队自己进行生产，又由自己来分配，使过去严格的供给制度破坏了，自己生产的东西多用一点似乎也没有关系，这样就引起了一些干部在思想上起了变化，跌入浪费、享乐和贪污的泥坑。但是，这里必须严重地指出产生军阀主义倾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留守兵团的最高级领导机关

不但没有及时发现这种倾向，并向之作积极的必要的思想斗争，反而他们自己本身也存在有这种倾向，把军队看得比党还要大，不尊重党，向党闹独立性。当中央军委派考察团到留守部队去考察工作的时候，他们采用了一些不正常的办法。这样他们自然就不能很好地积极地在部队中进行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领导工作。今天我们的党，提出了思想上的统一，提出了建立以党为中心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

四 建立坚强的一元化领导

上面我讲了三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即有某些同志对党的认识上，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上，对革命军队的认识上的许多模糊或错误的观念。同志们，边区党所执行的总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是正确的，但在对于以上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及认识问题的方法上，有某些同志还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分歧，还产生一些偏向或倾向，还不能完全一致。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是夹杂在政府的领导思想当中的。它虽然在政府的领导思想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但它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是有某种程度的妨害的。在政府工作的同志中，还有对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如林伯渠同志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对于边区所处的战争环境的认识问题，对于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的认识问题等。在留守兵团的领导思想中，也还有对于统一战线问题，对于建设根据地问题，存在着与党的认识不相一致的地方，这在贺龙同志的整军报告中已经指出了。在过去青年运动中的“青年主义”和“第二党”的倾向，文化工作者中的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某些专门家在边区建设方针上的意见不一，

这许许多多思想上的不一致和偏向，都在这次高干会中揭发了出来，以求党内思想的统一，以奠定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牢固基础。同时，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与阶级立场的不坚定而产生出来的。假如我们这次高干会上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不能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彻底地揭发它、批判它与纠正它，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让它存在，让它发展下去，那么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无法建立，高干会上所决定的许多政策也就无法执行，无法贯彻到底。因此，这次高干会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因为它不是在许多现象里兜圈子，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使我们边区的党，在思想上奠定了领导一元化的基础。我想，这次会议以后，以西北局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在边区应该是能够很巩固地建立起来的。

今后西北局的领导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掌握思想上的领导，继续这次高干会着重检讨思想问题的精神，更加努力地达到西北党在思想上的完全一致，克服存在着的和可能生长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这是第一个业务。其次要抓紧当前边区工作的重要环节，就是努力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并注意干部的学习领导，用全力研究与掌握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的各项政策，以指导全西北党政军民各种工作，并组织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

西北局以下的各级党政军民关系，也要建立健全的以党为中心的—元化领导。今后各级党委的任务是更加重大了。边区党各级的干部，必须忠诚地服从西北局的领导，为坚决执行西北局的每一个决定而奋斗。对于某些仍然继续闹独立性的同志，须严申党的纪律。西北局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西北的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组织，只有爱戴西北局，坚决执行西北

局的决定，才能表示他们真正是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真正是爱戴党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

任 弼 时

一 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

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对于领导战争动员工作是比较有经验的、熟练的。每一个动员任务来到的时候，不管怎么困难，都能迅速地突击式地完成它。但是从整个边区的工作看来，除开延安、靖边、清涧、陇东一些地区或者还有一些地方之外，许多地方的情形是：在一次动员任务完成之后，便感到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或继续做第二件动员工作，似乎是除了动员以外，就没有其他工作可做的样子；或者是不管什么性质的工作，缴公粮也好，运盐也好，组织冬学也好，办合作社也好，既不区别哪些是取之于民的，哪些是帮助老百姓或给予老百姓以利益的，又不分辨哪些是临时性的工作，哪些是经常性的工作，一律当做动员工作来看待，一律采取动员工作的方式去办理。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了我们边区许多地方的工作，还是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是动员工作的方式代替了一切

* 这是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讲演的第二部分。

其他方式。这种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风，不但办理不好许多细腻的、经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觉到今天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都只是动员，只是向他们要东西，还不如苏维埃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直接给了他们许多利益。两相比较，老百姓对于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关系，自然没有从前那样亲密。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造成这种情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抗战以来，边区的环境变化了，任务也变化了，而我们的许多干部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还没有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转变我们的领导作风，却仍然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办法，这就需要我们今后来一个大大的转变。

这几年来，我们边区所处的环境有些什么特点呢？一方面是我们面对着战争，全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敌人与我们隔河相望，而在我们的周围又有几十万数目的友军，时有向我们闹磨擦的威胁。这样就使我们不能不经常处于戒备状态，以求保卫边区的人民和边区的人民政权。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处在一种和平的环境，边区是一个前线的后方，敌人虽然对我们有空袭，有隔河炮击，但它的兽蹄还没有和无力踏进边区里来。抗战以来，国共之间的武装斗争已经停止，虽间或有过武装磨擦，但并未破裂两党的抗日合作。这样的和平环境，对于边区是有利的。战争也是为着求得和平。华北、华中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经常遭受敌人的反复“扫荡”，遭受敌人“三光”政策的破坏，那种情形在边区是没有的。同时，就今天国共两党关系的形势看来，也可能走向好转，大规模的磨擦战争大体上也不会发生。因此，在这样的和平环境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

同志们，我们应当怎样建设，应当建设些什么呢？边区从

旧社会接受下来的遗产太不丰富了，这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因而我们不能妄想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样样都作好，样样做模范，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小学到大学，从托儿所到养老院，像某些同志所幻想的那样。我们应当从可能和需要出发，应当根据边区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必要的建设。在今天说来，最可能与最需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够担负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改善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因而，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我们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去进行。列宁曾经教导过我们：“仅仅一般的作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徒，共产主义的信徒那是不够的……需要在每一个时期里，找出这样一个特别的环节，对这个环节应当用所有的力量把它抓住，以便握住整个链子。并巩固的准备过渡到以下一个环节”。在边区，在和平局势下，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发展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中，尤以发展公私农业生产为中心。只有开展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这就是说，只有抓紧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更加富裕起来；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问题；才能给我们以物质的保障来完成教育与培养大批干部的重大任务，以准备迎接行将到来的胜利开展的局面。同志们，应该认识边区今天的斗争任务，比较处在敌后的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前进了一步。那里是战争的环境，中心的任务是战争，是打开局面，击破敌人的“扫荡”。而边区已经是有了一块比较完整而且巩固的和平的地区，斗争的任务也就前进了一步。应该根据可能的条件和斗争的需要，在民主和建设上，今

天特别是经济建设问题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这不仅可以给予将来也要进入和平环境，也要以建设任务为中心的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以榜样，使他们少走摸索的曲折的道路，而且这些办法与经验，也可供大后方经济建设事业以参考。这样，加强边区对全国的影响，提高边区在全国的地位，便不致于流为空谈。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过去对于经济建设事业的努力程度如何。我们说是作了一些工作，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应该自我批评地说，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我们还不善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真正抓紧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我们时常听到有些同志这样讲，工作非常多，指示也不少，但似乎没有一种带经常性的中心工作。虽然党中央和西北局老早已经提出发展边区经济的积极方针，指出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但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有许多同志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就妨害了这个方针的贯彻。比如在军队方面有了“打出去”的不正确的想法，自然不会积极地来建设边区。大会上已经批评了军队方面对边区经济建设消极的错误。但地方党政方面，对经济建设工作是否可以说已经是足够的注意了？照我看，同样是注意得不够的。产生这种放松经济建设工作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九三九年之前，边区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依靠外援解决的，忽略了从经济建设中解决自己困难的任务。另一方面，两次的反共高潮，边境上的磨擦战争，以及反共军队可能进攻边区的威胁，也妨碍了我们作长期打算，积极地进行生产建设的工作。而最基本的原因，是军队也好，党政机关也好，对于生产建设的重要性之认识是不够明确的。大家还没有深刻地了解，在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

受敌人侵袭以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正因为这个真理未被全党同志所了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才被忽视，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才未被抓紧。只有某些区域的党政机关（如延安、靖边、陇东的某些地方等）和某些部队（如三五九旅、保安部队、警备一旅的第一团）真正抓紧了经济建设工作，作出了很多成绩，探寻出一些生产建设的规律，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经济建设事业的方针。如果边区的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干部，及时地认识了新环境下的中心任务，及时地抓紧这一中心环节，以全副精力来进行生产建设，那么，我们边区的生产会更加发展，自力更生的基础会培植得更加巩固，边区的地位和影响会较今天更加提高和扩大。假使地方党政机关，都能像延安一样，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解决生产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移民开荒、劳动互助、妇女纺织、合作社等，那么全边区的人口会比今天更加增多，边区人民的生活会比今天更加富裕。假设边区部队都能像三五九旅等努力生产建设的部队一样地去开荒种地，合理地组织战士进行生产，那么各部队也必然具有比今天更雄厚可靠的经济基础，也必然会减少更多的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错过了一些时机，如果我们能早加注意，我们的成绩和收获是较今天更多更大的。这次高干会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经济建设事业，使大家认识了经济建设是当前边区工作任务的中心环节，了解了今后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这样就扫清了许多对于中心任务，对于建设

方针的模糊认识。

同志们，任务改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和平环境的建设工作和战争环境的战争动员工作，性质不同，进行的方式也就不同。过去的老一套方法，在今天和平建设任务之下是不适用或很少能适用的。内战时期，陕北是处于一种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心工作是组织队伍，进行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群众长期处于地主和军阀的压迫下，打土豪、分田地在当时是为他们谋利益的，群众就比较容易发动起来。在那种战争环境当中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动员人民参加游击队，并要他们帮助军队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兵，打扫战场。那个时候所建立的临时政权，因为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也没有好多的建设工作可做，粮食和经费主要是从打土豪得来的，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分配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帮助军队进行动员工作，或者可能从事一点文化建设的工作。总之，那个时候的工作，是一切适合于战争的需要，我们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一套作法，已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掌握了许多规律。但是对于和平建设的一套作法，却还在摸索中，还在过渡的阶段中。“凡事起头难”，经过一阵摸索之后，才会逐渐发现一些规律。比如许多机关所办的工厂，大体上都是先赔本的，因为赔本，才加以改进，随后才进入获利时期，其原因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办工厂的经验。我们往往用建设军队或建设机关的方式来建设工厂，用了一大堆不从事生产的工作人员，如厂长、副厂长、指导员、管理员、采买员、勤务员等等一大套，应有尽有，比直接参加生产的人还要多。或者是把都市中大工厂的设备应用到我们的小规模生产里来，致使成本过大。或者是强调自觉遵守纪律，反对严格管理，致使劳动纪律松弛。赔了本，受了教训，才会想方法改进，逐渐使其走向正轨。再如

办合作社，起初是简单地、机械地按照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规章办事，办得群众都不愿意参加，卖的东西也不比商店便宜，使许多合作社遭受失败，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不断的改进，才发现了真正合乎群众需要的像南区合作社那样的形式，它是与南区人民血肉相关的深受群众爱护的很重要的经济事业机关。其他如修水利、开荒、移民、运盐、纺纱、国民教育等，都是经过了摸索或失败的过程的。在军队方面，情形也是一样。我们的军队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建立了战争时期的一套制度和工作的方法，但是对于和平驻军时期的一套工作方法，就没有经验。几年来留守部队虽然有某些部分或某些工作，也找到了一些新的工作规律，但整套的适应新环境的工作方法，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的。

由此可见，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在边区，经常性的建设工作的传统和作风，还没有普遍地建立起来，而只是在少数地方如延安、靖边、陇东某些地方逐渐培养出这种新的工作作风，但还是不够完整的。从整个边区看来，还是处在由内战时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转变到普遍建立建设工作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过渡阶段当中。但是在上述少数区域以内，已经创造出一些适合和平建设环境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这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必须传布到全边区去，为大家所学习，并加以发扬。今天某些干部在工作中感到苦闷的原因，就是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以建设为主的工作环境，而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感到“棘手”，感到办法少，这也说明了转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必要。

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

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这种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之下的独立解决问题，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不同于闹独立性。我们不要因为反对闹独立性而走入另一偏向，就是妨碍各个部门、各个组织、各个同志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下，按照具体情况，独立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发展。我们所反对的独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为所欲为”的现象。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作事的积极性，只要这件事情是群众需要的，是适合于边区建设的利益的。在发扬这种独立工作的能力，发扬这种创造性时，应该注意的是，必须打破公式主义，不要像过去办合作社一样，使群众觉得与己无关，甚而是一种负担。打破公式主义，就是要我们尽量运用群众习惯中所有的一些方式，比如不用劳动互助社的新名词，免得老百姓不懂、害怕，以为又是向他们要东西的新花样，而采用群众所熟悉的变工队、扎工队一类的形式而加以改进，使它们实际上成为劳动互助社的性质。其次就是善于在事业的进行中，很好地组织人民的力量。要改造那些群众所不喜欢的东西，定出适合群众口味的办法，使群众感到所办的事业对他们是有利的、方便的，像南区合作社所进行的业务那样，如代缴公粮，老百姓既可免去麻烦，又可作为股金，自然是非常满意。这样，合作社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它在群众中的信用更加提高，它的业务也就可以更加发展。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二 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

在领导作风问题上，党也好，政府也好，军队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这种情形，固然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时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限制他们对于问题的了解，也多少有些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指出，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作怪。

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不是从实际的可能条件出发，并没有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程度，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凭着一种大概的估计而制定出来的。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些党部对上级发来的书面指示，也不正式提到会议上去讨论，只是由党委的一两个负责同志看过一遍，就关在箱子里，置诸高阁，时间久了，决定的内容已经忘却了，更谈不到研究当地的情况，定出具体执行的办法了。比如边区经济建设问题，西北局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已经作了决定，送发到各个地方。那个决定里，一般说来，是正确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建设任务，指出了发展生产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但这个决定并没有普遍引起各地党部的注意，或许有些党部根本没有讨论它，或许有些党部随随便便讨论一下，致使大家还没有把经济建设看做自己的中心工作。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当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解释，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法。这样，就把事情弄得很糟糕，本来是与群众有利的，群

众是会欢喜的、赞成的，却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不赞成的，反使群众不满。比如过去办合作社、办学校等，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毛病。官僚主义倾向还表现在，有了一个计划也是摆样子的，不去组织执行，更不去按期检查执行的程度，而一味醉心于许多“不执行的计划”，东也计划，西也计划，形成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这就是固临县委组织部长说的“在桌子上跳舞”，因为他只是在办公桌上写计划，却没有考虑到计划可不可以行通以及如何才能行通。军队里也有“计划多、报告多、工作少、麻烦多”的现象。总而言之，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在我们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里，还有这样的极少数的官僚主义化了的分子，他们虽是出身于工农群众，虽然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也正如固临县委组织部长所说的，这些人“脑子里装满了法币”，因此就可以贪污，可以作恶，可以无法无天。

同志们，像这种官僚主义倾向的坏作风，是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的。像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我们的新的工作作风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这次高干会总结了我们几年来的工作，明确地规定了生产与教育是目前边区的两大任务，而经济建设是我们工作的中心环节。那么，转变我们领导工作的作风，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

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究竟如何来建立我们的正确领导，建立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呢？少奇^①同志在他的第一次讲演中已经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职责，并清楚地提出了许多办法，我们应该照那些办法去改进我们的领导。斯大林同志对领导问题曾有总结性的正确指示。他说：“正确的领导——这就是说：第一，必须正确的决定问题。而为要正确的决定问题，就非估计到群众所有的经验不可，群众是亲身遭受到我们的领导的结果的。第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的执行。而为要组织这种执行，也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而为要组织这个审查，也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正确的领导必须建立在正确地决定问题、正确地组织决定之执行和经常地组织对决定执行情形的审查，而这些工作必须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假如不得到群众的帮助，那我们正确的领导也是无法实现的。

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正确决定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不应当以主观的态度去从事工作，制订计划；就是要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要不使我们的决定一到实际中就破产，不使我们的决定成为空洞的不能执行的口号，不要像我们过去一般地背诵一遍所谓领导春耕、夏耘、秋收工作等口号一样，而要学习毛主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像这次他所起草的经济建设计划一样。他不是笼统地提出要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而是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边区究竟有多少荒地，有多少劳动力，有多少半劳动力，能够移民多少，依据这些条件决定我们究竟可以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并且为着使规定的开荒和

增粮的数目字能够真正实现，又研究了如何增加劳动力的具体办法。比如发展带有劳动互助性质的变工队组织，利用变工队的形式来发展在私有经济基础之上的集体生产，以获得增加和调剂劳动生产力的效果。延安的同志和靖边、清涧的一些同志，过去就是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决定问题的，他们在组织春耕、开荒、移民、合作社以及植棉、水利、纺织等工作时，都是用这种态度去解决问题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地区的同志来效法的。

在问题决定了以后，不能让这些决定变成为空洞的口号，成为纸上谈兵。要使这些决定变成积极的行动，而且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保证它的实现，就必须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就是如何去组织这些决定的执行。比如我们这次大会所通过的毛主席起草的经济建设计划，是按照需要与可能制订出来的，但要这些计划由可能实现进而为实际的现实，首先就要各级党部仔细地研究与讨论这个决定，按照各县各区各乡不同的具体情况规定出该县该区该乡执行这个计划的具体办法，并坚持执行下去，克服一切中途的困难。要执行计划，要把事情办好，这里不能忽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挑选和配备适当的称职的工作干部。另一方面，必须把这个计划在群众面前进行很好的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这个计划对他们是有利益的，使他们拥护这个计划，自愿为这个计划的实现而行动起来，也就是说，把领导机关的计划变为群众的计划。我们每一个党员应成为执行这个计划的模范。比如毛主席特别号召我们发展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要我们普遍采用集体生产性质的变工队的组织形式。我们首先就应当使党员和群众认识这种变工队的好处，可以调剂劳动力，调剂耕牛，增加粮食生产等，使他们乐意来采用这个办法。这样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善于挑选农村中富有生产经

验与劳动热忱的农民去担任变工队的队长，要善于配备与组织变工队的干部。假如我们马马虎虎找一个劳动力和劳动经验都不够强的，或者简直是吊儿郎当好吃懒做的人去当变工队的队长，那么其他的队员自然就不高兴、不满意，变工队就不能组织得很好，工作的进行也必然不会好。相反的，如果我们挑选农村中被大家所佩服的积极劳动的和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像吴满有这样的劳动英雄来领导变工队，那么，在春耕、夏耘、秋收的时候，他指挥别人从事劳作很得法，今天帮助这家，明天帮助那家，参加变工队的农民自然就会很高兴，就会拥护变工队这个组织。同时要使变工队能够及时地迅速地组织起来，就需要农村里的党员同志积极参加变工队，发挥高度的劳动热忱与帮助他人的精神，成为群众参加变工队的模范。这样，变工队就不会搞不好。再比如，我们办一个纺纱或织布工厂，特别重要的或有决定意义的，也是挑选和配备干部。我们要善于在群众中挑选出有办理这个工厂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同志来担负这个工作，这样工厂才能办得好。群众中是不缺乏这些人才的。假设我们随随便便配备了一个没有经验又没有组织能力的人去办理这个工厂，他一定要浪费许多时间、精力和物资，重复过去摸索过程中的许多缺点，摆很大的架子，用很多不从事生产工作的“工作”人员，花费很大的成本，结果只有一条道路，贴本以至于关门大吉。如果这个工厂是由群众集股举办的，那它马上就会在群众中失去信仰，而且会使群众对于党所号召的其他建设事业也冷淡起来。因此，每个正确决定通过之后，事情还不算完结，而必须进行很精细的耐烦的组织工作，特别是慎重地挑选和配备干部，因为干部的才力和品质对于一种事业的成败，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

有了计划，有了干部，工作在那里进行了，但这还不等于

工作已经完成。工作中有了毛病还需要改正，有了经验还需要总结，总之，还需要经常的审查和督促。斯大林同志指出这种审查和督促之“所以需要，第一就是因为只有实行这样审查，才可以透彻无遗的认识工作人员，查明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就是因为只有实行这样的审查，才可以查明执行机关的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就是因为实行这样的审查，才可以查明该工作指示本身的优点和缺点”。

斯大林的这些话，第一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为配备了好的干部，事情就可办妥，就可以高枕无忧。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有组织能力、工作能力的干部，可能是适于组织运输队，适于组织合作社，但却不一定适于组织变工队。也可能这个同志原来适宜于组织变工队，但因为后来不善于团结队员，或者不能公平地恰当地分配队员的劳作任务，惹起队员的不满和反对。因此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审查，从工作审查中去了解干部的品质，了解他的德和才是不是适合于他所担负的工作。

第二也就是说，我们在审查工作中，去了解执行机关是否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的工作，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好好的审查执行程度——这是一种探照灯，这种探照灯帮助我们随时查明机关工作的状况，并揭露官僚主义者和文牍主义者的原形”。

第三也就是告诉我们，只有经过经常的实际的审查，才能够发现我们原订的计划是否有主观主义的成分，是否真正是从实际情形出发的。

总之，只有在经常的审查中，才能根据工作中的经验，发出具体的补充指示，以便更好地更进一步地解决具体问题。比如我们发现了我们原来配备的干部不恰当，怎么办呢？就及时地调换这种不恰当的干部，用称职的恰当的干部代替他们。比

如我们发现了执行机关是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工作的，怎么办呢？就及时地改造这个执行机关，或者设法纠正执行机关的这种错误态度。比如我们发现了原订的工作计划和指示本身是有缺点，是不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的，怎么办呢？就及时地修改或补充原来的工作计划，使它成为真正能够行得通的可以实现的计划和指示。

当我们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审查的方式和方法。第一，我们审查一件工作，不能单凭它的计划或者是书面报告，而必须要到工作实际进行的地方去，审查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它的具体结果。第二，我们在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不应当是仅仅从上而下的，仅仅依靠执行机关来进行审查，自然这种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审查工作的全部，还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审查。比如我们审查一个工厂的工作情形，不仅要派人去审查这个工厂的管理机关的工作，和经过管理机关去进行审查，并且要发动这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由下而上地审查它的业务计划进行的实际情况，审查工厂管理机关的领导工作。只有采取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配合的审查方法，才能使我们对于工作执行的实际情况了解无遗，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

我们在审查工作中，应当善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了解工作中的情况，而在于从了解工作情况中想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在一件工作进行完毕之后，就应当进行经验总结。如果这个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或者本来就是经常性的工作，那就要恰当地分出一定的阶段去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一件工作，得出了许多经验教训，就必须利用这些经验教训，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教育工作，因为它是最好的最生动的最具体的教育材料，并且要把这

些经验教训在各地运用起来，使它更加丰富。比如我们总结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教训，就拿来进行教育，就在各地普遍地采用起来，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有更好的改进。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各地对于总结工作还是做得很差的，或者是做得不够的，这也使我们的工作不能迈开大步前进。

我们应该依照这些原则，来建立我们经济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风。但是从整个边区看来，在警备区，在陇东，在南边的鄜县一些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那里的民主政治的中心任务，首先是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只有真正减少了租息，使群众得到了利益，他们才会安心地努力去生产，才会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谈得上开展经济建设的事业。一般地说，减租减息政策在那里还没有被认真地普遍地实行，那里有些地方的下层政权还在地主阶级的手里，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有少数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是采取怀疑态度的，他们中间有人这样说：“究竟现在是山羊和绵羊之分，还是谷草和莠草之分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还有一种群众的呼声，他们说：“地主怕农民，农民怕政府，政府怕地主。”地主怕农民是因为农民有力量，农民怕政府是因为政府有权力管理他们，政府怕地主是因为这个政府还不是真正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的。这告诉了我们，那里的下层政权还是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减租减息的政策还不能很顺利地执行，老百姓的生活还没有被改善，老百姓的政治权利还没有被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还被压抑着。我们应当给那些地区分配以有力的干部，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发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改造政权，使之成为真正的“三三制”政权，并由这个政权去领导经济建设的事业。在那些地区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同样的也应该依照上述的原则去建立。

要培养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所谓领导是艺术，就是指的这个道理。而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

三 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

毛主席在高干会演说中，曾经号召我们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也曾经指出，在我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中，还存在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存在有贪污、腐化、堕落的严重现象，军队中也存在有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许多要反对要肃清的东西。用什么办法去反对，去进行斗争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我们这次高干会之所以开得好，就是因为我们正确地运用了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什么话大家都说，有什么缺点不隐瞒地揭发出来，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来改进今后的工作。像这样的发扬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过去在边区的党内还是不够的，而这种民主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也常常会被有官僚主义或军阀主

义倾向的人们和贪污腐化者、自由主义者所阻碍、所压抑，因为他们是害怕批评的。

边区的党，今天是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它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地方，因为战争的环境，就更加需要集中，党内民主就不得不比较缩小些。而我们边区的和平环境，就使我们有可能和必要将民主的范围扩大一些，发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对党政军民的工作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这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不如此，坏的东西就无法肃清，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彻底转变也会受到阻碍，即使这次高干会所通过的很好的计划，哪怕是毛主席亲手写成的，也会落空，也会无法贯彻。

在边区的留守部队中，应当怎么办呢？一般地说，军队是集中的军事组织，军队中民主的范围是比较狭小的。但我们留守部队，今天是处在和平驻军的环境中，而我们部队中又存在着军阀主义倾向和贪污腐化的严重现象，不克服它就会阻碍我们的建军工作。因此，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定的时期内，部队中党的组织内的民主可以有意识地扩大一些，发扬部队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与批判部队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这对于今天的整军工作也是必要的。

同志们回去之后，应该根据这次会议中正确地运用的党内民主与开展自我批评的精神，去传达会议的一些决议和计划。必须把高干会的这种精神带回去，发扬起来，并且向同志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在召集各地党的会议时，也要采取高干会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民主讨论的办法，把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工作加以检查，丝毫不隐瞒地揭发工作中的某些弱点或某些倾向，以治病救人的办法，使大家认识那些错误，纠正那些错

误，改正自己的作风。这是转变整个边区工作作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然的话，大家在这里讨论得很热烈、很严正，而跑回去之后，又把这种精神置于脑后，对于当地工作中的某些错误与倾向，反而采取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那么，我们整个边区工作的作风就不会真正地转变过来。

我们时常看见有一些同志，他们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只喜欢人家表扬他的成绩，却害怕人家批评他的缺点，因而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改进工作的办法。正如一个人生了疮毒，讳疾忌医，结果溃烂下去，整个身体的健康都要受到损害。列宁曾经说过：“政党对于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这个党是否郑重和它是否在事实上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义务。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那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党的标志，这就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对待自己错误所应持的态度，整个党如此，每个党员也如此。

或者有人会这样设想：如果发动下面的群众来检查领导机关工作和进行批评，那岂不是要丧失领导人的或者是领导机关的威信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确地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恰恰是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消除了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与不负责任的习惯，才能更加巩固工作纪律和劳动纪律，使每个工作者成为

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人。

四 使组织工作适合于当前的任务

我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既然是发展经济，那么，就要求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要使它的机构，它的人员，它的业务，能够适合于发展生产的新任务。

今后的农村支部与乡政府，都要以如何领导农村生产事业为它的中心工作，改变过去那种多开不必要的会，多花费有用的时间的老作风。据高岗同志的统计，我们边区三十万的全劳动力，花费在开会和其他勤务工作的时间，每年约为二十万人的一个月时间，用它可能生产出十万到十二万担的粮食，我们应该减少这方面的浪费。支部大会不要开得太多，不必要的可以不开，甚至一年只需要开四次支部大会，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征收公粮时）之前各举行一次，决定一些进行这些工作的好办法，或者还可以少开一些。平时可以利用时间举行小组会，其内容也要很好地和农村生产事业、生产组织相结合。比如说，将来农村里要普遍组织变工队，我们就可以使小组的经常活动与农村变工队的经常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支部书记、乡政府主席、支部干事、小组长，都需加以重新审查和配备，挑选富有生产经验、劳动中积极的分子和党性强的同志去担任这些工作，以加强农村支部、乡政府对于农村生产事业的领导。群众团体也不要再梦想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时代那样的大刀阔斧的作法了。它们的组织与工作，今后必须转到一个新的方面，就是要用变工队、运输合作社、纺织小组等群众所需要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去进行工作，这样才可以使群众团体不致于脱离群众。

干部决定一切，因而我们要重新审查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工作中的干部是否称职，是否适宜于领导这些工作，不称职的或不适当的，必须加以调动，另用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去代替，或者给以训练，培养与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同志们，生产建设是繁重的工作，同时又是最实际的工作，不但要用脑子去考虑问题，而且要用手用脚去改变事物，在一些重要的领导和执行机关中，一定要配备有工作能力的和党性坚强的干部。为着加强对于经济建设和经济组织的领导，甚至于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从上级的比较次要部门抽调到下级的主要部门中去，从上级的不直接组织生产的岗位抽调到下面的直接组织生产事业的机关里去工作，也是应当的、必要的。只有各级党委都能抓紧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全党上下都能重视经济建设工作的进行，才能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对于工作积极，肯负责任，有创造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必须加以奖励；而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加以处罚。特别重要的是要反对政府、军队和党的系统中的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这对于巩固党的组织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在国内战争时期，贪污的现象是很少的，那时贪污了几十块钱就要枪毙的。到了今天，在统一战线的和平的环境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下，产生了这样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如果我们不加注意，不努力克服，任其发展下去，干部与党员就会起着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大会上提出了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贪污腐化现象，汉奸和特务分子正是要寻找这些人，抓住这些人的弱点，利用他们去进行破坏工作。尖锐地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把那些思想上已

经蜕化而成为异己的分子，坚决地清洗出去，在今天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除了抓紧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和配备坚强的干部以外，应该号召我们每个党员同志成为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同志们，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党员呢？如果他是努力生产的，热心劳动的，从劳动生产中得到收获，一方面家庭的生活较前富裕了，另一方面，缴公粮，担任各种勤务时也能成为群众的模范。这样的党员，公私兼顾的党员，应该说是一个好党员。我们应该在开展群众的生产运动中，测验我们的党员同志。过去，有这样一种党员，不缴党费，不到会，不做工作，我们称之为落后的消极分子。但是这些人的中间，有没有一心一意想把生产搞好一些，因而不愿麻烦，不愿管闲事的呢？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对于这些人还是要进行教育，还应该在今后生产建设的方针下继续考验他们，不适宜很快地让他们离开党。也有这样的一种党员，他们在党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今天，还是不改变对于生产的惰性，不愿意从事劳动，多少有点“二流子”的习性。对于这一种人应该好好向他们解释，要他们改变对于劳动的态度，并指出如果执迷不悟，就会妨害党所领导的生产事业，就可能被清除出去。同时，在生产建设的运动中，一定会有许多努力生产和富有创造性的模范者在群众中涌现。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使党增添新的血液，增添许多对生产事业抱有极大热诚和进取心的新的成分。

只有改善党的成分和干部的配备，并根据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原则，根据精兵简政的政策，去改变某些组织机构，使之更加适合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

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才更能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更便于转变党的领导作风，更加保障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刘少奇。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等问题 给陈毅、饶漱石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

陈、饶：

四日电悉。（一）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荫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二）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其他路线则可经刘晓送西安转延，或经北京、彰德、开封转延，交通建立办法另告。但人数不能太多，并须可靠的能在敌区国民党区行走的干部才可以。

（三）在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来延安，以免在敌后损失，但须估计他们的身体是难于长途行军的。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 第一届参议会发表宣言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晋察冀分局：

(甲)二十九年发布之施政纲领在群众中有很影响，并且直至现在还是适用的。目前不但不应发布和旧纲领并无多大区别的新纲领，而且不应对旧纲领条文有所修改，致影响旧纲领在群众中的威信。此次参议会可发一宣言，此宣言由参议会共产党员发起，邀党外人士联署向参议会提出通过然后发表。宣言中拥护二十九年之施政纲领，同时对二十九年纲领中未包括之事项加以叙述。

(乙)你们所提新纲领草案中有些提得不适当的地方，指出如下：

一、目前晋察冀边区形势的特点是边区极大部分地区日益游击化，根据地日益缩小，处境日益困难，而严重的困难则还在今后，因此除说明有利形势外，应将此点补充进去。而对基本根据地区与已经变为游击区之地区，我们的政策应有不同的提法。

二、应着重提出调整边区各阶级关系，以巩固边区党政军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民及各阶层间的团结。

三、应着重提出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便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军民公私必须积极协力发展生产，发展贸易，以开财源，以裕民生。

四、在冀中冀东等广大的游击区中，不仅汉奸之依照法定手续处理，严格的法制制度之建立，财政税收之严格统一与正规化等，均难实行，即对于敌伪政权，敌伪组织及敌伪之各种设施，必要时亦不得不采取两面政策应付，因此虽应对之分别进行瓦解、分化、争取、打击或相机抵制，却难一律摧毁或坚决反对，在纲领中应同时照顾这些情况。

五、在环境日益困难，游击区日益扩大的条件下，应争取先机，积极缩编，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和训练，并由政府和主力军尽量供给民兵以武器弹药，方能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及游击队打击敌人的“蚕食”政策与“扫荡”，以达缩小敌区扩大或保持我区之目的，不必提出实施志愿义务兵役制问题，因实际上今天很困难实行，反可给敌利用来欺骗群众。

六、在目前边区斗争条件下，不仅要教育民众尊敬爱护与帮助军队，更应教育部队爱护尊敬并帮助老百姓，使军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这点在今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有重要意义。

七、有些过高而难实现的办法不应提出，如允许战后实行薪俸制及减轻人民负担等，这在将来是无把握的。

八、关于保障人权中之逮捕拘讯处罚问题，在今天敌后斗争形势下，除第六条所规定者外，应加上在敌人“扫荡”时及游击区等特殊情形之下，经政府授权者不在此列的意思。

(丙) 以上所指各点，在你们起草参议会宣言时望加以注意。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总政治部关于争取伪军伪组织 工作给野战政治部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野政：

关于国民党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比我占优势问题，其原因：

甲、由于国民党据有中央政权，国民党统治者的阶级基础与伪军伪组织统治者的阶级基础是相接近的，他们彼此间原来就有很多社会的政治的关系。

乙、由于我们的地区局限在农村中，经济很困难，我们干部中能与伪军伪组织中高级人员联络得上者一向就比较少，关系亦少。

丙、由于我们过去政策上有些过左，我党在敌占区没有组织，工作亦甚弱，这也影响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

基于以上客观的与主观的原因，我们立即取得在伪军伪组织中比国民党占优势的地位是过分奢望，我们应当一步步的作去，与伪军伪组织中的抗日人员特别是比较负责的人员取得联系，加强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伪军伪组织同情抗日，注意隐蔽我们与伪军伪组织的关系，以麻痹国民党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反共活动。至于在伪军中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应取隐蔽的慎重的精干的政策，希望立即创造很庞大的共产党组织是不可能的。

要利用伪军伪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及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与日寇间的矛盾，争取他们不反共不妨碍抗日，因为国民党之人在伪军中也是不合法的，而伪军中的某些上层分子在其利害关系上是需要与我来往与维持善意的，这就给我们以利用的间隙。在敌占区在伪军伪组织中，我们斗争目标是日寇，不是国民党，虽然有些国民党特务分子是很坏的，甚至有的成为日寇的忠实走狗，倘若我们把斗争主要目标向伪军伪组织中国国民党之人，而不指向日寇，则会增加他们对我们的仇恨，更加坚决的依靠日寇，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此在伪军中对国民党分子采取阴谋恐怖的手段，一般的说是不适当，至对伪军中某些人发委任令保证书，此方式亦可采用，惟在今天作用恐不会大。

总 政

真

并致震林⁽¹⁾同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谭震林。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 上的闭幕词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

林 伯 渠

同志们：

我们这次高干会议胜利闭幕了。这次会议我们虽然花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但它不是一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会议，而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次大会的成功，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和帮助下，在党中央其他许多负责同志的亲自参加与指导下，在西北局正确的领导下，以及全体参加这个大会的同志在整风学习的精神影响下取得的。

我们这次会议是胜利的。之所以是胜利的，首先是它揭露了我们陕北的党，我们党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在党、政、军、民工作中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意识。这正是我们党与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所不同的地方。我们揭露了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的某些不正确思想，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我们的思想统一，促使同志们更自觉地遵照党的正确路线进行工作，为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一切行动上的统一和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这次会议自始至终都贯彻了整风的精神，贯彻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可以说，我们这次会议就是一次最好的整

风学习，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的例子。

说我们这次会议是胜利的，还因为它回顾了我们的陕北党的历史，检讨了过去历史上的问题，用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与方法，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并以这种精神与方法分析它产生的原因和环境，讨论了怎样把它纠正过来。这种历史的检讨，使我们得到很多经验与教训，使大家认识了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性。

我们陕北党的历史上曾经执行过错误路线。这次会议中，我们大家都以非常尖锐的眼光，明白地清算了过去的历史，把对革命斗争有着重要意义的过去的正确路线弄明白了，表扬了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历史的检讨中，证明了我们陕北的党是有领导力量的，是经过了许多复杂的斗争的，有着很长的斗争历史，有着具有各种经验的许多很可宝贵的干部，所以，它能够引导着我们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这是我们这样坚强而有力的党足以自豪的。

同志们，说我们这次会议是胜利的，还有一点，就是在目前抗战空前困难的时候，作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在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参与及领导下，指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经济建设的方针，以及进行这种经济建设的方法。总结了我们的抗战以来数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表扬了许多模范的例子，奖励了许多模范的经济建设工作，批评了那些在经济建设上的坏分子，确定了我们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并且指出一些具体的步骤。这些在毛主席所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讲得非常明白。这个文件，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不仅指出了克服我们边区目前困难的办法，确定了我们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而且也指出了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个方向，必将使我们边区

群众的生活，机关部队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得到改善，欣欣向荣，而且也是全国抗战必须走的经济道路。

我们这次大会所取得的这些胜利，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些胜利是无法以数目字来估计的。它是我们党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胜利。

我们这次大会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我们同时要认识到，这种解决，不仅仅是在大会上的解决，决不能到此就满足。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我们整党的这些文件和决定，整军的这些文件和决定，整政、整财的这些文件和决定，整关系的这些文件和决定，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今天在座的各级干部的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希望党、政、军、民各级干部担负起这个责任来，首先是今天在座的高级干部应该担负起这个巨大的责任。

中国古书上讲“任重而道远”，我们的责任也是重大的，艰苦的，长期的，道路是遥远的，但是光明却在前面。只要我们的干部掌握了这次大会所决定的各项政策，掌握了这次大会的精神，就一定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这一点，我们高级干部尤其要认识清楚，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不仅要苦干，而且要把工作做好。在今天来说，我们也完全有条件把这些工作做好。比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两大任务——经济建设与加强教育，而领导经济建设又是我们工作的中心之中心，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明白地指出了，我们只要坚决地照这样去办，那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一项工作的完成，首先要有一种方针，有一个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有所遵循。同时，还要有一个领导核心。现在就整个西北党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以西北局为核心的领导，有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机关。在下面的各级党的组织和机关中，我们

也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这样的领导机关之后，我们在实际行动当中就要拥护这个领导核心。拥护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使得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如这次大会所决定的一样，能够一件件地完成。我们要在目前两大任务——经济建设与加强教育方面都做出很大的成绩来，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中，我们更应该有许多的创造。

昨天，同志们已经看到，西北局奖励了去年一年中，在经济建设领导上，在实际行动上可以作为模范的那些同志，给了他们奖状，上面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字。我想，得到这种奖励是非常光荣的，有很大意义的。这说明了只有劳动才可以创造一切，只有劳动，善于领导劳动才可以创造世界。在座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像昨天受到奖励的同志一样，像王沛年、刘秉温同志一样，善于领导生产，确实执行经济建设的计划。我们大家都应当向他们看齐。这样一来，我们脱离生产的六万机关部队的人，就都会成为经济建设的领导者，而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也就有了政府和党的领导，六万脱离生产的机关部队的人和一百四十万老百姓的生活就会过得好一些。总之，我们必须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各项决定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使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党、政府真正能统一精干，没有官僚主义。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这个责任。我想，我们每个同志如果能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全局，把我们边区与全国联系起来，把现在的事业与将来的事业联系起来，我们的工作就一定可以做好。我们不是空洞洞地讲要怎么办，将来要怎么样，全国怎么样，而是从当前需要的实际做起。我们搞边区就是为了全国，搞今天就是为了将来。我们必须把这个中心抓住。

最后，我还想指出，我们应该懂得，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相信广大群众；相信他们是有力量的，一时一刻都不能与他们

脱离。我们党是不怕自我批评的，我们要很虚心地接受各界人士，各阶级人士、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批评。毛主席在参议会上讲过这个话，我们要虚心地接受这个批评。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共产党，我们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是掩饰自己错误的小人，而应是胸襟宽大的君子，有坚定的立场，为劳苦群众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的解放，素来都是抱着光明磊落的态度。我们欢迎一切批评，目的就是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我们这次三个来月的会议，正是贯穿了这一精神才取得这许多的胜利。现在每个同志心里都感到很高兴，每个同志的心里都燃烧着胜利的火。中国古话讲：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们这次会议也可说正是这样。

根据华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林伯渠文集》刊印。

陕甘宁边区政府 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

一、拥护军队是边区人民与政府应尽的责任

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武装，是本质上最好的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认识与战斗能力，有优良的作风与传统。

八路军不仅坚持了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起了支柱作用，而陕甘宁边区的保卫，人民民主、民生利益的保护，亦全赖有八路军之镇守。

近年来边区物资条件困难的情况中，八路军的生产自给，曾大大的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今年军队自给平均每人至三千五百元之多）。既能打仗，又能生产，更是难得可贵的军队。

总之，八路军是值得政府和人民拥护的军队；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二、过去拥军工作有严重的缺点

过去政府与人民对于拥军虽做了些工作，也有一些成绩，但还存在着不少的甚至是严重的缺点：

(一) 由于数年来边区处在比较和平的环境，在一部分人

民和政府人员中间，存在着与滋长着忽视拥军的观念，忘记了一切服从革命战争的原则，甚至把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起来，这是极端错误的。

（二）在近年边区物资条件困难的情况中，一部分人员往往只了解与照顾本身的困难，而不甚了解与照顾军队的困难，不关心或不积极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如对于粮草的供给与运输、担架的输送、生产的帮助等，采取被动的应付的态度；当军政或军民关系发生缺点或误会时，某些政府人员没有首先检查本身，批评与责备自己，并向人民作积极的解释，反而采取观望态度，或推脱责任，有时甚至夸大军队的缺点，埋怨军队，而把自己率领人民帮助军队的责任忘记了。

（三）对于优待抗属做的很不够，特别严重的是“重工轻抗”，优工比优抗好；此外还有“人在情在”、“近比远好”、“在比亡好”的现象；而对于抗属离婚问题，也有处理不适当的。这些严重缺点，大大的妨碍了军队的巩固工作。

（四）对于潜逃战士没有积极的帮助归队，而采取旁观态度，甚至有把潜逃战士留在地方工作或为之包庇的。

三、必须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

（一）要使干部认识拥军的意义和重要性。要通过干部向群众作广泛深入的解释，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保卫边区、保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没有八路军就没有边区，人民利益也无法保障。各级政府和人民必须把爱护与帮助军队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经常注意尽到自己的责任。把那种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的观点，与对军队的困难漠不关心，有问题不当面提出协商解决，只是埋怨的自由主义态度，都是错误

的、有害的，都应该彻底的改正。

(二) 关于粮草的供给与运输，政府应领导人民积极的、主动的提出适当办法，竭力给军队以帮助。

(三) 对于军队生产中的困难，政府须帮助其解决。

(四) 军队遇有换防调动，各级政府应发动群众欢送欢迎，慰劳慰问；又须于每年阴历年节前后，对驻军举行隆重慰劳慰问一次。

(五) 要根据新订《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具体检查各地优抗工作，把各地抗属调查清楚，根据具体情形采取代耕、包耕、救济等办法，保证抗属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生活水平。应在优抗工作上做到贫先于富，远近一样，亡存一样，尤其要把优工比优抗好的现象倒转过来。反对对优抗工作上的任何忽视现象，同时要注意教育组织和帮助抗属积极参加生产，奖励生产中的模范抗属。

(六) 各级政府应把帮助归队工作当作自己的任务，应彻底执行《陕甘宁边区动员潜逃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办法》。

(七) 军政军民关系上发生纠纷时，政府负责人应以“厚责于己而薄责于人”的态度，协同军队负责人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呈报上级解决之。

(八) 各级政府应将本决定和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及最近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新订《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关于动员潜逃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办法》、《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条例》、《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办法》，配合起来作详细具体的讨论，并请军队派人参加，切实检查当地的拥军工作，总结经验，纠正缺点，以进一步增强军政民的团结。

（九）拟定今年二月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具体办法同留守兵团政治部商办之。

（十）各级政府应将拥军工作看成经常重要的工作，给以定期的切实的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应给批评、指责和惩罚。

根据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刊印。

肃清军阀主义倾向*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

谭 政

同志们：

高干会议已经结束，这次的会开得很好，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首先就是思想问题。现在我们要根据高干会议的精神与决定，讨论军队，规定政策，提出任务和计划工作。

边区部队几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例如保卫了河防边防，进行了生产自给，训练了部队，我们的领导工作基本上是合乎于中央路线的，是在军委、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和指示下进行工作的，大多数干部是坚决、积极与忠心耿耿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部队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倾向，这正如弼时同志所指示我们的，就是某些干部发生了对革命军队——党军认识的模糊，发生了一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严重的倾向，是原则的倾向，是有悖于我军传统的一种恶劣倾向。

自然，这种军阀主义倾向还只是一种倾向，在我们部队中还没有成为一种军阀主义的体系，但是如果发展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讨论它，来克服它。任弼时同志的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已经说了很多并且说得很好，但我

* 这是谭政在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

觉得这个真是太重要了，有引申发挥的必要，在我们会议上彻底检讨的必要。

军阀主义倾向，在边区部队中是一种普遍增长着的倾向，在各旅各团都是存在着的，尽管它的表现形式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它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倾向，所以我们的检讨是必要的，有全般意义。

现在我们来讲军阀主义倾向在各方面的表现，分析它对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的传统作风，对于我们部队的团结，对于军民关系，对于军队与党政关系有些什么损害，已经受到一些什么损害，以及这种倾向所以产生的政治根源与社会根源。

军阀主义倾向第一种表现，就是某些干部产生着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想要造成一种力量，培植一个系统，拉拢一些干部。要调他的人员或者是调他的干部，他是不愿意的，若要他离开这个部队，他更是不愿意的。他觉得他在这个部队里任职，要是他那个系统中的人才是亲信，对于新来的人，总是觉得不大顺眼，不表欢迎。在干部的关系上，他是不按党的原则行事的，他以个人的喜怒为爱恶，以个人的爱恶定政策。在上下级关系上，他对上级报告多少是有保留的。缺点同问题不大乐意反映，当上面派人来考察工作时，他是家教的：“坏的方面少说，好的尽管多讲。”拿句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封锁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从旧军队学来的，学得还差不多，不过不敢公开，彼此心照不宣，暗中行事罢了。

军阀主义倾向第二种表现，就是官兵关系的不正常，官兵之间脱节。我们部队中某些干部，不关心部队，不关心下级人员与战士，对他们的情绪与生活，不闻不问，只求个人享受得舒适。对于下面毫不过问，这种人不但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者，而且很有一点军阀派头。

再从某些干部的行政措施中，也可看出不关心部队的现象。拿用钱来说，某些部分用钱是很大的，但用在改善大多数人生活上的为数很少，而用在行政方面的（办公、杂支、特费）反而要多，这是一类；还有一类，许多为大多数人有益而且应当用的钱往往舍不得用，而对于那些摆门面的钱，却又十分慷慨。这些领导者既然不关心部属，部属对领导者自然冷淡下来，于是士兵们就不满意这些干部。怨言发出来了，风凉话出现了，打油诗也有了，对生产“为谁辛苦为谁忙”的发问也被提出来了。这次改编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士兵在议论谁来他们连上，有的表示说“管他谁来，横竖还不是七斤半？还不是一斤四两？”从此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类干部是如何的漠视，如何的冷酷刻薄啊！可见这几年来，逃跑增多，政治情绪变坏，并不是没有原因。

有人说，部队情绪之坏，是由于环境困难的原因，觉得官兵脱离的提法，不免有点小题大做。假定就是这样吧！但是，倘若我们干部同志同他们是有联系的，是和他们同甘共苦的，是关心他们疾苦而积极为他们想办法的，那么这种情绪是否可以改变？是完全可以改变过来的。历史上许多难关之所以能够顺利渡过，不是可以说明一切吗？我们跟前许多模范连队，一年到头没有逃兵，官兵和谐，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吗？

军阀主义倾向第三种表现，就是干部关系的不正常。我们干部关系中，存在着有一股邪风，这种人会了面的时候，总是互相恭维，有缺点不批评，见了批评就满面通红，就挟气见仇，而对于奉承的话就全身发痒，在上下级关系上瞒上瞒下，在同事关系上是闹意气，争地位，我比你高，你比我低，我要跨在你之上，你必须站在我之下。许多无原则的事情一定要争过输赢，否则决不服气。

由于干部之中有这么一股邪气，使得积极分子消极，许多正派的人被孤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斥为溜沟子拍马屁了，许多人的头脑被闭塞了，党的原则被阻压了，贪污腐化现象部分地被认为合法了。

由于干部中的原则空气太少，庸俗的气氛太多，所以在我们内部时常发生无谓的纠纷，而一些不正派的人，就乘机钻空了。进行拉拉扯扯的勾当，使他得以顺利地以个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党的政治原则为中心来笼络干部，造成内部的一股乌烟瘴气。因此，我们要在干部中加强原则的空气，反对庸俗的风气，要批评他们，要教育他们，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大家必须照办。

有人说，因为爱护干部，因为爱的出格，因为爱的过分，所以不免宽大放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不是爱干部，这简直是陷害干部同糟蹋干部。关于爱护干部，毛主席有一段很正确的话。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在党的培养与艰苦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干部，是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应为全党同志所尊重所爱护，各级领导机关则负有用实际办法达到爱护目的之责任。有些什么办法呢？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不怕犯错误；但同时，又适时地与恰当地给以关于工作环境、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的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理论与方法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之在思想上在领导能力上较之过去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工作。不是每天检查，而是适时检查，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纠正缺点，扩张成果，这是必要的，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改造他们。这就是对于有缺

点的、犯错误的、有不正确思想的干部，用主要的说服方法，不得已时则用斗争方法，使他们改变过来。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在并非大的原则错误又非说而不服的情况下，不适当地轻易地给人戴上‘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等大帽子的方法，不适当地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都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的疾病问题、生活问题、家庭问题等事，党的领导机关应给以热忱的亲切的同志的关心，漠然置之冷淡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疾病必须医治调养，生活求其切合工作需要，家属问题在可能范围内也须助其解决。一切这些，在物质与环境许可的限度内给以照顾，对于激励干部的工作精神，团结全党为一体的目的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了解，所谓爱护干部，第一就是指导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而不是包办；第二是提高他们，不使他们落后；第三是检查他们的工作，不是不检查他们的工作；第四是改造他们，就是说，当他们有缺点有错误时，要采取适当步骤采取批评与斗争。这里有放任的意思没有？是没有的。由此可见，因爱护干部就不免于宽大放任的话，是全无根据的。

再者，从这段话中，也指出了打击干部的不对，这就是对于有缺点的、犯错误的、有不正确思想的干部，主要的用说服方法，不得已时则用斗争方法，使他们改变过来，并且指出，耐心是必要的，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就没有这种耐心，就不是用主要的说服方法，动辄发脾气、谩骂、用自己性子来处理干部，开口撤职，闭口关禁闭，人家不敢见他的面，看他有点阎王像，这不也是军阀派头吗？

处分干部应当有一定的程序，有批评、有劝告、有警告，抛开这些过程，算总账，一下打下去的办法，是不对的，这方面，我们党的历史上已经有痛苦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

总起来说，党的干部政策是有原则的，是光明磊落的，它之所以有原则和光明磊落，在于在任何场合是把干部当作党的公有财产，而不是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是以执行党的路线任务衡量干部，而不是以个人爱恶及对个人的阿谀逢迎来衡量干部，对于干部错误的处理，既不可放任，也不可打击，打击与放任的恶果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党之干部政策之所以光明磊落，还在于对干部的说话，屋子里面同屋子外面是一样的，没有里外之分，明暗之别。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是不正确的，对于同志应当看作是一种侮辱，一种伤害，而应坚决加以反对，对之不加以反对，不是失了知觉，就是失了党性，二者必居其一。

军民关系恶化，军队与地方关系之极不正常，是军阀主义倾向之第四种表现。军队对老百姓对地方党政人员捆绑打骂的行为，恶意的侵占行为，攻击的行为，破坏法令政策的行为，是层出不穷的。许多同志对于这种现象熟视无睹，许多人还认为正当，认为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之不好，责任是在地方，而不是在军队，不检点自己，只是埋怨地方，这种错误观点，从很早以前开始一直继续到现在，所以关系愈来愈坏，而没有任何基本上的改变。

军民一致，军队与地方党政一致，这是党的原则，是我们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军队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军队，我们政治工作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军队的政治工作，这是极大的一个分界线。如果我们不能办到这点，如果我们军队同人民同党政关系日益疏远，如果抛开这个基本原则来谈政治工作，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同这个基本原则背道而驰，那么，军队就要变质，政治工作就要失败。

我们军队之所以能够壮大与巩固，能够在艰苦困难中不断

战胜敌人，我们究竟靠着一个什么法宝？我们头一个法宝不就是军民一致，军队与地方的一致吗？为什么这样好的传统竟被忘却了，为什么不把它充分地发扬起来？我们应当发扬它，无限地来发扬它。

许多人只从表面看问题，不从本质上看问题，觉得陕甘宁边区群众的革命情绪不如华北，不如内战时代，群众工作是做得不充分的，群众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军队的生活反而下降。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陕北的老百姓不好，党政机关对军队有成见，不关心军队。他们仅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忘记了事情的另一面，不懂得这是边区，不是华北，更不是内战时期，边区长期的和平环境，没有显著的战争形势，从这个特点出发，就不能一般地来同全国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较。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就不能这样设想，人工的强制的在一个相对的和平领土上来制造一种强烈的战争形势，对人民发出这样的奢望，说你们要同敌后的人民一样地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拥护军队，而且这种工作的内容形式与程度，都与华北党政作同一规模，向他们看齐，否则就是不积极，就是对军队冷淡，对战争怠工，同志们！这是可以的吗？显然是不可以的，而且没有必要，老百姓富足了，比以前吃得好，穿得好了，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应当说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这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也是战争的一种潜在力，把这种基础与力量加以爱护，加以积蓄，等到必要的时候才来使用，才来开发，从长期着眼，是完全必要的，是不能反对的，苏联对德国战争就是这样办的。

群众工作做得不好，不能单纯责备地方，地方同志的缺点他们自然会来检讨的，群众工作做得不好，军队要负责任。一来军队是要做群众工作的，不能坐在旁边乘凉；二来军队同人

民，同地方党政关系，之所以不好，主要责任是在军队而不是在地方与人民。因为大部分的原因是由军队的缺点，军队的强横霸道所引起的。政府是革命政府，政府的法令就是党的政策，政府的法令命令，军队必须执行，不能例外。党政机关的同志同军队工作者目标是一致的，彼此应当合作。不合作工作是做不好的。现在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实现了，军政民关系亦有正确规定，今后工作更应注意配合。

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煞，影响政治工作威信降低，是军阀主义倾向的第五种表现。在我们部队中这几年来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倾向，这就是有意无意地阻止政治工作的进行。他们把政治工作列入从属的地位，认为政治工作是不必要的，是可有可无的，不给政治工作以物质保证，诬蔑政治工作为吹牛皮、卖膏药。他们不参加政治工作，不帮助克服政治工作中的缺点，他们只是站在一旁说风凉话放冷箭，他们惟恐政治工作做出成绩，他们爱争权表功，成绩是我的，事情弄坏了是你的，这样态度简直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说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越权，说它的权力太大，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目前政治工作是软弱无力，法定的职权许多于无形中被取消了、被限制了。例如政治工作人员的调动任命问题，关于贪污腐化分子的检举问题，生产账目的审查问题，特殊化的党员的制裁问题，政治工作独立任务的保持问题，政治委员的职权问题，政治教育文化活动与党的工作问题等等，许多不是被限制被改变了吗？如果这些都是越权，那末，政治工作还有什么地位？不就等于说空话吗？

政治工作对于军事行政、军事作战的任务有保证的责任，这完全不错的。但这不是说，政治工作除了保证工作一项而

外，就没有它的独立的工作了，它还有许多独立工作要担任的。这就是说，它是有它独立的任务，不承认政治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政治工作只是跟随军事工作的某一具体措施之后的保证工作，这是减轻政治工作责任，客观上等于削弱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

所谓保证工作应当是双方面的，是建筑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当我们提出任务与制定工作计划之时，应当估计客观情况，使任务与计划本身就具有某种的现实性，而不是主观的空想。倘若计划是主观主义的，那末计划本身就失去保证的价值，这是很明显的。军事计划提出之后，政治工作应当加以保证，必须动员自己的党员加倍努力地来完成。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事情的全部。军事机关仔细地审查自己的计划与严格地督促这计划之执行，是很重要的。必须把这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而不是把这种责任向政治机关推诿，否则计划不能实现，任务便不能完成。军事机关必须给政治工作以物质保证，例如，政治工作必要的经费之发给，工作时间之规定与工作权力的赋予等，没有这些保证政治工作是做不好的。

无论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或供给卫生工作，同是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于一架机器的组成一样，彼此只有分工不同，而目标是共同一致的。我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而不是减弱战斗力，彼此之间不是孤立地进行工作，而是共同地进行工作，因此要有分工，但又要有配合。没有分工，大家混在一块，你包办我的事，我包办你的事，这等于混合，混合的结果，事情是办不好的。但如只有分工而没有配合，事情也是办不好的，所以彼此之间必须合作，精神上必须一致，互相对立互相破坏抬杠子的现象是不许可的。成绩是大家做出

来的，不是一个人可以独霸的。缺点应共同检讨，共同负责，把成绩归居自己，缺点错误推向别人，是根本没有共产党员气味的。一个共产党员与一个工作机关在群众中的威望与地位，是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正确领导中建立起来的，不是巧取豪夺可以得到的。爱争地位的人，其地位与威望只有降低，以致全部破产。

政治工作威信之所以降低，其应有的职权与地位之被忽视被抹煞是一个重大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许多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与创造性，他们满足现状，墨守成规，对于工作多像和尚念经，照例还愿，表面工作是做了许多，究其实有什么利益，那是不过问的，他们不分析环境，在和平环境下怎样做？做什么？直到现在还是糊里糊涂的。这样工作自然没有成果，地位就不能提高。关于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之被忽视被抹煞，在政治工作人员中是有反映的，但是这种认识在他们之中还没有被提到原则的高度，有的则表现动机的不纯，不是出之于原则之事，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的关于整个政治工作地位问题之争，而是出之于个人权力之争，意气之争，这是不对的，无原则的。在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必须把原则的斗争与无原则的斗争区别开来。

军阀主义倾向第六种表现，就是贪污腐化的现象，个人特殊化的现象，以及铺张的作风是相当普遍的。现在部队中贪污公款之事层出不穷，为数之多空前未见。嫖赌现象发生了，抽洋烟的也出现了，个别分子不但贪污腐化而且成为恶棍，在军队欺压士兵，在地方欺压老百姓。对于这样的坏蛋，舆论没有反映，有的反而加以包庇。有的人的荷包公私不分，为着个人享受，将公款、将生产利益任意挥霍，而是以百计以千计以万计。每饭非半斤酒四个菜不能咽，讨老婆一定要批多量的结婚

费，要做新衣新被，否则就不满意，拿怠工来抗抵。邀朋友进馆子更是常事，且视为美谈。

在待遇上我们并不主张平均主义，但干部与兵士之间悬殊太甚是不好的，有碍团结，而且在现时经济基础上是办不到的。

铺张的风气是存在的，工作图表面，摆门面，用钱也是图表面，摆门面，在待人接物上也是图表面，摆门面，埋头苦干的人得不到表扬，做表面工作的运气亨通。

有这样一种倾向是很不好的，觉得现在是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成功了，艰苦奋斗的口号觉得是过时了，个人生活水准应当大大提高，一切应当从事铺张，不必讲求节约，不必脚踏实地，因此在实际中经常表现出来的是个人生活第一，工作是列居第二位了。许多额外的不正当要求可以准许报销了，贪污腐化的事实是不足为奇了，支用公款变相的贪污现象也认为合法了。所有这些不是证明我们的优良传统有点变相了吗？旧军队的传统不是已经在我们内部发生了影响吗？

产生军阀主义倾向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统一战线、国共与其他党派的合作，我们的大门打开来了，旧军队的习气像股阴风样的侵袭进来，在我们内部发生作用，这是客观的原因。然而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是外界的原因，而是主观的疏忽和错误，特别是高级领导机关没有意识到这种倾向产生的可能性，在和平环境中头脑是被麻痹了，对于思想领导完全失却控制，醉心于成绩，以为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一方面拒绝自我批评，另方面对上封锁隐瞒，烂疮子长在身上，既不愿人家来医治，自己又不肯医治，只好成为隐痛，结果遍身长起了，开了天窗才被发觉，因此就不免有点过时，医治较为费力。

军阀主义倾向，已经在我们部队中造成一些恶果，最显著

的是官脱离了兵，内部涣散，不团结。这自然不能不影响战斗力，军民关系、军队与党政关系极不正常。几年来应当获得的成果没有得到，而不必要的一些损失却已经损失了。军阀主义的倾向对于军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倾向，张国焘军阀主义的结果，是分裂党分裂军队。因此我们要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在边区部队中必须展开这种斗争。

整军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整风——反对军阀主义的倾向要在党内于干部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按驻地及干部情况，分别召集会议，或集中讨论，或在开会报告之后举行分组讨论。反省是必须，但对不同干部要不能同样，领导责任大的要多反省，错误大的要责成他多反省。反省一般应是自觉的，只有对有些错误大又固执不肯反省的人，才采用群众力量强制他反省。

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军阀主义倾向，同时要教育干部以革命军人的品质，并逐渐培养他们具有这样的品质。因为我们进行的事业——革命战争，是神圣的事业，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事业，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同时又是残酷的，所以我们的军人不但要求具备一般的革命的品质，同时又要具备一种特殊的品质——革命军人的品质。

什么是革命军人的品质？革命军人的品质应当怎么样？

第一，要有革命的人生观。具体来说就是忠诚于革命战争的事业与人民的事业，不背叛革命战斗的利益，在困难中，在绝望的情况中，在不幸被俘虏时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与节操，把它看成生命一样。

第二，要有坚强的党性。八路军新四军是我党特殊的一种组织力量——武装力量。党把对武装力量的率领委托于军队干部，因此军队干部在党面前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军队干部应当

是党性最强的，是最有原则的。不把党的军队看成为个人的军队，不在军队内培植私党，不是超出党的政治原则之外去建立个人信仰，不能把党的威信与个人威信对立起来。当上级决定调人调枪或调你离开这个部队时，就要乐意服从，当上级来考察你的工作时就要真实报告，有半点不乐意，有半点隐瞒，就是党性不纯。

第三，是勇敢的但又是和蔼的。每个革命军人都是一样，对敌人要勇敢、要毒辣、要奸巧，慈悲心、仁义道德、老老实实是一点来不得的。但是对人民对自己的同志，必须是和蔼可亲、谦虚、坦白，倘若盛气凌人、横蛮、讲霸道，就势必脱离群众、破坏团结。

第四，军队干部应当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因为革命军人不是普通军人，更不是所谓“老粗”。革命军人不懂政治是不好的。虽然分工上各有专长，干军事的人要多学军事，要精通军事，但是，政治的头脑是必须有的。军队干部要懂得识大体，顾全局，在看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能从局部圈子中跳出来，不为局部利益局部现象所蒙蔽。一个连一个营对于全军来说是一个局部，而全军就是全局，军队对于全党（党政军民）是一个局部，而党政军民就是全局。拿生产任务来说，军队要生产，党政民也要生产，我们就不能以军队生产利益去妨碍党政民生产利益，更不能妨碍边区整个财政经济利益。在解决军队与党政纠纷问题上也是如此。

第五，军队干部必须不断地求进步。他们应当具备政治、军事、文化、理论、业务的各种知识并不断增加这种知识，而为求得这种知识，就须经常学习。

革命的人生观，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执行政策中的模范，与不断的求进步，这就是军人所应具备的品质的五个标

准。每个军人干部都应当具有这样的品质，并随时培养他们具备和提高这样的品质。

同志们：我的报告就在此结束。我们的任务有三个（生产、教育、整军），都很重要，都要努力去完成，但中心关键是克服军阀主义倾向。如果这种倾向不打压，如果让它继续存在，官兵之间的这一道沟就不能填平，干部关系就不能改善，一切人员的积极性就不能发动，任务自然不能完成，工作作风的改革也就谈不上。军阀主义倾向如果不克服，军民关系，军队与党政关系势必继续恶化，一元化无从实现，而高干会议就白开了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我们的大多数同志，他们是坚决、积极和忠心耿耿的，他们对于党对于上级所给的任务是尽力而行的，因为有军阀主义倾向的存在，在他们面前就带来了一种阻力，从中阻碍他们。“我要做好，你要做坏”，使他们的工作任务无法完成。大多数同志工作的决心是好的，但如不反对军阀主义的倾向，不克服这种倾向，那末，他们的决心与愿望就不能实现。所以就工作环境顺利上说，也必须肃清军阀主义倾向。一部分同志因为部队中产生了军阀主义倾向，他们很看不惯，却没有勇气来克服它，来同它作坚决的斗争，因而就消极起来，就不乐意说话，就想改换一个工作环境，这种情绪是不好的，是怯懦的表现，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对于这类同志我们要鼓励他，克服怯懦，提高勇气，要他们不要怕碰钉子，碰了钉子不要灰心，下面碰不通，就提到上面来，问题总要求得解决，否则决不应当放手。在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我们决定扩大民主，允许军队中一切人员凡是有意见的受过压制的，都可用写信或当面陈述的方式向上级报告，甚至越级报告，都是允许的，对于这类报告任何人不得阻拦，更不得借端报复。

克服军阀主义倾向，不但是完成任务的关键，而且是建军的一个关键，因为军阀主义的原则和我们党的建军原则是两套根本不同的原则，是互相不容的，如果不克服军阀主义的原则，党的原则就不能树立，建军工作就要受到阻碍，军队就不能前进。所以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是原则的斗争，是党的原则克服军阀主义原则的斗争，因而一切同志都要卷入这个斗争，积极参加这个斗争，而决不能站在斗争之外，对于这个斗争要就是赞成这个原则反对那个原则，或者是赞成那个原则反对这个原则，模棱两可的态度，是要不得的，在党的原则上是不许可的。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目的在于想把工作做好，在于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中央和毛主席所号召的整风运动，在全党全军已经获得了巨大成绩，许多错误思想被纠正了，工作作风也有很大的改进，边区部队同志，应当在这个整风运动中积极学习，认真学习，以求得改造自己，把自己提高一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的
《谭政军事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最近中美中英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美英放弃了在华的特权。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党部凡在战争环境许可下，均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美中英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均须循此目标前进。并向全国人民说明下列各点：

(一)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历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残暴，中国民族中败类自西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抵抗主义者，直到汪精卫等等卖国求荣的无耻；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解放斗争，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红军运动直至现在的民族大抗战。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斗争。

(二) 中国殖民地化过程与民族解放过程的斗争，到了“七七”抗战以后，已进入到决定胜负与决定中国最后命运的

* 这个决定是王稼祥起草的。

阶段。百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斗争涌出了领导这个斗争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七七”抗战的发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坚持，全国军民的卓绝奋斗，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英美苏（苏联还远在十月革命后即发表声明书，声明废弃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后又签订孙文越飞协定，更于一九二四年正式签订条约，完全取消中俄间不平等条约，完全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使中英美间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

（三）中国今后命运是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决定。抗战已五年有半了，今后困难尚多，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巩固国内团结，反对民族败类——汪精卫及其他无耻汉奸，揭露日汪间一切奴役中国、出卖中国的协定，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

（四）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我党中央在去年七七宣言中已指出战后中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事实证明了：当国内团结，国共合作时，中国是充满着光明与希望的；当分裂内战时，人家便来欺负。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上一次国共合作，曾经收复了汉口、九江租界，这一次国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是保证中国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

（五）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便投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孙中山先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变革命方法，采取发动群众的路线，实行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提出打

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共产党在大革命时代始终尽了急先锋的作用，后虽不幸破裂，被迫退入农村，继续民族解放的斗争，但自“九一八”后，共产党又不断提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与恢复国共合作，特别是“七七”抗战后，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举国一致在蒋^{〔1〕}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伟大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的地位，担任最艰苦的职务，转战敌后五年有半，抗击在华日军恰好一半，前仆后继，未尝稍懈。共产党不仅是为抗战胜利而坚决斗争，并且还要在战后独立、自由、民主、与国际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同样也站在最前线。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毛泽东关于争取在抗战胜利后 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德怀同志：

你十二月十八日电最近才看到，兹复于下：

(一) 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1]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和国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二) 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

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都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

（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四月起学了八个月，今年三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准备以今年一年审查完毕。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的深刻的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过去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为这两件事必须

进行各种对外对内的严重斗争。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 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边区政府，是边区人民和边区部队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它的一切措施，均是为了人民、为了抗战利益的，所以，它是一个模范的民主政府。在边区物资极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领导人民积极生产，征收救国公粮，帮助军队解决粮食、被服困难，支持前方抗战。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发展与巩固，是有赖于边区政府的扶植和领导的。

边区人民，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他们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生产，缴纳救国公粮，为军队、为抗战，尽了应有的力量。边区军队与边区人民，像鱼和水一样，是分不开的，军队脱离了人民，就无法打胜仗，无法存在。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发展，就是有赖于边区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边区政府是革命政府，边区人民是很好人民，这样的政府与人民，我们军队应该拥护它、保卫它、爱护它。拥护政府、拥护人民，是我们革命军队的责任，是响应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具体表现。

过去五年来，边区部队对于拥政爱民的工作，一般的是做得有些成绩，军队和政府、人民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完成了保卫边区的任务。但是，由于边区遭受着严重的经济封锁，物

资条件异常困难，以及军队本身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因而造成了军政民关系某些不融洽的现象，军队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在部队中，存在着与生长着忽视拥政爱民的观念，忘记了过去红军的优良传统，把军队与政府、人民有时对立起来。某些人员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思想，把军队看成为高于政府和人民，丧失了革命军队的品质，于是违犯政府法令，自高自大，不尊重政府，侵犯群众利益，违犯群众纪律等行为，时有发生。这些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严重。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必须深自检讨，彻底纠正。必须提高全军爱护根据地、建设根据地、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认识，使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为此目的，各级军政机关必须执行如下决定：

（一）必须使全体指战员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意义，军队应该坚决执行政府法令。边区部队与边区人民是血肉相关不可分离的，军队离开人民就无法存在。在部队中，须加强政策法令的教育，对于政府的各种法令，通过干部向战士进行深入的解释，务使每个指战员不仅懂得各种法令的内容，而且要认真执行。对于过去不尊重政府，只顾自己，不顾政府法令，不顾群众利益的思想与行为，必须予以彻底纠正。

（二）军队须尊重各级政府机关，对于政府负责人，应以本部队首长同样看待，不得轻视与污辱。军队无权逮捕政府人员与人民。

（三）军队有保护政府的责任，在边境地区发生敌情、匪情时，必须即时通知当地党政民机关。如地方机关受敌人或土匪袭击或包围时，当地驻军应机动的派队援救。政府机关派人去边境区工作或运送重要财物时，驻军应派遣必要的武装掩护或护送，使之安全的顺利的完成任务。

（四）军队有帮助政府之责，政府的各种困难，军队应竭力设法解决。军队应积极参加生产，解决粮食、被服及日常需要，以减轻政府与人民的负担。对于政府的各种号召及动员，如春耕、秋收、冬学、建立民兵等，军队应协助政府机关，对人民进行深入的解释，帮助其工作的顺利完成。

（五）军队与人民须建立密切关系，爱护人民，尊重群众的人权、财权、地权，不得侵犯人民一针一线的利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必须了解与尊重民情风俗，举行与人民送节礼、祝寿、拜年与婚丧等应酬，以建立与人民的良好感情。

（六）军队须帮助人民的春耕夏耘秋收，首先应帮助抗属，不得索取任何报酬。

（七）严整部队纪律，加强部队纪律教育，使全体指战员自觉的遵守群众纪律。部队行动时，应加强纪律检查，借物送还，损坏的东西要赔偿，驻地打扫干净。部队生产时，应严守《生产运动中应守规则》、《公营商店守则》。进行归队运动时，应遵守《动员潜逃战士及逾期不归战士归队办法》。部队调动时，应与当地党政民机关开联席会议，检讨军政民关系，虚心听取地方机关及人民的意见。对于部队中违犯纪律的人员，必须批评与斗争，严重的必须予以应有的纪律制裁。

（八）各部队，尤其是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帮助地方学校教育、民众教育、民兵建设等工作。每一个指战员均应有向人民宣传的责任，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觉悟。

（九）各部队卫生机关，应尽可能替人民医治疾病，首先应替抗属治病，不收医药费，并对人民进行卫生宣传，利用各种方式，向人民讲解浅显而通俗的卫生常识。

（十）军政、军民关系上发生纠纷时，军队方面应负主要

责任。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协同地方机关就地解决之，横蛮无理是不对的。如解决不了，则须呈报上级解决。即使该纠纷系地方机关或人民不对，军队方面应以和蔼谦逊态度向其解释。

(十一) 各部队应将本决定与边区政府《关于拥军运动的决定》，及最近边区政府颁布之《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边区军民诉讼条例》、《抗属离婚处理办法》、《抗日军人抚恤条例》、《动员潜逃战士及逾期不归战士归队办法》、《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办法》等各种条例，配合起来，向指战员进行教育，切实的与本部队过去违犯政策、法令，侵犯人民利益的具体事实联系起来。

(十二) 拟定今年二月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具体工作另有指示），以掀起部队拥政爱民的热潮，推动今后拥政爱民工作的开展。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邓 小 平

我们的对敌斗争

五年来，我们同敌人在华北进行一天比一天尖锐、严重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前进，实行正面进攻，在华北兵力较少，经验缺乏，更对我党我军估计不足，给了我们从对敌斗争中创立抗日根据地以非常优良的条件。此期我们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打开了局面。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撤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一九三七年我们先以一部在同蒲路北段作战，如在阳明堡火烧飞机，随即全部沿正太线作战，如七亘村、黄崖底、广阳战斗，都是在敌侧背配合正面友军防御作战；只有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第一部分的第二、四两节，原载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五期。

在太原失守之后，才是本师单独作战，如在正太路粉碎敌人六路围攻。一九三八年进行了三次反“扫荡”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邯长大道的伏击作战，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于一九三七年末，即对冀南派出东进小支队，作侦察式的活动，一九三八年春夏正式进入冀南，形成了冀南根据地的局面；当徐州、武汉会战之际，我们组织了平汉线津浦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余次大破击，给了下面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在政治上，我们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打击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爪牙，打坍了晋东南、冀南广大地区的维持会及为敌利用的封建组织，如会门、自卫团、联庄会等，建立了广大地区的抗日政府；消灭了六七万皇协军及伪化了的土匪会门等封建武装，普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发展了正规军数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打击了敌人“招回流亡，恢复治安”的欺骗人民的诡计；游击队不断地在铁路两侧的活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护路计划。

在经济上，我们尚无何种设施，亦未引起注意；敌人则有相当成就，但在广大乡村被我控制的条件之下，敌人未能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我们军事政治斗争的结果，把敌人束缚于点线之内。这是我们的大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敌人回师华北，实行“治安肃正”计划，华北斗争局面开始严重。此期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次反“扫荡”作战。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区进行了敌人打通邯长公路及我们收复邯长大道的斗争；一九四〇年则由我们主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交通线斗争，以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其最大者为冀南全年的破击交通线斗争，五月白晋战役，特别是由八月二十日开始直至年底的百团大战，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一九四〇年全年之激烈战争的结果，敌我双方均有相当的削弱，敌人伤亡较我更大（九与七之比）。

在政治上，根据地日趋巩固。一九三九年我党我军仍有相当发展，群众有相当发动，抗日政权初具规模。而一九四〇年夏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成立，在统一本战略区强化根据地建设上，特别在对敌斗争上，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阶段，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一九三九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一九四〇年初，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英明的直接领导，人民的拥护，以及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打开了局面，既巩固了根据地，又巩固了国内的团结，打击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

在经济上，一九三九年我们仍然是忽视的，民生凋敝，军队供给极端困难，在敌占区只有需索而无工作，故征集资财亦无成绩，这是我们（主要是太行区）最穷困时期。一九四〇年我们才开始注意经济问题，在根据地注意生产和节约民力，在敌占区反对“把敌占区变为殖民地”的观点（结果又形成了完全不到敌占区工作的偏向），根据地民众才缓过气来。同时，一九三九年发行了冀南钞票，加强了经济斗争力量，军需才有

了保障。但在此期间对敌经济斗争的成效，则甚为微弱。

在反特务斗争上，我们只作了些防御工作，故敌人的特务政策仍有相当成就。

此一阶段，在巩固根据地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成绩，但忽视了敌占区工作，虽曾屡次提出纠正，转变很少。一九三九年在敌占区的需索政策，给了敌占区人民以很坏的影响，大大损害了我们的政治声望；一九四〇年的不到敌占区，没有挽救这个损失，这恰恰给了敌人以巩固占领区、扩大占领区的很大便利。而一九四〇年讨逆战争后的冀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前后的晋东南，都产生了政策上“左”的错误，既损害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又帮助了敌人扩大其社会基础。一九四〇年四月黎城会议，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但在部分问题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点和错误，如对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及敌占区工作重视不够，对游击战争的分量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了正规军，编并地方武装，结果更便利了敌人的前进和造成了我们的退缩。这一阶段斗争的结果，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开始建设根据地。但敌人亦有其相当的成就，这是与我们忽视了敌占区的政治工作和一些政策错误有关的。

第三阶段，敌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我们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双方都走向深入，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阶段。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九次大的反“扫荡”作战和五百一十五次反小“扫荡”与袭扰，两年作战达七千九百七十六次之多；我们于一九四一年初即强调了军区建设工作，纠正了对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的错误，县区基干队建立与逐渐健全

了，不少正规兵团地方化了。人民武装主要是民兵的建设，打下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基础，两年来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能力，开始起了很大的作用。游击集团的组成上亦有进步。这些都大大地增强了保护根据地的力量。一九四一年开始注意向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各地对此了解较差，收效不大。一九四二年成立武装工作队，认真地注意了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提出与加强格子网⁽¹⁾内的斗争，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抗日政府的负担面在太行区有了相当的扩大；冀南则在根据地变质的条件下，顺利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太岳亦有不少成绩，并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的局面。惟在某些区域，向敌占区发展的注意力仍嫌不够。

在政治上，一九四〇年底北方局指示了一套明确的政策，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显著的进步；惟一九四一年对于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仍在忽视之列，所以民主建设等工作，还是架在云端之上而无确实的成就。对敌占区和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北方局提出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开始某些地区不懂得这个政策的进攻性，反变成了主动的退缩，帮助了敌人的蚕食，纠正后获得了不少的成功，冀南对伪军的工作成绩尤大。在反对敌人的蚕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没有多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则各地都有大的进步。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在经济上，我们在一九四一年即已提出加强对敌经济斗

争，因在摸索之中，未获多少成就，冀钞对伪钞比值甚低，物价高涨即其一例。一九四二年则一改旧观，太行区不仅在根据地建设上有不少成绩，而且在对敌占区经济斗争上，也创造出一些经验，获得了初步的较大的胜利。不过冀南、太岳在经济斗争上仍然无力，敌人收获亦大，应加注意。此问题将有专门报告，勿庸多述。

在反特务斗争上，一九四一年前，对敌人破坏根据地千奇百怪的特务活动警惕不够，直至黎城离卦道暴动、柴关暴动的惊人事件发生后，才略有注意，但对敌人之毒辣性一般均认识不够深刻，虽群众运动发展之后有些进步，但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的事情。

在文化宣传上，我们曾于一九四一年进行了对敌三次政治攻势，在敌占区作了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在打击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振奋人民抗日情绪上，起了不小作用。一九四二年继续进行三次政治攻势，配合以游击活动，在某些地方曾结合敌占区民众反对捕壮丁、反对配给的斗争，而以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一次为最成功。这是因为过去几次政治攻势，一般只作了一些宣传工作，而反第五次“治安强化”的攻势则主动地抓住了反对敌人抢夺粮食斗争这个中心，组织了真正的一元化斗争，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再配合以恰当的反汉奸、反维持、反特务的斗争和宣传鼓动工作，故成绩甚大。但必须指出：过去的政治攻势，也可以说五年来，我们都一般地忽视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照目前情形看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经过了几次政治攻势和一九四二年的敌占区工作的前进，敌占区的状况与过去大大不同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大大地扩大了，人民都认识日本必败了，这就打下了我们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作的基础。可是过去我们

是不可容许地忽视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今后则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总起来看，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以上就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概述。

小 结

在五年来敌我斗争及其所引起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天敌我双方都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阶段，这说明了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我们在此复杂斗争中，下层干部能力甚嫌不够，今后应切实注意加强下层，提高下级对敌斗争的能力。

二、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过去我们对此原则认识不够，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敌人也

很注意隐蔽问题，如敌一一〇师团的文件即曾提出“不震荡敌人，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的策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而收到了效果（如每次“扫荡”、蚕食前的准备），故我们一方面要隐蔽自己，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敌人。

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人民即使反对敌人而对我中立，也只是便利了敌人。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要有一套明确的政策，否则发生错误，易为敌所乘，而敌人则恰恰善于利用我们的弱点以弥补其在中日矛盾中的基本弱点。经验证明：过去有一时期因为我们政策错误，敌占区人民对我采取中立乃至反对态度，给了敌人以很大发展。经验又证明：敌占区工作不开展，根据地也要退缩；游击区不能坚持，不仅根据地要退缩，而且失却了向敌占区前进的有利阵地。经验还证明：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

四、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现在敌占区开始起了有利于我的巨大变化，其基本表现就是人民抗日情绪大大增长，敌伪矛盾发展。我们应好好抓住这个基本特点去发展工作，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经验证明：在敌占区不应该去扩大中国人自己的阶级矛盾，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能如此我们便能开展敌占区工作，反

之我们便不能在敌占区立足。经验又证明：团结中国人对敌，也包含有斗争。斗争的内容，主要是反对那些不明大义、破坏团结、帮助敌人、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而斗争方式也应是和平的、政治的。只有对于那种死心事敌、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在根据地亦应切实注意巩固团结问题，比如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的执行，是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打下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发挥其更伟大的抗日力量，这是完全必需的；但是在发动群众中，必须把它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这仍是今后应该注意的。坚持根据地，需要广大的基本群众的发动，同样地也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

五、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经验证明：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坚持对敌斗争；没有对敌斗争，企图关门建设根据地，也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存在。今后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

六、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敌进我进”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

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总之，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应是今后非常注意的问题。

七、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由于我们过去对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期间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这也是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了解不够所致。今后（在反攻之前）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方面一九四二年已获相当成绩，此后还应加强其指导。对于武装的爱护和党员干部的军事化，亦应切实注意。

八、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量；如果内部磨擦，互相埋怨，结果只会放松或放任对敌斗争，遭受很大的损失。今后应根据中央对敌后根据地统一组织机构的决定，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九、过去我们同志一般有坚持敌后抗战与取得胜利的明确观念，而尚未树立起巩固战后在华北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而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到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故先我取得先机，已有不小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来补救。我们同志对于我们在敌后斗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全国这种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往往缺乏全局观念，在言论行动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对中央的方

针，还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些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其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这个观念应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来。

十、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方局和朱^{〔2〕}总司令、彭^{〔3〕}副总司令，对于敌后坚持的原则，历来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执行了这些方针和指示，所以我们有几年来的成绩。但一到我们对中央和上级指示了解不够的时候，就要发生错误，如对游击战争的认识不够，对敌占区工作的忽视，影响很大，损失不小。这教训我们：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占领区，摧毁、缩小抗日根据地，大量修筑据点、碉堡、公路、沟墙等，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切断联系，严加封锁。这些公路、沟墙等纵横交错，形如网状，被称作格子网。

〔2〕指朱德。

〔3〕指彭德怀。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 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当此苏联冬季攻势已经获得了空前胜利，德、意在北非又遭受严重损失，苏、英、美等同盟国的力量日益增强，德、意法西斯总崩溃为期不远的时候，日寇冒险北进与继续南进虽将遭遇重大的困难，但它为着最后挣扎而向中国发动局部攻势，尤其是对我敌后进行残酷的全面“扫荡”，是势在难免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局势，一方面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更加接近胜利，另一方面是我敌后抗战的局面更日趋困难。

二、在去年十一月敌寇开始“扫荡”淮海与皖东北时，华中局、军部即指出今后敌寇对华中敌后严重“扫荡”随时可能到来，并号召华中全党立即进行反“扫荡”的动员和准备。根据最近各方情报与敌伪动向，证明这一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我华中全党、全军对今后华中敌后空前严重与高度复杂的斗争形势必须有明确的估计，对敌寇的“扫荡”、“清乡”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联合的进攻，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我们一切准备必须从最坏处作打算，向最好处去努力，才可能避免遭受重大的打击和损失。

三、同时我们必须明白指出敌后抗战局面虽可能日趋困

难，但这种困难只是暂时的。因为日寇在敌后的残酷“扫荡”乃是病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我们敌后抗战的空前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只要咬紧牙关，渡过敌后最艰苦的两年就是胜利。我们只要能坚持到最后就将有一切，同时我们本身也已经具备着可以坚持艰苦斗争的各种条件，所以那种只看见国际形势好转与胜利在望，便不顾摆在自己面前的困难，因而麻木不仁、盲目乐观是不对的，同时那种只看见敌后严重困难，而不懂得胜利在望，不懂得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因而惊慌失措、悲观失望也是不对的。只有克服上述两种不正确的倾向，坚决、果敢、沉着、机警进行一切必要和充分的准备，才能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四、因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全党千百倍提高自己的信心和警惕，准备在任何严重的环境下，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是目前华中全党最基本的战斗任务。为此，我们华中全党全军必须坚决完成下列具体任务和工作：

（一）彻底实行精兵简政。必须迅速缩小机关，减少单位，精干上层，加强下层，使敌后党、政、军一切机构真能适应敌后新的艰苦斗争环境，真能保证在任何艰苦条件下灵活机动，执行任务。凡没有实行精简的地方，应该立即着手研究实行；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应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必须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如果在今天新的环境与新的艰苦条件下，仍留恋着旧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而不愿按照中央去年十二月一日的指示彻底实行精简，简直是自杀政策。同时各地在进行彻底精简时必须按照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华中局精简通知原则，预先进行详细研究及作最广泛最深刻的教育和动员，不可草率从事。编余干部应妥为处理，大批派到下层去，到群众中去，到

生产中去，到训练班中去学习、训练，并计划送部分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延安去保存和学习。

(二) 加紧战斗准备。必须克服太平观念，对反“扫荡”与反“清乡”应作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特别要加强侦察情报和控制交通的工作，重要资材应设法分散，军政机关必须轻装，并处在经常转移的机动位置，地方部队及民兵应以分散作战、就地游击、就地坚持为行动方针，主力部队亦应加强分散作战与灵活机动的战术教育。为了适应环境，便于就地游击和坚持起见，华中局号召各根据地做到每一个县均能建立一个模范游击部队，作为坚持斗争的骨干。其编制在大县相当于一个营，小县相当于一个连。其成分以在军事和政治上经过考验的当地地方军为基础，并调派一定的主力（如营须派一个连，连须派一个排的主力）为其骨干。其领导成分当选择在该县群众中最有联系与威望的群众领袖与干部党员公开负责，并以其人之名为该游击队之名。同时应选派坚强的军事干部与政治委员，加强其领导，使其不但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与当地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以便在任何严重的情况下，该县党政民都可依靠这一模范部队坚持斗争，继续各方面的工作，各区各乡亦应根据上述原则切实加强民兵，建立就地坚持的模范游击队。

(三) 更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动员根据地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扫荡”的斗争，把这种斗争变成为全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必须加强部队中群众观念与群众纪律的教育，大大发扬我军进行宣传与居民工作的光荣传统。必须广泛发动军民普遍开展生产运动，节省人力物力，爱护根据地。在各民众团体中应普遍进行反“扫荡”的动员与爱护主力、拥护抗日军的教育，以建立军民不可分离的联系。在敌伪“扫荡”之前与“扫荡”过程中，必须进行良好的宣传鼓动工作，以提高群众的信心和

对敌伪的仇恨。但在那些敌伪据点已经建稳，武装恢复暂时已属不可能的地区，应领导群众采取各种复杂的斗争方式以保存元气和贮蓄力量，应特别爱护与加紧培养在群众中有密切联系与高度威信的地方干部和群众领袖，只有依靠这种在群众中拥有高度威信的地方群众领袖，才能在最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和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四）加强边区与开展敌区的工作。应当抽调得力的与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争取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及人民中的工作，调派善于进行各种复杂斗争的部队到边区加强活动和建立同情区，以便必要时的隐蔽和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对边区的工作应采取各种复杂和隐蔽的方法，对同情区的工作应从长期打算，不求急效，对于伪军伪组织应不贪小便宜，不作过分与过多的要求，注意争取其上层分子，严格保守秘密，时刻注意为对方的安全作打算，才能更加持久和更加有效。

（五）加强统一战线与扩大交朋友工作。各根据地应在加强国内团结共同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下主动向邻近友军各方接洽，以求建立友谊关系。最近盐阜、苏中、皖东北及淮南路西对这一工作均有良好的开始，应继续努力进行。凡对这一工作尚未开始进行的地区，须按照上述各地区的经验设法进行。应团结根据地内各抗日阶层进行反“扫荡”的工作，特别对地方有威望的开明士绅与各界参议员须尽力照顾其安全，并吸收他们参加反“扫荡”与反奸细的斗争。应当注意华中各根据地的地主很多与会门和土匪有联系，如对他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或不够，都能增加我们在反“扫荡”中的困难。

（六）转变各根据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在新的困难条件下，各根据地内的各种工作方式方法，必须有所转变。今后在

根据地中一切工作均应切忌张扬，切忌表面，切忌大吹大擂，提倡埋头苦干，简单朴素的作风。加强县、区与团、连的领导和工工作，干部应该面向群众，深入下层。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避免刺激敌人的警惕，引起敌人之注意。在各根据地的重要市镇与交通要道，应按照华中局扩大会所指示的原则，有计划的建立精干的秘密党的组织，加强各地锄保工作，提高全党反奸细斗争的警惕和教育。

（七）加强全党团结，贯彻党的领导一元化。全党铁的团结与统一领导是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保证，党政军各级干部必须加强党性锻炼，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严格地痛快地清除自己的宗派主义余毒，严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根据中央指示，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并且把党的领导一元化，从各区党委贯彻到各地委以至各县、各区。

只要各地能够切实完成上列任务，则我们华中全党全军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一定会胜利。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
军·文献》（3）刊印。

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

(一九四三年一月)

彭 德 怀

有了武装工作队，我们的政治影响和抗日活动可以深达敌伪心脏，收到很大成绩。

首先，关于武装工作队及隐蔽游击根据地。

武装工作队的组织，是在实际斗争中逐渐发展成功的。当敌封锁分割加紧时，我各地区曾有便衣队、便衣侦察组的组织活跃于敌我边沿地区，主要是刺探情报，破坏交通。这些侦察队员三五人一组，深入敌交通要道和据点附近，隐蔽活动，可达数日之久。因此，引起我领导机关的注意，认为这些经验很可宝贵。一九四一年，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以后，不少根据地变为游击区，不少游击区变为敌占区，根据地日益缩小，且遭受严密封锁，经济物资深感困难。为打破此退缩与被封锁局面，晋察冀于一九四一年夏，曾有“武装宣传队”的组织，在武装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地区工作，侧重在争取人心。至一九四一年冬，北方局始正式提出建立武装工作队，并大体规定其任务、组织、活动方式等。对其要求，不同于侦察队及武装宣传队，较二者为繁重。除一般宣传、调查工作外，兼负锄奸、发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打击敌“配给制度”、破坏敌

* 本文是彭德怀《关于敌占区与游击区的工作》一文的节选。

伪统治秩序之责。但当时，对于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的认识，还非常模糊，仅估计到在敌寇分割封锁的格子网内，有建立小型秘密武装的可能。事实上，隐蔽根据地建立的可能，至一九四二年春天，始为我们了解。当时，冀南部分根据地为敌摧毁和控制；同时，却发现某些村庄抗日政权虽对敌秘密，但在村内仍可公开存在，部分抗日工作照旧进行，依然具有根据地作用。以后，敌对冀中平原大“扫荡”，对其他根据地边沿区的严重“蚕食”，使不少根据地变质。但随之，隐蔽根据地也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一九四二年冬，臻于相当普遍。

为什么武装工作队能够深入敌伪统治区内部活动呢？为什么在敌封锁分割的格子网内可以建立隐蔽根据地呢？这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是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以后，人民负担普遍的加重（特别是劳役负担）；加以敌大量捕捉壮丁充当伪军，或输送出关，种种暴行虐施，不一而足。这种残暴的民族压迫，引起人民普遍的、极端的愤恨，打破了多数落后群众苟且偷安思想——“只要完粮纳税，不问谁来当官”。即上层阶级，除去极少数为敌作伥的汉奸，大多数也感到“活不下去了”。当时，各个阶层共同叫出“敌人是喂不饱的狼”这样通俗而深刻的呼声。敌寇为了巩固内部，对伪军伪组织中所谓“动摇分子”（即同情抗日分子），又实行清洗与镇压，使许多分子感到“汉奸也不是好当的”，更促成两面派分子的产生。所有这些，均给我们武工队活动及隐蔽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准备下客观有利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我各根据地为敌严密封锁。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以后，曾为我一时打破的“囚笼政策”，不仅逐渐恢复，而且碉堡、公路更为增加，“扫荡”与反“扫荡”战争于一九四二年亦特别频繁；敌又疯狂实施“蚕食”政策和“三光”政策，使我遭遇严重困难。敌如此步步进逼，

我步步退缩，长此下去，不是道理。部分战略区乃在军事指导上提出“敌进我进”口号，注意到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武工队及隐蔽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就是在这样主客观要求下应运而生的。

其次，虽然武装工作队有极大成绩，但仍存在着某些相当严重的缺点。主要是：

（一）不善于根据工作的发展形势，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使武装工作队逐渐地方化，领导已经初步发动的群众，变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为隐蔽根据地或游击根据地。这主要是在思想上还没有了解，我们在敌伪统治区活动有破坏和建设的两方面。一方面，必须破坏敌伪的各种组织及其所树立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必须发展我们的组织，进行工作，来建设自己的力量。现在，一般同志对积极培养我们的力量，逐渐创造根据地这一任务，自觉地去进行得还不够。因此，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实际工作方面，还较少长期着眼“生下根去”的具体做法。

（二）在敌占区、敌占优势游击区活动的同志，特别是武装工作队，还有不少违犯群众利益、破坏革命纪律的行动，这是必须严格纠正的。工作中，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作风和违反敌占区、游击区具体政策的现象。如宣传中的党八股还很多，不问对象，向乡村人民大讲苏德战场、太平洋的地名。甚至宣传者自己也闹不清楚，把伏罗希洛夫当作地名，说日美在哈尔科夫打仗等，这已经变成笑话了。如机械的将根据地内军民誓约，搬到敌占区，强迫群众执行；对敌占区、游击区知识分子提出“团结在文化界救国会的周围”，坚持对敌文化斗争，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的要求等。又如，把宣传品贴在老百姓门墙上，使有些群众为敌杀害，以及不问环境召开

大会等。再如，不顾及内线安全，把宣传品放到敌皮袋内，或在澡堂、厕所、厨房到处散放，以至暴露。也有把宣传品贴到敌司令部门口，以致全市戒严，捕人数百等。又如，对两面派，不问其处境如何，坚持必须做到某些事情，否则即以死相威胁。或对已经争取回头的汉奸，一方面要他为我做事，一方面又布置暗杀等。类似以上所说，这些主观主义、不照顾群众利益、违反隐蔽埋伏方针、违反正确的争取两面派和锄奸政策的例子还很多，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检查，认真纠正。

以上这些缺点，如果能够纠正，武装工作队将收获更多的成绩。

最后，关于武装工作队，再提出几点：

（一）为了适应今天对敌斗争的需要，应确定武装工作队的工作目标是组织敌占区、游击区群众，变敌占区、游击区为隐蔽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所有武装工作队的具体活动及任务，均应围绕这一基本目标，求得在各该地区生根。若果隐蔽游击根据地一旦形成，依据具体情形，必要时，该武装工作队即可成为当地的基干武装，继续发展为我占区，与我基本根据地互相打通，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即使不能如此，也应留置部分人员在那里长期坚持。因此，应更好地注意活动的方式方法，巧妙利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配合，绝对避免突出暴露，以防敌寇摧残，弄到功败垂成。

（二）武装工作队的组织，是一种综合性的组织形式。所有队员，均须有较高政治质量，真能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目前，尤须适当增加地方工作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每队必须配备有一两个相当地委、县委的坚强干部，掌握政策，成为领导核心。应成立党委会（三人到五人）负责领导一切工作。行政上应设队长、政委。一般受地委会领

导。关于军事政治工作及行动，在地委会决定后，分由军分区负责指导。各级县委会或县级对敌斗争委员会，有必要时，应吸收武工队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一定会议。领导机关必须定期检查其工作，总结经验，纠正分散独立活动发生的不良倾向。应采取轮番整训，抽人报告，到工作区域实地检查等方法。

（三）需加强政策教育，特别是敌占区、游击区各项具体政策与实际工作的教育。学会如何争取两面派及叛变动摇分子，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及坚决反共的叛徒。掌握斗争与争取（即中央所说的镇压与宽大）联系运用的策略。学会争取知识分子，进行社会统一战线工作的本领，也要学会运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的艺术，用各种办法减轻群众负担，适时恰当的领导群众斗争，以适合当地环境的多种多样的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当进行讨论研究时，要将一般原则和实际经验相结合，更要着重于在实地工作中不断研究改进。

（四）要有机警的游击战术训练。因为是深入敌格子网内活动，便要格外的防止敌人袭击及“清剿”。一般的应由近及远，避免久住一地。应采取三五人一组，彻底分散活动的方式，飘忽不定，神出鬼没。同时，必须严格群众纪律。只有如此，才能使群众感到我们言行一致，得到拥护。否则，存身都不可能，更不要说进行工作。这一点，应深刻认识。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延安各界正开盛大的群众大会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在前线与后方各地，日内均将召开同样的大会。全国人民对于我伟大民族之获得国际地位的平等，正在兴奋热烈地进行庆祝。本报愿乘此机会，一述中国共产党与废约运动。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大体上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帝国主义者残暴侵略、中国腐朽统治者卖国求荣、中国国际地位日益下降的阶段，后一阶段为中国人民民族觉悟生长、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发展的阶段。这种划分是大体上的，因为在前一阶段中，也曾有过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前夜的护路斗争等等民众的反抗运动，而后一阶段中，亦曾有过“九一八”后汪精卫的不抵抗主义与投降主义。然而基本上是可以作这种划分的，因为前一阶段中虽然有民众反抗运动，但这种运动是自发的、民族觉悟程度不高的、组织散漫的、目标不清楚的、屡仆屡起的斗争，只有在后一阶段上，中国人民才清楚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的桎梏，才有高度的民族自觉，才有鲜明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才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民斗争的政党，及全民族的团结奋斗，以致能

够进行神圣的抗战和取得目前废约的成功。后一阶段上虽曾有人如汪精卫之流和我们民族死敌日本帝国主义者，谈和平、谈共荣、讲妥协、签条约。可是民众义愤终于焚毁了这些纸张，爆发了伟大神圣的祖国战争。这两个阶段底分水岭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之诞生。中国共产党，是认清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及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个政党。当在中国尚有许多人士迷信“威尔逊宣言”和期待“列强援助”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一个政治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上，以《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为题，而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榨取中国的本相”，指明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事实上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战斗口号。并于同年六月第一次对时局宣言中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债款，完全收回管理”之要求，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矢。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曾大声疾呼倡导民族民主的联合战线，两年之后这一联合战线结成了，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改组于广州，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政纲，其中有一条是：“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之口号已成为民族民主联合战线的口号，全国人民的口号。自此以还，民族斗争日益澎湃，由“五卅”而省港罢工、而北伐、而占领武汉、而收回汉口租界。不幸中途变生，功败垂成。此后十余年中，中国共产

党始终坚持着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光辉旗帜。当汪精卫之流窃据要津，高唱“不抵抗主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及签订屈辱条约时，中国共产党却坚持地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宣传、组织和实行以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此后，中国共产党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结成奔走呼号，乃于卢沟桥事变之后，在蒋⁽¹⁾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了全国抗战，恢复了国共合作，五年以来坚持不屈，用能屡挫暴寇，使中国一跃为世界四强之一，而获得了今日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与平等新约之签订。

从这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它是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倡者，是这一主张始终不屈的坚持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议者，是抗日战争中站在最前线的英勇战士。而共产党之能够首先认清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提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之正确的口号、方向、道路、方法，乃是因为它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它掌握了集几千年人类思想大成的理论与方法。正是马列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去了解周围环境，判明祖国所处的危急状况，认识奋斗的方向，提出战斗的口号。正是马列主义帮助中国共产党发扬中国人民反抗外敌的光荣传统，走出狭隘的排满口号，抛弃“列强援助”的幻想，而走上广泛的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马列主义及掌握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乃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灯塔。

（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底倡导者，而且是争取这一口号实现、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实现的主要的方法——民族统一战线底倡议者。中国共产党早就看到，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斗争，才能求得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历史事

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远见之正确，大革命时代与抗战时代，不论对内对外，都是中华民族近百年史上最光明最充满希望的时代。目前废约之成功，将来抗战之胜利，均唯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赖！

（三）虽然如此，在今日废约成功之时，中国共产党却并不以此自炫。它深知在这事业上，政党倡导之力固然不可湮没，然而这个成功，总的说来，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民，唯有人民，乃是这一光荣史诗的作者。政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它的领导只是把人民的公意“集中起来”为口号、纲领，又“坚持下去”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运动。任何政党只有在能够与人民一起正确反映与集中人民的要求而又不折不挠坚持这个要求，才能成为运动的胜利的领导者，反之，就会成为可怜的失败者、历史的丑角。所以，若问：这是谁的成功？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首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我们衷心地崇拜我们伟大人民的力量底雄伟，而要更深入人心，加强与民众的联系，正确反映民众的要求和坚持民众的要求。人民——这是中华民族求得自由平等底力量的源泉和保证。

（四）正如我们在中共中央二十五日决定中所看到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热烈庆祝废约之成功，另一方面，却强调争取抗战胜利之重要。废约和平等新约之订立，固然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成功，可是，这还不是民族解放底彻底实现……因为必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中共中央决定）。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着我们的的大好河山，不击败它，不把它赶出中国境外，则一切平等条约的规定，便不能实现。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当前的急务。在欢欣庆祝之中，我们应更“坚定军民

抗战的信心，号召军民驱逐日寇，为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我们已经有了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我们还需战胜日寇的民族战争的胜利，我们需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全国军民，全国同胞，为抗战胜利而努力呵！为彻底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呵！

根据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毛泽东等关于加强统战工作 给各战略区域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

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毛 朱 王 叶^{〔1〕}

丑虞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王稼祥、叶剑英。

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

邓 发

中国工人阶级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七”，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前的“二七”，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二七斗争”遭到当时北洋军阀的惨杀，所以“二七”是沉痛的革命纪念日。在“二七”的斗争中，虽然丧失了我们英勇的同志——林祥谦、施洋，及工人阶级的许多战士，然而烈士们的鲜血并未白流。当时烈士们奋斗不懈的理想，“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英勇口号，经过二十年的斗争，已经实现了，或者逐渐实现着。屠杀烈士们的刽子手，曹吴⁽¹⁾军阀已被打倒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湮没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气焰。经过二十年来的英勇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创造了自己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民主主义“三三制”的政府，在这里工人阶级不仅有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生活文化也一天天的提高了。过去中国工人阶级是赤手空拳的，今天却手拿武器；过去毫无自由的，今天则与各抗日阶层共同成了“三三制”政权的主人翁。所以在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里，烈士们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烈士们“为自由而战，为人权

而战”的理想在全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呢？眼前事实已经回答是没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还占领着我们许多重要城市和富庶的省份，他还在蹂躏着我们无数的同胞。在沦陷区那里只有野蛮而无自由，只有屠杀而无人权，要完全实现烈士们的理想，唯有将日本帝国主义打到鸭绿江边！

没有民族的完全独立，一切自由人权，是无从获得的；要取得民族完全独立，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将成为空话。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当然必须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坚持抗战。继承“二七”光荣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困难与接近胜利的关头，必须团结一致，熬过难关，发扬“二七”英勇斗争精神，争取最后胜利。特别是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的工人阶级，更应热烈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来纪念“二七”，来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

为了克服抗战困难和减轻各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同时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我党中央曾不断号召发展各根据地生产。在各根据地里，一切觉悟的工人无不积极起来响应这一号召。为了更多的生产军需品及日用必需品，就有赖于工人劳动热情更进一步提高，在设备简陋的公营工厂中，只有广泛的开展赵占魁运动，才能达到减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在华北各根据地许多公营工厂工人已开始这一运动，如晋东南那里已经产生了不少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如王绍棠由于工作方法之改造，使每人每日产量增加了四倍，刘克勤超过预定产量三倍，解聆森一天产量等于别人三天，常胜基一天完成两天半的生产。赵占魁运动是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发动的，但直到今天却还有许多工厂尚未发动起来。还有不少工厂对这一运动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或者对此运动采取一种轻视怀疑态度，认为这个运动无法发动起来，有些说标准太高

了，有些说生产率过去已很高，用不着再发动赵占魁运动了。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发动呢？我想是可能的，因为：

第一，我们大多数工厂作坊（除个别厂外）已有的原料，仍可供给现有工人的生产，并不感到原料缺乏。

第二，工厂及工会，都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生产的，工厂与工人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各根据地的工人群众，经过几年抗日的实际斗争的教育，政治觉悟已一般的提高了，同时由于生活的改善、文化的提高，对于生产一般还是积极的。

因此，客观可能条件是存在的，所缺乏的是主观的努力和具体的组织工作。那末应当怎样努力和从何着手？首先必须懂得：要发动赵占魁运动，如果工人仍保有浓厚的经济主义思想，缺乏高度政治觉悟，缺乏高度自觉的革命热情，缺乏对日寇深恶痛绝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厂行政人员、党的工作者、工会工作干部，在工人群众中应抓住具体问题（如日寇暴行事实、抗战胜利、苏联红军胜利、目前英美废约、各根据地生产热潮、苏联工人为战胜德国法西斯曾提出“以一当十”的运动、各种革命纪念节、新民主主义建设前途、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参加生产的劳动意义等）进行宣传鼓动与耐心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掀起高度的生产热潮，运动才有可能开展。其次，工厂行政人员、党的负责者、工会工作人员，对赵占魁运动必须采取一致的步骤，抓住组织赵占魁运动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中心环节。如果支部积极发动而工会不动；或者工会出来号召而支部又不积极领导；或者支部工会都动起来了，而工厂行政管理人表示若无其事，袖手旁观，此冷彼热，互相推诿，那末运动则永远也不会发动起来的。最后必须在工厂中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如进行支部大会动员，组织工会积极分子

会议及工人大会等；解释提高生产对于战胜日寇的重要性，解释我们今天生产不是为任何私人创造财富，而是为革命增加财产，解释发动赵占魁运动的意义，分别找工人中积极分子谈话，向工友们说明：作为赵占魁的工作者的条件及他现在所享有的荣誉，推动他学习赵占魁的劳动态度。对这些首先领头的人予以奖励，对于那些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怠惰分子，则加以批评，开展适当斗争，甚至处罚，使每个工人认识，在为抗战而生产中，表示怠惰就是耻辱。

工友们起来吧！苏联工人阶级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祖国，为了最后战胜德国法西斯，曾提出“以一当十”的生产口号。我们为了坚持抗战，克服困难，最后战胜日寇，让我们每个工人起来学习赵占魁吧！

根据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吴佩孚。

毛泽东关于总结整风学习经验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

恩来、德怀、小平、荣臻、林枫、朱瑞、荣桓、漱石⁽¹⁾同志：

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

(一) 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

(二) 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

(三) 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

(四) 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

(五) 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

以上问题望予速复为盼。

毛 泽 东

二月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即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饶漱石。

军委关于部队干部 实行交流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

各战略单位：

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建议：

(一) 我军所处环境，交通不便，上下隔阂，各地情况特殊，很不一致，因此干部太流动是不容易熟识情况，有碍于正确领导，但干部太固定，亦使干部进步停滞，上下隔阂，故在适当程度内（如政治部之科员科长，司令部之参谋与科长等等）实行干部交流之必要。即：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这样既可以从工作中更好的来培养干部，又可以沟通情况，密切领导与加强部队的工作和战斗力。

(二) 上面与下面的交流：长在领导机关之干部，特别是新知识分子干部，应使之到部队里去做一个时期的下层实际工作。而在部队中做了相当时期工作之干部，则应吸收到领导机关参加一时期的工作，这对于这种干部本身与领导机关都是有好处的。就这种干部本身来说，可以使他们扩展眼界，能总结经验，得些较全面的知识。就领导机关来说，能经常反映下面新的情况，与下面的实际有更好的联系。现总政与联防政治部，已实行此种交流，作为一种干部制度与工

作制度。暂规定总政每次与一二〇师及原留守兵团部队交流四人：团级二人，一老一新。营级二人，一新一老。交流期每半年或一年一次。前方各部队亦可根据具体情况，实行此种干部交流制度。

（三）前方与后方的交流：这里又包含两种不同的交流，即：

1. 原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应吸收一部分由华北与华中抽调回延的干部到部队里去，增强实际作战的能力，原在该部队的干部，则抽调一些到军校学习。

2. 前方各部队亦有自己的后方，应将在此种后方机关工作的干部（如参谋、宣传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工作人员），与经常处在战斗前线上的干部，酌量实行必要的交流。

（四）军队与地方的交流：这对于军队与地方都有好处，就军队来说，可以更好了解地方情况，与地方关系弄得更好些，可以学些地方工作作风，补助部队工作作风不足之处；就地方来说，可以使其工作更能适应战争环境，与军队关系弄得更好些，也可以学些军队作风，补助地方工作作风不足之处。此事，各部队可提到当地党领导机关商定实施办法。

（五）此外，部队政治工作者，可能时应以一部分转到军事工作岗位上去，但其他专门工作与技术人员，则不适用交流办法。上述各种交流主要是指一般政治性质的工作干部，而军事干部的交流则只限于军事工作本身（如这个部队交流到那个部队，参谋、军事教育者与指挥员等交流）。

（六）实行上述各种交流不管是长期的与短期的，都应把自己最好的干部调出来，反对本位主义，借交流之名，以坏干部换好干部，或者只要人家交流，而自己则一毛不拔，应识大

体顾全局，对本位主义的应严加纠正。

军 委

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 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五年余以来，我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与敌伪作艰苦的斗争，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主要是依靠着八路军新四军与广大的人民，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妇女工作是有成绩的。可是由于我们在妇女工作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缺乏深入下层、埋头苦干、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建设对于坚持抗战、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没有把经济工作看为妇女最适宜的工作，没有把握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及她们家务的牵累、生理的限制与生活的困难，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妇女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就根据主观的妇女解放的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规定计划，成立团体，要妇女经常出来开会，对

* 这个决定经毛泽东审阅，并在第三自然段的最后加写一段话：“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她们作不必要的动员，浪费她们一些人人力物力，致使工作一般化，组织形式化，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这种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倾向，是使妇女工作停滞，不能更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

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 and 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对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为实现上述的方针，各地妇女工作作风、方式、方法，须有彻底的转变。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妇女群众的生活、需要、情绪，顾及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选择中心地区开展工作，逐渐影响邻近地区，以至于推动全局。因此：（一）各地妇委妇救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深入村庄，教育帮助与解决农村妇女参加生产战线中的困难，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妇女工作的尺度；（二）农村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喂猪、能煮饭、能理家……应按照各地具体情形来作计划，但她们的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她们家庭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不可能妇女孤立的去做，不要重复过去某些地区只从形式上、数字上标榜妇女开了多少荒、建立妇女林等没有实际内容的缺点，要动员妇女实实在在参加到广大群众的生产中去；（三）根据妇女群众的

需要进行组织，纠正过去有名无实的组织方式，以生产合作及各种生产方式（如纺织小组等）去组织她们，这些组织应该成为妇救或妇联的基本组织，而不是办一些有名无实的空团体、空机关；（四）尽量减少对农村妇女不必要的动员，减少开会，爱惜她们的人力物力，使她们有更大力量从事生产；（五）妨碍身体健康致影响生产的，如小脚及不注意卫生等，应当鼓励妇女改革之；（六）对于妇女文化的、政治的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歌唱的小调等；（七）妇女干部要消除轻视经济、生产工作的错误观点，必须了解生产不仅是各根据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而且妇女工作者要密切与巩固和农村群众的联系，只有从深入农村中去组织妇女生产，解决其生产困难，增加其经济利益着手。要做到此点，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国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国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今年纪念“三八”节的方针，就是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工作，各地应按具体情形规定详细办法。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高干会与整风运动

（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高干会清算了边区党历史上三风不正的害处，并以之教育了党的干部，使他们在思想上认清了党的历史，获得了珍贵教训；高干会揭露了现时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偏向，指出这些偏向都是三风不正的残余，使干部懂得了党的现状，知道党在布尔塞维克化途程中的阻碍是什么，并如何克服它们；高干会明确的规定生产与教育为今后边区党的两大中心任务，澄清了“百端俱举”、“样样都想做模范”等不切实际的思想，使干部把握了将来，知道边区全党今后所应努力的总方向；最后，高干会更反对了对党闹独立性的现象，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党的一元化，使干部懂得了“党是无产阶级组织之最高形式”的理论与实际。这些就是高干会的主要成功。所有这些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收获是如何得来的呢？高干会的经验，对于边区今后的整风运动又有什么意义呢？

高干会的经验教导我们，要贯彻整风运动，首先就必须把它与实际结合，整风一旦脱离实际，就成为无的放矢，就不会得到任何的收获。边区党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时期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所统治，因而使党蒙受了很大的损害；边区党的许多干部，虽都是从历史中过来的人，但还未能都把它明确的提到思想原则的高度，还未能能在观念形态上把它正确的表现出来，

因而也就不能统一全党的认识，不能根绝不正的三风。边区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在高岗同志领导下，已经克服了历史上不正的三风，一贯的执行了中央正确的路线，但三风不正的残余，在一部分干部中却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着。如这次高干会所揭发的，党内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本位主义、闹独立性、贪污腐化等倾向及其他一些偏向，都是三风不正的残余表现。没有整风运动，这些偏向是很难克服的，高干会是很难成功的。但是反过来说，边区党的整风运动，如不与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相结合，如果不是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那末整风运动也是不能贯彻的。而在高干会前，边区党的整风运动所以还未能更好的深入下去，其根本原因也就正因为还没有把整风精神与边区这些实际问题更好的结合起来的缘故。高干会这种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奠定了边区党整风运动的基础，是整风运动在边区的具体化和进一步的发展。今后边区的整风运动，一定要遵照高干会的方向，和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乃至每一个人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

高干会的经验又教导我们，要贯彻整风运动，对于党内党外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必须着重于思想检讨。所谓整风与实际结合，决不是要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搜罗无数的现象，更不是要我们枝枝节节、谨小慎微、把中心放到技术上去，而是要我们通过各种现象找出其思想根源，找出其真正的中心环节。譬如高干会关于历史教训的检讨，不只是搜罗当时的各种现象和事实（虽然这是必要的），而且更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现象和事实的根源，指明它们是路线错误和个人品质恶劣的结果。这就在本质上解决了问题，使我们以后有可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再生。又如为什么发生闹独立性的现象呢？原来是由于这些同志对党的认识及党的某些政策有不正确的观点，因而产生了闹独

立性的现象。又如为什么产生各种自由主义的现象呢？原来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和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因而产生了自由主义的态度。高干会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工作中一切原则问题，都有它思想上的根源，不从这些思想根源上来着手，解决问题就不会彻底。而党的一切政策，都是基于党的无产阶级思想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就要更多注意于掌握党内的思想动向。这是参加了高干会的许多同志所深刻体验到的，也是今后整风运动中所应该注意的。

高干会的经验又教导我们，要贯彻整风运动，必须正确的运用党内民主，充分使用自我批评的武器。这次高干会所以能比较深刻的检讨过去的工作，暴露其缺点所在与得到纠正的方法；所以能真实的反映现实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规定出今后的具体任务；所以能使党更进一步的认识干部，使许多干部能更真实的认识自己与别人，更深刻的知道自己的毛病所在，并在思想和作风中开始转变，都是与这种党内民主及自我批评精神的发扬不可分离的。如果到会干部对自己与别人的缺点，不能实行无情的和无保留的揭露，如果只看到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成就而冲昏头脑，高傲自满，而忌讳讲出我们的缺点，如果我们只求表面的形式的一团和气，而把它误看做是党内的团结，如果高干会是为这样的精神所笼罩着，那末，高干会就不能有任何的成就，整风运动就变成了毫无实际的空话。因此，对于高干会广泛的发扬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但不应有任何的怀疑，而且应在今后的整风学习中继续加以发展。

高干会的经验更教导我们，要贯彻整风运动，必须倡导布尔塞维克所特有的那种学习精神。这次高干会就是一个集体学习集体创作的大会，就是一个学校。我们从党的组织方面看，有县委、地委、西北局及中央四级工作的同志，从党的工作性

质方面看，有党政军民学五方面的干部。经过他们把党内党外的一切情况与意见，完全集中起来，在大会上加以分析，加以研究，互相检讨，互相学习，最后才得出正确的意见或方案。这个过程充分证明了：对于政治领域内的一切问题，绝非一二“天才”所可独断，而必须集中群众的意见，才能更加接近真理，才能使党的领导更加正确。因此，党及党员干部就必须有最虚心的学习精神，向所有干部学习，向所有党员学习，向广大人民学习。这种学习精神是我们党在思想战线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反之，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学习精神，如果我们不善于集中党员干部的意见，如果我们决定政策只是根据少数人偏狭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必然会犯主观主义的毛病，就会使党的领导走入错误之途，自然也就不能贯彻整风的学习了。我们应该向群众学习什么？我们要集中群众的经验，找出教训，找出规律，这就不但要研究现状，还要研究历史，因为现状是由历史发展出来的。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采取割断历史与片面的或笼统的态度，而是详细占有历史与现状的材料，由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各种现实情况，然后得出适当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高干会关于财经问题的研究与结论，及高岗同志关于历史问题及高干会总结报告，都是这一方法正确运用的典型，活生生的教育了全体干部应该如何正确的解决问题。早在前年八月，中央调查研究决定就要我们学习现状学习历史。这次高干会的所以成功，就正是由于在广泛的范围内实行这种学习方法的结果。我们整风运动的目的，既是为了学会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那末，高干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高干会决定今年全边区党要以高干会精神及内容，贯彻整

风学习，以转变全党工作。我们希望全边区党都能继承高干会的作风，使整风与实际完全结合，更多注意思想上的检讨，发扬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精神，虚心的向群众学习和学习历史，真正在整风学习中完成高干会一切决议。但这不是一个说空话的问题，只有实践才是我们检查整风学习与检查高干会决议执行的唯一标准。那末，就让我们大家等着瞧吧！

根据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解放日报》
刊印。

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何克全

从去年毛主席召集的文艺座谈会以后，快一年了，在那个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的号召。从那次座谈会毛主席的号召后，许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要求下乡，决心下乡，后因整风运动，把大家留在延安整风后再下去，一留就留了一年。现在整风运动的文件学习大体上已经完结，同志们都要下去了。留了一下是有好处的，那时就下去倒反不见得有好处。因为那时虽然经过文艺座谈会在思想上的确得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毛主席对文艺运动的指示，但是如果没有整风运动，文艺座谈会的方针是不能深刻了解的，思想上的进步是没有今天这样大的。所以今天下去与那时下去是不同的，是要好得多的。今天我们有了文艺运动的方针，又有了整风运动思想上的准备，所以今天下去比那时下去好。现在利用下去工作之前的机会，召集一个会议，把有些以前没有说的问题更说清楚一下，尤其是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由陈云同志详细来说明。这些问题，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文委很早就想说，因为没有适当的机会，因为时机没有成熟，一直没有说成。在文艺座谈会时谈这些问题是

^{*} 这是何克全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否适当？是不适当的，因为时机没有成熟，思想不一致，思想上还没有准备。从前和文艺工作同志讲话，不管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总是客气，中央文委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经过毛主席在去年座谈会上的结论，经过整风运动，大家认识进步了，时机也成熟了，所以这些问题应当说了。在今天，说了大家不会见怪，不会有什么反感，因为在思想上有了认识一致的准备。在今天来说大概是可以说得通，说了以后虽然也许有些同志还不免一时难过，但是过后冷静一想还是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应当说了。是不是不说好呢？我们觉得不说不好，因为问题是存在的，不说对党没有好处，对同志们个人也没有好处。说了倒有好处，对党有好处，对同志们个人也有好处。所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文委决定召集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把以前没有说的问题说清一下，以便同志们下去工作时好好的把毛主席的指示实现起来。

经过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延安的文艺界是有了进步，有了改变。这个变化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从今年春节的宣传中可以看出。春节文艺宣传活动，大量采用民间形式，采用为广大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的形式，采用为老百姓能解得下的形式，这是表示延安文艺活动向新的发展方向的开始，向着毛主席号召的方向的开始。比如“鲁艺”的秧歌队为各方面所赞誉，其他各个剧团及机关学校所组织的秧歌队都有了成功，这是值得表扬的。许多作家已经开始去访问老百姓劳动英雄，写他们的事业，小说、诗歌、戏剧、木刻等等都在向着接近群众这一方向走。所有这些就是表现延安文艺界向着新的发展方向的开始，向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开始。

经过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许多党员文艺工作者也有了进步，有了改变。他们的变化表现在哪里呢？从前在党员文艺

工作者中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很难进行的，这次整风中，如在“鲁艺”，在“文抗”，在中央研究院以及其他各机关的党员文艺工作者，自我反省自我批评都比较容易进行了，对党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思想意识也有了进步，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文艺与群众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这就表现党员文艺工作者在为实现党的新的文艺运动方针中，党员自己也有了进步。没有党员文艺工作者自己的进步，不断的克服自己的弱点，党的新的文艺运动方针是不可能实现的。党的新的文艺运动方针，只有经过党员文艺工作者与非党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工作才能实现。

过去我们的新文艺运动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现在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圈子跑到工农兵的圈子里去，这是需要许多工作许多努力。现在大家下去工作，把毛主席的指示，把整风的精神，拿到工作中，实现党的新的文艺运动的方针。

今天我想讲下面几个问题：

一 为什么下乡，怎样下乡？

这次下乡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在下乡之前，对于下乡的认识还得说清楚一下，虽然要求下乡是一致的，但对于为什么下乡，如何下乡，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没有好好的认识下乡，就是下了乡也得不到结果。下乡这件事情并不是新的，以前我们也有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到乡下去，到前方去，到部队去，但由于认识不够，结果还是没有解决文艺工作中的两个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相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

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下乡，下乡目的何在？决不是因为延安吃不开，也不是因为精兵简政。下乡为了什么呢？是为了

文艺真正为工农兵服务，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要这样做，就必须到他们中去生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与他们打成一片。这次文艺工作者下乡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以前还未解决的问题，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这两个大问题。过去我们新文艺运动的圈子的确是太小了，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今天我们有一切好的条件，可以使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把文艺运动的圈子扩大，深入到他们里面去，来写他们的生活、工作、斗争和事业。这就是这次文艺工作者下乡的目的。

过去我们有过不少的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到部队去，到乡下去，到工厂去，为什么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就是因为对下乡的认识还不够。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为什么下乡，怎样下乡是非常必要的。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过去下乡的经验，提出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打破做客的观念。过去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到部队到乡下到工厂的也不少，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组织服务团的，有组织工作团的，有组织考察团的，有去参观访问的，有去收集材料的，有去实习的等等。不管在何种形式之下，总括起来一句话，都是去做客，去的人以客人自居，接的人以客人相待，去的人客客气气访问一番，接的人客客气气招待一番。关系弄得好的，就是宾主尽欢而散，开欢迎欢送会，多杀几只鸡，多备几匹马。关系弄得不好的，就是宾主不欢而散，结果就造成文艺工作者与部队与地方党政民之间的隔阂。去得好的，最多就是收集了一点材料回来了，写了几篇东西。去得不好的，连材料也没有收集。过去下乡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下乡的方式是不适当的，对于我们的事业的帮助很少，对于下乡的目的也不能达到。

这次下去，就要打破做客的观念，真正去参加工作，当作当地一个工作人员而出现。到部队里去就是军人，到政府里去就是政府的职员，到地方党去就是党务工作者，到经济部门去就是经济工作者，到民众团体去就是群众工作者。不管职务之大小，担任一定的职务，当一个指导员，当一个乡长，当一个支部书记，当一个文书，当一个助理员等等。如果这次下乡还是抱老观念下去，那结果一定是不会好的。对自己方面来说也是不好，你不真正参加工作，就很难与当地群众当地干部打成一片。你不真正参加工作，也就很难去体验实际，真实的材料也就得不到。对他方面来说也是不好，你不是他那里的工作人员，工作就不好分配，你不担任一定的职务，也就很难照顾，结果反而增加他们的麻烦。如果仍抱旧观念去下乡，虽然表面上可以做得很客气，但实质上必然会增加双方面的隔阂，至少是会增加双方面的顾忌。如果是去参加工作，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工作由那里分配，有意见在那里提出解决，那就无所谓麻烦不麻烦了，隔阂也就会在共同工作中逐渐消除。因此这次下乡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痛下决心，打破做客观念，真正参加工作，担任一定的职务，当作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如果要这样，那就要求下去的文艺工作者两件事：（一）不要抱收集材料的态度下去，而要抱工作的态度下去。重心放在做工作，还是放在收集材料上面？放在工作上面。把工作做起来，把工作搞好，在工作中体验生活，与群众和干部打成一片，材料自然会丰富。这样得来的材料，一定比所谓收集来的材料好。如果是抱收集材料的态度下去，对方也就以你是收集材料者相待，他告诉你的材料，一定是他急于想发表的，这样得来的材料一定是以他所想到的为主。而且你真正把工作做起来了，与当地群众和干部搞熟了，也不妨碍你去收集材料，这样得来的材料

一定也更好。假若抱收集材料的态度下去，那一定不会好好的工作，结果真正的材料也不一定收集得到。假若抱工作的态度下去，把工作搞好，丰富的实际的材料也一定可以得到。(二)不要抱暂时工作的态度下去，而要抱长期工作态度下去。文艺工作者常常有一种想头，以为我不过暂时去体验一点生活，不久就要回来写作，结果包袱一放，开口就说我在这里工作半年或一年、两年。人家听了你这样一说，已经冷了半截，原来你是来暂时工作的，结果也就随便分配你一点临时工作，应付一下，等你期满后好走。这次下去，不要抱暂时工作态度，不要规定期限，不要说是西北局、中央组织部、或文委派你来工作半年一年，收集一点材料的。不仅口里不要那样说，而且要实际下一个决心，真正抱长期工作态度，取得丰富的经验和真实的材料。以前我们有去前方收集材料的，这些人不都是临时的，也有在那里长期住过的，有的住过三四年的，但是观念没有改变，结果还是做客，从这个地区做客做到那个地区。你说长期也可算长期了，抗战六年他就做了四年客，还不长期？我们所说的是长期工作，而不是长期做客。什么是长期工作呢？长期工作就是安心于当地工作，把工作做好，获得真实的、足够的写作材料为标准。

有的人说：长久不写会丢生去，以后手硬了，就不能写了。这种问题是不会有的，即使有，也不很大。一个有技术的人，会写文章的人，并不会丢生去。而且我们并不是说长期工作就不写文章了，真正有材料，在业余还是可以写，而且也应当写。在你参加工作后获得新鲜事物时，可能把旧的一套写作方法丢了，可是创造出的一套新的写作方法来了。所以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也有人说：工作搞起劲来了，搞起兴趣来了，有改行的危

险。这种问题也是不很大。假若真正有这样的人，把工作搞起劲来了，改了行，这也没有什么坏处，证明以前的行对他是不适合，而现在的行对他更适合，这只有好处。因为干文艺工作是在革命，干其他工作还不也是在革命？有的人在文艺上还没有成为他的行，其他的行又没有，把工作搞起兴趣来的，就搞下去，这也不算改行，因为他本来就还没有行的。至于在文艺上有了成就的同志，又获得了实际生活，而文艺对他又是适合的一行，他用文艺来服务革命比用其他来服务革命更好，那为什么还要改行呢？所以这种顾虑也不必。

第二，放下文化人的资格。这个问题是和上面那个问题联系着的，做客的观念不能打破，也就是因为文化人的资格没有放下来，不放下文化人的资格，结果就势必做客。你不放下文化人的资格也由你，但是他们那里不是文化工作，而是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党务工作、经济工作、群众工作等等，而你以文化人的资格去工作，结果还不是把你当作客，格格不入。并不是说文化人不好，你做文化工作时以一个文化人出现是可以的，今天你做的不是文化工作，而是另一种工作，你就应当放下文化人的资格，以那种工作者的资格出现，到军队就是军人，到政府就是职员，到地方党就是党的工作者等等。

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是文化人，如果存了这种观念，对其他的工作就不会感到兴趣，而总以为自己只是做文化工作的。自己不要把自己看作是特殊的，应当看作是他们中之一个工作人员。当然一个过去从来是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忽然跑去做其他工作，开始时是不熟悉的，但只要虚心学习，努力肯干，其他工作也一定可以做好。如果不把文化人的资格放下，别人也把你当作一个文化人看待，结果总把你看成一个特殊的人，外面来的人，而不把你当作他们自己的部门中的一个工作人员。

这次下乡，我们不仅要有下去的决心，而且要了解如何下去，根据过去下去的经验，提出这两点意见：打破做客观念，放下文化人的资格。

二 下乡的困难

同志们既然决心下乡了，我们还得说一下下乡的困难。下乡是会有困难的，而且会有很大的困难，但只要有决心，那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过去下乡，在旧的观点下的下乡，也是有困难的，但在那种情形下的困难，主要的是生活上的困难，吃东西的问题，骑马的问题等等。这次下乡与过去不同，因此不仅是生活上的困难，而主要的将是工作上的困难。

首先来说工作上的困难吧。下乡去参加工作，而且担任一定的职务，这些工作都是从前没有做过的，是生手，地方情形不熟，人事不熟，工作不熟，要经过一个相当时期才能摸熟。不仅对于工作不熟，而且对于党的各种政策也不熟，现在去工作就必须了解党的政府的一切具体政策，须要一些时候来研究各项政策。工作环境变了，过去是搞文艺工作，现在是去搞地方工作，或部队工作，须要经过一个相当时期，来逐渐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以便适应于新的工作环境。

现在是去担任一定的工作，就要站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完成一定的任务。要这样做，就要求服从当地党的当前的任务，服从当地的组织。那就没有以前做文艺工作或写文章那样随便。以前坐在家里写文章，灵感来了，可以多写一点，灵感没有来，就可以不写。担任一定的工作，就要完成一定的任务，那可不管灵感来与不来都要完成的。譬如说，现在要动员牲口驮盐，或征收公粮，那就不能等灵感来了才去动员。过去有些

文艺工作者确是不懂得服从当前任务的重要性。当地党提出要他们用文艺配合当前的任务时，他们怕降低艺术水准而不作，或者是想埋头去创作留待百年后“不朽的”著作！以前也派过文艺工作者去担任一定的负责的工作，因为工作搞不惯，今天要一头驴子，明天要一斗粮食，觉得不胜其烦，还是一个人自由自在写点文章，或找几个知识分子学生聊聊天好，结果干不到一两月就不做了。实际工作是要动手动脚的，怕麻烦那是做不好的。到工作中去的困难一定很多，有决心都可以克服的，不要因为一遇到困难就灰心，要坚持下去，自然能克服困难。只要照毛主席所说的“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就可以把事情做好。

其次，生活习惯上的困难也会是很大的。过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生活惯了的，一下子跑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过去许多人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一下子跑到农村去，一定是很不惯的。要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就要适合他们的生活习惯，中国的农村并不是那样卫生的，在知识分子看不惯的事情，在老百姓看来却很平常，如果不能与他们打成一片，就很难接近他们。我们首先要能接近他们，然后才能逐渐提高他们。

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也是会有的，有人说乡下的生活很好，这当然好，但是下乡去要有准备吃苦的精神。假若没有这种准备，你抱着乡下生活很好的观点去的，到那里后，并不好，那就会引起失望。在一般的物质条件困难之下，我想乡下的生活，一定不会是很好的。

三 下去应该注意什么？

文艺工作者与普通知识分子下乡有一点区别。普通知识分子下乡，就是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下去。文艺工作者下乡，背上背了一个文化人的“包袱”。因此文艺工作者下乡更要特别注意，把“包袱”放下来。一时不能全放，也得慢慢的放下来。因此必须注意：

第一，与当地干部的关系弄好。他们可能在文化知识方面不够，但是应当承认：他们在工作上是有本事的。他们对当地情形熟悉，与群众有联系，对工作有办法。因此文艺工作者下去应当抱的态度：第一是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第二才是帮助他们不够的地方，不要一去就是取帮助他们的态度。他们有许多长处，确实需要学习。至于他们文化不足，当然应该帮助他们。

第二，对乡下的看法，这个问题也得说一下。他们的工作虽然是好的，但缺点一定会很多。有工作的地方，一定会有缺点，问题就是我们对缺点怎样看法。经过整风以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进步了，但也还得注意，要先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夸夸其谈，要从整个工作过程，发展历史去看问题。

这里还须提起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结论中已经是完全解决了的问题。毛主席曾经指出：文艺工作的内容历来都是赞扬光明和暴露黑暗，只有阶级标准的不同。我们为工农兵的文艺是赞扬民族抗战和人民大众的光明，暴露侵略者压迫者的黑暗的；对于黑暗势力在长期历史中所加在人民身上的坏东西，例如愚昧、落后、怯

懦、自私等等，则不是什么“暴露人民”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暴露侵略者压迫者的问题，对于人民只是一个教育问题。抗战的中国，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光明的时代，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更是处在一个光明的时代，所以对于斗争中的群众，当然是写光明，只有对于敌人才是暴露黑暗。毛主席这个指示已经把这个问题清楚的解决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并不是已经完全一致。有的人以为写光明就会变成公式主义，或者以为从正面写光明就会变成公式主义，从反面写光明才不会是公式主义，例如从工人罢工胜利来写工人团结就会变成公式主义，从工人罢工失败来写工人团结就不会是公式主义。这种了解，就是对于写光明写黑暗问题还没有好好的认识。公式主义不仅从写光明可以产生，而且写黑暗也一定可以产生。不仅从正面写光明可以产生，从反面写光明也一定可以产生。公式主义不是与光明相联系的，公式主义是由于没有生活，不能真实的反映客观而产生的。假定依照那种逻辑，写光明一定要从反面写起，这还不是公式主义？譬如有人来写延安的文艺界，你们赞成他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写光明合乎事实，还是写黑暗合乎事实？假定有一个人说延安的文艺界一点用处也没有，吃了小米一点事也不会做，你们赞不赞成？当然不赞成，因为不合乎事实，因为延安的文艺界是革命的文艺界，它是光明。至于在整个为着革命事业奋斗中还有某些缺点，那是另一回事情，那正是毛主席所说的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写黑暗的问题。因此对乡下的看法，应当首先看到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工农兵，他们是在为什么工作和奋斗；他们是在为抗战胜利为革命胜利而奋斗，这就是光明。在工作和奋斗过程中当然会有缺点，这就须要教育，纠正，克服，以便工作弄得更好。

这里也还须提一下自我批评的问题。既然工作中还有缺

点，是否允许自我批评？当然允许自我批评，而且需要自我批评，这次边区高干会就是充满了自我批评的。有的人以为写光明就是不要自我批评，或者是怕自我批评，这是曲解，这是不对的。有的人说，既然不怕自我批评，那就一切都写好了，这又是对自我批评的曲解。我们所需要的自我批评是与敌对的攻击相区别的。我们的自我批评是有立场观点的，是要合乎民族抗战和革命的利益的，是要合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我们的自我批评是有政策的，是要合乎党的政策的。我们的自我批评是要有光明前途的，而不是丧失前途的。我们的自我批评是要为着改善工作和巩固我们的队伍的，而不是为着破坏工作和瓦解队伍。自我批评是要从整个工作、从发展历史、从全面来看问题的，我们的自我批评是要有阶级斗争的立场和唯物史观的观点的。因此对乡下的看法，在使用自我批评时，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来使用自我批评。

四 对下乡文艺工作者的希望

下乡的也好，不下乡的也好，党的文艺工作者，基本上是党的好干部，我们这次帮助大家下乡，也就是为着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实现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指示，实现党的文艺运动的新方针。因此对大家的希望是：

一、把毛主席上次座谈会的结论，在工作中真正实现起来。新文艺运动发展的方针已经有了，而且大家的努力也在向新的方向走，所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一定是有前途的。

二、上面说了许多下去要参加工作，为着什么要去参加工作？不是为着别的，而是为着文艺运动。因此还是希望大家要写作品，大的小的长的短的都好。经过实际生活后，经过与工

农兵的结合后，希望产生真正有内容的作品，反映八路军，反映边区，反映群众生活的作品。过去没有好好的来反映这些东西，中央文委自己也觉得领导不够。希望你们下乡以后，真正拿出有内容的作品来。

总之，我们的希望就是这次真正能够解决以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使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把我们已经开始的新文艺运动方针推向前进。

根据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刊印。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 两个倾向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陈 云

同志们！现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来讲几句话送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了很重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够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讲讲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的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讲得是否对。两个什么缺点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从积极方面说，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讲不要特殊。在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说宽些，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没有人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呢？我看这种人是有的，不但他们自以为特殊，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是特殊。这种现象，应不应该在党内存在？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

* 这是陈云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也许还有第三种，文化人和党员各半。不过，这只是过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种看法或第二种看法发展的。党对这两种看法的态度怎么样？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

那末，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三条党章里面，一条也没有讲起党员分工以后怎么样，党员就是党员。要说分工，个个党员都分了工，我们党内就没有一个不担任任何具体工作的“单纯党员”。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这种落后的要求。

同志们或者还要问，那末，党为什么又说要照顾做文化工

作的同志呢？我想，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这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里面说得很好，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误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考虑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人家长期照顾，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这是我要说的关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层。

这一层弄清楚了，接着就好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会越帮越忙，——那末，就要毫无例外地实行我们的党章第四十四条：“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越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

党执行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个党员偏不自觉，那怎么办？那就得来一点束缚。是不是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天才束缚住了？我说不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有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所以，同志们对于这一条完全可以放心。

同志们过去对于有纪律的生活既然不很习惯，现在又要到前方到乡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所谓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是这样说，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所谓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我们说要服从真理，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说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人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这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这就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地遵守纪律，不能具体地遵守纪律。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

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党员是不成问题的。做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倾向以后，一般也不成问题。而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议论。有的说，做文艺工作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说，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艺工作吗？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个时代，怎么能反映这个时代群众的斗争？所以，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我现在不多重复。我只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以上是讲不要特殊。现在再讲不要自大。这与前面讲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我不是说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自大，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

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这里要分别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演过很多戏，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这是不是值得骄傲？我说丝毫值不得骄傲。如果做文艺工作是一个人的分工，那末，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艺术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艺术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

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

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观地估计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见得能够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我们的这些同志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小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许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就连在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往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知识实在是很少的。同志们现在都很年轻，知识少，不能成“家”，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种自大的人，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最喜欢批评旁人，偏生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自己。表面上说几句“欢迎批评”的话有没有呢？是有的。每逢演戏，开演前都有人出来说：“我们这个剧排演时间仓促，技术上比较差，

希望同志们批评。”但是，这类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有的是假的。你要真的批评起来，那就成了仇人。他们心里是只许人家说好的。这样，使人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正同志式的“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既然没法拿出来，不如敬而远之了。我们现在就要提倡真正同志式的态度，就要提倡自我批评。有些同志想，实行自我批评，这不要丧失自己的身份吗？恰恰相反，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斯大林说：“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我们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

我今天就讲这两点，因为是专讲缺点，又是实行同志态度，讲的话也许不很好听。但是，我的意思是为同志们好，还是为同志们坏？这是大家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我讲的缺点也只是一部分同志的缺点，就是这部分同志，也有很多优点。头一条就是他们拥护光明，反对黑暗；拥护工农兵，反对侵略者，这是任何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缺点也只是革命中的缺点，从旧社会带来的暂时的缺点，在革命队伍中一定能够很快克服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一回经过了整风，现在又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进步一定很快。如果我今天的话能够对同志们的进步有所帮助，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北方局 关于加强山东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山东分局：

北方局听了萧华同志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以及初步研究了山东分局几个文件之后，认为山东党五年来在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下，坚持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就创造了克服今后困难，坚持长期斗争的基本条件。

(一) 有相当强大的武装，这些武装基本上是统一的，团结的，而且和山东人民有着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是我党今后斗争坚持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 民主政权的上层机构，县以上已经相当的普遍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制度已在开始创造，进步法令的颁布与初步的执行，已为多数民众所拥护，民主政权的威信在民众中开始有了相当的提高。

(三) 自中央土地政策颁布后发动基本群众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山东党的注意，并在若干地区（滨海、鲁南、沂蒙等地）收到了相当大的成绩，使广大基本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比

* 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批准了这个指示。

以前进一步的认识和爱戴。

（四）我党我军在五年来的艰苦斗争中，已经积蓄了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对山东今后坚持是有意义的。

上述这些基本条件，乃是我们山东党全体同志艰苦奋斗的结果，乃是我们平等博爱的精神用到目前的⁽¹⁾北方局对山东全党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表示敬意，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表示无限的悼念，同时希望山东全党同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为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而斗争。有了上述的一些基本条件使我们可以更加相信山东党一定能克服困难，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但是，北方局认为山东工作中还有若干严重的缺点与某些错误，如不坚决改进，会使我们今后的工作增加不少困难。山东党，特别是领导机关，应该以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深刻检查自己的工作，克服一切缺点和纠正某些错误，以期更有力的坚持山东长期斗争局面。这里只指出下列主要的几点，以作为山东党进行自我批评的基础。

（一）山东党的工作一个最基本的缺点，即是在全山东的范围内还没有取得政治确定的优势。这就是说山东的党还没有把自己造成为团结山东各阶级各党派共同抗日的中心，基本群众还没有普遍发动起来，形成统一战线的优势，这就使党缺乏更雄厚的群众力量，斗争依靠在广大的中间势力当中，党还没有创造出应有的政治影响和建立起应有的阵地。

（二）几年以来，山东地方实力派伪化过程之速，伪军数量之多，是不能完全委诸客观原因的，主要原因乃是山东党主观领导上的缺点，使我们失去了许多有利的时机，就在目前说来，这种缺点仍然存在。北方局认为目前不但存在着充分发动基本群众的可能，而且也有着改善我党与中间势力关系，使我党成为团结抗日中心力量的可能。目前山东民族矛盾还在继

续发展中，在于实力派之民族纷繁、复杂的矛盾也足资利用，过去我们长期没有开展统一战线局面。地方实力派加速伪化过程，除某些客观原因外，我们在主观上犯了下列主要错误：

（甲）没有很好掌握住民族矛盾，这是山东一切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但山东党过去并未很好了解的。没有用在切实努力和争取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可能性，以团结他们在共同对付当前的民族敌人，反而在统战工作中打了一些不应该打的地方实力派，打跑了一些可能争取的中间力量，这就必然放松少数应该给以严重打击的对象。打击得太多，而且打了一些不应打的对象，这就损害了党在政治上的威信，这就使许多可能争取、可能中立的地方实力派依靠敌人，也促使许多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而敌人则利用他们的反共情绪，促其伪化。

（乙）在敌统治区，敌我游击区，执行中央、北方局所决定的正确政策贯彻不够，或者执行得不好。把敌占区看成殖民地的现象相当长时期的严重存在，这就形成某些敌统治区与我游击区人心隔离，扩大了伪军的社会基础。

（丙）锄奸工作中在某些地区犯了原则性的严重错误，某些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与人心的不安，也是造成伪军发展的条件之一。

（丁）在根据地建设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地方的建设工作一般落后于军事建设，政权建设还只在上层有了某些成绩，区村政权一般的尚未切实改造，这就使抗日民主政权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财政经济建设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山东的党还未深入了解财政经济建设乃是支持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历史充满数次证明要没有这一建设工作，就不能巩固自己既得的阵地。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群众工作方

面，距离充分发动群众还是很远的，今后还须要山东党以最大的力量来完成任务。

（戊）在军事建设方面，虽然建立了强大的党军和数量相当大的地方武装，但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仍未克服，在山东总队⁽²⁾与地方武装中，政治工作制度还不很巩固，政治委员制度严格的说来也还没有巩固的建筑起来。在一一五师一般的保持了过去内战时期政治工作的传统，但几年来缺乏应有的进步与创造性，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统一战线环境及战时的游击战争情况之需要。突击工作还多于经常工作，工作上的寒热性还存在，还不善于把突击工作成绩巩固成为经常工作基础，突击工作方式且常易于造成干部的自骄自傲。就拿山东建军工作说来，军队干部的修养和教育还落后于现实斗争之需要。主力中，地方武装中，对于地方干部扶植得不够，因此军队与地方的联系不够亲切。

（己）山东党的组织是不够巩固的，在干部中三风不正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尤其在领导机关中主观主义较严重的损害了党的领导工作。

北方局认为山东工作中所存在的上述各种缺点，基本上是由于山东党领导上的缺点和某些错误而来。这里要特别指出下列各点：

（甲）由于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因而对中央、北方局过去的历次指示未能坚决执行与贯彻。如中央关于党性决定，北方局一九四〇年高干会的决定，以及有些关于财政经济工作与对敌斗争的指示，在山东都未能很好传达、执行、贯彻。

（乙）由于强调山东的客观困难条件，因而掩盖了主观上领导的错误和缺点，以致不能深刻检查过去工作。

（丙）由于领导同志未能深入下层，长期缺乏调查研究工

作，指导上满足于空洞的长决议，长报告。这不但不能实际解决工作问题，而且造成山东党内某些领导环节空谈主义、平均主义、文牍主义的恶劣作风。

（丁）领导机关的不团结、不民主的现象对实际工作也发生一些不良影响，阻碍了日常领导工作和削弱领导机关的威信。北方局认为山东的党正处在日益恶劣的形势之中，特别在最近敌寇对华政策转换以后，对我的政治、军事、经济进攻必将更加严重，敌我斗争必将更加残酷，这就是加重了山东党的领导责任，必须巩固既得阵地，建立党的政治势力，团结山东各阶级各党派，展开对敌斗争，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此目的，山东党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检查过去工作，并以百倍努力求得今后实际工作的改进。

关于本年度山东工作之基本方针仍应根据北方局关于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力求贯彻。这里将山东具体情况作以下的补充：

（一）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积极的、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游击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只有这种战争上的积极防御，才能打退敌人当前严重的“蚕食”。深入敌之统治区，捣乱和打垮敌之伪组织，威逼敌人不能不停止对我根据地之“蚕食”。只有这样才能停止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严重形势（去年五月北方局反“蚕食”斗争指示）。在山东今天仍然全部有效，但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是依靠武装斗争达到摧毁伪组织，镇压汉奸，打破伪秩序，鼓舞人民抗日信心，扩大对敌伪的宣传和建立伪军伪组织内线工作，建立革命两面政策的工作，团结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对付日寇之目的。为此，必须每军分区组织两三个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统治区（武工队组织见德怀⁽³⁾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的

文章）进行上述工作。武装工作队应该抽有力干部，并给以政治教育，使其真正成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质量，印发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到敌占区、游击区广泛散发，并用一切办法保障送到觉悟知识分子及伪军伪组织上层分子手里。

（二）在巩固根据地方面应加强下列工作：

（甲）继续深入群众工作，并把这个工作和改造区村政权、巩固支部的工作联系起来。区村政权必须引进基本群众与实现“三三制”，保证党的领导作用。

（乙）加强财政经济建设工作，展开对敌的经济斗争，基本上应该依靠于农业生产，这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工作，党必须以大力去经营。在对敌经济斗争方面，把握物资统一与管理出入口特别重要。党必须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去做这个工作。

（丙）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重点放在政治上，正规军应该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地方武装中党的工作必须加强，要以一切力量建立起地方武装中的党的骨干，切实保障党对这些武装的统一领导，同时党还必须认真注意去组织和训练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这对今后山东各根据地的坚持和进一步的巩固是有重要意义的。

（丁）在思想教育方面，主要是开展整风运动，应根据北方局野政今年二月指示坚决执行。

（三）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是坚持山东斗争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北方局认为由于民族矛盾的增长，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于我有利，由于山东敌寇对东北军与地方实力派的加强压力，目前打开山东统一战线局面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开展山东的统一战线工作。这里只将山东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指出下列各点：

(甲) 山东的党必须把握民族矛盾，用一切可能去争取各阶级各党派共同抗日，必须启发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要求。在他们的每一个抗日斗争中给予适当的帮助，逐渐建立友好的关系，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乙) 必须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争取工作，应该加强一般联络疏通工作，这就必须适合各个不同对象的政治要求，提出不同的标准，建立不同的联系，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般化的现象必须纠正。为此目的应该继续宣传中央去年七七宣言，切实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复的解释。

(丙)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该给予较多的注意。

(丁) 对地方实力派应有足够的认识，这些力量目前正是敌顽我争取的对象，其本身也具备了抗日与反共的两面，必须以一切力量发扬其抗日的一面，并在实际抗日斗争中求得团结，以阻止其投敌反共。同时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或反共，一般的是自存政策为出发点，抗日而可以自存则抗日，其主张抗日反共的也是为了自存的，山东党必须抓紧这一点，对地方实力派加以利害进行反复的宣传。

(戊) 党应征调一批有社会经验的、适合统战工作条件的干部，组织专门机关进行统战工作。

(四) 关于对伪、顽、会、匪斗争，在策略指导上应以北方局去年十月二十一日对冀鲁豫反顽的指示为根据，并加强对它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具体的了解再定出对象。

(五) 具体的领导工作应该坚决改进，主要步骤在进行整风运动，揭发领导机关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严重的三风不正现象。北方局认为山东的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山东分局开始，以身作则领导山东全党整风，切实进行自我批评，以改进山东党的领导工作。要求领导机关中深刻检讨执行

党中央与北方局各种指示决定的程度，根绝强调特殊、平均主义、空谈主义的恶劣作风，必须认识这些恶劣作风，过去给了党的工作以不少损失。北方局相信山东的党一定能够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并以百倍加紧的努力去从事于党的实际工作，使党的路线在山东得到完全的胜利。关于其它详细工作问题另由萧华同志面达。

此致

敬礼！

北 方 局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原文如此，应有漏字。
- 〔2〕“山东总队”可能是“山东纵队”之误。
- 〔3〕即彭德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讲话的要点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一 时 局

日本最近从满洲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二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¹⁾皓电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²⁾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³⁾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

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

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

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 工作方针

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

研究问题：

（一）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六大国，主要是研究六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项。

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

（二）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

（三）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军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

中共党史开始研究：二十二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

（四）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

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

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

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

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 工作任务

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

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切实实行。

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何应钦、白崇禧。

〔2〕指汪精卫。

〔3〕指蒋介石。

我的修养要则*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周 恩 来

-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 这是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的。

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

刘 少 奇

“华中概况”及你们给各地指示均收到，完全同意。我经过华北时，看到华北对敌斗争有很多好的经验，特简略电告，望你们参考。

(一) 敌人较大的扫荡战役，总是分若干路向中心区合击，然后反复扫荡，再向据点撤回。我们应付的办法是：当敌人合击与反复扫荡时，主力应切实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要去企图阻止或打击敌之一路，而应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地打击敌人空虚的据点及交通，或择地隐蔽，只留小部队在中心区游击周旋；待敌撤退时，主力再转回中心区。

(二) 在反扫荡时，所有笨重不能带走的东西，都埋藏在山上或沉之水底，而这些埋藏东西的地方，是预先秘密准备好了的，有些还派小部队看守。所有群众的粮食、器具也都埋藏地下，全家老小只挑一担行李、粮食，上山“跑反”。群众“跑反”及耕牛隐蔽，也常是有组织的，有民兵掩护及放哨。

(三) 在反扫荡时，地雷的作用很大，使敌人的行动受很大约束，使许多村庄及窖藏得以保存。太岳区人民还普遍有一种石炮，即在坚硬的石头上打一个洞，装上土硝、信管，放在

* 这是刘少奇给陈毅、张云逸等的电报。

路旁村边，触动即自行爆炸，如石匠爆取石头者然，可以炸死数人。在冀中曾用地雷包围一些据点，缩小敌占区。望你们切实研究地雷、石炮、水雷的制造，或以手榴弹作地雷。但地雷炸死自己人的事，也常发生，故须派民兵看守。

（四）训练好的民兵，在边沿区、敌占区及在反扫荡时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平时不要管饭的军队。对于他们的训练，实际的战斗锻炼及武器（地雷、手榴弹、快枪等）配备等，望令各地切实注意。各地民兵数量不一定要很多，每乡有二三十人即够，但质量要很好。华北有些边沿区的民兵，已逐渐成为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全区青壮年轮流脱离生产，当半年兵，如是在这个区，就经常保持一二百人的游击队。

（五）在敌情特别严重的游击区，游击部队的组织形式有以下三种：（甲）在八路军、游击队尚可公开活动的地方，游击队一般着军服，以连为单位活动，主要领导人是营以上干部。当地区长、区委书记，都经常在部队中，依靠这个部队坚持斗争。（乙）在八路军、游击队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游击队均着便衣，昼伏夜出，以二三十人为单位活动，他们也不一定要一个公开的番号。（丙）在完全的敌占区，就以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队活动，平时人枪完全隐蔽，队员都有“良民证”，必要时在夜间临时集合行动，至天明前则又分散隐蔽，白天放哨，如有敌人来搜查，则分散转移。华北许多主力部队的连长，都轮流经过特别训练，学习以连为单位活动的一切办法。

（六）华北争取了不少的日本俘虏。他们积极工作，对我们帮助极大。日本俘虏帮助我们教操、教刺枪、教劈剑等，获得很大的成绩，特别对我们做敌军工作、争取俘虏工作帮助更大。日本俘虏开始转变是很困难的，必须使他们明白新四军、八路军是正义的军队，中国抗战也是为解放他们自己，他们才

转变。但在转变后，大多是完全可靠的，能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亦不逃跑。要已转变的老俘虏去争取新俘虏，也是不困难的。望你们切实注意这个工作，并信赖他们。

（七）在游击区与敌占区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需要巧妙配合。一切非法的事都可以向敌人说是新四军做的，一切合法的事由人民来做。在敌占区帮助人民减轻与逃避对敌负担是中心问题。在华北没有提出对敌不负担的口号，只提出少负担、慢负担、拖负担的口号。当着敌人把负担派下来时，我们就和人民讨论，如何采用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办法，使人民的负担减少、拖延及逃避。这样就使各阶层的人民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共同对付敌伪，打击敌伪，保护人民，我们在敌占区就能存在与发展。

（八）减轻根据地人民财力与人力的负担，华北也有许多办法。除开部队生产节约外，一切不必要的会议不开，不必要的运动、工作和自卫军形式上的站岗放哨均取消，只在敌情紧张时及敌据点附近才放有作用的隐蔽哨，一切部队的粮食军需均由部队派人搬运，不动员民伕及派牲口搬运，如此则节省极大的人力，使之用在生产上。

以上各项，参照华中实际情形加以运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 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

一、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的工作条件，中央机构有重新加以调整之必要，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二、根据上述方针决定：

A.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甲、宣传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是：统一和集中有关宣传教育方面事业的管理，研究宣传教育方面的各种具体政策，分别性质向政治局、书记处提供有关宣传教育政策的提案与意见。对于宣传教育日常性质的问题有权作出决定，交由所管辖之各部委执行之。已决定之问题，须向书记处作通知。

下列各组织，统归宣传委员会管理：

(一) 中央宣传部（包括宣传教育的指导，编译所工作及延安整风学习与在职干部教育的直接管理）；

(二) 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

(三) 中央党校；

(四) 文委（文抗拨边区管理）；

（五）出版局。

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1〕}四同志组成之，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王稼祥同志任副书记，乔木^{〔2〕}同志任秘书，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宣委成立后，原有之中央党报委员会组织取消。

乙、组织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是：统一和集中党的组织工作（政民在内）和根据地、大后方、敌后方党的各种政策（政民在内）的管理，经常研究上述各种政策，分别性质向政治局、书记处提供有关政策和组织工作的提案与意见。对于日常性质的问题有权作出决定，交由所管辖之各部委执行之。已决定之问题，须向书记处作通知。

下列各组织统归组织委员会管理：

- （一）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
- （二）统一战线部；
- （三）民运工作委员会；
- （四）中央研究局；
- （五）海委。

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3〕}、邓发、尚昆、弼时八同志组成之，由刘少奇同志任书记，杨尚昆同志兼任秘书，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

为着保证党务与各种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取得更加密切的配合，决定刘少奇同志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

B. 为着分工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同志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同志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同志负责管理（因为陕甘宁晋西北在军事上已统一，财经亦趋统

一，决定晋绥分局以后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大后方工作归陈云同志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同志负责管理。而管理各地区工作的同志，对其管理的工作，直接向书记处负责。

C. 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D.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他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他的经常业务是：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和应讨论问题的材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负责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的工作，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委组委管理之。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

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E. 中央研究机关重作如下之调整：将现有之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之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另行组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设局长（刘少奇同志）、副局长（杨尚昆同志）各一人。下设党务研究室、材料室和图书馆。

甲、党务研究室设主任一人（王若飞）。该室的任务为整理根据地、大后方和敌后方党的建设各种政策的材料，并加以研究，将整理的材料和研究的意见提供政治局各同志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了解情况决定政策之参考，同时负责编辑党的资料。

乙、材料室设主任一人（邓力群）。下分政治、经济、国际三个组，每组二至三人。该室的任务为整理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等时事问题的材料，提供政治局各同志，作为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的参考。

丙、在研究局之下，合并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图书材料室、文抗、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成立一比较完备的图书馆，专供研究机关及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之用。但须规定管理图书及借阅的严格制度，保障图书不致失散。

丁、在新的中央研究局成立后，原有调查研究局名义取消。情报部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实行精简后，情报部与社会部可以合署办公，干部工作，可以统一管理。

F. 总政大部拨并于联政后，移驻王家坪与作战部靠拢。军委设秘书长。在军委之内增设军政研究室，其任务是收集和整理有关军队方面的材料，并加以研究，供中央及军委各同志作为了解情况研究问题的参考。军委作战部除管理二局三局外，在本部之内设立作战室与教育室。在军委之内设立高级参谋室，以吸收由友军中来延的高级干部。另设办公厅，在中央管理局统一的制度与计划下，管理作战部政治部二局三局之行政与生产事宜。

G. 为着便于更有联系而统一集中的指导各地民众运动，决定将现有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设书记（邓发）和副书记（蔡畅）各一人，下分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四个组，每组三四人，分别研究工、农、青、妇工作。各组研究的结果提交委员会集体讨论。关于政策问题提交组织委员会讨论后，再交政治局会议讨论。海委及文委，因其工作性质之不同，仍然保留，不合并于民委之内。

H. 中央财政经济部组织，决定取消。在书记处之下另设经建材料组，由洛甫同志主持之。负责收集整理各抗日根据地的经建材料，并加以研究，分别性质，提供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或中央各同志研究采择。

I. 在中央宣传部之下设立编译所，翻译及编著关于马列主义著作、苏联及其他外国的著作、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著作及课本。

J. 为着便于控制机密，贯彻精简，统一管理、审查、配备、教育机要干部，决定军机、康机合并于中央机要科之内，由李质忠同志任中央机要科长，调曾三同志任机要科政治协理员，机要局组织取消。为了交换电讯机要工作经验，研究秘密技术之改进，决定每三个月召集一次机要科二局三局各负责同志的机要联席会议，由康生同志负责主持之。为使机要工作更有安全的保障，使公开与半公开的电报与机密电报完全分开，决定在办公厅秘书处之下设立专门译电科，将公开的指示、党务广播、战报及事务之来往电报统归该科译发，以便酌量减少密码通报。

K. 自军委直属机关与中央行政机关合并后，中央管理局直辖生产和行政机关增加，而且有很大数量的非党人员在各生产、行政、卫生机关之内工作。因此决定直属党委应兼任管理局政治部的任务，负责在管理局系统下的生产、行政、卫生人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保证各种业务计划的完成。

L. 在华北华中大批党军政民干部来延后，中央党校应开办第二期。中央三委合并后，邓发同志任民委书记，解除党校校长之职务。决定由毛泽东同志兼任校长，彭真同志任副校长。

M. 中央交通局在建立国内国际必需的交通线的工作任务

下，应缩小组织，调换工作干部，归并于办公厅之下成为一个交通科。

N. 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组织，均应根据力求精简，灵活和增强工作效能的原则实行精简，由李富春同志主持之精简委员会协同各部委局厅社主管人，负责具体计划，并提交书记处通过后实行之。但须在四月半以前完成精简计划。

三、中央及军委，各部委局厅处社均于三月至四月份内作出一九四二年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在这种总结与计划内须有具体的内容与分析。

四、中央各部委除应直接加强对各地来延干部的教育和审查（这些干部是带有全国性的），并与新来干部进行有计划的谈话，收集各地情况，并根据各地来电、报告材料，加以研究，作出指示，加强对陕甘宁、晋西北材料的研究与直接领导，作为自己经常业务外，应善于利用新华社广播、解放日报及党务广播，作为指导全国工作的工具。在延安各个中央委员及各部委工作人员，应该把经常供给解放日报、新华社及党务广播的稿件，作为自己业务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秦邦宪、何克全。

〔2〕即胡乔木。

〔3〕即张闻天。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 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一九四三年春)

周 恩 来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湖南的何叔衡、夏曦同志，浙江的宣中华同志，江苏的侯绍裘同志，北方的李大钊同志、于树德（那时是共产党员）和李永声⁽¹⁾、于方舟同志等。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

* 这是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的报告。

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因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中没有明确说应有妇女参加）。这样，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作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

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派别，对三民主义也自然而然地作各种解释。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党籍。改组首先受到他们的反对与破坏是不奇怪的，因为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孙中山去世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党革命的，是西山会议派。他们公开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组织。他们大骂广东的国民党，大骂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先生，大骂广东被赤化了，但一般地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工作。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廖仲恺，拉拢蒋介石。他们对蒋介石是看对了的。这些右派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地起来以后，始终是反对革命的。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是戴季陶。他虽然也在孙中山的遗嘱上签了字，表面上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也说要维持国民党的统一，但他采用的是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消极方面，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

国国民党》，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他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到黄埔军官学校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他讲演以后不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黄埔军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是右派的组织。另一个右派头子是孙科。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要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党“五五宪草”式的民主。国民党中央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是和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

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

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2]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

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他是知情的。谭延闿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朱培德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程潜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

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央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在沙基惨案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

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

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到冯玉祥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了。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粤，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

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伍朝枢。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粤，恰好与“失踪”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五月十五日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他们定了几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张

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那时还是共产党员），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北伐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节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

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即李锡九。

〔2〕即黄兴。

周恩来给柯棣华大夫 家属的慰问信*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朋友：

我谨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和中国共产党，为柯棣华大夫的逝世，向你们致最深挚的悲悼。柯大夫曾予华北敌后五台区最需帮助的军民以无可比拟的贡献。

柯棣华大夫系于一九三八年受印度国民大会之命，参加其所派遣的印度医疗队，去到延安，于一九三九年进入华北游击区。他在华北曾经过许多地方，最后定居于五台区，成为故白求恩大夫事业的承继者，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直到逝世。他的中国同志都爱他，尊敬他。为了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之最高贵的任务，为了给伤病战士以兄弟般的友爱，他曾救活了许多抵抗日寇侵入自己祖国的战士的生命，还帮助了許多人免于残废。我们受惠于他的极多，使我们永不能忘。

柯大夫曾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将永存于他所服务终生的两大民族之间。

* 本文原载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

我们在全体爱自由的人类的共同损失中，分担你们的悲痛。

谨致热烈的敬礼！

周 恩 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出发归来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张 闻 天

出发经过

我同几个同志于去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从延安出发。从二月十八日起至四月十二日止，为在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从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日止，为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村区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碧村调查》（此外还有十三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是别的同志写的）及《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大纲式的）。从九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止，为在警备区米脂县杨家沟村的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杨家沟地主调查》（此外还有刘家峁、高庙山二村地主的调查，是别的同志写的）。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日止，为在米脂城内调查时期，搜集了一些材料，没有整理出。从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止，为在西川、双湖峪市镇乡调查时期，搜集有双湖峪市镇乡各花户⁽¹⁾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未整理好。附带调查有张家寨子户地材料、马蹄沟

* 这是张闻天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盐滩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及西川各区地主材料，均未整理。从一月十八日起至二月二十四日止，为在绥德市调查商业的时期，搜集的材料，尚未整理。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回延安。

今将一年来调查工作过程中一些经验教训择要写在下面，作为本人向中央一年余工作的报告。

打破教条的囚笼

这次出发使我深切的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東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但这些东西，又是如此的生动活跃，变化多端，如果我不同它们保持经常的接触，紧跟着它们，它们又会很快的前进，把我远远的抛弃在它们的后面。同时一切事实又如此明显的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们，熟悉它们，了解它们的动向，我们决然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即使马马虎虎的决定了，任务仍然无法完成，政策也无从实现。

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

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我想，这也许比一切关于这类辞句的空谈的作用，要大得多！

我想，我这次所走的途径，或许是改造像我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党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吧。这就是说，首先应该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如关于“知识分子”与

“理论家”之类的错误思想，然后使他们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使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决心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延安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的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第一步，没有第二步，第一步的了解是不会深刻的。

从实际出发

在过去，我从未怀疑过我是一个唯物论者（我主要是指历史唯物论）。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承认了马列主义关于唯物论的一切原则，我当然是唯物论者无疑了。然而一年来的经过，使我对于我过去是否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这一点，发生怀疑了。因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作风。相反的，这正是主观主义唯心论者的特点。所以我的自我改造，还得从做一个真正唯物论者开始。

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这当然似乎是谁都知道的普遍真理，然而真能在一切实际行动上这样做的，却并不很多。客观的实际虽是天天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要求我们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统治地位，然而我们却偏偏来个“熟视无睹”，不肯去理会它，甚至根本不承认它。但是客观的实际，并不因为我们的“熟视无睹”，我们的不理睬或不承认而消极退休。相反的，我们愈是不理会它，愈是不承认它，它愈是积极的同我们捣乱，使我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只弄得我们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我们在很久的时期内，简直像

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一样，受了这许多痛苦，还不知道这钉子从何而来。只在经过许多牺牲与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同志许多次的指出以后，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钉子是客观的实际的钉子，如果我们再不理睬它，再不承认它，我们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去年来毛泽东同志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号召，才得到全党有力的响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最普遍的真理，我们中国党仍然是支付了极大的代价，才把它接受过来的。可见，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

既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那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地位，向它毕恭毕敬，老老实实，而决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调皮捣蛋。真正做一个唯物论者，对客观的实际只能有这样的态度，不能有别的态度。

同时，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还必须承认，只有正确的认识了客观的实际之后，我们才能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正确意见。这个简单的普遍真理，要求我们对于客观的实际必须有详细的调查研究，而决不能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任何伟大的天才，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非常细小的事物，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的意见的。那末像我们这类普通的人才，怎能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大发议论呢？！关于一件事物的许许多多的议论，无数篇文章，无数次的讲演，在对于这件事物做过真正调查研究以前，除了浪费精力、财力外，究竟还有什么价值？！许多问题的争论不决，闹不清楚，许多事情的办不通，办不好，归根到底，还不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一番切实的调查研

究，因而找不到共同承认的真理而造成的吗？！

所以真正的唯物论者，不论在发表意见时，不论在决定问题时，必须采取经过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的，小心谨慎的老实态度。真正的唯物论者，决不能有其他的态度。主观主义者不是从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是从个人的脑筋中任意抽出感想，所以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就必然成了他们的特性。客观的实际如果对于他们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是在于他们可以从找出许许多多“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意见的正确罢了。党内有许许多多的报告，就是先做了“结论”或“总结”，然后列举“事实”做证明的。这类意见的必然破产，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他口头上是否承认或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而主要的要看他在实际行动上是否真能这样做。整顿三风，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了实际的效果，也可以拿这个标准加以测量。他可以满口的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然而如果他不能从实际出发来办理一切事情，那他的三风仍然不能称为“正风”的。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曾经使我们犯了无数的错误，使我们受到过极大的损失，如果我从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只有无情的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

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

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调查研究工作，不论对于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绝对必要的。像前面说过的，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这正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各种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决定作战的命令。这已经是很明白的了。但一个领导者，在正确的提出任务之后，是否可以不再需要调查研究，让事情自己发展下去，所谓自流的发展下去呢？当然是不可以的。然而我们常常在任务提出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不再过问，只是到了一定时期之后，才照例召开一个检查会议，或总结会议，照例的检查一下，总结一下工作。但是，正因为 we 平时对于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缺乏详细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在检查会议、总结会议上，也就提不出新问题，新办法，以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至于在会议前后，给下级以经常的具体帮助者，那就更少看见了。因此，许多工作的检查总结，常常是照例的、形式的、死板的、没有内容的、空谈的，因而也很少结果的。这正好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只发出了作战的命令，而没有根据于各种变动着的情况来进行不断的作战指挥。这种正确的作战指挥，对于一个战役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有时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所以一个领导者，不但在决定任务之前须要做一番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即在正确的任务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断的调查研究。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但须要对于一件事情有正确的原则的领导，而且还须要作战指挥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只有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把这种领导称为具体领导。这种具体领导，不以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决

不可能的。这种作战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在我们党内有特别强调的必要！

在被领导者方面，在接受了上级规定的任务之后，在执行任务时，是否可以对于当时当地的情况不进行调查研究呢？当然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不能在接受任务之后盲目乱干一气，而必须考虑一番：如何执行任务，才能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一个被领导者，不但对于上级所给与的任务应有清楚的认识，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与勇气，而且还须要有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的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而这，没有对于当前情况的调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这正好像一个战斗的部队，在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时，仍须不断侦察战斗情况，以便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斗形式与组织形式，以争取胜利一样。

事实证明，一个任务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相反的方法来完成。一种方法是不问实际情况的，死板的，强迫命令的，脱离群众的，违反政策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的，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执行政策的。说用前一种方法不能完成任务，是不合实际的。但是只问任务完成与否、不问任务如何完成的观点，是不足为训的。我们要完成任务，但只有拿后一个方法来完成任务，才是我们所拥护、所赞成的。不了解当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完成任务的。

所以不论是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基础。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即以陕甘宁边区来说，有警备区与老边区之分，有土地革命地区与非土地革命地区之分，有中心地区与边界地区之分。所以，上级的决定，必须很好的估计到这些不同地区的特点，

使决定带有原则性。下级执行上级决定时，必须估计到本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具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上级的原则决定，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内能够具体执行，而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能够步调一致，和谐的合拍的前进。这没有双方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不可能的。

所以，调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阶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才需要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

在实际中和在群众中审查工作

马列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的是否正确，必须要在实践中找到证明。实践中证明做不通的，或找不到证明的东西，不论说的如何动听，或如何“伟大”，我们必须认为是无用的、有害的东西，决然加以抛弃。反之，在实践中证明做得通的，不论说的如何平淡无奇，如何“不足道”，我们必须认为是可靠的真理，加以抬举与尊敬。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审查我们的工作有无成绩，有何优缺点。

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审查，常常偏于在上层，在办公室里，在工作报告上，在会议上，因此常常是片面的，空洞无内

容的，吃力不讨好的。正像上级决议向下传达时常常不断的打折扣，到最下层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数目字一样，下级把实际情况逐级向上报告时，也是不断的打折扣，到最上级时，常常只剩下几条硬化了的结论了，而这些结论，或者毫无内容可言，或者有点内容而毫不可靠。因为下级同志向上级做报告时，往往只选择他认为是特别要紧的东西，往往是从他的了解做出的结论，而真正重要的东西，真正宝贵的经验教训，却往往被抛弃了。我有过无数的经验：常常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材料，下级同志却认为不重要；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他们却长篇大论的叙说。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听过很多这样的报告，报告人可以说到他们如何开会，如何传达，如何布置，到会人数，发言人数，以及“经验教训”等许许多多的话，然而实际材料却是很少，实际问题究竟在哪里却是无法知道。这类报告再经过许多次的传达、讨论、总结，就变成什么也没有的空话了。但人力、精力、物力的浪费，却是不可计算的。

偏重于这样的审查工作，甚至把这样的审查当做审查工作的唯一方式，实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之所由来。这种领导因此常常不能不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其表现形式，也不能不是党八股的、老一套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实际中，在群众中，即在决议执行的地方，按决议实际执行的结果来审查，那情形就会大大的不同。在机关审查中纠缠不清的、颠三倒四的问题，一到这里会豁然开朗起来。在机关审查中死气沉沉的、闷人的空气，一到这里会生动活跃起来。因为决议的真正变为实际行动是在这里，而不在机关里。决议的真正执行者是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决议的真正实行是在紧张的斗争环境中，而不在和平的讨论中。正像斯大林所说的，工作人员的优缺

点，执行机关的优缺点，决议本身的优缺点，在这种审查中，就会清楚的看出来。

所以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经常的保持同实际、同群众的联系，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最下层的干部与群众举行会谈，实是绝对必要的。从这里他可以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这是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办法。只要每个领导者懂得使用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转变我们上层审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而使上层审查也变为有内容的、生动的、有实际效果的。上层审查不是不需要，但必须以下层审查做基础，才有意义。所以在党内，虽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审查均有必要，但自下而上的审查，我以为在今天必须强调。

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做事情要亲自动手，出一身汗才做得好。我过去对于亲自动手，只是了解为亲自看文件，亲自同高级干部谈话，亲自参加工作讨论会，没有了解应当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而正是后者，是亲自动手的主要意义。

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与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松动了。他的这句话，我到今天才算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不在实际中、群众中审查工作，是很难有什么可靠的主意出来的。

过去我以为要同实际、同群众接触，一定要出发得很远，其实未必如此。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只要有决心去同他们接触，我们是到处找到他们的。不愿同实际、同群众接近，熟视无睹，才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基本原因。

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所以，“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正是在我们平常工作中最被忽视的。我们可以天天高谈“改善群众的生活”，“坚决执行阶级路线”，然而对于自己所在地群众的生活，群众中的阶级关系，却可以毫不调查。我们可以登记某一个士绅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见，称他为中间派或进步分子，然而对于此人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却可以毫不调查。讲“一打一拉”，而不知打谁，拉谁；讲减租减息，而不知租佃关系、借贷关系是什么；讲发展生产、春耕秋收，而不知如何生产，如何收获。这种态度，显然是非马列主义的。我们在工作中闹的许多乱子、许多笑话，也就出在这里。显然的，没有这种社会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任何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

也许有人以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是很神秘、很困难的。其实，这种调查，既不神秘，也不怎样困难，只要我们肯动眼、动口、动耳、动手、动脚，我们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成绩。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群众中间，老百姓们如何生产，他们在生产间的关系如何，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天天可以看到的最平常、最普遍、最大量，而且千万次反复着的

东西。

但是正因为这些东西太平凡了，太普遍了，太常见了，所以我们常常容易把它们忽略过去。特别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常常喜欢“昂首向天”，在天上的星星中间寻找世外的、奇异的“理想”，而对于这些事情，则简直看不起，认为太卑鄙、太功利、太平淡无奇，以致采取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的态度。我们不了解这些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事情，是牵连到千千万万人民生活的事情，一切伟大的理想，如果同这类事情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铜钱也不值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完全不是在于他们发现了什么天上人间少有的、奇怪的东西，而正是在于他们发现了这类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人们要生活，必须吃饭穿衣，而要吃饭穿衣必须使用一定的工具来生产，这种生产使人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叫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试问这种理论不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吗？然而其伟大也正正在此，因为他所要解决的正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问题。

说来也很奇怪，我们常常可以在脑筋中装进很多海外奇谈，以及小广播上听来的新闻，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很容易把群众中的这些最普遍、最平常，但又是的东西忘记掉。这在脱离生产太久的、脱离群众太久的知识分子，特别如此。但不论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一忘记或只是不很重视这些问题，那乱子就会出来的。

农民出身的干部，一般都是熟知农村中的生产情况及阶级关系的，但他们常常以为这些材料是上级不需要的，或者以为这些材料同他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没有关系的，因而也常常不很重视这些问题。这无疑的，是主观主义领导的恶果。

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者，必须首先熟知当地民众的生活情

形，熟知生产上的一切问题，熟知各阶级间的关系，了解各阶级间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明确知道自己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之上，斗争应该向着什么阶级进行。不明了这些情形，掌握政策是说不上的。

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工作的同志，都能调查清楚土地的种类，各种土地的质量，一垧地有好大，每垧地需要好多布袋粪，好多种籽，需要几多人工、牛工来耕种、锄草、收割，何时耕、何时种、何时锄草、何时收割，每垧地能打多少粮食等等，以及谁是地主，谁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谁是二流子，调查清楚他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如租佃关系、借贷关系、劳动互助关系等等，以及他们间的各种斗争形式等等问题，那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必须特别指出，几年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们常常把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即阶级斗争的原则，置之脑后了。很多同志，甚至高级干部，不知道如何划分阶级，不知道阶级斗争采取些什么具体形式，不知道以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形势，不知道党派斗争中阶级斗争的实质。这是好大的危险呵！

着重典型

调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典型的问题。我们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物都一件件调查研究清楚，而且事实上也无此必要。我们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比如我们调查边区的农村，我们不必调查边区的每一个农村，我们只要调查一些典型的农村就可以了，如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村与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村，川地的农村与山地的农村，中心地区的农村与边境地区

的农村，同姓的“父子村”与异姓的杂居村。如果能够真正把几类典型的村子调查清楚了，那对于边区的农村也就能得到具体的了解，这正像我们对于人体生理只要解剖几个人的身体就可了解，不必把所有的人都加以解剖一样。解剖所有的人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就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也不能把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加以研究，而不能不以英国的资本主义为典型来研究。

我们过去的调查，常常是走马看花式的一般的调查，调查的事物虽然很多，但常常是表面的、空洞没有内容的、不深刻的。这种调查，可以列举某类事物的许多现象，但并不深入其内部，发现其内部的运动规律。从这种一般的调查而得出的一般的结论，照例是不能正确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而且这种一般的结论，结果不能不变为老一套的党八股，只能为夸夸其谈者供给资料。

典型的调查研究则不然。它对于一件事物虽是花费的时间比走马看花式的要超过许多倍，然而它看得深入，看得透彻。它能够发现该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而从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对于同类事物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这在我们一年来的调查工作中，已经完全的得到证明了。

所以，马列主义告诉我们，真理必须从具体事物的具体研究出发而得出。普遍的东西，决不会在单独的东西之外，脱离单独的东西而存在；普遍的东西，实际只是单独的具体事物的质、属性、本质而已。这就是说，真理是个别与普遍的统一。

列宁说，“真理总是具体的”。对于这句话，我过去的了解是抽象的，概念的，因此实际上是不了解的。因为如果真正的了解了这句话，那我们追求真理的工作，就得从具体事物的调

查研究出发，而决不会粗枝大叶，漫画式的了解问题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某一事物典型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同类事物的一切特性，因此可以把这一结论硬套在一切其他同类事物的头上。这只是说，从典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的原则指导。其他同类个别事物的具体解决，仍须对该事物做具体的研究。比如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指导，但决不能以他的公式硬套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头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必须加以单独研究的。

再举一个眼前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动向问题，西北中央局应该根据几个典型农村的调查研究，得出全边区农村阶级关系的一般动向的结论。这个结论拿到警备区地委，是否可以机械的运用到警备区的一切农村呢？不能够的。它只能以西北中央局的结论为原则指导来研究警备区几个农村的典型，指出警备区农村阶级关系发展的特点。这样一直到乡的支部。上级的结论只能成为下级的原则指导，下级的具体情况仍须加以单独的具体的研究。这样，才能称为领导的原则性与具体性的统一。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的过程。

在研究典型中应该注意的一点，即关于典型的选择问题。最好的典型，应该是最能做同类事物的代表的具体事物。典型选择得愈好，则其得出的结论就愈带有普遍性，当然例外仍然是有的。但要选择这类的典型，如果对于这类事物没有一般的了解也是不可能的。故对于一类事物的一般的了解仍然是需要的。但这种了解也要有先前深入的典型的研究做它的基础。

分析与综合

在选择好调查研究对象之后，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从感性方面得来的关于调查对象的统一的、笼统的印象，必须首先加以分析，加以解剖。如调查一个农村的阶级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分解成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分解成为各个家庭。我们的调查就先从各个家庭开始。但一个家庭还只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必须继续加以分析，如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然后加以个别的调查。关于“家庭人口”一项我们仍然可以加以分析，如儿童、壮年、老年，儿童、壮年、老年又可分为男的、女的。关于劳动力一项，我们可以分析为男劳动力、女劳动力，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关于土地一项，我们如依土质来分析，可以分为山地、川地、水地，其中又可分为上中下三类；如依占有性质来分析，可以分为自种地、租入地或租出地、伙入地或伙出地⁽²⁾等等。经过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农村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认识。这是我们的思想从全体的认识到部分的认识的过程，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这种分析，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这种分析方法，我们过去在工作中实在用的太少了。

但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那我们得到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它们不是整个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变成为脱离整体的独立的東西了。这使我们对于这个事物的整体，同样得不到了解，或者得到完全错误的了解。所以我们的分析方法必须要以综合

方法来补充，使我们时时记到我们分析出来的部分，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是不能脱离整体的部分。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所以综合是从部分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我们仍以上述一个农村的调查为例。在将一个农村分解成为许多家庭，并将各个家庭加以调查之后，我们就应把这些家庭综合起来，这样就可使我们知道这个村子的户口总数，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村子，还是一个小村子。在将一个家庭分解为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各个组成部分，并将这许多部分加以调查之后，我们就应把一个家庭的这许多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研究，使我们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阶级成分的家庭，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家庭等等。再把不同的家庭成分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村子所有户口的阶级成分了，如地主好多，富农好多，中、贫农好多等等。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全村的总户数，而且可以了解其阶级关系了。

但如果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村子的各阶级间的具体关系，我们还得把这个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继续下去。比如关于全村不同阶级成分各家庭之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的各方面，还应加以分析与综合的研究。以土地一项为例，应该把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土地的租出租人、伙出伙人等加以分析与综合，使我们了解全村各阶级土地占有、土地租出入及伙出人的各种关系。经过对土地、牲畜、农具等各方面分别进行这样的分析与综合，我们就可以把全村各阶级间的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的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层层研究清楚。如果再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那这个村子的阶级关系，就可以弄得很清楚了。经过这样分析与综合的研究过程之后，对于这个村子的了解，已

经不是像开始那样对于这个村子的一般的、笼统的印象，而是充满了具体内容的具体概念了。这种概念，如果在分析与综合中不犯什么错误的话，那就会是这个村子在我们思想上的正确反映。

所以，在调查研究一个事物时，首先把这个事物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把这些方面、这些部分加以分析与综合，得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规定性，然后加以全面的综合——这就是认识这个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所以，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综合而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综合必须建立在分析之上。主观主义者的综合，并无分析做基础，他们只是从许多一般的感想中，再综合出一般的感想，这种感想当然是不能反映实际的。

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不论在研究事物的现状或历史发展时，都是必须使用的。

调查方法点滴

除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外，关于调查方法，可以提出谈谈的，有以下数点。

一、在开始调查以前，应弄清楚调查的目的，即要调查的是什么事情，根据调查材料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二、选定调查对象后，对调查对象所处环境应有必要的了解，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

三、善于同群众接近，生活群众化，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他们请教。态度应不太庄严，使群众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调，使群众看不起。待人和气、亲热、自然，是最主要的。

四、同当地党、政、军、民机关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应该完全独立自主的做工作，不要依赖他们。只有亲自动手得来的材料，才是比较可靠的。别人的材料，只能当做参考。

五、从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着手，同他们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开始调查，经过他们的介绍，推广到其他的群众。但也不要以此束缚自己，落在少数积极分子的小圈子内。如能找到别的关系，应抓住不放。

六、调查方式，可以采取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及实地调查三种，适当的把它们结合起来。调查材料，能当时记录者，即应记录，当时记录不便者，事后即应记录，记忆力的可靠性不大。谈话次数可不拘，总以问题谈清楚为主，但谈话时间，力求以不妨碍对方生产、损失对方利益为原则。农忙时的中午休息时间及夜晚时间，及冬天农闲时间，是最便于调查工作的。谈话不要采取像审问或填表格的形式，而以生动的、随便的，但又有一定方向的“拉话”为最好。

七、尽量搜集书面材料，如各种账簿、契约、分家单、收条、收据、家谱、碑记等。关于过去历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记忆清楚，以书面材料较为可靠。

八、发现被调查方面的各种矛盾，如阶级间的、个人间的、大姓与小姓间的、老户与外来户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进行调查。如从农民调查地主，从小姓调查大姓，从张三调查李四等等。但不应只以调查矛盾的一方面为满足，矛盾双方均

应调查，免受一方的蒙蔽。

九、在调查中如果发现同多数群众有切身利益关系的问题，能经过当地党、政、军、民机关解决的，应帮助解决，以取得群众对调查者的信任与拥护。这对调查工作有很大的便利。

十、调查来的材料，应经常加以整理。这样可以使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不足的补充，缺乏的增加，发现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给以校正。决不要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就是可靠的；应该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

十一、调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当地即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问题还不清楚的，再行搜集材料。研究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调查的地方进行。两者相隔太久，会使研究工作流产，因而也不能完成调查的任务。

十二、调查工作，不要太匆忙，以从容不迫为有利。熟悉一个地方的情形，不但需要问话，而且需要生活，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考察与体验。

据我个人经验，看人家写的、听人家说的关于调查经验之类的文章或讲演，印象很少，大概在看过听过之后就会忘记的。但自己亲自调查研究一番之后，自己就会有点“经验”，不大容易忘记。在自己有了一点经验之后，再来参考参考他人的经验，得益就多些。以上十二条，在有经验的同志看来，是简单不足道的，故解释更成为不必要的了。

坚持下去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工作，我总算从去年开始

了。但应该特别强调说明的是，这只是在开始。因为是开始，所以事情还需要长时期的坚持下去；因为是开始，所以调查研究出来的材料，其质量是不会很好的。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了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那末，像我这一类共产党员，怎么能不更加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呢?!

显然，这个方向没有什么最后的止境，没有可以停止下来、不需要再行前进的地方。这只是一个方向，而且永远是一个方向。它没有尽头。但虽然如此，只要我们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做去，就会有好的结果。我努力一分，就会有一分的结果；我努力二分，就会有二分的结果。这个无穷的方向，也就这样在我的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能够被一步一步的体现出来吧。

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这里。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像我在上边所说的。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

所以，我并不惭愧，因为我原是一个初学射箭的人。我也并不着慌，因为我还准备长期的从容不迫的射下去。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户口，旧时造户口册子时的用语。花，言其错杂繁多。

〔2〕都是地主出租的土地。租出地按固定租额收取地租。伙出地就每年收获总额按成收取地租。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开展 生产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由于敌寇更加残酷的“扫荡”、封锁与掠夺，以及物价不断的高涨，敌后的经济困难必然会随着增加。因此，厉行生产节约运动是当前敌后军民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物质困难，积蓄力量，渡过黎明前黑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我华中全体军民当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二）过去华中各地解决经济困难的主要办法是依靠开辟税源、增加税收、经营商业以及发行纸币等。实际上这些都是消极的办法，而且超过一定限度便要发生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因为部队做生意弊病很多，不但可以助长商人意识，而且常常造成与民争利、违犯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的现象。开辟税源、增加税收势必增加人民负担。在敌后发行纸币主要应作为对敌伪货币斗争手段，而不可作为解决自己财政经济困难的方法，否则不但不可靠，而且含着大的危险性。凡此种种必须引起各地立即注意。

（三）我们今后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基本方法，必须从积极方面打算，必须放到依靠自己动手、自己劳动的生产上面。各部队必须实行开荒种田、种菜、种麻、种豆、养猪、养鹅、养鸭、做鞋袜手巾，一切部队日常必须的东西都要自己动手来

做，把生产所得列入重要的收入，以减少根据地人民负担，提高生产热忱，达到自给自足，以便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四）我们的兄弟部队华北八路军及陕北各地所处的环境远较我们为恶劣（或者处于敌人不断“扫荡”中，或者活动区域土地贫瘠），但他们在生产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延安留守兵团提出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号召，预计今年生产七千万元；中央直属机关计划每人生产七百元；山东一一五师计划今年生产节约一千万元，做到全部伙食自行生产；去年一二九师冀南生产部队生产节约二百万元，解决了全部日常用品经费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五。今年上半年兄弟部队的生产均以开荒种地、经营农业为主。我们华中各地区，如淮南、淮北、淮海区，均有广大的肥沃的泞地和湖地。敌人虽随时可能对我们“扫荡”，但一般的说，我们战斗空隙还是有的。因此，我华中各地在不妨碍战斗任务之原则下，抓紧利用一切空隙来进行生产学习运动，学习华北各兄弟部队的榜样。

（五）各地方、各部队对华中局春季工作指示中之生产一项应加讨论，根据各地方、各部队具体情况去计划，在不妨碍战斗任务与战斗准备原则下，应毫无例外的严格执行，并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提出可能达到的最低限度的生产标准，作为各地生产与竞赛的目标。春耕在即，各地应抓紧时机立即进行生产动员，建立并健全生产组织（组织节约委员会），指定有生产经验的同志来领导督促检查推动生产计划之执行。各级干部并应以身作则，支部党员应起核心作用，对生产积极、成绩优良者应给以奖励与表扬。各地党委除了本身迅速进行生产运动外，并应当领导各群众团体，首先在

农抗会有计划、有组织发动群众加紧生产运动等，并把动员、组织、领导群众加紧生产作为今春开展群众运动，扩大、巩固与加强群众团体的中心口号与中心任务。盼各地将生产计划与经验教训随时报告我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六年来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三月)

刘 少 奇

一、抗战以来党的行动路线和 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 历史行程的曲折性

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客观上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这是由于历史是在社会矛盾之斗争中发展的这种情形所决定的。虽然人们在主观上常常想推动历史依照客观上可能的直线道路前进，然而客观的历史行程总还是走着弯曲的道路。

有一种时候，历史是走得很快的，是飞跃的前进，在几星期或几个月之内，就能走过平常时期几年几十年的路程；但在另外一种时候，历史又是走得很慢的，甚至使人们感觉不到历史是在前进，或者似乎还是在后退。

因此，我们——蓄意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革命的指导者，就要把握历史发展的这种规律性，必须使自己的工作，使革命阶级的行动路线、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适应这种规律

* 本文写于延安整风学习期间，其中第二、第三部分以《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为题，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性。就是说，当着历史走得很快的時候，当着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之时期，我们就应放胆地鼓励群众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就应善于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前进的革命的口号，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去爽快解决在革命过程中业已成熟的各种任务，就应占领尽可能多的阵地，发展尽可能大的力量，把历史推进到尽可能前进的程度；而不要落在历史发展的后面，阻碍历史的前进，拖住历史的火车头。但是当着历史发展得很慢的时候，当着运动的退潮与革命的低落之时期，我们就不要犯急性病，就要善于巩固与保存自己的阵地，甚至要善于实行巧妙的退却，采取隐秘的方式，保存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便懈怠敌人，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能有阵地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说，我们在革命中的行动路线，是走着曲折的路线。

但是，我们有许多同志就常常不能把握上述的规律性，就常常犯了与这种规律相反的错误，常常使自己的行动路线、工作方式、斗争形式、组织形式，不能适应这种规律。就是说，当着历史走得很快的時候，他们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善于采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斗争形式、组织形式，把历史推进到尽可能前进的程度，而远远地落在历史发展的后面，蹒跚不前。但是当着历史走得很慢的时候，他们又常常要犯急性病，又不善于巩固自己，又不善于退却、埋头苦干与等待时机，而常常不顾环境，不顾广大群众还跟不上来的事实，单凭少数先锋队的勇气，脱离群众地冒险前进。这些错误，在我们党的过去历史上是数见不鲜的。就是在抗战发生以后，我们党在许多地方的工作中，又有不少的同志重复了这种错误。

我现在不来说在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机会主义，它在革命发展的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在自己的行动上表示如何地胆

怯，如何地不能放胆前进，解决在革命中业已成熟的各种任务，因而引导革命走到严重的失败；我现在也不来说在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它在全国性的运动的退潮与革命的低落之时期，在自己的行动上是如何地表现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与疯狂性，如何地不能等待，不善于巩固自己、埋头苦干，而以少数先锋队脱离群众地冒险前进，因而引起革命中空前未有的损失。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另外的报告中来专门地论述。我现在只来说，在抗战以后，华北华中山东敌后地区党的工作经验，在如何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问题上来作一种比较，也就发现我们有不少的同志是重复地犯了上述这种错误。

我现在也无暇来总结抗战后党在敌后各方面工作的经验，只就我个人六年来（一九三六年初至一九三八年冬在华北，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四二年在华中）在华北华中工作的经验，在党的行动路线的决定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来作一个概略叙述的报告，以便作为同志们在研究“如何决定党的策略路线”、“如何指导劳动阶级革命斗争”这个问题时的一种参考材料。

目前中国的抗战，有人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它的经验在人类革命历史上也是十分重要的经验。而在中国抗战中经验的最主要部分，又是在敌后及前线的斗争，特别对于我们党来说，敌后与前线的经验，更是抗战以来的历史时期内经验的主要部分，因此，我来说说这部分经验，或许不是没有益处吧？

二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新形势、党的新任务 与革命斗争的新形式

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与人民的革命运动就处于全国性的退潮与长期低落之时期（但在苏维埃区域有局部的

来潮及高涨。在“九一八”以后至“一二八”抗战，有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的来潮，但被反动统治镇压下去了。至“一二九”运动以后，中国才又开始有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表现为反日运动与国内和平运动）的来潮。至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和平在基本上实现，进一步地巩固了这个来潮。至卢沟桥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的武装大举进攻，就使中国政府、中国的各党派及各阶层人民一致走上了武装抗日的新时期，形成了革命的高涨之时期。但至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以后，由于国民党中反共投降派的活动，大后方的民众革命运动又开始了退潮，在敌占城市中则处于革命的低落之时期。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高涨，有它极大的特殊性。这个革命的高涨，是由于异族敌人的大举武装进攻所直接引起来的，因此，它的直接目标，是驱逐异族敌人出境，是民族任务的特别突出，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浪潮与高涨，是长期的革命的防御战争，是革命的高涨，是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但它最初不是表现为革命的进攻，而是表现为革命的防御，只有到将来，到反攻时期，才表现为革命的反攻与进攻形式的战争。而且这个革命的高涨，大体上是在中国大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无产阶级英勇地参加了这个伟大的革命的防御（将来也还要参加反攻），但是它只有部分的领导权。由于这些特点，就使这个革命的高涨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时的高涨有很大的不同。在全国性的革命的高涨之时期内，又有敌占区与敌占城市的革命的低落。在举国一致进行抗战之时期内，在民族浪潮依然高涨之时期内，又有大后方民众革命运动的退潮和低落及敌后的许多武装磨擦等。我们有些同志总不高兴革命防御这样的字眼。他们总以为防御未免有些“机会主义”气味，只有革命的进攻才有十足的革命气味。这是一种全然不懂

得革命的投机心理的表现。他们不知道，目前中国最伟大的民族战争，苏联最伟大的保卫祖国战争，全世界最伟大的保卫文明与民主的战争，最初都是在防御的口号之下进行的。他们不知道，在一定的情况下，防御性的口号最能动员群众理直气壮地走上革命战场，因而也是最有实际革命意义的口号。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革命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比以前有了极大的变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大举向中国内部进攻，使得中国与世界许多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动，使得中国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基本的变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转变到抗日方面来，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也有一部分参加了抗战。因此，就引起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略计划的部分变动，就是我们除开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外，还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日反封建分子来共同抗日与走向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新形势，不独是引起了中国各阶级间的关系有一些基本的变动，而且革命与反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也引起了基本上的变动。大家可以看到，在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形式，主要的是非武装的斗争形式——即其所谓“不战而胜”的战略，企图以外交恐吓走私等方式来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在事变后，日本的进攻，主要的就是采用武装进攻与武装占领的斗争形式了。百万寇军，就从华北华中华南向中国内地进攻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形式之变化，就使得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形式也变更了。在事变前，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武装的斗争形式（反日游行、示威、抵货，反日会、救国会、民先队等），当时的学生与知识分子常是站在斗争的前线，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救国领袖”、“救国七君子”

之名，也是在这时候形成的。但是在事变以后，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反对日本的主要斗争形式，就变为武装斗争了，就变为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了。在这个时期站在斗争前线的，是抗日的军队和武装起来的人民。因此，平型关、台儿庄等战斗的将军们及在敌后领导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人、官吏、教授和志士们，就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成为全国闻名的民族英雄。而过去那些站在反日斗争前线上的学生、知识分子，他们此时不能站在抗日武装斗争的前线去，或站在前线而不能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大显其身手的话，那就无论他们是如何比过去加倍努力地奔走号呼，从事反日游行、示威、抵货及组织救国会、民先队等，全国的人民总还是不大注意他们的。“救国领袖”、民族英雄，总还轮不到他们。他们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总比过去是大大地降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时代与过去不同了。这是武装抗日时代，这时只有在武装抗日斗争中能大显其身手的政党、团体和个人，才能取得在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如果他们过去曾经一时的在游行、示威、抵货等主要的反日斗争形式中取得某种领袖地位的话，那么，此时他们就不能在另一种主要反日斗争形式——武装抗日中来取得或保持其领袖地位。有些学生与文化界的同志们，很久不知道他们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是如何比过去降低了，就是由于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就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在中国人还没有在全国拿起枪来打日本以前的时候，还是在准备抗战的时候，用嘴巴，用笔，是能够打击日本的，是能够一时表现其重大作用的；但是在事变后，在中国人到处拿起枪来打日本以后的时候，就只有拿起枪来打日本，才能表现其头等的重大的作用，如果在这时还只用嘴巴、用笔——喊口号、唱歌、讲演、写标语、写文章、办刊物、游行、示威、组织救国会等——去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就不够了，就不能表现其头等的重要的作用了。那些学生与文化界的同志们，在武装抗日的新时期里，他们还只能用嘴巴、用笔去打击日本，而不能用枪去打击日本，他们的作用与地位要比过去降低，是毫不足奇的。在这时，一切宣传鼓动，一切其他的群众斗争形式，只有密切地配合抗日武装斗争，才能显示其一定的作用与重要性，并且只能伴随在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作用里面来显示其作用，而不能有其独立的作用。就是说：其他一切的工作与斗争，要看他们对抗日武装斗争能有多大的帮助，它们当时就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独是反对民族敌人的主要斗争形式变更了，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也变更了。在事变以前，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是内战；但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事实上大体是在西安事变以后），国内斗争的主要形式，就不是武装斗争了，就由过去的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了，而国内阶级斗争更加要服从于民族斗争。在抗战期间，虽然也有几次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及许多地方的武装磨擦，但这些武装磨擦还是暂时的局部的性质，还不是这时期内国内斗争的主要形式，还是为了要停止顽固派的武装进攻、保持国共继续合作之目的而进行的。在这时期内，国内斗争的主要形式，还是政治斗争。其他的斗争形式——如经济斗争、理论斗争、武装磨擦等，都是配合政治斗争的。这种政治斗争，主要表现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及如何建设新中国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在对抗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及建设新中国的两个方针的斗争中，表现在抗战建国的领导权的问题上。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有办法，能大显身手，并使其他的斗争形式——经济的、理论的、武装的以至部分政权形式的斗争，密切配合国内的政治斗争，然后才能保持、巩固与加强

自己的阵地，发展自己，并提高自己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否则就有被人陷自己于孤立的危险。在抗战时期国内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斗争这一个论断，并没有改变、动摇与抵触另一个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在卢沟桥事变后，除了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及国内各阶级间的关系有某些基本变动外，中国的新形势，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决定着我们的策略路线的变动。就是说，在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下，任何政党、任何团体或个人，只有当他在抗日的战场上，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了他自己的最高作用时，只有当他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在为国内进步团结与坚持抗日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中，表现了他自己的最大能力时，它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并在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舞台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否则是不可能的，且有陷自己于孤立的危险。我们的党当然也不能例外。

个别国家的党的策略路线的决定，除开根据于本国战略的要求，根据于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斗争中的战略策略的要求，及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斗争经验而外，主要的就是根据于各个时期内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之时期内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决定的。党的策略就是革命阶级在这些时期内的行动路线的决定，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和口号的采取、变换与配合等。斯大林同志说：“策略就是无产阶级在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时期，革命的高涨或低落时期内行动路线的决定，就是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的方法，以及用配合这些形式等等的方法，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进行的斗争。”很明白，在“一二九”与卢沟桥事变以后，在全国形成的抗日运动的来潮与民族革命的高涨之新时期内的新局势，是要决定党

的行动路线的变动，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和口号的改变的。如果我们的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熟视无睹”，那我们就不能指导中国具体的革命斗争。

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的新任务——在战略任务上来说，是彻底战胜日寇，中国民族完全独立，是削弱封建势力，推动中国走向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投降派、坚决的反动派孤立，是联合所有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层共同抗日建国，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策略任务上来说，就是开展抗日的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和国内的政治斗争（与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并服从于抗日斗争），是在参加伟大的民族革命的防御战争与反攻战争中实行部分的进攻（因为我们如没有对国内反共派的部分的政治进攻，冲破他们对革命民众及我们的严格的限制，我们就不能将党的革命的主力布置到前线上去，并不能在抗战中削弱封建势力。这种部分的进攻，就是独立自主地走上一切可能的抗日战场与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而这两者都是对抗战有利的，别人无理由来反对我们的，因此不会引起自己的孤立的），从各方面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加强自己的力量，团结一切民主势力，以便造成实现党的战略任务的可能性和前提。这是在新的时期内全党的总任务和全党的行动路线。

三 党应采取哪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

哪里是党的主要工作地区？

在抗战以后，既然抗日民族斗争是主要的（国内的阶级斗争是服从的），抗日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抗日的其他斗争形式是次要的服从的），那么我们又应怎样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呢？

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敌作战呢？哪里是党的主要工作地区呢？

我们的党，是有军队的党，是进行过多少年武装斗争的党，是对游击战争特别有经验的党。因此，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能够在某些战区、某些战线上独立自主地、有组织地进行抗战，能够在某些战区、某些战线上，担负独立的战斗任务与战略任务。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党十多年来英勇斗争所创造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今天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基础上开始前进。

所谓站到前线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本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分别地或个人地参加别人领导的抗日部队去抗战；第二种是我们有已经组织好了的部队，或重新组织部队，去到一定战区与战线上有组织地进行抗战。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应该采取。但如果我们自己有可能而客观形势又允许（但并不一定要同盟者允许）的话，我们就应该着重采取第二种方式。因为第二种方式对抗战对我们都有极大优越性。抗战以后，很多人都自己组织队伍参加抗战。这样作的不只是我们。

那末，我们的队伍参加到一定的战线上（主要是敌后），又应该怎样和敌人作战呢？武装斗争是有三种方式的，即正规战（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与武装起义。在这三种方式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我们应该采取哪一种呢？主要的和基本的我们应该采取游击战争。这是因为我们组织好了的队伍不很多，如果我们拿这点队伍去进行正规战，那是极有限的力量，那就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那就可能在一个或几个战斗中即基本上被消耗或有极大的削弱，而我们新组织起来的队伍，一时是不能进行正规战的。而我们被消耗了，人家是不补充我们的，并还不许我们组织新部队。虽然在整个抗战中正规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有极

大发展之可能，在相持阶段中且是主要的战斗形式，能给敌人以极大的打击，并还有在一定条件下转入正规战之可能。游击战主要是在敌后进行的，是站在抗战的最前线，是最困难进行的，是我们应站的岗位。国民党军队在最初又不屑或不敢在敌后进行游击战。而我们在敌后基本上又只有游击战争可以进行，正规战在长时期内基本上是不能进行的。我们又长于游击战争，我们在分散的游击战争中又最便于发展自己与建立根据地。而在敌后发展有力的游击战争与长期坚持这种战争，又是在正面抗战的国民党所需要的。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有组织地去参加抗战，只有到必要与可能的时候——或者在将来反攻的时候有这种可能与必要——我们才能在基本上或部分地采取运动战。

在抗战以后，武装斗争——有组织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但是这种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只能在敌人的后方打。在我军的大后方，在敌占城市，是不能打游击的。而在一切的敌人后方特别是乡村中，又差不多都是能打游击的。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党的主要工作地区——工作的突击方向，应该是敌后地区，应该是那些不久就可能失守的地区，应该是乡村。

在事变后，由于敌人的大举进攻，大半个中国不久即被敌人占领，并将中国大体上分为这样三种不同的地区，即：一、敌人完全占领的城市与交通要道。这里不能有公开的反日运动。二、敌人还控制不了的敌后的广大的乡村及若干小城市。这里能够进行广大的反日游击战争，并能建立根据地，长期坚持这种游击战争。三、没有被敌人占领的我军的大后方（主要是国民党统治区域）。这里由于国民党对内的反动政策，只能容许很小限度的援助前线抗日的群众运动，到后来这种很小限

度的容许都被取消了。在事变后，全党全民族的总任务，是团结全民族战胜日寇，是为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准备条件，是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反攻的胜利。这些任务，是要在以上三种不同的地区都来执行的，因此党也应在以上三种地区同时都进行工作，也就应该在这三种地区都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全国性的党。但是由于情况的不同、战略地位的不同，我们的党（只是说我们的党）在以上三种地区内执行上述任务的时候，就要采用不同的形式，就有各个地区不同的特殊的具体任务，就应该有所偏重，有全党主要的中心工作地区，而不应该平均地一律地看待。

党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限得很的，应该善于审慎地支配与使用这些力量，应把这些力量的绝大部分用到当时最能够推动全局的中心环节上去，而不应该把这些力量的重要部分使用在次要的不可能获得重要结果的方面，不应该浪费力量，不当地使用力量。然后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在以上三种地区内，历史上最大的敌后的游击战争，既然是党的全盘工作中之中心环节，我们就应把一切可能的绝大部分的力量使用到敌后游击战争中去，争取我们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完全可能实现的领导地位。我们在敌后地区的特殊任务，是独立自主地进行有力的游击战争，拖住敌人以配合正面作战，破坏敌人的企图，打击与消耗敌人，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反攻敌人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准备必要的条件。在我军后方（国民党区）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党的组织，动员与组织群众，援助前线与敌后的游击战争（在这里当然我们要首先援助在敌后我党领导之下的游击战争——如干部、物资及其他一切），团结国民党及其他一切可能的势力抗日，并和大后方投降倒退反共的潮流与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为了要有效地实现这些任务，就要建

立大后方党的组织，进行宣传，利用一切可能合法的方式动员与组织群众，以便能动员力量到前线去，同时能有阵地地反对投降倒退与分裂的危险。在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援助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当然首先是援助我们的游击战争），同时与乡村反日武装斗争配合，准备将来在城市中的反日武装起义。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保存与建立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秘密党的组织，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势力，以便能够有力援助与密切配合附近的游击战争，并准备将来能够响应反攻的武装起义。在今天来说，由于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的人口，占了整个敌后地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党在敌占区的工作及敌占区的合法斗争，其重要性更是增加了。

这就是党在上述三种不同地区内执行全党全民族总任务的不同形式，不同的具体内容。而在这当中，应该偏重在敌后地区，以敌后游击战争为全党的中心工作。

在全民族来讲，前线是中心，在大后方组织反攻力量是中心，其他一切是配合的。但在我们党来讲，由于我们有限的力量，及其他许多情况，我们此时只能以前线与敌后游击战争为中心，其他一切都是配合的。而我们在前线与敌后的游击战争又是配合（在相持阶段中是主要的）全民族抗战的。这是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势力在抗战中的一种分工。这也就是我们党在抗战中可能实现而今天也已经实现的一种实际地位。如果我们要求在抗战中实现更高的、超过这种可能的实际地位，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条件是不够的，因此，这种要求也就是错误的。但我们如果自愿放弃这种在抗战中可能实现的实际地位，而不去努力求其实现，那就是更严重的错误，会要受到历史的严重的惩罚。

四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行动路线的决定

在卢沟桥事变后，需要团结全民族战胜日寇，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问题。在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可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也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甚至封建阶级、奴隶主阶级也可以来领导的。历史上的这些事例，都可以找到。不论由哪一个阶级来领导，不论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怎样，只要能团结各阶层共同抵抗外族的压迫，实质上还是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领导成分不同，统一战线内部的结合关系不同，就决定了统一战线结合的范围、程度与形式、抵抗外族压迫的政策与力量等等有各种不同；而这些不同点，也就要影响到“是否能够胜利地抵抗外族压迫”这一结果，以及还要影响到在战胜外族敌人以后国家内部关系的组织。因此，在抵抗外族压迫的战争中，第一，必须要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第二，还必须要看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成分是什么，内部结合的关系是怎样，然后才能了解这个统一战线的力量、它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它是否能胜利地抵抗外族、和在胜利以后又将建立怎样的国家。很明白，这后一个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注意或不清楚了解这后一个问题，就必然要犯绝大的错误。

很明白，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是存在着或存在过实质上有所区别的两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型。第一种，是以大资产阶级中之一派为直接领导的——在形式上是很不完备的，似乎是很难捉摸的一种很特殊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抗战以后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作。这种统一战线，在抗

战初期中的阎锡山、程潜、廖磊、黄绍竑等人的地区，曾经一时是发展到比较完备的形式的。在今天也还是全国性的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他们（大资产阶级）在口头上不承认统一战线的原则，不要共同纲领，拒绝与其他各党派实行平等的民主的合作。他们所要的是其他一切党派团体和阶层不论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甚至在思想上都完全地绝对地服从他们，跟随在他们的后面去抗日，原则上不允许其他阶级有任何的独立性，并企图在抗战中消灭、瓦解或削弱其他一切异己势力。然而又由于他们的力量软弱，今天他们又还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威胁他们最大的民族敌人，他们无力来同时对付国内的其他派别，并且还不能不和其他派别妥协，给以一定的权利和地位。这就是他们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内容。第二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敌后许多抗日根据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以“三三制”政权及其他平等的民主的形式，团结所有各抗日阶层及党派团体共同抗日，实行照顾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和彻底战胜日寇的政策。但这种统一战线今天还只是地方的局部的，还不是全国的形式。这两种统一战线，都是抗日的民族的统一战线，都在中国同时存在，也还没有最后闹到彼此不相容。但这两种统一战线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而这后一种统一战线，在胜利地抵抗外族压迫的斗争中是有极大的优越性的，也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只要条件是允许的与可能的，我们就应该为建立这后一种比较优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或使前一种统一战线逐渐转变为后一种。在条件许可与可能的形势下，我们总不应该拒绝这样作。

因此，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种，是以大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在

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苛的）之下去参加。第二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吸收其他抗日的阶层与阶级来参加。在全国范围内来讲，目前要求建立第二种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要求建立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领导的统一战线，至少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建立第一种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只能这样作。但在局部范围内（大多数是敌后地区）来讲，建立第二种统一战线就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就应该这样作，只要我们在这样作了以后不致于引起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根本破裂。这就是说，在抗战以后，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团结敌后一切抗日的势力和阶层，建立以自己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政权、军队等等在内），坚持敌后的抗战。这种敌后的统一战线应该包含在全国的统一战线之中，不与国民党及中央对抗，同时也不拒绝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抗日党派来参加。这就是我们在敌后应采取的关于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

为什么在敌后我们能够独立自主地建立以我们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这是由于敌后的特殊环境以及敌友我各方面的特殊条件而产生的。首先是由于敌人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激化。在敌人大举进攻之下，地主资产阶级在敌后广大地区内的政权武装及其他腐败的统治机构，被敌粉碎，或驱逐，或迅速地逃走或投降敌人，或当汉奸为虎作伥反对抗战。旧的秩序已被彻底破坏，而敌人又因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且忙于正面作战，“新秩序”还不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这就给了我们（以及其他任何人）一种可能，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期内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建立武装、政权及其他机构，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建立一种新的抗日的秩序，建立在我们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同时（这是次要的）又还

因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很有威信的党，还有自己的武装，我们本身又能比较最完善地建立起这种新的抗日秩序。而且在这时期内这样作了之后，并不伤害友党，且为友党在抗战中所必需（国民党政府及中央军委批准冀察晋边区政府成立等事实，就是明证）。这种特殊的有利的时机，在一切敌后地区都或长或短地产生过的。这是在中国革命历史的特殊发展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时机，使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机内可以不大费力地大体地局部地解决革命中最中心的问题，即在部分地区内（包括数千万人口）获取与建立以自己为领导的一切革命阶级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政权。在敌后所产生的这种时机，一般都不长的，有的只有几星期，有的是几个月、半年或一年。因此，历史上产生的这种特殊时机，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去利用，不在事先就有充分的准备，那末，这种时机是稍纵即逝的。

我们是否应该利用这种特殊时机来爽快地解决革命中业已成熟的又不会发生危险的各种基本任务呢？是应该利用这种时机来解决的（虽然只能局部地解决甚至还没有胜利的最后保证，而只能是一定时期的解决）。这种时机在历史上是不常产生的，如果今天的历史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产生了这种时机，而无产阶级自己不知道去利用，或自觉地不去利用（作一个不在混水里面摸鱼的君子），让这种特殊有利的时机放过，那就必然要受到历史的严重的惩罚。在革命中业已成熟的各种任务（例如二五减租、“三三制”的三民主义政权等），是多年来没有解决的，如果不在这种可能的特殊时期内解决或造成解决的前提（虽然这只能是局部的），那也将会在多少年以后还不能解决的。

有些同志说，这种特殊时机，只在华北敌后产生过，在华中华南敌后没有产生过。华中华南敌后的情况“特殊”，这里没有八路军，因此，在华中华南敌后我们就不能独立自主地进

行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及抗日民主政府和武装等。这种理论，是不合事实的。华中华南敌后与华北敌后比较，是有一些个别的特点，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还不致于引起实质的变化。

有些同志说，只有正规战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战胜敌人，游击战争是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和战胜敌人的，因而主张我们不要去重视游击战争与敌后地区的工作，主张我们只有以全力去依靠与帮助能够进行正规战的大资产阶级，才有出路，而不要去利用这种特殊有利的时机，不要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打游击。这种理论的错误，也被后来大资产阶级实际的对内反动政策，和伟大的敌后游击战争所给予敌人的严重打击并造成我们在将来转入正规战的某种可能等等事实，所完全证明了。

有些同志说，如果我们利用这种特殊时机，主要采取有组织的形式去参加抗战，如果我们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建立我们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主根据地及政权武装，并实行三民主义等，那大资产阶级是不能允许的，因而也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作会引起国共合作的根本破裂，因而主张我们不要这样作，我们主要地应采取个别的秘密的方式去参加国民党部队抗战，只参加大资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当苦力或纯粹的帮手就够了，不应该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之外去行事。这种理论的错误，也被后来及现在的事实所完全证明了。华北华中敌后的许多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是长期存在着，国共合作也并没有因此根本破裂。相反，华北华中许多抗日根据地及“三三制”政权的存在，恰恰成为反共派不敢轻易地根本破裂国共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还造成在战后继续国共合作的重要条件。如果说皖南事变曾经引起国共之间的很大裂痕的话，那末，皖南的负责同志恰恰是主张并在党内独立自主地实行上述错误理论，一切不敢超出大资产阶级意旨

行事的人。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是顺从资产阶级的意旨行事，只是安心地充当资产阶级的苦力或纯粹的帮手，而不与资产阶级一切的反共企图进行斗争，那国共合作就一定破裂。远之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结果，近之有皖南负责同志机会主义的结果。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在基本上带着阶级对抗的合作，在合作的任何时候，无产阶级必须有充分的警惕性。这种合作在资产阶级说来，是带着极大的被动性与被迫性（帝国主义的压迫，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逼迫等），只要到他们认为不需要这种合作的时候，合作对他们不利的时候，情况可能的时候，他们就要压迫、限制、甚至丢弃无产阶级这个仍然戴着枷锁的“盟友”，并且严厉地来反对无产阶级。“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符合他们的法则的。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实行适当的让步，在合作过程中不去过分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又在合作过程中进行适当的斗争，并造成了一种情况，使他们不能随意破裂这种合作时，这种合作才可能保持延续到适当的时候。

这就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路线的中心环节。

这就是党在卢沟桥事变以后策略路线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二、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初期华北工作的经验

一 抗战准备时期

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决定我到华北去工作。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到了天津。当时中央给我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此时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都发表了，但苏维埃区域、红军同全国其他地方还是完全隔绝的。

当时华北的情况是怎样呢？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本部进攻。一九三五年发生了“华北事变”，“何梅协定”成立，在日本要求下，中央军从河北撤退，并成立了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造成了华北的特殊化。华北处于危急之中，保卫华北、保卫中国的任务非常迫切。

第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反日大示威以后，学生反日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小城市，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来潮。但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仍然处于尖锐对抗的形势中，因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顿时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呼声。

第三，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赞成，但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中。国民党虽然继续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旧政策，继续进攻红军与捕杀共产党员，但亦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总起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全国各阶层的人民，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全民族挽救危亡的总方针，工人、农民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化，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赞成抗日的方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也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当时我们党在华北的组织情况又是怎样呢？

从大革命失败以后，经过了九年的反动时期，现在又有了新的民族革命浪潮，我们的党在白区保存下来的还有些什么呢？我们不能不悲痛地回答：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

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

如果说在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苏区和红军党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在遵义会议以后已经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的话，那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白区党组织的时间是很长的。在苏区及红军的党组织还没有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时候，白区党的组织早就被这种路线统治了。在苏区及红军的党组织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白区党组织中的这种路线还没有被克服。虽然在“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以及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白区党组织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纠正过，但这种纠正是极不彻底的，特别是在思想体系及群众斗争策略、组织形式、斗争形式等方面，没有被彻底纠正过来。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

在上述情况下，华北党的任务与工作方针是什么？我们是怎样根据情况来提出任务与决定方针的呢？

除开动员群众并动员各方面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当时全党的总口号）而斗争外，党在华北的任务，就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要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就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联合一切抗日势力，有效地准备自己与准备群众，就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根据当时已经开始了的（特别在学生、知识界中）革命运

动的来潮时期之具体情况，提出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必须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必须在青年、军队及一切群众中进行顽强的工作，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这样，才能团结华北一切抗日势力，进而推动全国的团结和准备抗日。这就是我们在当时的任务与工作方针。

当时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努力工作了。

我们在华北以至在全中国广泛地传布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以党中央委托北方局的名义发表了新的宣言，并以陶尚行的名义发表了给《自由评论》（国家社会党机关报）的一封公开信，答复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讨论共产党新政策的文章，在党内党外均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还出版了《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刊物，又利用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地传布开来，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为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还做了许多具体的联络工作，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同各实力派及社会名流、学者等接洽，一般都得到了不坏的回答。我们还通过某方面的关系和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某种非正式的接洽。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号召群众为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使抗日救国运动更深入更广泛了。我们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进行政治的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的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贼和投降分子。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并由华北这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通过各界救国会、学生会、民先队等组织，出版了几

十个公开半公开的刊物和许多小册子，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戏剧团、歌咏团、下乡工作队等。这些就是当时群众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

党的组织在当时一般还是秘密的。但群众的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把统治者的严格限制多少冲破了一些。许多救国团体是半公开的，一部分刊物是在官厅登记出版的，另一部分刊物书籍则没有登记亦可在许多地方公开发行。依照新的情况，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需要给以重新配合。我们大体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联系，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的群众中，因此在这些活动中党的秘密组织的破坏还不大，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城市及乡村中略有发展。还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则发展到全国各个城市，以至在巴黎、东京等地都有他们的支部。

要准备抗日战争，没有军队的参加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争取华北的军队抗战，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通过各种关系同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二）通过群众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三）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的转向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且在党员及左倾人士中进行了深入耐心的解释工作，说服了他们。

在进行上述这些工作之前及工作过程中，我们在党内同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内的指导刊物《火线》在这一年多内出版了四五十期，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文章，从原则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又在一切具体工作与斗争中来彻底粉碎这种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六年三月，北平的学生因郭清之死举行的“抬棺游行”（郭清是为爱国被捕死在狱中的学生），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与学校当局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他们不听学校当局的劝告，不接受学校当局向官厅交涉抚恤及合法的追悼郭清的方式，而是秘密地、突然地推倒学校的墙壁，抬着郭清的棺材到马路上去游行，致被警察打得落花流水。这是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行动。我们批评了这次行动的错误，并且责令我们的党员进行许多善后工作，向学校当局进行了解释及道歉等，挽救了当时的危险形势。

当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在同党内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及工作积极性，因此，逐步地巩固了群众运动的来潮，使广大

的群众团结在救国会、民先队的周围。北平的国民党教授及其他国民党员为了分裂北平学生运动的目的而成立北平学生会（新学联）时，只有极少数的分子参加。在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党内只有个别的分子不赞成，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

以上就是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在进行了这些工作之后，华北的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及统一战线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地方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了，平津两市党的组织与工作大大加强了，还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华中华南的若干党组织。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及中学都加入了平津学生会。各方面人士对共产党的疑惧心理大大减少了，都愿意与党来往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和组织也有扩大和发展。党已深入在群众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过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运动来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华北党内克服了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执行党中央路线的结果。

这些成绩，为党与八路军在华北抗战创造了比较顺利的工作条件与发展条件。

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什么缺点呢？

这个时期我们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非常薄弱。除开在唐山及个别的铁路与工厂中有很小的组织外，在许多企业中没有什么组织，党的新政策在工人中的影响亦很小。当时学生群众的救国运动，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来，还没有较为广大的工人群众起来参加救国运动。这是由于：（一）当时的政府及工厂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与限制特别严重；（二）从很久以来，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就受到

无数次的破坏（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还有一次相当大的破坏，企业中的党员及与党接近的工人共有五十多人被捕），使党与工人群众的组织联系几乎断绝，党内做职工运动的干部亦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党必须重新训练干部才能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三）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各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工人中的工作注意不够，没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派遣必要的干部到工人中去刻苦工作。

当时，中央对过去白区工作中的左倾路线，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这使华北党组织克服左倾路线的斗争遇到了困难，并在党内发生了纠纷。当不少同志提出过去的领导路线是否错误的问题并要求答复的时候，我们的答复却不能不是含糊的。这就给了当时个别留恋左倾路线的负责人以间隙，使他们乘着这个间隙来反对正确的领导。不久以后，中央召集白区党代表会议（一九三七年五月和苏区党代表会议一起召集），我和华北的代表来到延安开会。就在这时候，反对者在党内，在代表中，暗中进行了许多活动，他们和延安的某些同志结合起来，影响白区党代表会议中不了解内情的一部分代表和他们在一起，坚持拥护历史上白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否定当时华北党的正确领导路线。因而使得这个白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工作中的困难不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虽在不久以后抗战就爆发了，华北的工作条件、工作任务完全改变了，但是这个白区工作会议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到很久以后还没有最后消除。这也成为当时华北党的工作中一个严重的缺点。

这就是抗战准备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和经验。

二 抗战初期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党中央估计到日寇要占领平津。平津危急。于是就提出了“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为保卫国土而流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号召群众与军队紧急行动。

平津失守后，华北及全国抗战的形势还没有确定。根据过去“一二八”抗战、冀东抗战及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的经验，国民党可能再来一个什么停战协定，还有妥协的可能。这时我们的方针，是采取一切办法推动全国抗战，反对丧权辱国的和平妥协。

因为平津被日寇占领，我们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但在撤退过程中，有个别负责同志反对撤退，利用撤退时某些人的慌乱现象，在党内外提出了“反对逃跑”的口号。他们命令党员及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留在平津，因而部分地延迟了这种撤退的行动。虽然没有造成损失，但这些同志的意见与行动无疑是错误的。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撤退。如果在此时党不去组织撤退，那只能是帮助敌人。

日寇占领平津后，即大举向中国内地进攻，收复平津的可能性暂时丧失，全国抗战的形势也已经确定，国共宣布合作，共产党已有半公开及公开的合法地位。这时候，我们决定了如下的方针：

第一，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

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

第二，在冀东（这里是在几年前就被日寇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地方），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冀东的同志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当八路军宋时轮支队进入冀东行动时，英勇地发动了冀东人民的大起义。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我们的同志在起义前作了很好的工作，那里的国民党组织及伪政权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队（七八个旅），县政府的武装，开滦矿山的工人，农民及许多地主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参加了起义。这是真正地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并在起义后立即组织了联合的领导起义的政权与军事指挥机关。然而这一次起义在不久以后即遭遇到敌人很严重的进攻，受到严重的挫折。只是到后来又用了很多的办法，方把冀东游击战争组织起来。

第三，在华北其他地区（我军的后方），应动员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此时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是战地动员委员会（有一些地方是救国会）。这种动员委员会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

第四，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应动员工人、职员能迁移者，迅速迁移；不能迁移者，准备和组织在失守以后的对敌斗争。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以上就是我们在太原失守以前的行动路线。

在抗战之初，我们就估计到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及国民党党部也会退走，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就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

在估计了上述的可能情况之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方针：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八路军一到太原，北方局就向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与方针。十一月十五日北方局的书面决定，再次确定了这一方针。但当时有少数同志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华北也许不至于全部沦陷，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敌人前进。因此，他们就觉得没有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的必要。说到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的任务时，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至于在华北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政权，那更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不能允许的行动。他们的方针是什么呢？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敌人前进。他们认为敌人是抵得住的，抵不住以后的事情不要去想它。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侧后不大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与前途是不大的。很明白，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当时否决与批评了这些意见。

到太原危急的时候，整个华北沦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太原是当时华北最后一个还没有失守的大城市，太原失守后，在华北进行正规战争的条件一般地就失掉了，不能组织相当固定的战线，只能以游击战争的形式来坚持华北的抗战。这时，我

们就在党内确定地指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我们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

这时候中央也指示我们说，我党我军在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这样的指示，在当时华北情况下，是完全正确完全需要的。

当时，群情慌急，不知所从。党内也有少数党员表示了这种情绪。我们禁止党员离开华北，并向群众作广泛耐心的解释，说明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一是继续同敌人打，二是逃走到别处去，三是投降敌人。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而要继续同敌人打，怎样打法？谁个打？是否能打胜？这些都是在一般群众及许多党员的思想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采取了许多实际办法，在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关于游击队的组织问题；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关于干部问题；关于游击队作战区域问题等。

我们特别告诉群众说：游击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而要由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来打。

在太原失守的前后，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八路军的胜利与良好的纪律，党与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党已一般地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可能。党与群众运动，华北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到处都有大发展之可能，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这时候，一方面是旧统治阶级的退却逃跑，张皇失措，和汉奸

的粉墨登场；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愤激和他们的武装抗战的决心，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高涨。这时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当时我们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采取了以下的一些办法：

第一，开办了许多一星期卒业的训练班，把这些人立即分派到各地去进行工作。

第二，把上层领导机关的人员尽可能地分派下去，连技术人员也分派下去工作。

第三，动员了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大批党员，大批学生及同情抗日分子，下乡去组织游击队，回到自己家乡去组织游击队。如果他们把游击队组织起来无法指挥时，就交给八路军指挥。

第四，召集一些可能召集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告诉他们工作方法，检查他们的工作，交给他们任务，使我们各地方的工作人员能够迅速成熟起来，能够担负当前的任务。

第五，大量发展党员，并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各地方的党部，首先建立各县的县委或地委，然后再来发展党员建立支部。

因为我们从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上述各种问题，所以全党都有一定的信心、一定的计划去进行工作，去应付激烈变化着的环境。所以，我们当时的发展是很快的，许多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太原失守后不久就成立了。在客观形势的飞跃发展中，我们的工作也飞跃发展了，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后来，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大多数退走，并抛弃了很多武器资材。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及差不多所有的县

长、专员都逃走了，山东韩复榘的省政府和县政府人员及其军队也逃走了，山西的旧派也大多数逃走了，而山西进步的新派就大为活跃起来。华北人民正决心准备自己起来救自己的时候，八路军部队和大批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华北敌后，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密切地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党员和八路军、积极的抗日分子，拾起国民党军队所抛弃的武器资材，到处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一时，在广大沦陷区中，我党的、其他党派的与无党派的游击队，共有数百个。而这些游击队大都与八路军有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加入了八路军。这样八路军在敌后就得到迅速的扩大，许多新的支队编制起来了。八路军就成为拥有十数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

在旧的行政官吏逃走或叛国之后，我们委任了许多新的县长、专员，并在各战略区经过民主方式成立了行政公署或边区政府，建立了新的抗日秩序。不久，许多地区的土匪被肃清，人心逐渐安定，人民自卫军、民众运动都大大发展起来。党的组织亦有十多倍的发展。单以华北范围来说，我们的党已成为领导抗战的最大的政党了。

敌人在占领太原以后的四五个月中，没有继续向山西南部进攻，这给了我们从容布置敌后工作的时间。这时候，我们决定在敌后采取可能的国家政权的斗争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与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军区、军分区），颁布各种地方法令，征集物资、粮食，镇压汉奸等。我们还决定了根据地中党的公开及采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不论党、政、军、民及其他组织，最初均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建立，首先成立领导机关，然后建立下层组织。在革命高涨时期，领导机关建立以后，很快就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充实下层。因为一切都在飞跃中，时

间是很宝贵的，浪费时间就等于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地解决。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开的，或不能迅速打开。我们在“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下，采取了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斗争形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织形式。由抗日人民代表会议直接产生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军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救国会，扩大八路军，以及党的公开等。由于我们及时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新的口号去代替旧的口号，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去代替旧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并且在斗争过程中，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把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相互结合起来，因此，就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激烈变化着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战场，并在战场上适当地布置开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关于策略的具体指导。

华北人民的革命运动，华北的党组织，在上述策略指导之下，大踏步地前进了。仅仅几个月，华北大部地区就完成了这样几个大转变：统治华北的腐败的旧政权，在敌人进攻下几乎是完全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敌人的傀儡政权——汉奸政权；随即又由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抗日游击运动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之下的大发展，在华北广大的乡村中，摧毁了敌人的傀儡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仅仅几个月，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抗战中失败了，退走了，代之而起的是数量更大的与八路军密切结合的人民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抗战中所给予敌人的打击，大大超过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所给予敌人的打击。这种伟大坚强的游击战争，将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也将在敌人面前证明：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很明白，像这样复杂的巨大的转

变，没有正确的指导，是不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

当时在策略的指导上，最复杂、最需要冷静地思索与处理的问题，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翻了筋斗。我们采用了这样两种斗争形式：第一种，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完全退走的地方，以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地区，建立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队，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然后请求国民政府批准（但国民政府不批准也就算了）。这主要是在河北采取的形式，我们在上面已经研究过了。第二种，就是在山西采取的，即是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过新派及牺盟会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这种形式，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

关于山西新派发展的具体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山西的阎锡山在绥远事变后，看到敌人要侵占山西的严重性，决定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因为他要抗战，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用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势力，即山西的新派。在太原失守后，旧派的许多人逃跑，有的投敌，于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装（决死队），任命新派作专员、县长等。但到后来，因为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独立的力量，他又畏惧新派的势力过大，就反过来压制与打击新派，提高旧派，并利用旧派来反对新派。到最后，就指挥旧派向新派武装

进攻。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新派采取了坚决的方针，击溃了旧派的进攻。新派就更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了。

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取得了胜利，也使我们取得了胜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统一战线中左派的成功。

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因此，这个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然而，即便如此，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的。主

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有些地方，特别是那些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因为长期习惯于秘密工作，在形势突然转变、历史飞跃前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方式一下转变不过来，不会运用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各种问题。他们仍然照过去一样，一点一滴地去进行工作，一个一个地去发展群众团体的会员和党员，只进行局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满足于几个党员与几十个会员的增加，满足于局部经济政治斗争的微小成绩。他们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提出任务，更不能解决在客观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务。因此，他们就不能不远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这种毛病，很久以后才逐渐纠正。

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这时候不耐心等待，就要犯错误。但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错误。我们过去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工作，也可以说是等待了十多年，等待什么？就是等待这样一个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今天，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都等到了，如果又轻轻把它放过，不利用这种时机迅速前进，那就等于犯罪。

第二，有些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他们在特别有利的时候，不知道以我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的抗日势力与抗日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来领导敌后的抗战。他们不懂得国家政权在革命斗争中极其重大的意义，而等闲视之，弃若敝屣。在山东及其他一些地方，当着旧政权人员逃走，汉奸政权又被我们推翻很久以后，还不独立自主地建立新的抗日政权，不知道委任县长、专员，不知道经过民主方式产生当地最高的政府，不去迅速建立新的抗日秩

序，让那种无政府状态延长下去。他们似乎觉得我党无权利站在抗战的领导地位，无权利站在统一战线及抗日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无权利建立当地抗日政府及委任县长、专员等，而且他们似乎还觉得全体抗日人民也无这种权利，唯一有这种权利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就等了又等，等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恢复那里的“一党专政”，然后他们再给以拥护。甚至当这些“一党专政”者转眼无情，不独不报答他们拥护的善意，而且要驱逐他们出境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这些同志的错误观点，使山东丧失了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并还将下面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也取消了。这些错误，给我们以后在那些地方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错误，在华北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

第三，有一些同志犯了过左的错误。在筹措部队的给养时，没有严格遵守统一战线的政策，过分加重地主富人的负担。在收编游击队时，编得过多，没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及非党的外围武装，对编余干部的处理简单粗糙。在群众运动中，有些地方对于流氓分子的破坏性注意得不够，因而造成某些乱捕人、乱杀人、乱筹给养的现象，引起社会上的严重不安。党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犯了“拉伕”的错误，引进了一些坏人及落后分子。这些错误现象的纠正，在许多地方是很慢的，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些地方在纠正这些过左错误的过程中，又不适当地打击了群众和下层干部，向他们泼了冷水，因而引起群众情绪的低落和下层干部的消极，反动分子乘机抬头反攻。

第四，当时北方局与八路军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政策、个别工作上还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

点。最初我们对于地主，对于汉奸，在政策上有些过分的规定，虽在不久以后，我们自己就纠正了，但下面很久还没有完全纠正。其次，一九三八年春天，党内及军队内曾受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一口号的影响，许多地方不敢放手发展。这个错误，我们不久以后也自己纠正了。再其次，这个时期北方局在晋西停留时间过久，没有迅速到敌后各根据地帮助解决问题，有许多原则问题没有在党的干部中，特别是军队的干部中解释清楚。八路军部队向河北平原及山东深入的时间，也稍为迟了一些。这些缺点，都多少影响到当时的工作。

这就是抗战初期，也就是我们在华北发展时期的工作经验。

三、抗战初期与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经验

一 抗战初期

抗战初期，华中党的工作是由长江局指导的。在长江局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前，中央派了博古同志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指导华中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并派我到中原局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工作。而长江以南及新四军军部的工作，还是由东南局负责指导。皖南事变后，才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因此，抗战初期华中工作的情形，我不清楚。以下的意见，只是我到华中以后，就下层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来加以检讨的，所以还不是全面的。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也是值得商讨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当时长江局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还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华中的工作，只是长江局指导范围以内一部分的工作任务。我在下面所要说的，也只是华中范围以内的工作，而不涉及其他部分。

抗战以前，党在华中的组织基础怎样呢？

一般说来，党在华中的基础比华北更弱，除开南方各省及大别山有不大的游击队之外，只在上海、汉口、河南及徐州等地方有党的很小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大半是新建立的。但是，由于民族革命的来潮和党的工作，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各大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都有党的各式各样的广大的同情者。

在抗战开始以后，武汉失守以前，是华中情况激烈变化着的时期。当时，华中情况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日寇向华中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汉口、杭州、九江、徐州、安庆等城市及华中广大地区，均有失陷的可能。

第二，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国共合作已宣布成立，我党已取得暂时的合法与半合法地位，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第三，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

第四，在敌人进攻下，前线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部分溃散，遗弃大批武器弹药，敌后地区的旧政府纷纷撤退，秩序混乱，土匪纷起，人民恐慌愤激。

在上述情况下，党的工作方针与任务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恢复与发展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抵抗敌人的进攻，推动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进一步的

发展和巩固；同时应将自己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准备与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上，放在敌后的乡村工作上，以便在国民党军队退却之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和势力，用游击战争坚持抗战。

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如何决定行动路线，我不知道。据说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只提出了：发展各地方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阻止敌人进攻，求得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等任务。而对于准备与组织敌人后方和前线的游击战争，敌后乡村中的工作及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则根本没有提出来。据说当时曾有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受到领导机关的反对，说这些同志太重视游击战争了，说敌人是要用机械化师团才能打出去的。很明白，当时华中党的行动路线，与当时中央在抗战初期的行动路线是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华中党在这一伟大抗战高潮时期内，是有成绩的，主要是：第一，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及某些乡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并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帮助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出版了《新华日报》及其他书报，向各方面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等；第二，成立了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不大地发展了新四军，在个别敌后地区组织了党所领导的几个小的游击队，但这些游击队都是用友军的番号。

除开这些成绩外，工作中还有重大缺点，这就是：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

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这就是当时华中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以下的错误观点造成的：

第一，是不了解卢沟桥事变以后民族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和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不懂得根据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与布置自己的工作。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上。在新形势下仍然以非武装的、部分的群众政治经济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就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发生不了什么重大作用。没有注意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没有想到自己如何有组织地独立自主地去参加抗战，而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结果国民党拒绝我们的帮助，并限制和禁止群众的反日运动时，我们自然就一无所有。

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在上海、南京、汉口、徐州及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却时丢弃了数十万件武器及大量的军用品，而敌后又是空虚的，一时什么人也管不到。如果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此时是有决心的，动员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批的干部、党员及非党抗日分子到敌后工作，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们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的时候，组织党员与同情分子一起往大后方退，而不是到敌后的乡村拾起枪来独立自主地打日本。所以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大城市失守以后，附近没有我们的游击队，倒有国民党的及土匪的游击队（我们在这些城市附近的

游击队是武汉失守以后很久才去组织的)。这样，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放过了。

第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在最初一个时期对于抗战形势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估计日本不至于打到武汉来，或者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阻止敌人前进，中国可以速胜，可以很快就驱逐敌人出境。因而他们认为没有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必要。因而他们对于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关系有不正确的了解，不了解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不了解我们在抗战中（至少是抗日初期与中期）只有在基本上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式去参加抗战才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放弃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

在举国一致的抗战中，说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看不见武装斗争，那是不对的。他们看到了战争，也懂得“战争解决一切、一切服从战争”的道理，但他们对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不具体了解敌人是一个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敌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广大中国领土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驱逐敌人出境也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由于敌人是异民族，并且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无法完全控制敌后广大的占领区。又由于中国旧的统治者的腐败，在敌人严重进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崩溃。只有在这种估计下，并从这些具体条件出发，才可能确立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但当时在华中的负责同志并不这样估计，并不承认这些具体条件的存在，认为中国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就阻止敌人深入内地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就不能确立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的方针，而集中力量于如何从正面阻止敌人前进，如何保住武汉，如何很快地把敌人打

退，收复沦陷区；而不集中力量于准备与布置敌人向内地推进以后的工作、武汉失守以后的工作、沦陷区不能很快收复时的工作，从而就丧失了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

其实，在武汉危急时，我们在华中大部地区的中心任务应是独立自主地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其他一切工作（如民运、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都只能是配合游击战争的。游击战争是这些地区当时工作的唯一方向，其他的方向都只能是空谈。当时我们在华中并没有一个正规军队，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都还在国民党指挥下，武汉及其他地方的群众又没有自己起来直接保卫武汉的实力，而我们要在武汉附近及其他敌后准备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又是禁止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除开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以及与游击战争相关联的其他一切工作）外，还有什么实际工作可做呢？这时如果我们不搞游击战争，而要搞正规战争，搞保卫武汉的正规战争，那我们除开向国民党建议，督促与帮助国民党而外，是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的。但国民党不听我们的建议，拒绝我们的督促和帮助。我们的建议、督促和帮助，都只能是空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抗战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正规战，也只有正规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与驱逐敌人出境。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当采取正规战的方式和敌人作战，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将来能够和敌人进行正规战的一切条件，这些都是无需说明的。但是，从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具体条件出发，是不能采取正规战去参加抗战的，特别在华中更无这种可能。而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占极重要的地位，我们又完全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因此只有进行游击战才是正确的方针。然而，当时华中的领导机关对于这种又重要又可能的游击战争不去搞，轻视它，主观地缩小它在抗

战中的重要地位，而去强调正规战，把自己的工作方针和全部希望放在正规战上。结果就只有去依赖国民党，将就国民党，幻想在国民党允许之下，成立若干归我们领导的机械化师团去进行正规战，或者幻想国民党能够允许我们参加他们的军事、政治领导（即所谓共同领导）。这就要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走到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造成上述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执行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他们不是在敌人大举进攻下采用一切办法造成一种形势去逼迫（同时也实行必要的有限度的让步）大资产阶级与我党合作抗日，而是采用单纯让步的办法和在行动上严格限制自己的办法，去企图求得大资产阶级诚心善意的合作。因此，他们就不敢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和允许之外去行事，不敢采取有组织的独立自主的方式去参加抗战，不敢在可能条件下组织一定独立的战线与战区去抗战，不敢组织自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敢用共产党的名义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不敢收编那些愿意受我们编制与领导的抗日部队，甚至不敢拾起国民党军队所丢弃的枪支，更不敢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团结一切抗日阶层与抗日势力，建立在自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民主根据地与抗日民主政权。甚至在国民党采用各种办法来限制我们及向新四军部队实行无理磨擦和进攻时，也不敢采用坚决自卫的斗争方针，而只是一味地让步。因此，就不能不丧失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就不能不助长大资产阶级敢于向我们进攻的嚣张气焰，就不能不脱离广大的中间阶层，而陷自己于严重孤立和危险的境地。

他们不知道，我党与大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带着阶级对抗的合作，是在一种特殊形势下的合作。大资产阶级最初就不是

诚心诚意与我们合作，而是要在合作过程中来限制、削弱与瓦解我们。所以，在这种合作中，我们决不能只用让步的办法，必须进行适当的斗争，必须利用与设法造成一种客观形势去逼迫对方，才能使这种合作继续保持与巩固。为此，首先就必须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以外去发展进步势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必须超过大资产阶级允许范围，利用一切时机去敌后独立自主地建立我们的武装与根据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坚决进行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情势，使大资产阶级不敢轻易反对我们，不敢破坏合作，并不得不继续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独不会促使国共合作破裂，相反，还是保证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果只采取让步的办法去求得大资产阶级的合作，结果不独不会使合作保持、继续与巩固，相反，还会引起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严重进攻，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这一点，不独有历史上的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华中当时与后来的事实也是完全证明了的。然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不懂得这条道理，所以走了错误的道路。

第四，不能不说到华中负责同志的组织纪律问题、党性问题以及思想方法问题。当时党中央对华中工作是有很多正确指示的，华北敌后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广大发展的实践经验，他们是知道的。然而他们不执行中央的屡次指示，轻视在华北实践中已经证明了的经验，而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在行动中坚持自己的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才在工作中造成这样不美妙的结果。

抗战开始以后，党中央关于政治、军事及组织工作的方针是很明确的，有历次决议、决定与指示，并在徐州失守后特别对华中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以后对东南

局及皖南新四军军部又有许多严峻而明确的指示。但是，这些都被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拒绝了，他们坚持着自己的错误方针，这不仅仅是方针上的错误，而且是组织纪律上的严重错误，表现了这些同志党性的不纯。他们强调华中一些个别的特点，说华中没有八路军，华中敌后大部分是湖沼地带、水网地带及平原，华中没有军事干部，华中的国民党与华北不同等，以此为借口，来拒绝中央的指示。很明白，他们夸大了华中的一些局部现象的特点，并根据这些局部现象来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

此外，他们对于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不够，害怕到敌后去活动，对敌后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也是他们放弃敌后工作的原因之一。

很明白，如果他们的组织观念是强的，遵守纪律的精神是好的，党性是纯洁的，如果他们尊重与细心研究并执行中央的指示，停止执行自己的方针，那末他们也不会在自己的工作中造成这样不好的结果。

以上这些，我认为就是造成这时期内华中敌后工作特别薄弱以及其他缺点的重要原因。

二 发展时期

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然而在这时，发展华中最好的时机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来得及补救。

我们到达华中以后，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因此，当时我们一方面布置武

汉附近及豫东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而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淮南路以东的广大敌后地区。如果我们能早将中心移到津浦路附近，那我们就会多做很多事情。以后我又回延安开会，整整耽搁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虽然李先念已经初步发展了武汉附近的游击战争，彭雪枫、吴芝圃发展了豫东的游击战争，而津浦路、淮南路以东仍是没大注意开展游击战争，那里的同志仍在东南局原来路线的影响之下。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这个过分的估计，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敌后地区去。但这时，时机更晚了一些，条件更困难了些。

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和共产党合作，但是它企图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党。所以它对共产党主要是采取麻痹政策与特务政策。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采取严格限制与打击共产党的政策，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从这时候起，国共之间的磨擦，就在各地逐渐发生。又因日寇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而加紧其政治上的诱降活动，国际上又有远东慕尼黑的新阴谋，以及我党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一些恐惧。因此，就使得国内形势逆转，投降、倒退、分裂的危险空前严重起来。汪精卫投降，亲日派活跃，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开始出现，华北敌后不断发生武装磨擦，华中国民党顽固派亦节节向我进攻，强令我江北部队南调，武装磨擦亦开始发生。此时，我党在华中及皖南薄弱的武装力量，有被亲日派反共派包围、孤立和击溃的危险。在国民党地区，我党和进步的群众组织，则受到压迫与摧残，已经开始了民众运动的退潮。因此，我们在华中的工作条件就更困难了。

这时，华中敌后地区的情况也和武汉失守时有了根本的不

同。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惶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这样国民党就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一些秩序，江北自发的人民武装游击队已全部被国民党收编（但在后来又大部投敌当伪军），而我们在敌后则很孤立。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办，我们的方针是什么呢？

我们根据中央指示，揭破日寇的诱降与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动员并联合一切抗日的党派、阶层和人民，反对汪精卫，反对亲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奋斗。我们的行动方针是：（一）在国民党地区，根据运动的退潮情况，适当防御与退却，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隐蔽精干，已经公开及半公开的干部党员，采取某种可能的向国民党抗议的方式撤退。（二）在敌后地区，则准备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战，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不依靠国民党发饷和弹药），准备全国性的及地方性的突然事变，准备实行自卫，克服当前的危险，准备在可能的地区建立一些根据地，并相机挽救前一时期华中工作中的损失。

我们当时在党内、军内传达了党中央在抗战以后的正确路线和我们的行动方针，在党的干部会上报告了目前严重的形势，指出了我们面临着的危险及华中党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全体干部的精神为之大振，深刻地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

政策不是出路，从而高度团结在中央的路线的周围，并为新的任务努力工作。这就在精神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并准备了群众，为克服当前的困难，为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而坚决斗争到底。很明白，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没有这种准备，没有这种明确的方针与坚决斗争的意志，要克服当时的危险是不可能的，当然更说不上创造华中敌后的新局面了。

我们工作的发展获得了超出我们希望以外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正确方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反共顽固派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反共顽固派在一九三九年发动反共高潮，向我华北八路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在我华北党坚决自卫方针指导下，八路军与广大人民坚决斗争，击败了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得不停止进攻。然而顽固派并没有死心。他们以为华中我军力量薄弱，过去又有退让政策，很好欺负，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可以有把握地消灭或驱逐我军，因而就毫无顾忌地向华中我军进攻。可是事态发展的结果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反共顽固派多次的武装进攻，使我们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团结一致与之拼命。在坚决的自卫斗争中，我们的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理直气壮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大多数地方士绅都是同情我们的，有很多人参加了我们的自卫斗争，包括江苏八十四岁的老耆绅，过去做过两任省长的韩国钧先生，都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同情我们方面，指责反共顽固派。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执行了正确的策略，严格遵守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我军的士兵、广大的人民群众、士绅以至国民党军队的官兵都亲眼看到：我们是自卫的，是有理的，是迫不得已的；而反共顽固派是进攻我们的，是无理的，是企图置我们于死地的。到了条件成熟了的时候，我们即向进攻我之反共顽固

派实行坚决的猛烈的反击。在反击之后，我们又进行充分的解释（对自己的士兵、对人民群众、对士绅、对俘虏、对友军、对反共顽固派都进行了解释），释放俘虏官兵，医治对方伤员，并请士绅到对方提出和平条件，说明我们是不愿意自相残杀而放过日寇的。这样我们就争取到了广大的同情者和后备军，而反共顽固派则是孤立的，内部是极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华中的武装力量虽然很小，反共顽固派指挥下的武装虽有二十余万人枪，但在无数次的磨擦斗争中，反共派没有得到重要的胜利，而我们则是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反共派的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样，我们在华中不独渡过了危险关头，而且打开了在敌后广大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局面。我们华中的力量，在一年多的反磨擦斗争中没有削弱，而且发展了。反共顽固派在敌后的二十余万武装，则在磨擦中引起了内部的瓦解——叛变投敌、逃跑，加上战斗中的伤亡，所剩无几。大敌当前，他们无理进攻自家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我们则“因祸得福”，感谢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我们在华中的武装部队很少，但在一定地区有局部的优势，可能独立自主地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三民主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抗战、保卫家乡、改善人民生活等。这样，群众拥护我们，而反共顽固派就嫉妒与痛恨我们，并找借口武装进攻我们。然而群众是明白的，许多群众说：“他们自己不实行三民主义，还要反对人家来实行，真是没有道理！”他们师出无名，其气不壮，在群众中孤立，内部不团结。在这种时候，我们停止了退让，实行了坚决的武装自卫和反击。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失败的基本原因，也是我们胜利的基本原因。我们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发展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经过这样的具体道路：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与坚决的武装自

卫斗争。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没有在大敌当前犯进攻“自家人”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在反共顽固派武装进攻面前，犯毫不抵抗、一味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不独是在对日武装斗争中，同时也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也在对顽的反磨擦武装斗争中，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执行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与组织方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彻底纠正了华中党在前一时期的错误路线，我们才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危险，并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我们的胜利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皖南的负责同志与新四军军部，就犯了这后一方面的错误，他们在反共顽固派阴谋和无理进攻的面前没有警惕性，一味退让，重复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没有在中央的屡次指示之下改正自己的错误，一直坚持错误到底，最后又在军事行动上犯了错误。结果就在皖南事变中遭到惨重的失败。华北华中以及皖南实践的经验，这样明确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谁个违背了它，谁就不能胜利。

反共顽固派的失败，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在每次磨擦之后，我们都向他们提议和平，要求他们停止武装进攻，一切问题用商谈来解决，然而他们完全拒绝。我们在二次黄桥战斗之后，答应让出盐城、东台及其他地区的防地，放还俘虏的师、旅、团长三十余人，退还缴获的武器等条件；请韩国钧先生到韩德勤那里去谈判，要他们停止对我们继续进攻，然而他们还是拒绝了。弄得韩国钧先生也气愤地对我们说：“和平无望！”

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顽固派除开抱怨他们自己以外，还能抱怨谁呢？

由于顽固派不顾大局，在华中进行了一年多激烈的武装磨擦，我们虽然基本上胜利了，但牺牲是重大的。尤其以皖南事变中的损失为最大。同时日伪也乘机利用这种磨擦来加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与掠夺，因而使敌后抗战更加困难。又由于许多反共武装的叛变投敌，伪军增加了，伪化区扩大了，敌人的“扫荡”也加多了。即使如此，华中敌后广大地区还是建立了进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阶层广大人民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建立了敌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武装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的自由及人权、地权、财权等，这就大大提高了华中敌后人民的抗战力量。华中人民和新四军在一起，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有力地坚持着华中敌后的抗战，给敌伪以极大的打击。这就是在磨擦中所引起的华中敌后情况的基本变动。这种变动，将长期影响华中敌后形势的发展，并影响全国形势的发展。这是在磨擦中所产生的积极的结果。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不独克服了当时的危机，而且使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也基本上完成了。前一时期中华中工作中丧失发展时机和敌后工作特别薄弱的缺点，我们也基本上克服了。

三年来，华中工作的主要成绩是什么呢？

由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援助，华中我党我军全体干部、党员和指战员的英勇奋斗，除开个别地区以外，我们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简单地讲，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胜利坚持了华中敌后抗战，严重打击了敌伪。除开皖南与豫皖苏边区外，击溃了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对我军的进

攻，阻止了投降分裂的危险。

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各师作战的情形如下：共作战二千三百九十一一次；缴获枪支二万六千一百八十二支，轻重机关枪六百挺，各种炮四十一门，各种子弹七十八万三千零一十二发，各种炸弹四万二千五百一十八枚；毙伤敌伪官兵三万三千零七十三名，俘虏二万零七百八十二名。我之死伤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八名（皖南事变除外）。

在一九四〇年以前，我军除第五师外，作战情形如下：共作战二千七百零三次；缴获长短枪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支，轻重机关枪四百二十八挺，各种炮五十七门，各种子弹六十六万一千五百零五发，各种炸弹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七枚；俘虏及毙伤敌伪官兵共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九名。我伤亡官兵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三名。

从以上的数目字，可以看出我军作战取得很大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伪，坚持了敌后抗战。

第二，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发动与组织广大的人民到抗日战争中去。虽然政府断绝供给我军一切弹药，但由于这种根据地的建立，仍能保证我军的给养。

根据不完全不精确的统计，可以报告以下的一些近似的数目字：

我军所建立的敌后根据地，面积共约一十八万方里，如加我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则约有二十五万方里，其中大约有十万方里是比较巩固的地区。在根据地内的人口，根据一九四一年向我交纳各种税款及公粮者计算，约共有一千五百万人，约占敌后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比较巩固地区的人口，则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虽然还极不完备，错误还多，但是我们注意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实行“三三制”。我们在各地开了参议会及士绅座谈会等，将党的政策向各阶层人民作解释，消除了中上层人士的怀疑恐惧，他们中有一部分积极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这里至少可以证明：抗日根据地内，在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是可以同中上层人士保持合作的；在与中上层人士保持合作的条件下，仍然是能够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那些认为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就不可避免要与中上层人士弄翻脸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三，发展了抗日武装部队，在一定基础上武装了人民。我主力军之大部经过几年来的战斗锻炼和整训，一般已结束了游击队的阶段过渡到正规兵团的规模。地方军中的一部分已提高了战斗力，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中一部分已能担任战斗任务。

第四，发展与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一定范围内组织了群众，改善了群众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等。

除开这些主要的成绩外，还在各地开展了敌伪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个别地方联络友军的工作亦有成绩。各地党与部队在训练干部方面亦进行了一些工作，在各种学校及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已有数千人。一部分在职干部的理论认识与党性有些提高，在三年的艰苦斗争与工作中，锻炼了我们大批的干部。兵工生产，文教工作，亦已在各地开始进行。

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成绩。一般地说，开辟与发展华中敌后工作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这种任务的完成，抗日民主势力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内的生长与巩固，不会不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军事情况的发展。我军在华中敌后已最后地站稳了脚跟，任何势力企图消灭我们，是断乎不可能的。

了。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斗争以至于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已经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呢？

除开我们最初对于敌人的战略进攻有某些过分的估计，及皖南的负责同志犯了错误，因而受到很大损失外，还有以下一些错误与缺点：

第一，有不少同志在反磨擦斗争中犯了左倾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反共高潮一来，磨擦一起，国民党就完全反革命了，国共关系就根本破裂，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可抛弃，因而在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有的同志在武装反磨擦中超出了有理与有节的原则，只图有利，造成了原则的错误。还有的同志提出了“打倒顽固派”的口号，或把“敌、伪、匪、顽”写在一起，把顽固分子当作汉奸，把中间分子当作顽固分子来对待，甚至还发生个别没收顽固派财产的事情。有的同志向各方面的宣传解释不够，不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个复杂的武装磨擦问题，而是粗枝大叶地随便地处理这个问题，因而引起许多人的误会与自己内部的怀疑。

最初我们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错误，反对在反共顽固派进攻面前畏怯、退却、投降。但后来，在武装磨擦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逐渐地严重起来。因此，我们又不得不集中火力来反对左倾，纠正这种错误。

第二，最初，华中的党、军队和群众团体在筹措给养方面，在收编游击部队与地方武装方面，在处罚汉奸方面，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和华北一样，犯了一些过左的错误，经过了一个混乱时期，引起了社会上某些不安及上层人士的恐惧，个别地方发生地主逃跑等。然而混乱时期一般不长，有的几个月、有的几星期就纠正了。另外有些地方，则由于土匪的蜂起及顽

固派武装的捣乱，这种混乱时期比较长些。

第三，由于我们在华中敌后的军队和党的组织，最初是通过江南、华北及中原各方面的关系去建立的，是各方面合拢来的，各有各的建制及领导关系、指挥关系等，在行动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联系很少，因此，在斗争中就不能彼此协助，不能统一地对付日伪与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而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在统一战线及其他政策上，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常常表现各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与党及政府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党所公布的政策与各部队各机关的行动之间的不一致，因而就给反对我们的人以很多机会来钻空子，进行挑拨离间，引起我们内部的误会。在华中建立统一的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从组织上、行动上、思想上以至供给上、制度上去统一各部队与各地党组织，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工作，并在中央的有力帮助之下，才最后获得解决的。

第四，华中我军是处在民族战争与内部的磨擦战争中。这两种战争，须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须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磨擦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须要统一。而这两种战争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由于客观事物的这种复杂性，再加上我们部队组织及战斗作风的不同，所以，许多军官的军事指挥就难免发生错误，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比如，在几个部队配合作战的反磨擦战争中，有些指挥员用指挥游击战争的原则来指挥部队作战。他们并不严格听从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认为可以打时就打，不可以打时就不打，或随便转移方向，擅自指挥部队行动。他们或者把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原

则机械运用到情况完全不同的华中敌后的反磨擦战争中。还有些同志不尊重上级所给予的战略任务，不肯用一点力去解决战略上关系重大的战斗，而只注意争取战术上的胜利。结果他们虽然在战术上获得胜利，缴了很多枪，俘虏了很多人，战斗次数亦很多，然而局面并没有打开，战略上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形势甚至还弄得更坏。另外有些部队在对日作战中不了解在战略上要统一指挥，而各部队在战术以至战役上要独立自主。他们常常在战略上不严格服从指挥，而在战术与战役上又常常请示上级，甚至抱怨上级对他们指挥太少等。还有些部队在对日伪作战中，疏忽了对反共武装的警戒，或在反磨擦战争中，疏忽了对日伪的警戒；或者不能在一定的时候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而两面同时作战；或者在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时，又过分估计另一方面的夹击危险，而畏首畏尾，不敢下决心，或中途动摇，不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以上这些，就是这个时期华中工作所发生的一些错误与偏向。由于这些错误与偏向的发生，使我们在斗争过程中丧失了一些后备军，在某些阶层的人民中引起了某种程度的隔膜，并给了敌人一些可乘之机，使某些问题不能解决，造成某些僵持的局面，浪费很多时间，使我们以后的工作发生了很多困难。

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磨擦斗争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其他特点，就使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然而，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因此，也就使我们在中下级干部较少较弱的条件下，能够运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复敌后抗日的秩序，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我们的周围，建设与巩固各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

战争。

这就是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基本经验。

本篇第一部分根据《党的文献》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刊印；其他部分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 整风运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

自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二十二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他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风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已经作成此种计划并在

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七十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拖着很长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尾巴，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对于上述新老两类同志（目前着手是对于干部），给予深刻的整风锻炼，借以纠正其错误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关节，坚定其阶级立场与党的立场，改造其工作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正确，或对马列主义武器掌握得较好的同志，则借整风增进他们的修养，可以使他们更趋于进步与发展。因此，凡以为整风是专整下级，不整上级；或专整上级，不整下级；或专整新干部，不整老干部；或专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或专整别人，不整自己；或专整自己，不整别人，都是错误的。

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各地内奸的严重程度虽然不一致，也不是说每个支部都一定有内奸，但就各个地区说来，可以断定，此种情况是无例外地存在着。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

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因此，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表露各种正确的意见，发扬正气纠正缺点。第二，在于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以便根据其表现而给予具体的与明确的纠正，使他们在自己经验中认识自己矛盾着的思想，因而便于克服错误思想，转变为好同志。否则毫无生气的，平平常常的学习，必不能有多大的效益。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使领导机关与广大干部逐渐识别他们。对于内奸分子，凡非军事紧急时机，紧急地点与紧要环节，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做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至于任何同志的

正确意见，更要虚心倾听，绝对不能抑制。

在采取这种政策后，在第一阶段中，一方面正确意见会生长表露，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说怪话、反领导、乃至反党等各种不正确的现象，也会发生。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要使错误思想多多暴露。这一阶段是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强调“四三决定”上要求注重领导一方面，着重发扬正确意见，缩小民主范围，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但须注意这种克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克服，而不是武断的命令主义的克服，不要伤害每一个还可挽救的同志。在这一阶段内，仍然不要提内奸问题。到了第三阶段，是学习党风的阶段，这是学习深入时期，此时大家都接触了实践问题（党风），又有了思想武器，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开展最热烈的阶段。此时除学完党风文件外，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于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作用。在第三阶段中，还应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与改善工作。

这样，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五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作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五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这样，一年以内（除去战争及其他繁忙任务所占时间）可以大体上结束整风学习，而把全部完成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任务，推至以后的时间。延安部分机关学校，一九四三年四月才结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这

些机关学校，从一九四二年冬季才开始着手审查干部，一九四三年四月，才正式审查干部。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但对内奸问题若过于仓卒处理，势必不能彻底，且易发生毛病。内奸的可怕是我们的不自觉，只要我们一旦自觉，内奸就不可怕了。有军队与政权在手，且有内战时期肃反经验的党，是有充分可能把内奸肃清的。故各地在一九四三年冬季以前，必须着重于深入整风，决不可放过整风的伟大思想斗争。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关于处理内奸问题，中央准备尔后再向各地作具体指示。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毛泽东、朱德为感谢印度医疗队援华 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印度国民大会诸先生：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这个医疗队五人均在八路军工作，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医疗队五人中除已先后返印的三人外，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际，我们希望印、华两大民族团结得更加坚固，以便与其他一切反法西斯国家配合作战，借以达到打倒法西斯，解放一切被法西斯压迫的人民，同时即借以解放印、华两大民族，获得两大民族的独立。

谨致

热烈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

朱 德

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军队，也就是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现阶段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的革命不但要驱逐日寇收复国土，还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因此对这种革命军队的管理，应该用革命的原则，这就是在对事对人上用“大公无私”的原则。这一原则相反的是军阀习气，他们对事对人是自私自利的。我们军队是从中国旧社会旧军队中生长出来的，因而不免也有少数人受到这种坏习气的传染，这是应该反对与肃清的。

革命军队组织力量之巩固，是建立在自觉的革命纪律上的，而这一纪律的基础在于：第一，全体军人对于革命对于抗战建国事业抱有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忠诚，因而能抛弃一切一己之私，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第二，在军中——上下一致，以对革命事业之热爱，相互爱护，服从命令，遵守军纪，以达到政治上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在军外——军民一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拥护抗日民主的政府，遵守政治法令，尊重政府人员，爱护民众，因而不致有违反党的政策，或违反政府法令，或违反民众利益之事发生。第三，指挥员指挥之正确，

关心部下，甘苦共尝，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因而获得部下之爱戴，虽挥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样，也只有这样，革命军队的自觉纪律才能巩固，军中团结与军民团结才能加强。因此，革命军队纪律的维持与执行，主要在于教育，奖励与惩戒都不过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奖励使军中知道努力的方向，惩戒使军中知道应避免的错误。对有功受奖者不应放任，应继续教育，促其继续进步；对有过受罚者，不应仇视或厌恶，而应以爱护的精神，教育之，使改正错误。至于混入军中之汉奸、破坏分子，则自应送之法庭，依国法惩处。赏罚公正严明，是革命军队中执行纪律的守则，惩办打骂行为，在我军中早已废除禁止，是自觉的遵守纪律，也只有革命军队中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在革命军队中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恶、生、熟之别，只有大公无私，一视同仁，如家人兄弟一般的工作着，不应有小团体观念和本位主义，才能团结全军，巩固纪律。

对部下的关心，首先，应在政治上注意。举凡有关政治荣誉、政治地位、政治教育机会等问题，切不可熟视无睹，必须认真替部下正确解决。其次，则工作上关心部下，如指导其工作的进行，考察其工作的成绩，表扬其优点，纠正其缺点，帮助其解决工作中困难问题等，使其工作有成绩有进步。最后，才是在物质生活上关心干部和战士，但这也是必要的，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工作是会受影响的。但生活关心的原则应考虑到：（一）保持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二）目前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三）不致影响其他部队其他机关。现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内今年生产的目标是“丰衣足食”，那末一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军队中的管理工作，一般说来将是较容易办好的了。但是无论何时，在我们军队

中，绝对禁止贪污腐化浪费的一切行为。

* * *

我们革命的目的既然在于建设新中国，因此，我们革命的军队就应该学会建设，与人民比赛，学会国家的建设。建设，主要在于生产，分配是次要的问题。不生产，就没有东西可以分配；生产得少，就无论用什么方法由什么人来分配，也都无法分配得好。只有努力生产，努力建设，把生产力提高，使生产的东西多起来，将来才可以经过“各取所值”而到“各取所需”。因此目前大家应努力生产，建设我们革命的家务。目前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多做工作，少得报酬。”

在分配中，目前由于生产力很低，决不能满足一切人的需要，就在将来新中国建设中也不能一下做到满足一切人的需要。因此，平均主义的要求是应该反对的。在供给不能满足一切人需要的条件下，假如有一件好衣服，因为不能平均分配，而把它收起来不用好呢？还是让给我们自己队伍中同生死共患难的那一个战友先用好呢？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说明在生活上平均主义的要求是错误的，永远做不到的。

然而，分配也不能毫无原则“凭心所欲”任意分发，分配应该照大公无私的原则，以革命的利益，工作的需要为标准。为了革命的利益，有时耗费很大笔经费在所不惜（如干部保健，优待技术人员等）；为了工作需要，恢复体力、脑力起见，有时应对某些人多给些或给好些。在这些问题上，绝对平均分配是错误的，过求“节省”实是吝啬，变成了守财奴，这种只有经济的原则而忘记了政治的原则，也是错误的。对于许多特殊问题，应该特殊处理。例如，有病的干部，必须依其在革命斗争中过去的历史与功绩；依其在工作中的岗位与贡献；依其

疾病的轻重等而给予特殊的照顾，如给予适时的休养或减轻其工作，给予临时的保健费以改善其营养，设法给予必要医药等。此外，在可能范围内对干部的婚姻、家属等问题，亦应加以注意。在这些方面，我们过去的注意是不够的。

在分配工作中，供给人员的工作态度是很重要的，如当家人不时时刻刻去照顾群众的生活，改善群众的生活，只是照例办办事，是不行的。如你要就要，不要算啰！或你对我好就给你，不好就不给或少给或迟给，没有东西就不想办法，都是要不得的。供给人员应该大公无私的主动的到部队中去，到干部中去，考察他们有哪些困难，在物质条件许可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多想些办法，替他们解决物质上的困难，主动的设法改善部队的生活，不等人家来要，更不应等人家来催之再三还不理或躲避。如果我们供给人员都能本此原则本此精神去工作，那一定能博得全军人员的赞扬与爱戴的，兵团军政指挥员对于供给工作的指导也应该注意到这一原则。

一切干部，学习用马列主义的原则，学习用革命的办法来管理我们革命的军队，是目前第一重要的事情。

根据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韩德勤 合作问题给陈毅等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

陈张饶⁽¹⁾：

关于韩陈谈话经过电，我们至今尚未收齐，下列意见，望严加考虑：

(一) 韩在今日情况下，如不投敌，是愿意而且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但若情况变化，韩如有了可靠的武力及地盘，即不会和我们合作，并有极大再度反我之可能，因此要保持与韩合作，就决不能让比较大的国民党武装在津浦路东立足，否则合作决不能保持。

(二) 霍守义已扩充成军，八十九军亦将大加补充，再加王仲廉部可能有极大的军力，只要这些部队东进，与韩靠接，韩必背弃一切约言，坚决反我，这时要韩保持中立是决不可能的。因此，不能承认上述部队东进，如我承认，将来它东进，即不好阻止与打击它。你们应阻止一切反共军队东进，这是避免与国民党磨擦及保持与韩合作的必要条件。韩提出顾、霍、王部队东进，是含有阴谋企图的，我们不应相信韩口头或书面约言，而应相信实际事实。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三) 韩在苏北各县，都有他的县长及区乡长与我们县长并立，如我允许他派县长在我所辖之地区活动，则在政治、军事上对我危害极大，因他有合法地位，在人民中有极大影响，我不能与之竞争。因此，凡在我已设县长之处，即不能允许韩再派县长，不能允许一县有两个县长同时存在。韩既要求我撤退在他地区的工作人员，则我亦应要求他撤退一切在我们地区及边界上的国民党县区长及其他人员。

(四) 以上两点望你们坚持不让。如韩对这两条能让步，备忘录的其他各条可以签字，地区的大小，关系并不很重要。如韩不让步，即不签字，采用拖的办法。

书 记 处

十七日

附一：陈毅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

(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

韩副总司令与新四军陈军长鉴于苏北环境艰难，为有利今后抗战大局，顾全现在事实，免除互相消耗，保存国力，共同团结对敌起见，经双方同意定下列事项：

第一条：双方皆本着实行三民主义，团结抗战之精神，消除过去成见和误会，互相协助，以坚持苏北敌后抗战。

第二条：为长久保持友好关系，双方工作人员及家属，互相给以安全保证，严禁所属部队及工作人员互相磨擦，遇有纠纷事件发生，应各呈报上级会同解决。

第三条：双方部队，应随时交换情报，配合作战，互相策

应协助。

第四条：副总司令部允许在总反攻阶段未到之前，除本年二月中旬以前原在苏北之所属各部队及第二挺进军王仲廉部队，二个保安团，及五十五师三个团外，不再策动其他国军东进。如华中时局发生意外变动，双方仍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以免事情扩大。

第五条：经双方同意指定：

（甲）铜灵睢地区暂维现状。

（乙）涟水城、悦来集、老张集、徐家溜、八集、众兴集，沿运河北岸至淮阴城、涟水城之圈线内地区。

（丙）署家桥、马家荡、建阳镇、湖垛楼，夏庄、射阳、宝应南境沿运河至淮阴，沿旧黄河至苏家嘴，咀坎圈线内地区为副总司令部所属部队游击根据地，各根据地内所有党政军均为一元化（但希望该地区之现行制度副总部斟酌予以保留）。在反“扫荡”期间，为适应敌情，必要时得临时向其他地区回旋，反“扫荡”结束后，即归还原地区。

第六条：除前条所指各根据地外，其余各县地区以暂维现状为原则，但各县管辖界限，可由双方派员就地会商，以便分工而免纠纷。

第七条：副总部于第五条所指甲、乙、丙地区之交通联络线及新四军二、三、四师之交通联络线，双方得于经过路西择要设置交通站（该站掩护部队不得超过一个连），并商谈该站附近友军协助保护。

第八条：为表示互助合作精神，双方在可能范围内，各以食粮及军用品等物资互相协助或借买，以利抗战。

第九条：为更能保持合作关系，顾全双方处境之困难与权限立场，对于公开言论不受限制。

第十条：本条款双方均应绝对保守秘密，未得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片面废弃或泄漏公布。

副总部代表 吕汉劲

新四军代表 彭雪枫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四日

附二：陈毅等关于释放韩德勤的经过 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并中央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

华中局并中央：

陈于三十一日与韩谈话，次日韩回拜，宴会后，即送韩归队，兹将办理经过报告如下：

一、韩之表示：

（甲）韩被俘后，见我无害彼之心，深知不与我妥协，决难在敌后站住脚，故决心要与新四军负责人谈判，不得到保证时便不愿离开四师。最初几日见军部无表示，疑我无诚意，一见陈前访甚喜，即欣然出驻并愿共同摄影，成立文件以示互信。彼云：“既对大局有认识，即应以负责态度作去，不虚伪，也不怕责难，故应制成文件，以示准信”。但要求措词不着痕迹，顾及对方立场。

（乙）韩又称：黄桥到曹甸战斗前后，这一时期本人为职权范围，且遭失败，重庆中央又对中共及苏北采取积极态度，同时我引咎自责，中央批准辞职，以王懋功代我；应当时陈军长，曾多方托人向我示意，我认为彼此无商讨余地，且不敢擅

专权，故未理会。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的错。

（丙）此次反“扫荡”前，黄^[2]师长向我示意中，见十中全会的表示，及去年中共“七七”宣言，本人认为国共局面好转，同时中央对苏北，均采取暂维现状政策，本人又处着“扫荡”的环境，故决心容纳黄师长的要求。在反“扫荡”突围之际，贵军确对我有实际战斗配合，认为双方进一步接近，已大有可能。

（丁）因此到山子头时，我对贵军疏虞，认为贵军不会出此，同时本人又不当机立断，以公开面目向贵军谈判，引起贵军问罪，贵军亦打得过早了。因此，我初到贵军，自思本人既无野心，又缺乏能力，本着尽忠职守一点，弄到如此田地，部下又遭惨痛牺牲，确心难堪，我不责人不负责，故愤不欲生。

（戊）继见彭、邓^[3]谈话，贵军确有合作诚意，证明山子头事件，确由于误会，不是专门对我，为着大局着想，不应消极，国共两党宜互相彼此相依靠，国家民族之福，故本人始决心与贵军商讨今后合作事项，能于大局有帮助，于彼此互利原则下，抱定决心干下去。

（己）本来我已遭失败，部下伤亡很重，反而面颜讲和，未免违反人情，但为大局着想，非如此不可。本人决心如此，乃系根据对大局和对贵军的认识，是非一时冲动。假若以后有反复无常，不重信义，本人人格何存，一切请贵军放心。

（庚）韩最后提出一个原则，即今后我承认新四军在苏北敌后所造成的现存事实，贵军顾及我的立场，彼此互相帮助。照陈军长所说的：“彼此以地方的、局部的、中下层的相融，来争取国共全局的好转，不宜在各地制造磨擦，影响大局”。这话我同意去干。

（辛）反“扫荡”后，我防地尽失，部队零散，中央不要我离开苏北，我亦不便离开。我如在苏北时，贵军应予以帮

助，彼此能友好合作；我在苏北亦较小，而对贵军为便；你们地区大，在地区方面，帮助我一些。这一点请贵军吃一些亏。

二、陈谈话大意，与韩之答复：

（甲）陈向韩致歉意，并说明我党我军对抗战合作的基本主张，特别说明山子头事件是由于汤^{〔4〕}部署，一二路东进军入苏鲁，李仙洲进入鲁西，向我八路军教导旅进攻；王仲廉亦整装待发，王光夏突然进入我根据地，捕杀我工作人员，辜负我反“扫荡”中帮助的诚意，不得被迫自卫。但对韩个人，绝无恶意。陈又提到，今后中央军可能大军东进，仍不改变其反共计划，可能因各种困难，故而暂维现状，亦可能进一步好转，双方进一步开始谈判。陈表示极愿从勉维现状，来争取进一步好转，达到全面合作而努力，避免另一种不幸进途，万一不能免，也只有被迫自卫；一面又提出我党整风教育，提倡生产，这政策都说明这是坚持抗战合作，与争取战后合作的真诚表示。因此，对韩无恶意，对共同坚持敌后抗战也是采取帮助态度的，即令将来局面演变，不幸有大规模磨擦发生，也力求与韩能保持友善态度，不受大局牵累，更盼望重庆能诚意解决新四军悬案。

（乙）韩之答复，认为“彭、邓与陈之表示，均坦白诚恳，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韩认为：大军东进不可能，部队小打你们不过，敌后“扫荡”将要更残酷，则大军东进亦非良策，本人今后无力磨擦。

（丙）“如真东进本人劝不住，愿守中立，可以辞职置身事外，本人确抱此最后决心”。又认为：“李仙洲入鲁，其野心甚大，又统有主力部队，好勇急功，可能主动制造磨擦。王仲廉入苏我可约束，其本人反共成见虽深，但力量不大，可能顾及环境，与贵军妥协，我本人当不主动策动东进，但总反攻到来时，则我辈不敢负责了。”

三、双方议定事项：（全文另发）。

（甲）双方本团结抗战精神，共同坚持敌后抗战。

1. 彼此停止一切相互危害行为，万一东进，磨擦不能避免，韩守中立则我军不向其进攻。

2. 双方交换军用物资，如弹药和粮食。

3. 韩要求在运河两岸划给一定地区，且让他总部驻脚，淮东原防相当放大；灵北、睢宁亦划界分治，其余维原状。

4. 双方不伤害其工作人员，遇有下层纠纷，双方上层共同解决，韩要求对其各县长也予以帮助，使其能够站足。

（乙）我们指出：在灵北、运河、淮东之点，控制部队构成一线，另有野心家必加以利用，以配合大军进攻，将来使韩难处。最后我们只答应他在淮东扩大。韩认为：“你们为生存发展而顾虑是完全必要的。重庆许多人对中共的看法也不同，但我本人确无利用贵军合作来进攻的意思。万一不幸，我知所以自处”。同时说：“如运河两岸地区不帮助我，我即无法生存，我曾提议到苏南或路西蒋不准，故非帮助不可”。此一点磋商再四，我们只作原则上同意，在运河东岸划一地区给他，当面未具体规定。

（丙）韩称：“我与贵军一切约定皆有利大局，且不违背双方立场，议定事项本无秘密，公开亦无妨”，但转弯要经过一次过程，故事先与顾⁽⁵⁾商量，顾替我分担一半责任，我才好做。故要求守秘密，我向重庆作各种建议，可能相机处理，此点要求请谅解。

（丁）韩提出：留其参谋长代表总部，雪枫代表新四军会商，成立协定，议定事项，分交韩陈核准，再由韩陈交换一封信，以示同意，即付实现。

（戊）韩宴会后即启行，我们派队送其归队，韩留其参谋

长在此处，接受俘获人枪等事。韩向我借钱，答应送其八万元；并云：以后送还其参谋长，劝告他带去了五万元。韩、吕^[6]两人临行时，要求退还皮包、手表、手枪等。韩态度尚诚恳，分别时表示愉快。

四、对韩之估计和处理：

(甲) 我估计：

子、在目下认为国共大局有好转，可能蒋对共不敢大做。

丑、目前大军东进磨擦不可能，即来，也难制服我军。

寅、本身欲保持其六年坚持敌后的历史，可以备战后之地位，非与我妥协不可。因此，在不根本违反蒋^[7]、顾意志条件下，与我暂时妥协，以维持其本身利益。韩认为坚持敌后，只有他才干，蒋亦难找到人来干。

(乙) 韩仍是随时顾及其立场的，但为私利，不得不承认事实，向我妥协。因此，韩是诚意的，尚不是欺骗，作为脱身之计。在今后不断争取，并在我力量能控制之下，韩亦不会根本坚持其顽固态度。

(丙) 因此，我们决定对韩不宜采取特务政策，而仍本友好合作态度，进行政治争取。

(丁) 估计韩力量不及时，对磨擦可能采取中立态度；其主观愿望仍希望时局好转。一面对韩争取一面提高警惕，不被麻痹，作有力的控制，则可能争取韩为有利时局之一员。

(戊) 我们估计将韩驻地分散，不让其与路西军队直接衔接，同时对东进必采取坚决自卫态度（我们与韩约定除韩直系军队八十五、八十九军独立旅外，一切外系过路不得同意，均要认为是敌对行为，为韩再三要求王仲廉部除外，我们准以只率三个团进驻路东，韩已接受）。

(己) 我们准备划众兴以东淮阴属来翁集以西，老张集、

八集以南，运河、盐河以北等地给韩，以衔接到曹甸原防（此节正确否请审查电复）。韩之要求中，作为立足之地区，似不得不予以局部满足，但不能危害我之战略利益。

（庚）韩要求返防后，其所属部队与各县人员，均要求我方援助。我们已令十旅停止进攻予以协助。

（辛）韩在苏北军计五年，最初辖有一军、三个师、十个常备旅、十个保安旅，迄今总崩溃，转而求我，不能不是反共专家的切身教训。只有力量可以制服反共，也是一个证明。今后韩或积极寻找报复，或转而带一些觉悟，听韩自择。力量与政治争取必须双管齐下。

（壬）在“扫荡”频繁中韩部要依赖我们，可否以新四军让一地区与韩的人情，转向重庆表示，韩在我处已与顾通电，顾回电准其与新四军消除误会，并且将具体情形报告，以便转呈委座云。此节证明顾、韩是一气的。

（癸）“扫荡”前我们与韩谈判配合是对的，但充分缺乏利用此一机会乘其力量削弱之际，驱送其过路西。“扫荡”后，以坚决手段阻止其在洪泽湖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亦是对的，不应该将其歼灭和俘虏，以做到发炮送行为最好。俘虏之后，进行争取，在适当机会送其归队亦是对的，送往苏南，路西均无效。韩转而靠我，此后加重了对韩的政治争取和力量监视的任务，我军在苏北与韩的斗争坚持二、三年，今后或未结束，韩如志欲为蒋之意旨，替他在敌后坚持政治旗帜，今后开展着一种新的斗争形势，即政治军事并用具体形势，以上请予指示。

陈 彭 邓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张云逸、饶漱石。
- 〔2〕指黄克诚。
- 〔3〕指彭雪枫、邓子恢。
- 〔4〕指汤恩伯。
- 〔5〕指顾祝同。
- 〔6〕指吕汉劭。
- 〔7〕指蒋介石。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

一、领导者的定义。

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而且多半已经做了领导工作。所以讲领导工作，是包含了上中下各级领导干部说的。

两岩⁽¹⁾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更非以干部与非干部来区别。今天两岩、报馆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下列几点：

- (一) 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 (二) 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 (三) 要相信群众力量。
- (四) 要有学习精神。
- (五) 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 (六) 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原题为《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

(一) 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 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三) 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我现在按照斯大林说过的三点来加以说明：

(一) 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二) 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首先，要经过组织计划和指示的执行之讨论。次之，要慎选人才，负责计划之执行。再次，要组织斗争，来实现党的计划。又次，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这样，就能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

(三) 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这种审查的方法：(1) 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2) 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3) 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4) 不仅由上而下，还要由下而上地审查；(5) 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6) 要有领导者自己参加。

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

确的。

五、领导者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分开来看，我以为：

（一）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注意大事；（2）提高政治警觉性；（3）提高理论水平；（4）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5）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二）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2）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3）要注意日常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4）要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5）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

（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这也是组织工作之一，不过可以单独来说。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斯大林曾指出用人不依原则的危害于党。他指出这种人到什么地方，都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也批评这种人的不老实，而过去“钦差大臣满天飞”就犯有这种毛病。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

(四) 审查工作。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才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缺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缺点。有人以为这样审查容易暴露自己弱点，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这是不对的。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五) 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 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 倾听群众意见；(3) 向群众学习；(4) 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 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 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 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 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 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七、领导艺术。

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八、工作方法。

（一）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

（二）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

（三）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

（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

九、工作作风。

（一）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三）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即红岩、曾家岩。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何时打败 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

(一) 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这是情况变化宣传必须随之变化的实例。

(二) 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关于此点，中宣部过去宣传要点曾有解释，去秋以来的《解放日报》亦已改变论调。

(三) 但有个别根据地上的领导同志至今还不了解此种意义，不但不去作正当解释，反而机械地继续宣传今年打败日本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的口号，以致引起人们怀疑、提出询问，仍然不知道如何解释，屡电中央询问。这是不知道宣传应随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原故。

（四）今年英、美是否开辟第二条战线，或苏联是否能于今年独立打败希特勒，此时都还不能断定。苏联现在已提出准备决战口号，红军实力已极大增加，故今年打败希特勒有极大的可能性，但也有要待明年才能打败的可能性。如果今年能打败德国，则明年自有可能打败日本，否则还要推迟时间。各地宣传，在目前几个月内不要去强调打败日本的时间，等到欧洲形势充分明朗时，中央及《解放日报》自有指示。

（五）对于过去口号，在疑问者多、需要公开解释地方则公开解释之，仅有个别同志询问者则个别答复之，无疑问地方则不作解释。

（六）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如胜利早临，我们并不吃亏；如胜利延迟，我们早有精神准备及工作准备。

中央书记处

五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 职工运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六个周年。战争的残酷与困难，随着接近胜利而增加，为了克服困难和适应日益残酷斗争的环境，因此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生产、教育为今年的中心任务。各地职工会应根据上述任务以整风精神来检查过去工作及布置今后工作。

在六年的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由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工人阶级不仅获得了政治自由，而且获得了参加政权的管理，虽然处于残酷的战争的环境中，在敌寇烧杀破坏之下，经济生活仍获得了改善，政治文化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职业有了保障，因此提高了工人阶级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作战的决心，发扬了生产的劳动热情。赵占魁运动正在陕甘宁、晋东南、晋西北等各抗日根据地继续开展，于是帮助了抗日政府与军队，解决了某些物质供给的困难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作是有成绩的。

然而在职工运动中仍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在公营工厂中，由于没有充分了解我们工厂的性质，因而不能掌握完成生产计划，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对反革命分子在工业建设上的阴谋破坏，对于贪污浪费，未能进行坚决的斗争，反而采取自

由主义态度（如陕甘宁边区）。国营工厂行政管理人员对轻视职工会的错误态度，未能及时克服。生产计划及管理制度，没有建立在工人群众基础之上，于是影响到工人对于自己工厂的爱护和关心。不懂得我们采取一切必要办法改善工人生活之目的是为着进一步的发扬工人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我们不是仅仅照顾工人眼前利益，同时要照顾抗日各阶级及整个抗战利益。因此不少职工会工作干部犯着经济主义错误思想，在工作作风上，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具体情况，存在着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及在教育工作上的教条主义。这是我们在各根据地今天职工运动中的主要错误和缺点。

为了克服上述错误和缺点，职工运动应根据下述方针进行工作。国营工厂是为革命而服务的，他的目的是为供给抗日政府及其军队之需要；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职工运动的重心应当放在国营工厂，在那里职工会应当同工厂行政一致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为此必须：

（1）在一切国营工厂中，发动职工反对贪污浪费及一切暗害分子损害工厂行为的斗争。工人阶级应当在实践中证明，他的确把工厂作为自己的家庭一样爱护，随时随地注意破坏分子的行动，及贪污浪费，损坏工具原料，盗窃资材，破坏生产计划及劳动纪律等行为之发生；并与这种破坏行为作有系统的斗争。

（2）在国营工厂中，应组织一些生产积极，政治觉悟程度较高的工人，学习赵占魁的劳动态度及爱护工厂的精神，以便普遍地开展赵占魁运动，使国营工厂生产标准及其质量的提高，成本减低，并在生产比赛运动中教育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经过参加赵占魁运动的积极分子，去团结和提高全体职工生产情绪，使全厂生产情绪、使全厂生产

标准比平时提高一步，并坚持下去。

(3) 各地总工会或抗联的工人部，应分别检查各级职工会在工作作风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形式主义，和不了解具体情况、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对于这种恶劣作风，应予以彻底纠正，引导职工会干部学习实事求是、深入群众的作风。

(4) 为了适应战时生产，应坚决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如冬天时间短可利用夏秋时间长来调剂），及半月一次的大礼拜日（即十五天作一礼拜日）；对于足以妨碍劳动政策，障碍国民经济发展的狭隘行会主义、经济主义思想，如只顾工人眼前狭隘利益，不管工厂本身是否可能解决的一些过分要求，应给以适当批评和纠正。

(5) 为了使工人阶级战斗决心的提高与劳动热情之发扬，应当注意改善工人政治地位及其经济文化生活。对于工人疾病及家庭困难应尽可能的为他解决，并经常关心其政治文化的提高。

(6) 对于农业、手工业、店员工人，应根据各地政府施政纲领（如陕甘宁五一纲领，晋察冀双十纲领）规定劳动政策，依照物价之变动，注意劳动合同之修正，一方面注意雇主对于劳动合同义务之履行，同时应保证工人遵守工作时间及工作质量。总之以巩固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战为原则。

(7) 工人教育应当是为了提高生产，因此必须教育工人懂得我们工厂的性质，及建立新的劳动态度的重要，提倡生产技术的学习，教他们学习与生产环境及生活有关的文字。一切与生产及职工生活脱节的教条主义教育，应当废止。至于农村工人，主要是在工余之暇，参加地方一般群众的识字组织。

(8) 为实行群众运动领导的一元化，工农青妇应联合组织民众抗敌联合会（陕甘宁、晋察冀已实行），其内部组织仍保

存其独立分工，以便研究工农青妇某种特殊要求。至于农村工会已由于农村经济之变化，过去许多工人已变成农民，因此，过于零散的工人可编入一般民众组织之内，工人集中的乡村则可单独成立小组，没有工人的工会，应当取消。

(9) 为适合政府及军队之需要，政府所规定之义务劳动及战争动员，如农村工人交救国公粮，义务工役及战争之直接动员等，为了民族和阶级解放，职工会应当发动工人积极参加。

(10) 应当进行调查研究所工厂的生产计划，生产组织，管理情况，工人生活及劳动情绪，以便具体指导生产管理以保证任务之完成。在农业，手工业，店员中，实行一区一乡一市一镇甚至一店铺一作坊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了解农业、手工业、店员工人的变化及其劳动生活情况，同时了解雇主对工人态度及其营业盈亏状况，以便改善对农业手工业工人工作之领导。

这就是各个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工作任务。各地应根据这个方针及当地具体情况，来检查和布置自己的工作。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边区 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

陕甘宁边区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是有长久历史的。无论在组织群众、创造政权、巩固政权、支持抗日，都有相当大的成绩。而这些成绩，特别在创造政权时代，尤为显著。可以说没有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及广大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就不会有陕甘宁边区。

可是由于我们过去群众观点的不足，群众团体性质未弄清楚，群众工作方针模糊，高干会前某些群众工作者，向党闹独立性，强调特殊，自行其是，以及一般缺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埋头苦干、与群众打成一片老百姓化的工作作风，而且又不严重注意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把抗战中后方相对和平环境，当内战的环境。群众团体做了些一般抗战动员工作，而对建设边区特别重要的生产与教育事业的领导，则放松了；党、政、民工作不分，包办，清一色，群众组织政权形式化；干部委派，群众视为“公家人”。而又把乡村环境当城市环境，到处以政治化的模型，去进行工、青、妇自上而下统一的系统的组织，大多数会员是有名无实的。多数群众工作干部，认为自己做群众工作无权，除参加政府工作外，觉得无事可做，因此工作不安心，甚至有个别落伍现象。工作中一般政治空谈多，

民众切身利益少；组织形式多，实际内容少。以上这些毛病，是表现我们群众工作中，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组织上有形式主义，以及领导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的各种倾向存在。因此就使得民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与广大群众日益脱节，也就使得党与群众的联系上，未能更进一步的密切起来。为着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更深入群众工作，巩固边区，支持抗战，西北中央局根据高干会的精神，对边区群众工作，特作如下的指示：

（一）关于群众观点的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专为群众谋利益的，除开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同时共产党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共产党是很难生存的。斯大林同志说：“只要布尔什维克党是保存着与广大群众的联系，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定律。反之，布尔什维克党只要一脱离群众，一失掉自己与群众的联系，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那它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可是这一基本道理常常被我们同志忽视，许多工作中，如减租减息，春耕运动，移民开荒，合作股金，学生入校，锄奸剿匪等等，常常不深入的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来做，而单靠党的机关政权力量来代替包办，甚至强迫命令。结果是明明于群众有益的事情，反而变成了群众的“担负”，群众视为“公家事”于己无关，使运动就不能开展。

我们要使每一运动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就必须采取各种办法，在群众中首先做出榜样，说清道理，使他们从实际行动中了解每一运动的意义及与他们的利益，自己动手来做。群众自己动手了，一切才有力量，才能组织与提高群众。把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作为领导，是完全不对的，是决不能发动群众的。毛泽东同志说：“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而我们同志，现在不但有站在民众之上的观点，

而且还有站在民众之外的观点，这就叫做没有或缺乏群众观点。现在要以整风的精神，从“之上”、“之外”改为“之中”，这是一个革命，这个革命成功，就叫做有了群众观点。群众是主人，我们党、政、军、民机关，都只是为群众办事的公仆。这不仅是群众团体工作同志要这样认识和这样做，而且所有同志都要这样认识和这样做。

（二）关于群众组织的性质与任务的问题。过去把群众团体性质，很简单的认识为政治性的，因此做的事也多是政治空谈。中央九一决定“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自愿组成的团体”。它应该接受党的领导，但不是党民工作不分与包办代替，而是党经过自己的党员与党团去起领导作用。它应该执行政府法令，但不是以政府“公家人”的面貌，去强迫命令群众，而是以群众“自家人”的地位，在群众之中，以模范行为去影响和说服群众，自动自愿的去执行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在拥护政府和军队帮助抗战动员等工作，“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生活”（九一决定），所以边区群众团体组织，决不单纯是政治性的，而主要是经济与教育性的。

至于民众组织的任务，就是要把党的任务在民众中去具体化，去执行起来，变成广大群众自己的任务，使他们从执行党的任务中，自然而然的一步一步的组织起来，提高起来。如当前边区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与教育，民众组织的任务，就是要发动群众把这两个任务具体执行，使它变成为广大群众的任务，造成为一种群众运动。

（三）今后民众团体工作方针。就是要去掉空架子，替群众做实际事；就是要从具体的生产与教育事业中，去联系群众，组织群众，从而又号召群众积极参加边区各项生产与教育事业，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把各项经济、文化事业机关，如

工厂、合作社、学校、民教馆、边区群众报等等，变成为党与民众的桥梁。特别是合作社将是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最主要的形式。农会在未经分配土地的区域，仍有作用，可让其存在，但也应逐渐转向合作社的方向。合作社的指导，将来要移交群众团体。县、分区、边区各级开合作社代表会议，即是群众的代表会议。

（四）群众团体的组织。现在边区工、青、妇各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应自上而下的合并，把领导与组织统一起来，工作在一个机关办，干部尽可能的打入各经济文化机关，不脱离生产，从自己职务中去建立与群众的联系。边区、分区及县有必要脱离生产的，也只须极少数人。现在这些经济、文化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与群众有联系有威信者，即是我们群众工作的干部。

工会、妇联、青救的名义还可存在，但要克服那种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的组织。一切组织重内容，不重形式，有什么就组织什么，哪一名义妥善，哪一方法好（如合作社、纺织组、变工、扎工之类），就用那一名义、那一方法组织之。

（五）群众工作干部的作风问题。要彻底废除政治空谈、政权工作方式及党八股的老一套；要完全养成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老百姓化的工作作风；要切实注意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替老百姓谋利益出主意。老百姓对于自己的利益，在未亲身体会以前，常常是不很相信的，他们必须是已经走过的道路，才敢放胆的走去。因此，我们群众工作领导者的责任，对于每一群众有益的措施，都必须抓住中心，首先党员以身作则，并找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而大，从简而繁，做出榜样来给群众看，使群众得到利益，而又说清道理，使群众相信了，然后逐渐推广之。这就是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道

理。南区合作社每一事业的成功，都是从这样来的。群众工作干部必须生活在群众中，穿老百姓爱穿的衣服，说老百姓能懂的语言，一切生活习惯都为群众所喜闻乐闻，处处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以自己一切的模范去影响他们，建立在他们中的威信，逐渐成为他们所爱戴的领袖。

（六）党要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完全克服群众工作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和对群众工作包办代替或不管的倾向。党要在每一群众运动过程中，去总结经验，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具体领导。各级民众团体的领导责任，主要是由各级党委担负。地委、县委须组织民运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民运工作政策及领导民运工作，民运工作好不好，就是测量党的工作好不好。特别是党的支部是群众的核心，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其基本工作，切实领导，定期检查。支部要指令党员带领民众，去参加各项群众的组织与工作。

（七）以上就是我们群众工作的新方向。要实现这一方向，要克服许多困难，肃清民众工作中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这一新方向是为着加强群众工作。一切以为这是减弱或取消群众工作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西北局责成全体同志去详细研究和讨论，并切实执行之。

西北中央局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

（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中国思想界所以要提出这个任务来，并把它作为中心任务，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战胜侵略我国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使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贯彻到底，取得最后胜利。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思想上分清敌我，不容丝毫含糊，不容在我们的抗战阵营之内还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不但这样，中国思想界所以要提出这个任务来，并把它作为中心任务，其另一重要理由，就是为了将来的建国，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不是法西斯的中国，或类似法西斯的中国。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思想上反对一种误国害民的思想毒素，这种毒素就是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要与这种误国害民的思想分清界限，不容丝毫含糊。只有在思想界肃清了这种毒素，才能够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因此，这个任务，是中国目前思想界的中心任务。

法西斯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同盟各国现在正与法西斯进行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战斗，中国是进行这个战斗的最早一国。六年来的斗争，证明法西斯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彻底消灭这个敌人的。

为了彻底消灭这个敌人，不但需要武装斗争，而且需要思想的斗争，这就是对一切法西斯欺骗宣传的斗争。

一切法西斯欺骗宣传的核心，就是假装的民族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都向他们国内的人民宣传他们的所谓民族主义，但是这与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是毫无相同之点的。

法西斯主义者并不爱他们的民族。

希特勒毁灭了德国，墨索里尼毁灭了意大利，日本军阀毁灭了日本——难道这就叫做爱民族吗？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使最大多数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陷于贫穷、破产、饥饿；剥夺他们的一切幸福和自由，最后又把他们抛入反动的战争的深渊——难道这就叫做爱民族吗？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在他们的人民中间宣传复古、倒退、迷信、盲从、堕落、野蛮、无理性、神秘主义，破坏了德国、意大利、日本原有的进步和文明——难道这就叫做爱民族吗？

法西斯的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摧残民族、掠夺民族、强奸民族的主义。

法西斯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一伙强盗，他们强奸了自己的民族，挖掉了她的眼睛和舌头，并且继续压在她的身上吸她的血，但是这伙强盗说，他们是最爱这个民族，他们是为这个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如果这个被蹂躏的民族起来要求自己的生路，他们就说她是“叛逆”，说她是“分裂”了国家的“统一”。

法西斯主义者所代表的，乃是最少数的大金融资本家。他们公开垄断了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这种垄断比十八九世纪欧

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坏百倍。但是他们却假仁假义地攻击自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他们不要脸地宣布他们所代表的乃是“全体”，他们的经济和政治乃是“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

一百个人里面，九十九个人的利益不代表全体的利益，一个人的利益反而代表全体的利益，这就是法西斯的数学。一百个人里面，九十九个人向一个人要求生存的权利，叫做“煽动阶级斗争”，一个人剥削迫害九十九个人，反而叫做“阶级合作”，这就是法西斯的逻辑。

法西斯最后只有不要逻辑，用极端的唯心论和唯心史观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的概念，人们把握它不是用内在的知觉的报告的观点，而是依据至高无上的信条的观点，用客观意志的观点。它引导个人的提高，使他自觉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员。”

法西斯主义者对自己的民族尚且如此，对旁的民族的蹂躏就更不用说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宣扬的“王道”，我们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

但是法西斯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了。我们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类现在所进行的战争，就是灭绝法西斯的战争。我们叫做民主阵线，因为我们不但现在反对法西斯，将来更反对法西斯，我们流了这么多的血，就是为要实现民主的中国，民主的世界。将来的中国和将来的世界，一定不允许有无论什么形式的法西斯的流毒丝毫存在。

这个思想，在大西洋宪章里已经有了确定的表现。大西洋宪章第六条规定：“待纳粹的专制宣告最后的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缺乏的保证。”以后罗斯

福和丘吉尔又都再三发挥了这个论点。

我们中国不但在拥护大西洋宪章的华盛顿公约上签了字，而且还有孙中山先生全部反对法西斯的遗教。

法西斯主义是否认民族平等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公开宣传非雅利安民族是劣等民族，并且公开侮辱了中国：“真是出人意外，有人以为一个黑人或中国人因为学过德文，预备终身用德语说话，及为某个德国政党投票，就可以变做德国人。这就使我们的种族开始不纯正。”但是孙中山先生却再三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破民族间的不平等，就是要做到中国“同现在列强处在平等地位”，做到“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

法西斯主义是冒民族之名来压迫剥削本国人民的。墨索里尼说：“法西斯革命(?)创造力的根源就是组合的国家，即经济力量完全划一于调和(?)的国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其中是根绝了的。”但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却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密切结合而不可分离，所以孙中山先生批评辛亥革命的根本失败，“就是由于当日同志仅仅知道注重民族主义，忽略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过错”。

法西斯主义既然要“根绝”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也就是要“根绝”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法西斯主义认为民权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认为人民不应该有什么自由和权利。希特勒说：“大多数人不得决定，只有少数人可以决定”，但是孙中山先生却主张少数人不得决定，只有大多数可以决定，主张“以人民为主人，以官吏为奴隶”，主张“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孙先生不但坚持现在是“民权时代”，并且预言民权主义“以后的时期很长远，天天应该要发达”，中国只应该比

法美更进步，造成俄国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希特勒党的政策大纲明白规定着“国家统治一切社会化的企业，如托拉斯等”，而希特勒、戈林、墨索里尼、齐亚诺等也就在这样的“统制”“划一”之下成了最大的财阀。但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却是要“四万万人都可以享福”，要“大家有平米吃”，要“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先生不但在理论上反对法西斯，而且在行动上反对法西斯。中国这样的民族，本是只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但是还在民国十三年，居然就有个买办资本家陈廉伯，为了破坏孙先生在广东的革命根据地，阴谋要求广州成立什么“法西斯蒂的政府”，孙先生不顾某些外国人的压力，毅然决然地反对了陈廉伯，这就是有名的商团事件。孙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一定比以前格外痛恨法西斯，一定是全中国和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急先锋之一。

为了反对法西斯，为了贯彻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中国一切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应该联合起来，应该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反法西斯思想，来加强抗日战争的力量，加强民族团结的力量，加强全国人民为光明的将来而斗争的信心和热情。

在这个反对法西斯的大联合中，三民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亲密的战友，因为无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与法西斯主义不能并存的。

“五四”和“五五”是中国民主思想的二十四周年纪念日，是马克思诞生的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革命根据地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二十二周年纪念日。这三个纪念日这样巧妙地联合在一起，应该是思想界反对法西斯大联合的一个象征吧。

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万岁！
中国思想界反对法西斯的大联合及其胜利万岁！

根据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 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美国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一九三七年以来的六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

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与群众动员，借以达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的到来。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

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

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末，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提议 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

一九一九年，由于绝大多数战前旧工人政党政治破产的结果，组织了共产国际，它底历史任务在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底学说，使其不为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分子所庸俗化及曲解；在许多国度里，它曾帮助先进工人底先锋队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帮助他们动员劳动群众来保卫他们底经济和政治利益，来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所已准备的战争之斗争，来保卫反法西斯主义主要堡垒的苏联。共产国际曾及时地揭发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作为希特勒匪帮准备战争的武器底真正意义。在战前，共产国际早已不倦地暴露了希特勒匪帮在外国的卑污破坏活动，他们是以所谓共产国际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叫嚣，来掩饰这些活动的。

但是在战前，早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个国度底

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

世界各国发展之历史道路底深刻差别，它们社会制度底殊异，它们社会和政治发展水平与速率底不同，以及最后，工人们觉悟与组织程度底各异，也决定了每一个别国度工人阶级面前问题底不同。

过去二十五年事件底整个进程，以及共产国际所积累的经验，已经明确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符合于工人运动复兴初期需要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日益不能适应这个运动底增长和每个国度内日益复杂的问题了，而且还证明了这个形式甚至成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工人政党底障碍。

希特勒匪帮所掀起的世界战争，使各国间情况底差异更加尖锐，它在成为希特勒匪帮暴政承受者的国度与团结在强大反希特勒联盟中的各爱好自由人民之间，划下了深刻的界线。在希特勒匪帮集团的国度里，工人、劳动者及一切忠诚人民底基本任务，是用一切想得出的办法，从内部颠覆希特勒匪帮底战争机构，帮助推翻应负战争责任的各政府，这样来协力击败这个集团。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度里，为求最迅速地摧毁希特勒匪帮集团和建立各民族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合作，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先进工人们底神圣责任，是用一切方法来支持这些国度政府底作战措施。同时，不能忽略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各个国度，也有它们自己底特殊任务。例如，在希特勒匪帮占领了的、和丧失了它们国家独立的国度内，进步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底基本任务，是开展正在成长为反希特勒德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武装斗争。

同时，各爱好自由人民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战争，已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他们不分党派、不分宗教，团结在强大的反希特勒联盟底队伍中。这个解放战争更加明显地说明了，为最迅速战胜敌人所需要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是能够由各个国度工人运动底先锋队，在自己国家的体制内最好和最有成效地实现的。

一九三五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估计到国际形势及工人运动中所已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各支部在解决它们面前的问题时，有更大的伸缩性和独立性——，那时就已强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决定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时，需要“从各个国度底具体情况及特殊条件出发，同时一般地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底内部组织事宜”。

在考虑和批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队伍的决定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遵循了这种原则的。

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者底学说指导下，从不主张保存已经变为陈旧的组织形式；他们永远是使工人运动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服从整个工人运动底基本政治利益，服从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底特点，及由这些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各种问题。他们记得伟大的马克思底榜样：马克思曾将进步的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联合会底队伍中来。而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它底历史任务、奠定了欧美各国工人政党发展底基础以后，马克思鉴于创造民族的、工人的、群众性的政党之日益增长的需要，就实行解散第一国际，因为这个组织形式不再符合这一需要了。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从上述各项考虑出发，并估计到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底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且因在目前战争

过程中曾有若干支部提出解散国际工人运动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事实，但由于在世界战争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乃由执委主席团自身提出下列提议，再经共产国际各支部加以批准：“解散国际工人运动底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一切同道者，集中他们底力量于多方面的支持与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各人民及国家底解放战争，以便加速摧毁劳动人民底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与附庸。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哥特瓦尔德

季米特洛夫

日丹诺夫

科拉洛夫

柯泼莱尼格

库西宁

曼努意斯基

马尔梯

皮克

托列斯

弗洛林

爱尔柯利

（签字）

此决议为下列各国共产党代表所同意：

比安柯（意大利）

多罗列斯·伊巴露丽（西班牙）

勒蒂宁（芬兰）

波克尔（罗马尼亚）

拉柯西（匈牙利）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拟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毛 泽 东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吗？

是的，它是这样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

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四天来各国对于解散共产国际的舆论，综合起来看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一切正义人士，对此举动都交口称誉。但法西斯国家却不同，一切血腥的侵略者，过去曾经订立过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的，现在却似乎不愿意共产国际的解散，你们看奇怪不奇怪呢？他们都异常狼狈地在拼命指责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同盟国中，例如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两地社会民主党中的顽固派分子，从前以“受共产国际指令”为理由，拒绝本国共产党加入该党，现在却又不欢迎共产国际的解散，也算一件小小的怪事。

现在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任务，在于使工人运动归于统一，以便有力地迅速地打败法西斯。此种工人运动中的顽固派，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借口，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说各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中国也许会有这一类毫无常识的议论出现，我们且看一看吧。但是我相信：全中国大多数正义人士是不会附和这种议论的，其理由就是因为这种议论缺乏任何起码的常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

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七一八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 翻译工作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指定凯丰、博古、洛甫^{〔1〕}、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同志组织一翻译校阅委员会，由凯丰同志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及译完西方史两册，以应急需。希望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各同志把这一工作当作对党最负责并必须按时完成的业务之一部分。

中 共 中 央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何克全、秦邦宪、张闻天。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 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根据目前国内外情势，抗战六周年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因此除中央将有宣言发表外，各战略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下列各同志均请作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贺龙、林枫、朱瑞、罗荣桓、陈毅、饶漱石。各同志之文章题目由新华总社另行通知，一般的文长不要超过五千字，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文章望于六月二十日前经新华社电台发总社，经中央审定后统一广播发布。

中央书记处

五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

* 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

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

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

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

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

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现状和我党 工作方针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德怀同志：

（一）有电^{〔1〕}悉，同意对太南处置办法。（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2〕}倒蒋^{〔3〕}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纷争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三）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

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 泽 东

六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对太南的处置办法是：（一）对归马法五指挥的庞炳勋残部，争取其坚持抗战，以免为敌利用。其放弃之安阳、林县地区，我应去建立政权。（二）刘进派特务与我谈判，我采取共同合作，逐步取得优势而巩固之。（三）对孙殿英及其残部，目前不宜正面利用他，但可经过他去做伪军工作。

〔2〕指汪精卫。

〔3〕指蒋介石。

周恩来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后 国民党对我方针和我们目前对策 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

毛主席：

在共产国际解散的提议书到后，我们搜集了两方面情报，于本月四日开南局^[1]会议，估计国民党对我方针，并决定我们初步办法如下：

(一) 估计国民党对我方针：

(甲) 抓紧时机及趋向采取政治解决，辅之以军事压迫。一方面企图逼我们，另一方面暗示日寇缓攻。

(乙) 政治解决以交出军权、政权为主，至少是军令、政令统一，而最高要求亦有可能重演出溶共政策。

(丙) 局部压迫。在军事上，主要在华中、山东进攻；对边区，企图在宁夏方面是其可能冲入的一角；对华北，可能多以伪军作为进攻我们的桥梁。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封锁，有可能经过特务与敌伪合作。在政治上，大后方必更加加强宣传攻势，发展自首运动，特别是秘密突击，以进行秘密暗斗。

(丁) 为加强宣传攻势，对内必着重于理论反共，对外必着重于政策反共（如不打仗，种鸦片、反宗教等）。至要求政权统一，则对内与对外均用之。其方法，如从内部宣传指示，

到公开在报纸、杂志、座谈会、报告、小册子上的曲解、造谣、污蔑、攻击，直到文艺各部门。

(二) 我们目前对策：

(甲) 集中力量，多多反映各方面，主要的是当局方面意见。

(乙) 主动地向各方面主要是国民党方面，多谈论边区问题及其有关问题。

(丙) 对国民党谈话内容，着重在麻痹和分化顽固分子，争取广大同情。

(丁) 对民主运动方面谈话内容，着重在研究民主合作实际问题、道路及实施政策，以教育民主分子。

(戊) 宣传对策：在重庆积极宣传抗战，用各种办法宣传我方抗战及建设成绩，宣传我方坚持团结与民主的主张和事实，宣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辅之以揭发敌伪的某些阴谋和当局政策的矛盾，其方法应特别注意民族化。

(己) 外交的活动和宣传应加紧，更加强和美、英自由主义者的实际的联络。

(庚) 内部组织却应一方面提高我们政治警觉性，另一方面加强我们的责任心和创造性。

(辛) 动员党内外干部讨论问题，并发动他们提出今后意见，尤其是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问题。

恩 来

六月四日 渝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中共中央南方局。

毛泽东关于民主教育谈话 给彭德怀的信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德怀同志：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

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亦不合事实等。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 泽 东

六月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自美总统罗斯福去年宣布以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去年有二十八个国家庆祝这一个节日，纽约曾有五十万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联合国胜利在望，全世界对于这个节日的庆祝，必定更加热烈，更加盛大。

人类的命运，现在处在决定的时机。决定人类命运的，乃是此次大战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次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野蛮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我们中国进行了对日抗战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势武器在敌后坚持至今的游击战争，乃是我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国六年的抗战，诚如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把持国柄，勾结轴心，对外屈辱，对内反共，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作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这种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起就主张的对日抗战乃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主张屈辱投降的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是何等可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我们庆祝联合国的胜利，庆祝人类正义之胜利，也庆祝中华民族的强盛，庆祝抗战的胜利。

反对法西斯，不仅为了人类的现在，而且也是为着人类的将来。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乃是两个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了。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总统与英首相同拟的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人类的四大自由，这就是言论与信仰的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联合国日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在去年今日的演说中，再一次强调了维护人类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说：“信仰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与敌人之主要分野。”又说：“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类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气、日光、面包与食盐之不可须臾或离，剥夺人类所有此等自由，则彼等必将无法生存，剥夺其一部分自由，则其另一部分必将枯萎。”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拥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则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统一字”⁽¹⁾的并吞，对内则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党员所参加的地方政权中，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并把民主政治的原则具体化，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并坚决主张：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这不仅对于现在的抗战有很大好处，对于将来的建国有很大好处，而且对于全人类

也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为我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我国的一切设施会对全人类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影响。

可是，正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时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在我抗战营垒之内，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

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说。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和“盲从领袖”的调调。这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反对太平天国媚事反动清朝的反革命传统，继承了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术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这种中国式的

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污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污蔑了中华民族。

当我们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扫清这个毒素，当然也决不容许它在中国猖獗起来，以致将来再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地步。

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加紧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的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主要的应是为着动员人民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是为着反封建。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斗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

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

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这就会大大的增强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这就会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促进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会帮助奠定将来的世界和平，和独立的新中国之建成，这才会更加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而对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贡献。

根据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八纮一字，日本神道教用语。八纮，泛指世界。八纮一字，意谓兼并全世界成为一个国家。

对华中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

刘 少 奇

(一) 华中各根据地工作是经过如下的具体步骤进行的：第一年（一九四〇年）是以军事行动为主，打开华中各根据地局面，附带建立我们的秩序与进行群众工作；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是以恢复各根据地秩序、建立各种组织为主，并初步进行群众工作；第三年（去年）是以进行群众工作为主；第四年（今年）是以改造政权及建立民兵为主，同时教育干部（整风）与发展生产。这些工作都是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大前提之下进行的，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坚持对敌斗争与达到保存骨干之目的。在第五年（明年），各根据地就应以组织与发展根据地生产为中心工作，以便打下将来坚持根据地的基础。为了这个目的，你们现在应作一切准备。在今年生产中，创造经验，总结经验，使政府和农会工作人员熟习组织群众生产劳动的一切方法，以便在今冬能够定出明年发展生产的实际计划。农会在减租之后，应以组织群众生产及办理合作社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农会工作内容要有切实而适当的转变，不可老照过去一样。政府亦应制订比较固定的公粮、税收政策，保证农民在增加生产之后，不再增加负担，增产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参议会及其

* 这是刘少奇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他政府的一切会议，应以生产为主要内容，其他一切与人民关系很少的会议少开，以便能动员群众的力量到生产上去。各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战斗与工作的条件下，要实行广泛的生产运动，以便增加自给的百分比，而不加重农民的负担。

（二）在进行上述工作中，你们一方面要应付日寇的“扫荡”与开展反“蚕食”斗争，同敌人争地盘；另一方面要在今年明年彻底完成整风与审查干部的任务。因此，你们要好好总结对敌斗争的一切经验，我们亦准备将华北对敌斗争经验告诉你们。关于今年的整风，你们的决定是好的，但必须加紧检查与督促，加强思想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才能贯彻。在整风初期与中期注重整顿学风（文风合在学风一起学习）是对的，但在后一阶段即应注重整顿党风，深刻检查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要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以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反省自己。整风与审查干部的工作，应与生产及对敌斗争联系起来做。

（三）你们是在复杂的情况、复杂的任务与工作中前进，要善于利用时机，使各种工作联系起来进行，而不失去中心环节，要切实避免工作步骤的凌乱，才能按时完成任务。领导要总其成，工作则应分途进行。比如，生产主要是动员群众及战斗员杂务人员去进行，对敌斗争主要是指挥部队、武装工作队、民兵及敌工部门去进行，但领导机关须总结经验，随时给予指导；而整风与审查干部则主要是由领导机关自己来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已经得到各国共产党的一致赞成，而于六月十日经过国际主席团的决定实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整个看法，在五月二十八日已经有所论述，现在专就中国从这件事所应得出的教训，再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共产国际的解散，至少应该使所有中国人进一步认识（或者是从新认识）三个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解散，应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新的认识呢？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中间，它曾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发展条件，但是条件尽管改变，马克思主义却总是向前发展着。二十四年前共产国际的成立，曾表明这个发展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又到了一个更新的和更高的阶段。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为什么都赞成解散共产国际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今后将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继续发展，是有着一致的坚强的信心；这就是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之将在全世界继续发展，乃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抵抗的现象，而决不以任何国际中心

的存在和帮助为其必要前提；这就是告诉我们，中国有些人过去和现在说是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或特别不适用于中国，其所以还存在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者，就因为共产国际的活动云云，这是一种何等的浅见。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并不依靠某种国际性的组织形式，而可以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得到发展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受国界限制的科学，正如地球绕日的学说之不受国界限制一样。革命（这是科学应用于具体国家的具体结果）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但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革命的科学（这个一切先进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必然输出，也必需输入。还在几百年前，明末清初的那些最反动最守旧的昏君和暴君，就已经开始懂得了接受欧洲近代科学的必要，因而改进了几千年来“固有文化”的阴历。辛亥以后，虽然像袁世凯这样愚而好自用的专制魔王，也还知道定“舶来”的阳历为“国历”，以迄于今，未见中国因此丧失半点利权。若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则今日中国自中华民国之“民国”、国民党之“党”以下，各种输入的大小制度办法名目，何止千万？若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科学又不同，则俄国人列宁接受了德国人马克思的主义，大家试看究竟俄国有没有因此而成为德国的“附庸”，如完全“发扬”了独裁者凯撒以来“固有文化”的法西斯意大利那样？老实说，如果腐败的沙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的俄国，没有幸而变为富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则岂但俄国今天确乎要成为德国的附庸，四强弱了一强，即其他三强之命运如何，也正在不可知之数。若说马克思主义尽可适用于其他国家并使其真正富强，独独中国是例外，中国有孙中山主义，而孙中山主义是与外来科学思想不能相容的，这就更荒唐了，这就并不是诽谤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诽谤

本国的孙中山主义了。谁都知道，正是孙中山先生本人，第一个觉悟到国民党改组以前的固有方法不好，因而决心学习俄国革命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方法”。民国十三年孙先生给蒋介石先生的一封信里说：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①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其长，则各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在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

在这里，孙先生不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否和应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做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对于当时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地墨守固有方法，顽固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降心相从”的人，也做了公允的评价，这些结论和评价，都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所一一证实了。

共产国际的解散，使我们对于国际主义也可以有同样进一步的认识。国际主义，并不是共产国际存在的结果，而是共产国际存在的原因。如果这个真理，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有些人还是看不清的话，那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就应该完全看清了。觉悟的人类，有这种国际组织也好，有那种国际组织也好，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国际组织也好，其不分国家民族而团

结一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他们无论有一种什么形式的国际团结，总一定自始至终，忠实于其本民族的真正利益，这也是极其显然的。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个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无奈有些人硬像看见了什么似的，硬说一个国际组织对于一个民族是如何如何的“不妙”。那么看事实吧，以前美国共产党曾不得已而首先退出共产国际，这对于美国共产党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对于（比方说）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国际团结又有什么影响呢？唯一可说的影响，就不过是证明了那些造谣者的破产罢了。

中国现在还有人要趁这个“最后”的机会，伪善地“称赞”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国际主义特别是苏联的国际主义的“结束”。共产国际的解散，确如斯大林所说是“恰当和适合时宜”，而这种宣传，却应该说是极不“恰当和适合时宜”的。这种宣传极不恰当，因为第一，这些宣传者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再一次忘记了孙先生的遗教。孙先生正是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里说：

“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推到全世界，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

可见孙先生自己，就是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于一身的人。第二，这些宣传者自称是国民党人，却忘记了从大革命到抗战，受苏联的国际主义最慷慨最大量的帮助者正是国民党。第三，这些宣传者甚至拙劣地引证斯大林的意见，承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揭破了希特勒匪徒关于所谓‘莫斯科’意欲干涉其他国家生活并使之‘布尔塞维克化’的谎言”，然后又紧接着说，莫斯科过去确是意欲使其他国家布尔塞维克化的，这在逻辑上就不免使自己与希特勒的区别糊涂起来。这种宣传又极不适合时宜，因为第一，现在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说公理与强权的国际战争时代，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都已经联合一致，向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并肩作战，并且正在为最大限度地加强这种战时的和战后的国际团结而努力，因此就应该大大提倡国际主义，而不应该稍微减弱国际主义。第二，即使对于法西斯集团国家的人民和士兵，也只应该大大宣传国际主义，来打击法西斯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争取他们走到反法西斯战线方面来，而不应该相反地和法西斯的反国际主义宣传同流合污。第三，在中国来说，加强国际主义的宣传更是迫切需要，因为中国的抗战正在最困难的时期，不但急须开展瓦解敌军的斗争，尤其急须取得同盟国以更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来给予我们更大的军事援助，在这个时候来宣传中国民族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有何矛盾，与整个反法西斯国际战争的利益有何不相调和，当然是非常有害，应该立刻“结束”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又使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而切实消除过去一切关于它的误解和妄说。今天再没有人能够抹煞事实，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了。审查一个政党的民族化，应该有些什么标准呢？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与这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本心的拥

护；应该看这个政党的主张是否适合民族和人民的需要，能使其达到自由幸福的目的；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确实一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相信和能否发动本民族的人民的创造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赖或等待外援；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而不是坏的，早已过时而应该抛弃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从这所有的标准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最民族化的政党，在中国所有各政党中，它应该考第一名。

共产国际解散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推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国际与国内团结。中国国内团结的中心关键，就是国共两党间的关系。不可讳言的，这种关系今天还有很多缺憾。同样不可讳言的，过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借以反对共产党的理由，就是中国共产党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现在这个“理由”已经消灭了。因为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国际主义而加以反对之不能自圆其说，我们也在前面讲过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迅速地将两党间的关系予以调整和改善。国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利于日本法西斯，但是环顾国内，一方面虽有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和其他英勇军民的艰苦奋斗，虽有陕甘宁边区的积极发展生产，援助前线，改善民生，一方面却是大后方的民生憔悴，士气消沉。这种险象，起于亟待全力准备反攻的今日，真不禁使我们忧心如焚。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国内团结能够增进，一切问题都还是不难解决的。国民党人既然十分欢迎斯大林五月二十八日答复英记者的信，那么，他们当然是准备实现斯大林关于加强反法西斯各国国内团结的希望。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诚心努力与国民党人协商，来共同实

现斯大林的希望，并且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实现蒋委员长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谈话，实现民国二十七年三月的抗战救国纲领，实现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和对共产党“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的诺言。果能如此，则国内困难必可克服，抗战胜利必可促进，中国就算是没有错过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条件，没有辜负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件大事了。

根据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 即胡汉民、汪精卫。

刘少奇关于对付国民党的特务政策 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陈饶：

二十七日电悉。

（一）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并还有成千的特务与自首分子派进各根据地来。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学会反对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的全部艺术，我们一定失败无疑。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特务斗争。但你们今天还绝对不宜提出这个任务。

（二）目前我们对国民党特务还只能防御不能进攻。韩德勤在苏北的武装力量虽已不值得重视，但以这种武装来进行与掩护其特务政策的执行，则对我们是严重的危害。韩武装所经过与驻扎之处，可威逼我之乡保区长及其他党员自首，接受韩之特务任务。你们必须采取办法来防止这点，并审查那些地方的党员，尤其被韩捕后释放之党员。

（三）为了对付国民党之特务政策，我们对俘虏来之国民党军官令其自首（用说服利诱与威逼等办法），使其作我之情报特务是允许的必要的。这与过去再捉再放的俘虏政策并不抵

触。在原则上说，对顽方一切军官及行政党务人员，都可以用各种办法使其为我服务，为我作情报。但采用强迫威逼自首的办法则须选择对象，选择那些在他不肯自首为我作事时我能长期拘押或秘密枪决的人威逼之，不要对一切人都用威逼办法，可多采用说服利诱办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办法威逼之。

（四）特务斗争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细密的科学，须要详细研究和学习。饶漱石在外国当大体知道这种斗争，其方法是极复杂的。你们实事求是的去试办可也。

刘 少 奇

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一九四三年六月)

任 弼 时

二十二年来，我党已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政党，成为今天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为全国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柱，成为广大民众争取解放和胜利的旗帜。我们今天庆祝党的伟大发展，同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要加强责任心、自信心与创造能力。每个党员更应当在整风学习中，努力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这样才能担负起伟大的革命任务，才能有办法克服坚持抗战中的一切困难，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胜利。

为了在整风学习中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我想再强调地提出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的问题。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所以高明，所以领导正确，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我们每个党员是否能照这样去做，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

* 这是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写的文稿。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呢？因为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只有这样做到，才是正确的。而要这样做到便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这就是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又向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我们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因此，毛泽东同志曾不断地指示我们，共产党员要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能正确地去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才能把工作做好。最近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便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完整体现，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在领导方法上的经验结晶。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必须反复钻研去把它弄通，去纠正我们领导作风中尚存在的一些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比如，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行上级一般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不知道只要依靠群

众，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领导方法，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都学会使用。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的问题呢？有些同志在讲哲学时，都抽象地懂得理论由实践产生再回去指导实践，而一到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能正确地使这两者统一起来，不是读了《资本论》不能解释边币、法币问题，不能做好实际工作，便是以为在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工作中，没有什么理论，不能学得什么理论，更想不到可以发展马列主义。其实，我们学习《资本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得到经验，去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在处理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一切实际工作中，要避免盲目地摸索与乱闯，便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当着我们抓到了规律后，便使我们的行动由盲目的变为自由的，有明确的方向，并按一定的计划前进。所以，理论与实践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二十二年来，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是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增添新的东西。必须认识，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一切党的正确决定都有马列主义理论。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

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的革命绝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着基本群众谋解放。而基本群众的解放，又是要他们自己起来动手，才能真正得到的。所以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今天，在我们许多党员干部中还非常缺乏这种群众观念。他们在处理一切问题时，常常表现其观念上没有群众，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众，而没有具体的斗争的群众。他们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没有想到他们所决定的东西，是否符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动员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去实行。他们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因此必然脱离群众，必然发展官僚主义，必然不能做好工作。这种人党性大成问题，应该坚决纠正。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今天在整风学习中，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纠正自己“三风”

不正的一切缺点，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我们便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

毛 泽 东

今天是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的六周年。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打败人类公敌——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

中国的抗战已经六年，就时间来说比别国都更长些。一年以来，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过去是全世界各国被法西斯进攻，法西斯主动地进攻世界的一切国家，并且在进攻中打胜仗和压迫反法西斯国家。这就是过去的情况，就是说是一种不利的、艰难困苦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起了根本的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苏联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太平洋上英、美的胜利，和中国抗战的坚持六年，就是造成这个根本变化的原因。其中特别是斯大林格勒的大胜利，起了转变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过去，法西斯侵略者非常猖獗，主动权握在他们手里；现在，法西斯侵略者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转到了同盟国的手里了。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今后的一年，很可能是欧洲决战的一年。去年我们曾经说过，欧洲在一九四二年即可进行决战，但是后来因为欧陆第二条战线没有开辟，因此没有实现。今年的关键还是这个欧陆第二条战线，它愈早建立起来，胜利也就愈早到来。

我们共产党过去时时指出趋势，指出可能性，为的是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现在同盟国的被动状况已经结束，转到了主动，所以过去只是可能性的东西，今天就要转变为现实的东西了。今天欧洲还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但此事成为现实，一定是不会很久的了，这是今天全世界人类努力的目标。

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地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这样来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

这样比较了过去六年抗战与目前形势之后，可以断定，过去我们所指出的光明前途，现在接近实现了。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可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作一比较，把二十二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作一比较。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就会使我们对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增强信心，我们就知道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否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

首先比较两次世界大战。三十年来世界上爆发了两次空前

规模的战争，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列宁正确地预见，而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斯大林，他们的正确预见，证明马列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那时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别国的很少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那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是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其党员则绝大多数是还不觉悟的。这是三十年前的情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的面貌全变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

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三年，才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相隔不过二十多年，现在它变成了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数。有了一个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旧的俄国经过革命变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世界上有了这一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就影响整个世界，以至现在成为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

再就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于是在东方，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日本共产党于一九二二年成立，印度共产党于一九二〇年成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前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却已经成了这样的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其自己经历的二十二年中，进行了三次大的

革命运动，其中第三次就是联合全国人民组织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日寇。我们现在绝非只是孤立的一个党，而是有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和我们一起反对法西斯，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寇匪首东条爱说什么“十亿民众”，但这十亿民众即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印度的四万万，南洋的一万万人，日本、朝鲜以及台湾的一万万人，实际上都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

现在的中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国相比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的中国没有共产党，人民不觉悟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外国人有好坏两种还分不清，不知道将外国人区分为帝国主义者与善良的工农大众。那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七十年，但中国一般人还不知道它，学校里教员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时，往往连马克思的名字也不知道。那时中国已经有了旧民主主义的文化，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则还没有，那时甚至还不承认白话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参战国之一，可是只替帝国主义者帮了忙，自己的半殖民地地位却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深了。

现在的中国则是抗战的中国，人民觉悟到参加反法西斯的国际阵线来同法西斯作战。有了共产党，文化方面也进步了。我们常常把眼前的许多进步事情当作家常便饭，其实比起从来，乃是改朝换代似的大变化。

由此可见，不仅在抗战的问题上，六年来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就三十年前后的世界与中国来说，也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情景，那是翻天覆地的大进步。这种进步，是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创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来。法西斯

想拉着世界往后退，那是不行的。向前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大方向。

有了大方向还需要有政策。我们的政策可分全国的和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两部分。关于全国的政策，即将发表的我党中央纪念抗战六周年的宣言中，提出了向政府的四条建议，这就是“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办，我党中央去年发表的“七七”宣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战后我们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

我国的抗战，现在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敌后战场的斗争非常残酷，我们共产党在那里做了很大的努力，几年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等等。对于别的地区，我们看见什么缺点，只有提建议，但在边区与敌后则不然，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改正，所以我们应当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抗战六年来我党在敌后与边区的政策，可以分做两个时期来总结，第一个时期是抗战开始后的四年半（到一九四一年底为止），第二个时期是最近的一年半。

在第一个时期中，党的注意力放在下列问题上：如何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发动群众，如何与友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进攻，如何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制定各种政策如土地政策、劳动政策、“三三制”政策等等。这些都是那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四年半的靠后的一年半中，还曾被迫去对付反共分子所发动的两次大磨擦。

在第二个时期即最近的一年半中，除了继续进行上述各项工作而外，又进行了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军运

动。整顿三风这件事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这些工作仍须继续不懈地进行下去，借以保证抗战的胜利。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

毛 泽 东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这段文字，毛泽东要康生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

——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一)

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一八四〇年以前封建制度下的我国，是一定要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推动着人们去消灭封建制度，建立民主主义的新中国，造成生产力顺畅发展的条件。由于我国生产力很低，国家就很贫弱，帝国主义就来欺侮；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着人们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要使民族强盛繁荣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一切社会进化的动力，也是近百年来我们民族所进行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基本动力。这个动力是如此强大，除非任务解决，谁想消除它都是枉然。

太平革命到辛亥革命，整整六十年，我国志士仁人，断头流血，推翻了满清政府。然而，满清政府虽然推翻了，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并未除去，生产力还是不能顺畅的发展，封建势力依然统治我国，帝国主义还是侵略我国。为什么在别的国家，用推翻皇室和建立共和的方法，就足以替资本主义的顺畅发展开辟道路，而在我国却不能呢？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访问各国之后，得出结论说：革命

的失败，是由于“方法不对”。究竟不对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解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指出其应有的特性说：“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的、以及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除了客观的原因以外，还有主观的原因，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方法不对”，换句话说，就是用了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而还没有用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

辛亥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已不适用于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胜利，就是说，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要实行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但要有一个革命的、愿意与无产阶级联盟的资产阶级政党，还要有一个愿意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有了这样两个政党的联盟，并与其他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彻底胜利，才能给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顺畅的道路。

如果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一个革命的、愿意和无产阶级联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一个愿意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党，

它们的出现也是不可抗拒的。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犹之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谁要想取消共产党，就如同谁要想取消革命的国民党一样，都是违反历史发展的笑话奇谈。谁如果当真要来试试，谁就一定大倒其霉。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历史发展还将继续证明它。

（二）

五四运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与以前各个革命运动不同之点，就是有那开始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参加以至领导。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孙中山先生检讨了过去革命的经验，定出了三大政策——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扶持工农运动，这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新阶段，是完全符合于中国人民在这一阶段上的要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这也是完全符合于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有了一个愿意与无产阶级联盟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又有了一个愿意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两党实现了亲密的合作，第一次大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起来，我国民主革命史上就出现了黄金时代。

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我国民主革命中应有之事。孙中

山先生是主张平均地权的人。满清光绪末年国民党办的《民报》上，就以“土地国有”列为六大政纲之一。但是一九二七年，当革命运动发展到必须实际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代表就不惜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屠杀来对付革命的基本群众和共产党。国共分裂，既非共产党人所主张，亦非忠实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所主张，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代表的一意孤行。这就使革命半途而废，这就酿成十年内战，最后几乎招致亡国大祸，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形之下，革命运动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共产党挺身而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使之不致平白断送于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之手，乃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共产党的牺牲奋斗，存亡继绝，保留中华民族的一点元气，保留第一次大革命的一点遗产，那么，今天中华民族是否还能屹然存在于世界上，列于四大强国之林，是很可怀疑的。在这十年惨痛的内战之中，共产党人与忠实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一样，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抱有深刻的义愤，这种义愤是正当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共产党同志，在个别地方或个别时期，由于过分的愤慨，以致感情用事，得罪了中间人士。共产党方面，已经严厉批评了这种主观主义。这是共产党的一方面。在国民党的一方面，革命的国民党员对当时国民党领导者的正确批评，虽然很多很多，但当时的执政者，对于这些忠言，却至今未见接受了什么，反而辩护其当时的一意孤行，似乎违反孙中山先生遗教乃是正当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是深为惋惜的。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首先倡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显然的，当时还要进行内战，不仅抗日不可能，就

算“备战”也不可能。如果说当时继续内战即所以对日“备战”，那就是汪逆精卫“攘外必先安内”的汉奸理论，实无一驳之价值。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为了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不咎既往，这种惊天动地的义举，给了日寇和汪逆精卫的阴谋以粉碎的打击，铺平了团结抗战的道路。接着，中国共产党完全实现自己的诺言，实行三民主义，取消暴动政策，苏维埃制度改为现行民主制度，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在敌后坚持最艰苦的游击战争，牵制敌寇在华一半兵力，以至于今。甚至在皖南新四军被反共分子包围缴械并宣布新四军“叛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以相忍为国，力谋团结抗战为务，使我伟大之中华民族不致沦为朝鲜台湾。这是抗战阶段中共产党的一方面。而在国民党的方面，虽有汪逆精卫的叛国，全党愤然开除了汪逆的党籍，坚持抗战，这是很好的。二十七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也是很好的。内战的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就使得日本法西斯强盗无法灭亡中国，就使得神圣的抗战能坚持六年之久，而且还要坚持下去，就使得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盟各国对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我国被公认为四大强国之一。

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二十二年的经验是什么呢？这个经验就是，在半殖民地的情况下，我们民族的盛衰，系于国共两党的政策，及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两党的政策正确的时候，即是说，在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同时共产党实行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之时，两党的关系就好，中华民族就强盛，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抬高。反之，如果国共两党中任何一个党，破坏团结，则中华民族立即衰弱下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立即降低。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国共两党有最亲密的合作，革

命的发展就最顺利。十六年以后，国民党实行“清党”，内战发生了，国共分裂了，革命也就失败了。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从新合作，虽然不如第一次合作那样亲密，反共分子还闹过两次磨擦，但就足以进行伟大的民族抗战，直到现在。由此可见，为长期历史实践所证明的真理是：为了中华民族，国共两党只应团结，不应分裂，团结越好，中华民族也愈加强盛，反之，分裂则将招致民族的大祸。

（三）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岁的诞辰。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已经进行了足足六年。国际形势对于抗战非常有利，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这是今天好的一方面，对于这一点，谁也再不怀疑。但另一方面，六年的持久抗战，消耗了国力，今天我们遇到空前未有的困难，这是坏的一方面。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大家都要求有个对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早已预见这种困难的到来，首先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下列的政策：（一）精兵简政，组织民兵，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增强抗战力量；（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克服经济困难，提高军民抗战信心；（三）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以减轻阶级对立，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四）建设和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以期群策群力，一致对敌斗争。这种政策的进行，现在已经得到初步效果。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论环境说，是比任何地区更加困难，但经验证明了，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抗战依然可以很好的坚持下去，人民依然可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我们认为，这种政策，不仅可以施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在其他地区也一样可以实行。

我们根据二十二年历史的经验，根据最近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深刻的相信，如果国共两党能够更加亲密的合作，如果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则困难虽然严重，国事无不可为之理，日寇无不可胜之道。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抗战阵营中有一小部分人，竟提出另一种骇人听闻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认为（不管说话的词句是如何避开法西斯三字），中国必须实行法西斯主义。这种人公然赞美希特勒，公然学着希特勒的口吻，喊什么“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倡什么“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盲从领袖”，公开拒绝实行民主，说什么“宪政时期谈不到”。尤其值得骇异的，是公然以新的内战来威胁全民族，说什么“军政时期不能停止”。

为了战友之谊，为了民族大义，让我们给这些人以诚恳的忠告：

第一，法西斯主义，是行不通的。在外国，强国则有德、意、日的例子，弱国则有波兰、罗马尼亚、阿根廷、泰国的例子。在中国也不会例外。况且，经过这次大战，民主阵线是要胜利的。至于人类，因为过去对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估计不足，没有听共产国际的号召，及早就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以致现在损失几千万生命和几万万万的财产。但是吃了一次亏以后，现在也会变得聪明些了，现在谁要提倡法西斯主义，他不但会变成中国人民的公敌，而且会变成世界人类的公敌的。做这样的公敌，弄得身败名裂，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第二，要请这些人冷静一点，替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想想。中华民族要的是抗战，再也没有人喜欢内战了。喜欢内战

的人，大都跟了汪逆精卫当汉奸去了，这些汉奸倒的确喜欢内战，因为内战的结果，我国一定灭亡，这是十分肯定的结论。你既然还是中国人，何苦要中国发生内战，何苦要中华民族遭到新的危机？而且，即使你喜欢内战，你有什么把握人民不起来“予及汝偕亡”？

第三，老百姓要点民主，在满清和北洋军阀时代，要犯杀头之罪，但是现在犯什么杀头之罪呢？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民主，结果一切困难都能克服，试问有什么不好呢？大后方贪官污吏发国难财，军队给养不足，社会颓风日长，人民困顿流离，这种不幸事件，报上登了不少，早已引起广泛的要求民主的呼声，连《扫荡报》都主张“借脑袋”，为什么不可实行些民主，加强团结，整饬吏治，挽救颓风，消除不幸事件，以便克服困难，加强抗战力量呢？

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忠告这些提倡法西斯主义和鼓吹内战的人，你们的主张要不得，如果不改，是会自焚其身的。忠言逆耳，请你们好好冷静考虑。

你们的主张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太平革命以来九十余年，只有主张民主的人会胜利，绝无主张专制独裁的人会胜利的事实。“五四”以来二十余年，只有国共合作对民族有好处，从来未见国共分裂对民族有过好处。希特勒登台十年，固然曾经一时趾高气扬过，但是可以看看他今天怎样了，还不是只有死亡一条路？

你们说，似乎再来一次内战，把共产党打掉，就可以“进行实业计划”。这是要骗小孩的吧？实行封建专制的，前有满清政府，后有袁世凯、曹吴^{〔1〕}军阀，他们谁没有答应过一个“实业计划”呢？试问现在何处去了？希特勒答应德国人，并

吞了全欧洲之后，德国民众可以如何如何，然而现在呢，德国壮丁当了炮灰的已经将及一千万人。法西斯主义者的“诺言”，其结果就是如此。你们想以渺渺茫茫的“几十年的实业计划”，来欺骗青年去进行亡国灭种的内战，不免会弄巧成拙的吧？如果想想将来大批民族之花为你们的空头支票，像飞蛾扑火一样去毁灭，你们自己如有天良，也不能无愧的吧？

老实说，现今世界，牛皮是不大好吹的，大家都是有些初步常识的人了。不信，请看看牛皮大王希特勒、戈培尔的下场。

抗战是要坚持下去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根据历史证实了的经验，我们认为，如能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中的一切困难即可迎刃而解。如果国民党同志准备实现这一条，我们共产党人是竭诚欢迎的。我们早在二十七年我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中，就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过亲密合作的建议。可是这个提议，数年以来未能完满实现。相反，近来那些拥有重兵和大队特务的人，曾经杀过对方大批的赤手空拳的人，并对此种惨杀毫无改悔表示，却叫对方依然束手待毙，这只能欺骗小孩子，这种欺骗自以少做为妙。自己被北洋军阀骂过“割据”与“破坏统一”，现在自己照着北洋军阀的话来骂共产党，敢于诬蔑抗日的民主根据地为“封建割据”，诬蔑共产党人的坚决抗日行为为“破坏统一”，并且威吓着要进行内战，这种威吓吓不了人，亦自以少做为妙。老老实实在执行三民主义上，在抗战和建国的工作上，多做些有益之事，爱惜六年的合作局面，不要轻易毁坏罢。我们共产党的手，总是伸着的，我们希望得到回响。

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坚持

的，因为中国的解放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上就很具体的把这个新中国的道路指出来了：“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

我们相信，孙中山先生奋斗一生，乃是为了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翻遍中山全集，也找不出一句话，可以证明孙先生要建立一个什么法西斯专政的国家的。我们相信，忠实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同志，会同我们一起，建设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规定的三民主义国家。那些企图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如果有人说你忘本，你将何辞以答？

共产党，如同革命的国民党一样，是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要想消灭他是办不到的。想办法曲曲折折的来消灭他，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国共两党更加亲密的合作，来克服困难，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我们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祸国殃民的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吴佩孚。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 纪念宣言*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我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对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了，当此抗战六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愿向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发表自己的意见。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六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现在是处在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这就是：

* 这个宣言是毛泽东起草的，原载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

第一，苏、英、美三国的团结，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加巩固了，法西斯侵略国想用和平诡计离间苏、英、美团结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这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具有历史意义与最值得庆幸的。

第二，苏、英、美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战，将在今后一年中展开起来。这个决战，本来在过去一年中就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英、美未能实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所以推迟了一年。目前则是在苏、英、美三国第一个联合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在苏、英、美三国的陆军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的时候，苏联从东线、英美从西线举行第二个第三个更伟大的联合作战，给予德、意法西斯以最后决定性的打击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只要欧洲大陆上能够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则在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一年中已经建立了打败德、意法西斯的一切先决条件，今后的一年就将是一个决战的年头了。

第三，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有些中国人不希望同盟国先打败希特勒，或者是因为头脑不清醒，或者是因为不愿意希特勒法西斯制度归于失败，也就是不愿意日本法西斯失败，否则是不能解释的。

第四，太平洋上的形势，也因美国力量的增强，英、美联军的几次作战胜利与中国的坚持作战，而转变为对同盟国有利，对日本法西斯不利。美国力量还在猛烈地增长着，日本法西斯虽然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日本法西斯对于美国在一年中制造飞机十二万五千架，坦

克十二万辆，大小军舰二千艘与船舶二千万吨的生产计划，表示极大的恐慌，正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法西斯侵略国方面，则有如下的显著的变化：

第一，是法西斯侵略国已经陷入国际上完全孤立的地位。过去一年中，由于苏、英、美三国对于德、意匪军的第一个胜利的联合打击，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于日寇的威胁与中、英、美三国在太平洋上及中国战场上对于日本匪军的打击与合围，使得所有这些法西斯国家均感到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施行和平诡计，企图离间英美与苏联的神圣的同盟关系，妄想有一方能够和他们订立苟且的和平，以便他们先击破另一方，达到挽救他们自己，并整个灭亡全世界的目的。但是，此种诡计已经遭到英美与苏联一致的坚决的打击，于是不论德、意法西斯，或日本法西斯，就均只剩下“无条件投降”一条死路了。法西斯国家又企图拉拢现在尚未加入战争的各中立国家。但是某些被希特勒们原来希望拉入侵略集团的中立国，现在看见侵略国大势已去，不愿加入了。某些原来倾向同盟国，但因畏惧侵略国的攻势而表现犹疑与动摇的中立国，现在也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这种犹疑与动摇。和平诡计既已破产，拉拢中立国的阴谋又不成功，这样就使一切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第二，是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团结亦已发生危机。在反侵略同盟国的军事胜利与外交胜利的打击下，就使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不和生长起来，并已造成了危机。这个危机，不但生长在德、意两国之间，也不但生长在德国与其各附庸国之间，而且也生长在德、日两国之间。由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与外交失败，希特勒维系意大利、日本及各附庸国的威信已经突然下降。意大利内部正在生长着一种要求退出战争的力量。日本内

部的极端亲德派亦已受到其他派别的排挤，只要希特勒再遭遇一二个如同斯大林格勒与北非那样的打击，日本统治阵营内的任何派别都将不敢再依靠希特勒，不敢再依靠法西斯同盟了。到了这种时候，法西斯侵略同盟不但在其外部处于完全的孤立地位，即在其内部亦将处于各个孤立的地位。这种对于日本法西斯在国际上陷入完全孤立地位的威胁，使得日本法西斯匪首东条在过去一年中，不得不向中国沦陷区及南洋各占领地的民族叛徒们提出了一种所谓“新政策”的无耻诡计，给这些叛徒们挂上“独立”的假面具，以壮自己的声势，并妄想欺骗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匪首东条的所谓“新政策”，不是任何什么有利于日本法西斯的情况的反映，而仅仅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

第三，过去一年反法西斯同盟的伟大胜利，又造成了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军事危机。不管希特勒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再一次向苏联进攻的冒险计划，也不管日本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向苏联进攻或向其他方面进攻的冒险计划，但是“大势已去”的感觉是笼罩着一切法西斯国家的军队与人民，总的主动权是已经落入同盟国之手而离开了侵略国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了。成为战争基础的物质力量，例如人力资源、军备资源与生活资源，同盟国方面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极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对于侵略国已经占了优势；加上今后一年的动员，毫无疑义，同盟国将占到压倒的优势。而在侵略国方面，则德、意的资源已经变到接近枯竭的阶段，日本在生产上亦快要达到它的顶点，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一切侵略国的严重的军事危机。

第四，一切法西斯侵略国，由于它们的国际孤立、内部不和、军事危机这样许多的因素，再因为它们的残酷的惨无人道

的统治，就造成了在它们国内与在它们占领区内的政治危机。一切侵略国家，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裂口，正像火山的裂口一样，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酝酿着巨大的爆炸。这是一支从法西斯脚底下轰掉法西斯的大军，其爆炸的时间，必然在法西斯的内外危机达到其顶点的时候，突然地轰发开来。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一九一八年德、奥帝国主义所处的情境，就会相信这一点。我们也只要看一看过去一年中国沦陷区的民心与日寇军队的兵心曾经发生何等样的变化，就可以推断，这样继续下去，日寇的政治危机的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了。日寇的本国人民是一座火山，日寇所统治的中国人民、南洋各地人民、朝鲜人民与台湾人民，又是许多的火山，只要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在内）给予日寇几个严重的军事打击，这些火山是会爆发起来的。

同胞们！将士们！中国抗战已经六年了，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在抗战第六年中，我们遇到了同盟国与侵略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变到于我们及同盟国极端有利、于侵略国极端不利的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毫无疑问，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敌人与实现解放还须给出绝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胜利与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是反对法西斯同盟的一员，处在现在这样极端有利的

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呢？我们是一个农业国，比不上工业的先进国，但是我们有广土众民的优点，我们的人民又是富于斗争的坚忍性的，六年的抗战就是明显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算是很好地配合苏、英、美各同盟国的作战，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呢？六年抗战中我们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经验，求得比较过去更多的成绩，借以克服现有的许多困难，并在将来对敌反攻时准备好我们的力量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

应该加强作战。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在日寇与汪逆的阴谋勾引之下，最近数年中，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叛卖祖国者，竟达三十三人之多，未闻政府通令讨伐，由是伪军突增，日汪所谓“新政策”的欺骗，得以到处宣传，肆无忌惮。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处置，以振军心而利抗战。为了加强作战，兵役制度的改革是急不容缓的。现行兵役制度中存在着的许多严重缺点，例如捉人、捆绑、贿赂与完全缺乏政治动员等，极大地妨

碍着动员广大人民上前线的要求，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迅速加以改革。

应该加强团结。我们现在不来详说过去数年中以及最近时期中在中国抗日阵线内部曾经发生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冲突、妨碍、限制等等不良现象，而只希望政府能够于今后改革这些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是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支持政府抗战的，为了克服今后抗战中的更大困难与准备配合同盟国实行对敌反攻起见，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

应该改良政治。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政治应该如何改良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曾经发表过许多次的意见了，现在来说这个问题，也还是和过去一样，认为唯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日本侵华军队总共不过三十几个师团，何以我们以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还不能战胜它或取得更大的胜利呢？难道工业不发达是唯一的理由吗？不是唯一的理由，也不是主要的理由，而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因而没有发动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中国和苏、英、美各国是不同的，苏、英、美各国是抗战时间愈长久，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愈增长，中国则反之，大部分地方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了完全不应该的打击与限制，大大低落了，抗战第一二年中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的四年中逐渐看不见了。这种政治上壅蔽抑塞的情形，如不实行必要的改革，则其对于抗战的妨碍将是不可计量的。这种情形，就产生国内各阶级间、各党派间、各民族间的

许多不和睦现象，而抗战是极端需要这种和睦的。我们希望政府能于抗战第七年中，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较之现状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

应该发展生产。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说过多次了。现在经济的严重困难已经发生，如果没有适合时宜的改革，要应付今后愈加困难的抗战与准备有力的反攻将是不可能的。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全国工人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而应该改革的事情是很多的，我们现在只指出上述四项，以供政府的采择。至于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本党在去年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中已经明白申述，并已获得各界同胞的赞成，这里就不多说了。

抗战愈益接近胜利，困难将愈益严重，这就愈益加重了政府与人民的责任，也愈益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上作战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责任是超越寻常地加重了。

在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敌后人民的艰苦奋斗是史无前例的。侵华敌军的半数是由他们之手抗击了六年，并且还要继续抗击下去，直至驱逐敌军出中国。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

军饷的援助，但凭自己的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广大的土地，建立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实行了奖励生产同时又保护工人的劳动政策，实行了鼓励人民爱国心与发扬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因此引起了日寇与汪逆汉奸群的深仇大恨，誓死要消灭他们。残酷的“扫荡”，阴险的“蚕食”，堡垒如林，沟墙遍地，“三光”政策与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无止息的推行，“剿共委员会”的普遍设立，都是为了要消灭他们的。敌后战场上的斗争是如此的残酷，大后方同胞或尚有不明此种情形者。

共产党员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们！敌后的男女同胞们！加强你们的团结，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吧！残酷的战争只会把你们锻炼得特别勇敢、特别坚强，敌人要想把你们屈服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护军队的政策，彻底地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目的。

更好地将敌后战场上的一切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配合作战组织起来，加强对于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技术训练、战术训练与政治工作训练，加紧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反“蚕食”斗争，使一切军事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学会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把反“扫荡”、反“蚕食”的艺术提到更高级的程度上来。你们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能手，你们在六年爱国战争中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全国人民都是关心你们与寄托极大希望于你们的，因此你们要更

加努力提高你们的军事艺术与政治工作艺术，以便配合正面战场上的作战，驱逐敌人出中国。

十分注意争取日军的士兵与伪军，协同日本共产党进行破坏敌伪军的工作，使这个工作极大地加强起来。组织日本工农学校，发展日人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发展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及抗日团体，使这一切力量变成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强有力的友军。

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反对贪污浪费，惩治懒惰分子，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一切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

共产党员还要虚心学习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理论。继续整风学习运动，发展自我批评，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客气与毫不容情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任何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工作，不应该放松你们的学习，你们应该在艰苦的长期的战争中学出超人的本领来。

敌人总是每时每刻地、千方百计地想要从你们的外部与内部破坏你们、消灭你们的，你们要十倍、百倍、千倍地提高你们的警觉性，你们要学会同敌人特务机关作斗争的一切新办法。

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

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当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到决定胜负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坚持的*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

薄 一 波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位于白晋、同蒲两铁路之间，太岳山和中条山两山脉横亘其上，沁水河流贯通于全境，人烟稠密，物产富广，乃抗战形势之地。它已有五年多的抗战历史，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

正因为太岳区所处形势之重要，所以敌人对它十分注意，进攻和“扫荡”频繁。从抗战开始到现在，敌人对它的进攻“扫荡”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我之对敌斗争，亦因这三个阶段斗争内容的差异与根据地发展阶段的情形不同而有所更改。

从抗战开始到民国二十九年上半年止，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敌人经常保持其对根据地一年一度的大“扫荡”。当时情势虽不十分严重，但因我们抗日的经验还非常少，往往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事情（在今年看起来是平常的，如空室清野等），也需付出很大的代价始能学会。这一阶段我之抗日工作，是初试摸索、积累经验的时期，不知道抗日战争的规律，不知道建设根据地的规律，可是“吃一亏长一智”，实际上给了我们休养生息、锻炼军队、学习建设根据

* 这是薄一波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写的文章。

地的机会。

从民国二十九年下半年起到民国三十年止，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敌人对我采取所谓“毁灭政策”，大烧大杀，企图消灭我之生存条件，以达到毁灭我根据地之目的。当时形势比较严重，而根据地的群众又未充分发动起来，社会统一战线又不十分巩固。根据地开始进入正规建设时期，一切问题对我都是新的。敌人给我这一猛烈打击之后（比如二十九年冬天“扫荡”，仅沁源县一县人民被杀死者五千多人，占全县总人口十六分之一，房屋被毁者三四万间，牲口被拉走者七千余头），根据地曾经一度萧条，一部分人抗日情绪曾一度低落。可是多数群众更加痛恨日寇。此时根据地存在严重危险，我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努力，在群众中间进行教育说服，并决定重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和民兵，与繁荣市场，活跃农村。经过这一系列工作之后，群众情绪恢复了，抗日胜利信心更加坚定，抗日积极性更加提高，于是我即进入正规建设根据地的时期了。

从民国三十一年春季开始到现在止，为第三阶段。敌人对我采取“抉剔扫荡”、“铁壁合围”、“驻兵清剿”、“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等等，借以遂行其毁灭割裂我根据地之目的。这一阶段的斗争，是更加残酷和严重了。但由于我根据地的建设略具规模，群众已初步地发动，根据地本身是团结的。由于两年来斗争的结果，根据地比以前扩张了一倍以上，群众情绪更加提高，根据地的各种制度建立起来了，什么都有个政策了。但根据地的游击性也增大了，困难亦比从前增多。可是，同时也准备妥了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些条件。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的坚持，是与决死队的生长和壮大密切结合在一起。但是，决死队是没有经过什么战斗锻炼很年轻的队伍，军队的历史很浅。它只是在抗战开始后才生长起来的。

在山西说来，它还只能算是一支新军，数量也并不大。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山西事变以后，没有谁给它发饷械、弹药，一切供应是没有固定来源的。它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坚持这样严重的和长期的斗争呢？它是用进行坚决顽强的对敌斗争来坚持的，这个斗争又跟群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军队是骨干，群众是血肉，分开来都要失败，结合起来就是胜利。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是从敌人手中夺取回来的，而又与敌人不断斗争中生长的，壮大起来的。决死队从它开始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把带领群众进行对敌斗争，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就把促进民众的民族觉悟与政治觉悟，当成自己首要的任务。这一工作做得是有成绩的。比如去年春，白晋线敌寇为了“蚕食”我沁县根据地，增进三个据点（寨坡底、道兴、余凹），这就是说，敌人“蚕食”了我根据地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当时沁县的老百姓民兵拿起武器，来向这三个据点围困，整整一年的工夫，从未放下武器，敌亦组织不起维持会来。寇军在据点中蛰伏，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要从这个据点送一封信给另一个据点，就必须要有二连以上的兵力护送，否则会被民兵打掉。最近，我乘敌“扫荡”内地，其后方空虚之际，以正规军配合民兵游击队，就把这三个据点歼灭了。比如去年冬，敌寇大举“扫荡”我区后，留置一部兵力，将沁源城及二沁大道（由沁县到沁源）控制起来，这就是说，敌人把我根据地的腹心控制起来了，对我威胁最大。当时群众立即奋起，进行围困沁源城的斗争。二沁大道上的群众全数搬开，到山庄子住，把二沁大道变成一个没有人烟的真空管，把可资敌人利用的东西全部毁掉，把埋藏的粮食全部抢出。沁源的群众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参加斗争了。民兵每天每夜的去进行袭扰战斗，沁源寇兵所需一切均须由沁县运来，但又沿途遭我民兵游击队的不断打击。因此

敌寇的一二百人的行军，不敢摆成纵队，必须排成一宽七里的横队⁽¹⁾，始敢行军，群众把沁源城围困的水泄不通。今年春耕，沁源群众用集体劳动的方式，耕到离沁源城下不到一里的地方。沁源群众春耕情绪，不因敌人占领县城而松懈，敌人无法组织起沁源城及其他地方的维持会来。三、四月间被敌捕捉回去的群众四百多人，在敌人那样严厉拷打下，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投降，没有一个肯出来组织维持会。敌人很难在沁源久住下去。它现在虽以岳北为“剿共实验区”，但我们相信，在军民协力下，敌人的企图是不会实现的。

有人说我们在敌后只是“保存实力，游而不击”。这只是造谣诬蔑。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事实。几年来敌后斗争是残酷的，战争就能存在，不战争就不能存在。“游而不击”吗？你不击敌人，敌人就来击你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来消灭你的。在敌后亦曾经有过一些部队，不游不击，而有时甚至进行一些反共磨擦。这些队伍，有的已经被消灭了，有些投降敌人了，亦有些被迫退出了。以太岳区说，周围有敌据点二百八十八个，经常驻扎敌伪守备军三万人。他们经常压迫袭击根据地，在“扫荡”时，还要从别地调来队伍。不能设想，“游而不击”或者说“战斗不力”，而能够存在下去。

它究竟用什么方法坚持了，并且坚持着这样严重的长期的斗争呢？它是用与友军开诚布公、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坚持的。不应该也不能够设想，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队，同时又要进行反共磨擦，“一身而二任焉”，而能够持久的。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一身而二任焉”的军队，是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决死队从来

就认识真理，它是在坚持抗战，不准备和任何友军磨擦的。因为某种成见所产生的十二月事变，对坚持山西抗战是不利的。但决死队因为它是山西人民的子弟兵，它负山西人民的重托，决不因某种人的某种成见认为是不可消弭的。所以它不计较过去种种，而愿意在抗战和建设山西这个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与一部分抱有成见的人谅解。这一点做得并不坏，有成绩。民国三十年中条山战役后，友军第十四集团军因众寡悬殊，被敌追击。当时，武士敏将军、刘戡将军均率所部转移太岳腹地，我们供给其粮食，并派部队四出游击活动，牵制敌人，与友军以休整补充的机会。后刘戡将军更得我军向导掩护之助力，与我军情感融洽。西渡后，武士敏将军奉命据守岳南，我军岳北抗战，唇齿相关。为了长期坚持抗战，我与武将军曾有口头协定，以后做到：（一）岳南缺乏粮食、布匹、食盐，由岳北给之。（二）双方均为了共同坚持太岳敌后抗战，停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互相攻击，以增抗战力量。武士敏将军曾下令所属各县停止反共活动。（三）互通情报，互派参观团、代表团到对方参观，由是不独上层书面信件时有往来，而下层官兵的友谊亦日臻敦厚。（四）敌寇“扫荡”友军，我军自动增援友军，配合反“扫荡”。老百姓一时誉之为“真正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模范”。民国三十年秋，友军六十一军进驻汾河东岸，因有十二月事变的嫌隙，开始双方皆有戒心，甚至接壤驻防之部队时有小冲突。但因双方均处敌后抗战环境，要求“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最后做到订定抗日现地作战协定：（一）双方各守原防，除在必要时可超界对日作战外，平时各不相犯，如遇敌“扫荡”友区时，另一方各有协助之义务。（二）双方在各驻防地区之政治文化教育之实施，均有自由权，不得互相破坏，互相攻击，并可互派代表参观。（三）互通情

报，共收联区联防之效。这一谅解成立后，双方关系尚称密切。友军渡河后，所留李汉一部衣服、粮食等，均由我方供给，保持从来的友好关系。

至于与八路军的关系亦堪称模范。十二月事变后，我在军事上、物质上均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八路军朱、彭^[2]总副司令给我们以莫大帮助。在敌人“扫荡”时，敌人进攻的重要方面的任务，由八路军来负；次要方面的轻微的任务，才由决死队来担负。八路军是一个穷队伍，但当我们非常困难时，衣服、粮食和一定的菜金还由他们来帮助。我们决死队是一支新军。它帮助我们以真正的友谊、作战训练和教育。决死队想不到自己要做的事情，八路军倒代为想到了、筹划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团体，能够这样地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我们不必讲这决死队对八路军有特别的好感，但这是由八路军自己的好换来的礼尚往来。如果人家待我以礼而我不以礼往，那就不是人。

有人说我们在敌后进行“封建割据”，这只是造谣诬蔑。从敌人占领区中“割”出一块土地，来作为抗日根据地则有之，“封建”则未也。我与周围抗日友军向来是守望相助、互通有无，毫无封建的事实。根据地一切所实行的法令政令，都依据三民主义之最高准绳而制定者。我们在坚持抗战中，正在建设民主政治，坚决反对封建。但是我们却非常注视建设根据地，把它视若珍宝。因为没有根据地，就等于军队没有休整补给的地方，人民就失所凭据，失掉抗战信心。武装抗日斗争与根据地脱节，就容易失败，所以非要根据地不行。

它究竟用什么方法坚持了，并坚持着这样严重的斗争呢？它用密切群众关系，改善群众生活，发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来

坚持的。今天所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基本上是一个农民战争。如果不能把占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发动起来，抗战胜利就会是一句空话。为了改善群众生活，提高其抗战热情，我们是从几方面着手的：（一）从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来着手。我们实行了二五减租，我们实行了分半减息，既改善了群众生活，又照顾了地主的利益。在减租减息以后，人民生产情绪提高了，保证军粮民食；人民积极地参加了政府工作，参加了民兵，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大地活跃起来了。（二）从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上着手。我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数，只占巩固的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二点八。在一九四二年，比一九四一年全区人民负担减少了一百零八万四千七百元，公粮减少了五万四千六百二十石。目前部队生活是艰苦的、困难的，但我们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以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坚决地这样做了，并保证以后不再增加负担。（三）从发展根据地生产事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着手。主要是农业生产。去年秋后到今年春播中，全区共垦荒地（包括熟荒在内）七万五千亩，开渠一千一百五十里长，变旱田为水田者一千顷，每亩增收粮食三斗，即增收三万石。今年是生产情绪从来未有高涨的一年，这主要是由于减轻负担的政策刺激和鼓励，其次是合作运动。合作运动才在开始，还没有显著成绩，但蚕、丝、铁、锌、纺织、油坊、粉坊、运输等业合作社所吸收的合作社员业已有几万人之多，资金在一百万元以上。

在游击区、敌占区施行善政，除暴安良，特别帮助群众减轻对敌负担。在敌占区，有这样的特点：“谁能替群众减轻对敌负担，谁就是群众领袖。”我们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武装工作队结合了民兵不断地打击敌人的抢粮队、配给制度、以及各种勒索，从各方面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为了群众的利益，不惜

牺牲一切。这就把群众团结到我们这方面来了。沁源的群众说：“决死队给我们心都操碎了，我们死也愿意同他一道死！”我们与群众关系的密切有如此者。

现在太岳区的群众生活，在八路军、决死队上述的政策下，大加改善了，因之群众的抗战热情也提高了。岳南和中条的群众这样说：“过去我们拥护八路军和决死队，是因为它抗日。今天拥护它，则因为是我们的队伍。”“八路军和决死队的好处，不只是不支差、不打人，而是在乎他是和我们老百姓的利害是一致的。”这些话透露了我们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有人说我们在敌后进行的减租减息就是“共产”。这只是造谣诬蔑。减租减息，只是把过去那种过重的封建剥削稍加减轻，相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还保证了交租交息，使地主收入也有保证。这对佃户和地主都有好处，为抗战所必需。自实行这一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后，农民对于生产的积极性是提高了。农民说：“这可合理了，咱们要多多生产，保证军粮民食！”地主的抗日积极性也提高了。全区开明地主运动的内容是：（一）拥护抗日政府土地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二）拥护抗日政府一切实施，积极参加政府工作。（三）按期交纳公粮和合理负担。（四）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工作。（五）举办合作事业，开渠开煤。（六）转变土地经营形式，改变过去出租土地、坐收租子的经营形式为雇工、加肥、深耕的新经营形式。这一运动说明什么呢？说明敌后并未“共产”，地主并未消灭，而且抗日政府的设施对于他们亦是有利的。这样，大家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地主和农民较前团结了。

我们坚持对敌斗争，与群众密切结合，坚持统一战线，实

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用这样方法，团结各阶层坚持着抗日根据地。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 〔1〕原文如此。
- 〔2〕指朱德、彭德怀。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刘 少 奇

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的政党，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二个周年了。这是伟大的二十二年。在世界上，在中国，无数的伟大事变是在这二十二年中经过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三次伟大的革命战争。第一次大革命与北伐战争及现在还在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进行的，而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则是在我党单独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三次革命战争对我党来说是没有间断地连续进行到现在。许多共产党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放下过武器。在这一点上就说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是与武装斗争分离不开的。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它经过了多次的胜利，也经过了多次的挫败。它走着非常迂回曲折的道路，以至于今日。它屹立于伟大中国的国土上，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

* 这是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写的文章，原载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解放日报》。

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与历史事变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正是因为它走过了各种迂回曲折的道路，经受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所以它也就把自己锻炼得特别坚强，它也就具有各方面的特别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可以说，它在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共产党都经历了更多的重大事变，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论是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国内战争的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公开的与秘密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党外的与党内的……各种复杂形式的革命斗争，我们的党都经历过了，都有丰富的经验。而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我们的党有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把它总结起来。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这些经验的马列主义的总结，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只要我们的党员能够真正懂得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那他们就会增加无限的信心与勇气，就会把自己的工作大大推向前进，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推向前进。他们就能够避免许多在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使工作过程与革命过程缩短许多。必须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果。如果抛开如此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如果轻视我们党二十二年来在伟大历史事变中的斗争经验，不用心研究这些经验，不用心向

这些经验学习，而只去学习离开我们较远的外国革命经验，那就是轻重倒置，那就要使我们再走许多弯路，再受许多挫折。

二十二年来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是极丰富的，是各方面的。现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说明。但是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何者又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与假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是在中国革命群众中，并在中国共产党内多年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如果我们的党员不了解这种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标准，而不自觉地盲从在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去进行革命，那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事。这种经验应该是我们党的各种痛苦经验中最痛苦的一个经验。过去我们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党内存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地盲从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以至使这些人占据了某些组织某种运动的指导地位，甚至在某些时候占据了全党的指导地位，因而把革命运动引上痛苦的困难的道路。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引为深戒的一个痛苦经验。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以及宣传组织工作的能力，并不弱于任何一国的共产党。我们对于各种工作，历来就是做得很好的，可以几十万几百万地组织群众，可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可以在敌后那样艰苦与没有任何援助的条件下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战六七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革命精

神与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很可钦佩的。然而我们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关于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在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在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还不免发生错误，因而就使运动遭到部分的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应有的损失。这一个历史教训，我们必须记取，并且必须在今后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在各方面不发生严重的原则错误，那就等于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革命精神与艰苦工作精神，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指导，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地走向胜利。

然而，要怎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各方面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不发生严重的原则错误呢？这就须要我们的党员首先是我们的干部能够辨别马克思主义的真假，就须要在革命的队伍中，在党内，粉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派别，就须要很好总结我党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就须要很好地进行学习，提高我们的嗅觉，就须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

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就有真假两派马克思主义者。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充满着这两派斗争的历史，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同样充满着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这是我们一切党员必须认识明白的。

还在二十多年前，斯大林就很确切地描写过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现把他的全文引在下面：

“现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底旗帜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可是，这两派人究竟还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两派中间，还横着一条鸿沟，因为，两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照例只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会或者不愿意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或者不愿意实行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们不拿经验，不拿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工作的根据，却拿那些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来做工作的根据。他们不在分析实际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却在相同的事情和历史上相像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言行不符——这就是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们总是灰心失望，始终都是不满意于那个常常欺骗他们的‘厄运’。这一派人的名字，便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就是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西里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给了这派人一个很中肯的估计，他说：这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问题的重心，由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而移到实行马克思主义，移到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实际。规定适合于环境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因环境发生变更而变更这些方法和手段，就是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这一派人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而是由研究周围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在工作时，他们不是拿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是拿实际经验来做根据，拿经验来审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来学习和教导别人去建设新生活。所以，在这一派人的工作中，言行总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学说，完全保证着自己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说过，我们不应当仅限于说明世界，而且应当更进一步去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遵守这几句话的。马克思的这几句话，完全和这一派人相符

合，这一派人的名字，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人的组织者和领袖，便是列宁。”

斯大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两派人虽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做工作，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两派人的工作方法，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一派人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孟什维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们照例只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实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教条。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不拿经验与对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根据，而拿书本来做根据。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从分析具体实际生活中去求得，而是从书本上、从历史上相像的事情或相同的事情里面去求得。他们言行不符，口讲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做的就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是愚弄他们的，他们总是灰心失望，死气沉沉。

另一派人，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他们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他们特别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法的时候，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里面去求得，而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不拿书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并拿实践经验来审查自己每一步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和教育别人来推动工作前进。这派人言行一致，口讲马克思主义，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仅说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去改造世界。他们经常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

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也就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李立三路线，就是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教条主义。这些机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必须明白，必须提高警惕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一条孟什维主义的路线及其思想体系的。从陈独秀、彭述之、李立三以及后来的各种机会主义与教条主义，他们在各个时期中的各种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在组织上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联系，然而他们的实质，他们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是基本上相同的。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有其一贯性的，他们给予党的损害，给予中国革命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

中国的孟什维主义，除托陈取消派有其欧洲托派的衣钵真传外，其他形态的孟什维主义，是并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及俄国孟什维克衣钵真传的，而是从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中，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自己生长出来的。所以这些人与欧洲社会民主党及俄国孟什维克比较起来，在形式上有许多特点。这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在形式上是以“反孟什维主义”出现的，是以“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等等形式和词句出现的。他们在这些美丽的形式和革命的词句掩盖下，来进行实际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来宣传与实行实质上的孟什维主义。再由于我们许多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低下，嗅觉不灵，不能在实质上辨别其为孟什维主义，就

常常为他们那些美丽的形式与革命的词句所蒙蔽。他们就能够一时地取得许多党员和干部的赞成，而攫取到全党的或某些部分的领导地位。他们还特别发展中国半封建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并与中国社会中的流氓手段相结合，如是他们在党内的为害就特别严重，就特别表现其肤浅庸俗，表现其两极性与两面性。这就是中国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特点。

中国党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但存在着中国的孟什维主义体系和传统。

对于这种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假布尔什维克，是不能仅仅从他们的词句，从他们表现的形式去识别的。他们可以在言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有更多马列主义，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更革命，然而他们最怕实践的考验，最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因此，必须从他们的实践中，从他们的工作中，从他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中，从他们工作结果的检查中，去识别这种人，去暴露这种人的真相。他们是口头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马列主义者，他们的实际行动照例是不受马列主义原理的严格指导的。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总是拿书本子做根据，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拿什么决议上的条文来做根据，即是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论来做根据，而不拿实践中的经验和对于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根据。他们在解决问题、决定方针的时候，总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调查研究周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从历史上的类比出发，或者从苏联、从西欧各国、从其他什么相像的事情出发。他们在实践中是唯心论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是常常要犯错误的，是不能最后把工作做好的。他们在实践中的结果，是必然要与他们最初的愿望、最初在口头上的宣言相违反的。如果注意到他们的工作

方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及其结果时，就会暴露他们的本质。毛泽东同志在整顿三风报告中，对于这种人是有过严格批评的。

然而，这种人的危险性，就在于他们那大堆的马列主义的词句、布尔什维克的外衣及其先天的两面性。他们可以吓唬及蒙骗许多工农同志及幼稚的青年同志，甚至就是很老练、很有工作经验、但理论上的识别能力还很差的同志，也常常被他们所欺骗所俘虏，因而他们就可以把党的事业弄到很危险的地步。

党的过去的历史，是充满着布尔什维克路线与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是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是极端丰富的。在这种斗争中，党内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路线，虽然也曾经在几个短的时期内占了上风，得到过暂时的胜利，但大多数的情形总还是把错误路线克服下去。我们的党虽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错误路线，但是对思想上的孟什维主义的体系，总是没有彻底加以克服，没有彻底加以清算，没有给它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打击。因此，这种思想，这种传统，总还是在党内残存着，到了某个时期某种条件之下，它又发展猖獗起来，危害我们的党。

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只有这样，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维护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

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在艰苦复杂伟大的时代中，很好地实现我们先进政党的历史使命。

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反映，是它的一种高级表现形态，是成了某种体系的。要清除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思想及其体系，就要在党内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清除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要使我们的党员能够在一切形态上区别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有些地方还正在做，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去年以来所号召的整顿三风的运动。这种整风运动，是党在二十二年的历史中空前未有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批评运动。它使我们的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空前地推进了。我们应该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而总结我们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思想体系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把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党的建设上今天的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体系及其传统，决不能成为党在思想上的体系及其传统。党的历史，是与这种体系、传统作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历史。为了肃清这种传统的残余，给这种传统以暴露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没有必要替它掩蔽，替它否认，否则，对于党是有害无益的。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但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应该更加提高警惕的是，敌人派遣了一些特务分子混进到我们党内来，这些人也是以马列主义伪装起来在党内出现的。他们与前一种假马列主义者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对于这种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把他们清查出来。这就要在党内分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在党内肃清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则是在党内分清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这两种界限都应该分清楚，但分清的方法和手段应该不同。前一种是用审查干部和党员的方法来分清楚，而后一种则是用整风与总结经验的方法来分清楚。

用马列主义来清算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及其体系，清查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巩固党提高党的两大工作。这两大工作的胜利完成，我们就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我们就能以完全巩固、完全准备好了的姿态，迎接伟大光明的时期的到来。

掌握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武器，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残余，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朱德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西安胡副长官宗南兄勋鉴：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边区留守部队，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吾兄前派胡、侯^{〔1〕}二兄来延参观，备致赞美。嗣接尊电，拟再派侯兄驻延联络，德等当即表示欢迎。不料近日形势大变，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

朱 德

午支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胡公冕、侯声。

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

——为抗战六周年而作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朱 德

一 六年抗战的回顾

我们中华民族抗日的神圣的爱国战争，已英勇地进行了整整六个年头。所有已往的牺牲，准备着我们最后的胜利。六年来，我国军民，不顾武器的不精锐，准备的不充分，奋然起来单独抗战，首先抵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经平型关一胜，台儿庄再胜，打击了日寇疯狂的锋芒。经过一年余的坚决抗战，停止了日寇的战略进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寇国内困难的增加，战争就转入相持阶段。这期间日寇虽曾发动过十数次对我正面的战役进攻，和数千百次对敌后的残酷“扫荡”，但均遭我国军民奋勇抗击，使敌寇灭亡我国的企图，终于破产，而光荣的抗战，竟坚持了六年。如果总结六年抗战的伟业，应当指出：首先敌寇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我国的计划，宣告破产，一改为一年，再改为十年，到东条内阁时则更改为“百年战争”了。就是说时间愈久，则敌寇泥足愈深。这是第一。第二，由于我国六年的抗战，特别是敌后普遍的游击战

争，以及最近十九个月来我盟国的积极动作，使敌寇战线延长。在陆地上，北起蒙古沙漠（包头），南至孟加拉湾（印缅边境），在大洋上则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迄新几内亚，各数千里之长。就是说敌寇树敌愈多，战线愈广，则兵力愈散，弱点愈多。第三，敌寇南战于南洋，北战于阿岛，特别在华北华中敌后数十万哩地域内，到处都有我军与游击队民兵的抗战，使敌寇在这广大的地域中，无时无刻不被迫进行战斗，最近一年来，敌后战斗，每日竟达六十余次之多。就是说战斗愈频繁，敌寇人力物力的消耗愈浩大，因此战力减弱，战斗士气消沉，悲观情绪高涨，厌战自杀之事日有所闻。伪军之动摇反正，亦愈来愈多。第四，由于我国军民坚持了六年抗战，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起来。百年来我国人所力求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已大体废除，我们已基本上取得在盟国中的平等地位，而日寇则反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

二 六年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 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一）在对敌作战上：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曾给予敌寇在兵力兵器上以很大损失，并使各地敌军无一刻安静休息的时间，我们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达六万六千次以上，杀伤与俘虏日军约达三十万人，还钳制了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已打了半数以上的敌人。为了坚持这六年的敌后抗战，我们曾付出极大的血的代价，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这六年中阵亡与失联络的指战员共达十三万七千余人，六年来伤亡总数则为三十八万余人。由于我们在敌后给予敌寇以不断的打

击，也扰乱了敌人所谓在东亚作战的“兵战基地”，这对于盟国抗战，或不无贡献。在对敌军工作上我们进行了许多次政治攻势，使敌军士兵厌战情绪为之大增，我们从战场上争取了许多敌国被迫来华作战的青年，争取他们到反战同盟中与共产主义同盟中，并开办日本工农学校，帮助日本革命者训练这批青年；在对伪军的争取工作上，我们也做了许多成绩，使伪军更加动摇到我们的方面来。（二）在收复失地团结敌后人民上：我们在敌战区中，收复了许多领土，在这些领土上，恢复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政权，同时并把这些政权建设成民主的政府，实施民主政治，使各阶层抗日人民，都有四大自由与三权（人权、财权、政权）保障。这种政府，在敌后同伪政权对立起来，那些伪政权是专替敌人作虎伥，以镇压人民抗日，和掠夺本国同胞的壮丁、妇女与财产的。这种对立与对比，使敌后人民更加向心祖国。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能够团结敌后所有抗日的人民一心一德，共同抗战，能够提高敌后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能够加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些地方，建设成为坚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支持我军在敌后的长期抗战。（三）在打击敌人经济掠夺与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上：由于我军的积极动作，并与敌后人民密结在一起，组织起无数的游击队与民兵，到处袭击与破坏敌人，所以使敌人在华北华中占领区中的物质掠夺，受到很大的打击。敌人拼命推行其所谓“治安肃正”与“强化治安”运动……正是最好的证明。同时，我们也在自己的根据地上加紧经济建设，用自己动手的方法，发展公私生产，一切军队、学校、机关在不妨碍战争的条件下都动员起来参加生产，以求自给自足。政府、军队、党的机关，都积极帮助农民、工人提高生产，实行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实行

减租减息，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使根据地经济建设焕然一新；一面则同敌人进行经济斗争，反对敌人经济封锁与破坏的阴谋。

三 我们曾遇到哪些困难？ 我们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敌后残酷斗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度。胜利更加接近，则困难亦将更加增多。具体表现为：（一）敌寇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如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来把我根据地分割破碎（特别是在冀鲁平原上），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根据地之封锁，使我军被迫分散，而活动与转移渐加困难。（二）敌寇对我军作战，由围攻到“扫荡”，最近更用连续“扫荡”、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奔袭等战术，来求消灭我军、“蚕食”我根据地。虽被我军不断打败，但我之消耗因之加多，缴获因之减少。（三）敌寇实行“三光”政策，大杀我人民，大捕我壮丁，以摧残我根据地内的人力；大烧我房屋，大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物力财力。我方虽实行坚壁清野、空舍等工作，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不免遇到困难。（四）我军之弹药、被服、医药、粮饷等等，三四年来的不能得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种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数十万大军，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恐怕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然而这确是我们抗战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说是奇迹。然而我们还是克服了上述这些困难。我们看清敌后更加困难的环境，采取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我们实行精简政策，实行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而灵活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之

“维持”政策，以对付敌之“蚕食”政策；我们以军民密切合作，广泛组织民兵与武装工作队与更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对付敌之“三光”政策；我们以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生产运动，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无饷无弹无衣无药等困难。这样坚持了敌后六年的抗战，保存了我们主要的根据地与我军的精锐，并还能给敌寇以更多的打击，更好地建设自己的根据地，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抗日军队，保证我们的胜利。

我们为什么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坚持敌后的抗战呢？我们之所以能不被这些困难屈服，反而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坚持了六年苦战，是因为：第一，我们下定了决心。我们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生存，下定决心，宁死不屈，坚持到底。我们看清国内外环境，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们上下一致，军民一心，咬紧牙关，忍苦耐劳，牺牲一切，只求胜利。因此，我们能克服困难，坚持苦战。显然地，如果我们队伍中容许悲观动摇的情绪存在，如果我们遇到困难而屈服，那末我们敌后抗战早已不能继续了。第二，我们坚持进步。我们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与各界各军的团结，彻底实行“三三制”政权与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政策；我们彻底实施民主政治，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等自由，都有人权、政权、财权、地权等保障，因此，我们能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同情与协力。显然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实行一党专政，那末，我们敌后的根据地，也早已不能存在了。第三，我们自己动手。我们素来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辅之以争取外援。我们虽然得不到武器、弹药、器材、医药、被服和饷项的接济，虽然得不到外界物质的援助，但我们依赖军民一心，自己动手。我们发动生产运动，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人民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军队实行

爱民，人民实行拥军，军民相互帮助，大家努力生产，以求达到“建设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同时我们提倡节约，节省开支，反对贪污腐化，严办贪污分子，以求节流。因此，我们解决了军民的衣食问题，我们也生产了相当数量的医药和弹药，以维持抗战到今天。敌人和汉奸亲日派希望我们因无饷无弹而被消灭，但我们依赖了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了。我们敌后根据地在敌人严重封锁与破坏中，还能够依靠自己动手，求得自力更生，自给自足；那末我们全中国人口这样多，资源这样富，贤能这样众，如果能够全国实行生产运动，严惩贪污分子，以求自力更生，又哪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呢？自然，我们敌后各根据地还有许多困难，还需要力求外援，如果我们能得到我们应得的接济，相信我们必能给敌人以更多与更大的打击。今后第七个年度的抗战中，我们希望能加强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的更密切的策应和配合，希望能给敌后抗战以必要与应有的援助。我们全国也有许多困难，也需要友邦的援助。如果我国能得到更多的援助，我们必能进行战略反攻，并配合盟国，打败日本法西斯。我们也希望美、英、苏等盟国能加强对华的援助，以便予日寇以及时的打击。第四，我们实行精简。我们看清抗战的局面，看清敌后的环境，所以我们彻底实行精简政策。在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中一律实行精简，使我们军队精简后能更适合于今天敌后的军事行动，使我们党、政、民在精简后，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民负担。由于实行精简，使我们能抽出许多人力，用于前线战斗单位中与后方生产战线上，使人力能更合理地使用，也使许多人能各得其所。显然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末部队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经济将会更难维持。第五，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

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的基本原因。

四 前途的瞻望

抗战六周年的今天，在盟国方面是：中、苏、英、美及其他同盟国相互间的空前团结，军火生产力大大超过法西斯国家，战争经验逐渐丰富，战略行动配合一致，并取得了斯城、北非、瓜岛、阿图等地的伟大胜利，开始进行战略总反攻。在法西斯强盗方面是：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内部困难更加增多，欧洲占领区中各国人民武装反抗与罢工、怠工、逃亡已成群众运动，军火生产由于盟机轰炸而开始减低，人民中胜利信心已被悲观失败情绪所代替，德意之间及其喽啰们之间的龌龊和德日之间的矛盾日益露骨，而日寇的困难则更多，主要表现于：（一）由于战线之延长，占领区之辽阔，无可避免的引起陆地上兵力分散，海洋上运输困难，加以日寇造船业既不如英美之发达，钢铁生产又不足，遂使日寇的船舰成为最大的困难。（二）六年来我国的抗击，与一年半来英美澳等盟军的打击，已使敌寇战斗力逐渐减低，这不特在陆战是这样，而在海战与空战中也可以看到。（三）六年战争也使得日寇国内经济走上困难的路上。（四）由于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加强与作战胜利和我国的坚持抗战，使日寇的战略地位陷入不利的形势中。（五）由于英美苏的团结及已开始联合作战并在斯城、北非取得伟大胜利，使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受到严重的打击，今后还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因而就使得日寇在

国际上陷于更孤立的状态中。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第七年抗战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能善于研究自己六年来的经验，能使全民族团结于神圣的爱国战争中，发扬全国军民的人力，能善于与友邦团结争取外援，则我们的抗战必能得到最后胜利。敌后的抗战，虽然还将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但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些办法可以推行于全国。我们有了有利的国际形势，又有了这些克服困难的办法。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够胜利。这是我们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们有办法能够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解放日报》
刊印。

新四军在华中*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陈 毅

一

“七七”抗战爆发，我党即在东南各大城市进行抗战动员及组织工作。随着徐州、武汉的沦陷，我党即留在敌后，由城市转入农村，去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掀起华中人民武装抗日自卫的浪潮。一九三八年，新四军奉令东征，与江淮河汉各地之人民武装汇合，更加强了敌后抗日阵线，由零星游击武装，变为集团的抗日部队，指挥统一，地区联系，各种战争建设次第兴办，蔚为大观。而敌寇之“扫荡”，亦日益频繁。自汪逆精卫粉墨登场后，更以“反共”、“清乡”为敌寇“扫荡”之前驱。战局之紧张，斗争之艰苦，物质补给之困难，诚为前此所未有。本年恰为抗战六年度，亦即新四军东征后之第五年，抚今追昔，训诫良多。试略举敌我一年来军事斗争之诸大端，为本军同志告，并以就正于国人。

二

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去年夏，敌寇以独立十

* 这是陈毅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写的文章。

二旅团南浦部队为基干，向我长江下游苏中区进行“扫荡”，六月开始进攻南通、海门、启东地区，七月转至靖江、如皋、泰兴，八月九月转至高邮、宝应、兴化，并第二度进攻南通、海门各地。敌之锐利武器为水行利用装甲汽艇，陆行利用装甲汽车，水陆配合，且有大量土著伪军配合，运动迅速，刀锋深入每一农村角落。我一师粟裕部，经四个月血战，始于十一月初制止其“扫荡”凶焰。北面敌寇于九、十月之间，大举“扫荡”山东我一一五师地区后，十月、十一月以十七师团小林部队为基干，徐州为指挥中心，大举“扫荡”淮海地区及淮北泗水地区泗阳、宿迁、灵璧诸地，兽蹄所至，并及于津浦路西之凤阳、怀远、定远诸地，敌伪动员数达二万余人，继续“扫荡”亘二月之久。我三师黄克诚部、四师彭雪枫部、二师罗炳辉部，均轮番与敌伪纠缠。敌虽曾占我中心地区，终在我苦战之下，不得被迫撤退。去年十二月为战局比较安定之月份，但敌寇是时正转移兵力进攻大别山及豫南友军李品仙、汤恩伯诸部，本军决心自动配合。我二师罗炳辉部、七师傅秋涛部，在淮南路两侧及巢湖、桐城之线，予前进敌军之后路以袭击；我五师李先念部在黄冈、黄梅及平汉线上发动游击及破击战，均收效甚宏。敌虽占领英山、潢川、罗山、商城、固始、立煌诸地，然历二十余日之激战，终在我国军抵抗及我军配合夹击之下仓皇撤退。

当大别山战役进行之际，一月初，敌伪不断在南京进行“扫荡”新四军及鲁苏战区副总部韩德勤部队，公开广播东京报纸社论，连篇累牍讨论“扫荡长江下游中匪军之必要”，且谓“予韩总部、苏省府及新四军军部以毁灭性之打击，是粉碎英美反攻的太平洋总力战之必要部分”，又谓“长江下游富于食盐棉花粮食等战争物质，实不容渝、共盘踞其间。如让其坐

大，将为皇国百年大计之祸患”云云。敌寇鉴于多年“扫荡”之失败，转而与汪伪协商对策，选定人员，专门研究中国内战经验，尤注意于江西时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的研究。敌寇二月间草定之进攻计划纲要，其为日后攻战所证明者，其概要如下：敌寇判断鲁苏战区副总部及省府与新四军军部均集结于旧黄河与射阳河之中间地带，东至于海，西至运河、高邮湖，两部常在该地带流转。敌寇决心以三个师团之兵力，进行大举包围，由西向东，由南向北，以实现歼灭我军于海滨之迷梦。敌寇计划之毒辣，于此可见。敌寇之准备迅速就绪，于二月十二日即开始进攻。北面出动之敌，为十七师团，由淮阴、涟水进攻，南面之敌为十五师团、三十五师团及独立十二旅团，由兴化、盐城北攻。十七、十八两日，敌寇即在阜宁城、东沟、益林、凤谷村、曹甸一线上，完成其合击计划。本军三师黄克诚与韩总部互为犄角，策应得力。韩部于二十日后分批突围，渡运河西移。敌寇乃以全力“扫荡”我三师部队，及于整个盐阜地区。敌方分布据点构成大小包围圈，敌人大小合击数十次，企图打网收网，期一举而得鱼。我军反击突围，时分时合，忽现忽隐，敌我双方极尽其纠缠、迂回、扭打之能事。当此之际，我一、二、四师粟、罗、彭诸部，出动部队，援助友军，打击敌进犯军之后路。在路北侧翼，二月二十四日，彭部攻克泗阳之洋河镇据点，韩部突围路经此间，彼此配合，恰收协同对敌之效。韩楚箴⁽¹⁾先生曾驰书致勉谢。我们深感援助友军，共同杀敌乃我们应尽之责，本军愿以更大之配合期诸将来。二月二十三日，我一师粟部攻克南通东北曹家城、孙密等地，二师罗部乘虚以奇袭入淮阴城内，夺获敌马匹甚多，淮安、淮阴两城闭门数日。敌寇正面进占盐阜区，既难于站稳，而翼侧又受威胁甚大，顾此失彼，乃被迫撤退，敌寇

宣称之盐阜滨海“扫荡”遂于三月中旬结束。敌寇于三月中旬，自信其可靠之侦察，判定本军军部西移皖中无为、桐、庐之线，并以另一部南移苏南之茅山地区。敌寇不愿休息，复于三月十七日以大军进攻我三师之巢县、无为地区，并在苏南茅山地区加紧其第四期“清乡”，此为盐阜区大“扫荡”之尾声，亦即敌伪夸称对新四军之穷追计划。

巢南战局至四月初略趋平稳，而苏南敌伪之“清乡”工作，则已进至所谓第五期矣。我六师谭震林部活动于苏南地区，出没南京、镇江城下，穿插京沪线上，为本军斗争最艰苦之区。一年来经过四次“清乡”，至今尚在坚持不懈中。

敌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于“扫荡”盐阜区后返驻苏中，即于四月初连续进攻李明扬、陈泰运、黄逸峰诸部。我粟师迭与配合，不分畛域，使本军地区友军能够自由转移，能够获得必要供应。李、陈两将军与本军抗敌合作之亲善关系，诚为敌伪所嫉视。此种抗战中的真诚团结，应随斗争的愈加紧张而愈益巩固。敌之独立十二旅团长南浦，乃敌方专任之公共指挥官，进驻苏北已历三年，日与本军接触。三年来其所属五个大队长，保田阵亡，石井负伤，部队消灭近三分之二。发动伪方向我军“清剿”，为南浦得意之作，南浦亦以此自夸。今则以“清剿”苏中，历未完成任务，复与伪方矛盾加多，不能协作，南浦因此去职，继任者传闻为小林师团，伪方为张北辰。我一师在苏中之反“清剿”战斗必更加紧，可以预测。

我五师李先念部队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则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亦五年矣。今春二月十五日，武汉敌寇向长江与汉水间之三角地区进击我国军一二八师王劲哉部，沔阳以西地区失守，我五师即在汉川、天门之线进袭敌寇，给友军

以支援。迄三月八日，敌寇发动长江南岸攻势，分五处于岳阳沙市间渡江，进占公安、石首、华容一带，我五师即在敌后发动全面配合对敌之破袭战，五月中转战于宜都、安乡、南县诸地，复先后在潜江、沔阳、监利、襄阳等地发动游击战配合。总之，今春敌寇三次进攻我国军正面，我五师即三度在敌后痛击敌人，配合作战。其中以四月二十一日我五师攻入蕲春城、三月十日进攻黄冈柳子港两役，对敌震撼之力最大，尤为当地绅民所称誉。

三

本军战斗举例：

（一）去秋九月二十五日南通战斗。我军歼灭敌保田大队长以下日兵八十五名，伪军三百余名，战斗形式为伏击。该敌于谢家渡被我待其半渡袭击之，敌退守沿岸村庄顽抗，我继攻至半夜，放火围歼，始克竟功，敌伪全部就歼，生擒三名。战后我军捡还保田尸首于南通，以示我之伟大器度。敌方收尸复信感谢谓：“贵军战后归还战骸，宽仁厚德，诚贵军政略之胜利”。是役，我军由奇袭转为强攻，伤亡亦达百余名。这一战役之意义，在于阻止了敌伪下乡挺进之企图。

（二）去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定远之敌松尾中队长率敌伪四百余，事前诡秘进攻，突然企图一举而歼灭我驻在定远东南老人仓之驻军和党政机关。我军仓卒应战，予包围之敌以反包围，酣战至午，定远敌大队来援，复陷我军于二度围困中。我军应战至夜，突围而出。是役敌伪伤亡五十余名，我军伤亡数目略等。老人仓虽沦为敌伪据点，然迄今敌未敢再出。又三月下旬，淮阴、淮安之敌逐日向我淮宝区推进据点，企图

“蚕食”我军根据地，四月初已进至顺河集，企图进占高良涧、蒋坝之线，控制洪泽湖东岸，对我作更大之危害。我军于四月初袭击顺河集之敌，敌退至陈集。四月十日夜，我军大举进攻陈集，亘一昼夜。敌三路来援，复放射糜烂性瓦斯以自救。十五日天明，我主动撤退，敌我伤亡均重。是役后，敌向南推进之计亦不得不自动放弃矣。

（三）今春敌寇“扫荡”盐阜区之际，二月下旬即密布据点，计二月末到三月初，在不及两县范围之地区，即新增据点六十余处，妨害我军民居住活动甚大。我军乃于三月中旬，复发动拔除据点之反击战。三月二十五日，我军进攻阜宁西之陈家集，战斗当夜开始，敌据屋顽抗，我继以火攻，战至天明，敌不支突围。阜宁城之敌来援，亦被我军截击于中途。是役敌三十五师团之崖畅也中队计八十名全部歼灭，伪军一部亦同归于尽。我军亦伤亡计营长以下百五十余名。除了此役以外，还有八滩单家港、建阳诸地之著名战斗。敌不得已乃紧缩其据点，将新增之六十余据点，减至十一处。敌寇密布据点，即所谓钉铁钉之政策；我军拔除据点，即所谓拔出铁钉之战术。钉铁钉之力甚大，拔除之力必超过之，始克有济。战斗之凶恶残酷可以想见。

（四）今春三月十六日，淮海区敌寇分兵十一路，计敌兵千余人，包围我进驻梁岔之部队，企图以铁壁合围全部歼灭我军。我军闻讯，灵活转移，跳出包围。敌跟踪追击，复于十七日续行第二次合击计划。双方遭遇于涟水老张集朱杜庄一带，激战半日，我军复于黄昏后突围，转移至踈皮镇刘老庄等地。十八日晨敌三度合击，我军先头部队安全突围，而后卫则陷入重围中。我军乃就田野间之交通沟进行拒抗。第一阶段，我军进行突围，屡次与敌肉搏均无效，乃决心固守待援。第二阶

段，敌见我转攻为守，欺我废弱，以大队骑兵向我猛冲，为我军击退，其冲至防御工事前沿之敌，下马肉搏，均为我刃毙。第三阶段，敌悉知我仍不易与，乃选择较远距离，重新配备火力，以机枪、大炮集中放射，对我进行火力毁灭。是时敌寇知我军已突围无望，乃妄想降服我军，无耻的伪军乃开始其招我投降的火线喊话。我军将士坚不为动，乃从容将机枪步枪拆毁，并将文件杂物付火，将忠骸掩埋后，乃集中未伤者之二十余名，进行最后之突围。战至下午五时，终全部殉国！此我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第四连全部，连长白思才、副连长石学富、政指李云朋、文教孙尊明、排长尉庆忠、蒋员连、刘登甫等以下计八十二人，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敌寇虽歼灭我军一连，其损失亦相近。此役敌寇所获者无一可用之武器和杂物。伪方传出消息，敌军对于我军壮烈殉国之牺牲精神，深致敬佩！当地人民于战后三日内，即将忠骸举行公葬，题为“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谒者无不低徊流涕！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惟本军转战敌后，长年累月，应与敌之包围作斗争，切忌陷入敌之重围，此战术上之重点，本军将士宜知所警惕者也。

（五）四月二十四日，我军进攻运河西岸之洋河镇，经六小时战斗，歼灭敌伪军四百余名，残敌据房屋顽抗，我军以洋油火攻，房屋全毁，敌寇无一得脱。当我军在洋河镇上向民众收集火攻材料等，均照价给钱。洋河固苏北大镇，长十余里，战斗前后我军秋毫无犯。而后洋河伪军给罗圩伪方信称：洋河一战，人心大变，并谓“新四军固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明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云云。

（六）苏南我军于四月十五日奉令渡石臼湖（溧水之西，

高沟以北）西向游击。十七日进至明觉寺附近，当被敌寇发觉。天明时敌寇四路包围，双方遂于石臼湖东冈前堡新张家小赵王家东王壩之线，发生肉搏激战。敌寇企图压我全部投入石臼湖葬身鱼腹。我军背水抗敌，士气倍增。激战至夜，我军全力突击明觉寺方面之敌，敌不支溃退，撤围而去。我军当夜安全执行渡湖西进之原定计划。

四

战局平衡，分散兵力，巩固其占领之点线，集中兵力“扫荡”其攻击之目标，此敌寇战法之大要也。全面出动，以包围我军之根据地，寻求我主力决战，此敌寇“扫荡”初期之动作也。密布据点，进行封锁，部署不断之大小合击，以肃清其占领地区附近之我军，巩固其已得阵地，此敌寇“扫荡”中期之部署也。“扫荡”末期，则进行所谓篦梳式之“清乡”，其目的不在打击我之主力军，而以全力摧毁我方之党、政、群众组织，厉行其“归化运动”，即所谓政治“清乡”是也。敌寇进军之初，先以军事镇压、火烧、抢掠，无所不至，继则进行其怀柔政策，以“反共”口号掩饰其毒谋，妄图使居民健忘而堕入其彀中，伪方上下，则为虎作伥。敌寇之分区“扫荡”，为敌寇兵力不足之证据。敌寇“扫荡”时期，有继续至二月以上者，虽较过去为更持久，但终不能弥补其时间之中断。敌寇之施用毒瓦斯以及所谓“三光”政策、怀柔政策等，均为敌寇外强中干、力量不足、对我无可如何之表现。此一年来敌寇“扫荡”之规律也。敌寇之所得，在予我根据地以极大之破坏，予我部队以相当的损失，但不能予我以根本歼灭，敌寇之所谓胜利，盖暂时之胜利，军事掳掠之胜利，战术上之胜利，而战略

政略上之失败，则与日俱增，敌寇亦自知之矣。

分散游击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兵力以突击敌之薄弱部门，此我军反“扫荡”之战法也。“扫荡”初期，避免正面恶战，而必予前进之敌以阻滞。“扫荡”中期，相机击敌，而必予敌新建之据点和封锁以适当平毁。“扫荡”末期，则必予敌以有力反击，并痛击伪部，以剪除敌寇之羽翼，歼灭敌寇以动摇伪部之心胆。我军抗敌有方，则伪部人心思汉，此乃事理之必然。我主力为反“扫荡”的骨干，灵活转移，在适当时机，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军之时隐时现，零整互化；民兵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神出鬼没及于敌之卧榻居室，构成敌伪之日常恐怖。三者互相配合，互相转化，使敌伪难于捉摸，敌伪虽强大，终必低首于此。在军民联合打击之下，“清乡怕不清，扫荡白费心”，此为敌占区人民之民谣，实为对敌寇“扫荡”之正确结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此为华中人民要求参军上前线之歌谣。盐阜区士绅慰军大会，其传单有云：“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挥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国民党书记长某君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淮海士绅见农抗会领导之民兵活动，使敌不敢下乡滋扰；盐阜区士绅见民兵作战得力，土匪乘机窃发，为民兵削平，交口称誉“党政方面有远见”，并谓：“始知减租减息、扶助工农政策为抗战建国之大端。共产党能担负艰巨，又能让人民同享其成，乃知我等以前之不满，属于浅见”云云。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适来华中，亲见反“扫荡”军民合作情况，指

出：“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谰言。余不亲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苏中有九十老人某君自言：“几十年来，数经世变，凡大战兴起于城市，匪乱必起于乡间，战祸之直接损失尚小，战祸引起之兵荒匪乱，使人民受祸甚大。不料苏北处在经常与敌伪对战中，大军转移吾村，月必数至，甚有日必数至者，而乡间秩序井然，无跑匪畏兵畏匪之累，此乃党政办事之得法。战后之天下太平可于此卜矣！”沪上文化界某君等，获悉反“扫荡”中我军与苏北友军配合作战的情况，为之大乐，远道驰出，申其敬佩。以上为人民对本军之评论，其于本军之缺点或略而不言，或嘉其长而宥其短，或言其大而忽其小。以本军之实况当之，自省仍有愧怍之处。然而反顾国人中间，亦有人以“游而不击”的蜚语，诋毁本军。古人云：“止谤莫如不辟，止毁莫如自修。”本军素以此义自励，但上述人民之言论，固系公正之判词，当为国人所共鉴！

五

克服困难，迎接胜利。抗战第七年，时局对日寇必日益不利，其疯狂镇压敌后，必日益加紧，严重“扫荡”必然来临。本军决心不惜重大牺牲，换取坚持敌后支撑全面抗战之代价。本军损失固无可避免，而敌寇亦不能不付出重大代价。战局之必趋更加严重，此困难之一面也。

抗战第七年，华中根据地平原地区甚大，战局时紧时弛，尚有喘息余地。今则敌我战斗趋于狭窄地带，寸土必争，进退皆非易事；游而不击者必亡，击而无力者亦必亡。既游且击，

击必得力，此本军在敌后生存发展之道。违此者必降，为敌寇之降虏。其证例甚多，无庸列举。惟本军在武器拙劣和弹药缺乏的条件下，向强大之敌寇作战，故战斗之夜间性、白刃性、流动性、短促性、群众性表现最为明显，伤者多重伤，重伤者多死亡，此医药缺乏之所致，此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自皖变以来，迄今仍有友军不断予本军以高压：我五师、六师方面完全处在两面被夹攻之地位，我四师亦常在被友军袭击状态之中。本军忍辱负重，不愿轻启事端，扩大事态，一切仅限于严正的不得已的自卫。去秋浙赣路战役爆发，苏南皖南友方千里撤防，本军无一兵一卒南进，此为铁铸之事实，为江南友军官兵、地方绅民所目睹者。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援助敌后抗战之孤军，撤消磨擦方案，放弃特务政策，此本军所馨香祈祷者也！国内关系僵持不决，友军煎迫迄未停止，此本军处境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近年法币贬值，百物飞腾，敌后部队给养更见困难。去冬以还，本军即采“寓兵于农”之旨，从事生产，力求自给自足。比者黄梅初熟，麦黄菜青，荒地辟而水利兴，耕耘多而收获大，官兵生活略有改善，人民负担亦为减轻，此我军生活之困难，以及如何克服之又一方面也。

以上仅就内部外部之困难条件大体言之。本军将士身经数百战，出生入死，一心一德，政治觉悟和战斗能力均历经考验，加以当地各界人民同情环绕于本军者数百万人，人民乃本军之父母，本军乃人民之卫士，故本军虽临万难，信心坚定，始终如一。盖困苦艰难之来，既无可避免，惟奋斗不息，尽其在我者，足以克之，最后之胜利，盖属诸最后之搏战。孟子云：“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本军对国家民族之忠悃，庶几近此。如何以民主方策澄清时局，外以适合国

际民主之潮流，内以解决多年内争之纠纷，万方有罪，反躬为上，是非混淆，民意是从，是在明达者一转念间耳。抗战六周年，胜利在望，克服困难，以迎接新时代之胜利，本军将士仅以此自勉，并侍教于国人。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即韩德勤。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王 稼 祥

抗战已满六年了！

当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提供了抗战应循的正确道路与抗战中应该实行的政策。在六年抗战的过程中，共产党又把这个道路与这些政策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充实起来。

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就坚决的不动摇的遵循这个抗战正确道路与实行这些抗战的正确政策。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敌后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到现在，而在敌后坚持抗战比之大后方坚持抗战要困难到不知道好多倍。

共产党所指出的抗战正确道路与抗战中正确政策早已在我党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表现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敌后抗战的实践中证实它的正确性。抗战的正确道路，归纳一句话，便是全体人民的抗战，全体民众的抗战，而不是只照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利反而违反人民公益的抗战。

人民抗战的正确道路要求实行能够真正发动民众结合民众

的政策。我们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这些政策。首先，我们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各阶级各阶层都能合作参加抗战。我们实现了民主，实行了“三三制”政权，实行了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保障了人权，以便同心同德，共同对敌。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军事政策，使武力与民众结合起来，解决了征兵的困难问题，又建立了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相结合的局面，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实施了正确的军队政治工作，做到了在敌我武器不平等的条件下能够最有效的打击敌人，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争取敌伪军的伟大效果。我们又实行了抗战中应有的经济政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发展生产，奖励私营公营生产，结果，民力得以生息，抗战供给得以维持。而当敌后抗战进入更困难的阶段，我们又实行了精兵简政，以便减轻人民负担，实行了根据地领导一元化，以便增进抗战效能；实行了拥军和拥政爱民运动，以求得军民更加一致。凡此诸端均为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所坚决实行，而结果收到伟大的成绩。虽然敌后抗战之困难已经十分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为“豆腐块”，与大后方完全隔绝，几年来毫无经费、弹药、医药的补充，敌人仅在华北的封锁线之长已有万里长城之六倍，敌人在华兵力总数之一半是压在八路军新四军肩上，虽然困难重重，然而我们坚持到现在，军民奋发，不断取得胜利。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出抗战的正确道路与抗战正确政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革命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中国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一起，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有其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由于全体共产党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坚决奋斗，不顾牺牲，是由于共产党所领导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全体人民与其各阶层都

是诚心的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当着共产党找到了抗战正确道路而在敌后顺利的坚持抗战，抗击了在华日军之一半的时候，凡关心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前途的人，一定觉得高兴。然而反共分子则不然，他们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私利所蒙蔽，固执着自己不正确的抗战道路，看见共产党能够坚持抗战，便觉得如临大敌，坐卧不安，日夜在研究打击共产党的方案，找寻破坏共产党的方法：不讲团结，而专找磨擦；不实行民主，而鼓吹法西斯独裁；不讲究军民一致，反而抓兵欺民，军民距离更远；不减租减息，实行孙中山的土地政纲，反而加重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仅存之土地继续丧失；不讲究扩大生产，反而因为垄断政策物价政策之结果，而使生产缩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方之安定成为问题，民变之风蔓延，军队之战斗力减弱，投降之军官增多。这一切都是反共分子实行不正确的抗战道路的结果。

当着反共分子实行不正确的抗战道路收到了悲惨的结果时，于是又想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以图挽救自己的危机。他们想出了国家统一的口号，污蔑抗日根据地“封建割据”，要求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同时又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惜儿戏抗战前途，以军事进攻为威胁，以言论进攻造舆论，欲使已经很困难的抗战中国更加分崩离析，更加糜烂破碎而后快。

当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决战与胜利的前夜，当着中国抗战胜利在望、同时又处于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应当指出，现在是中国解放斗争历史最关重要的时候，也是我们为中国解放而奋斗的人士应当最负责的日子。

在这样严重关键，我们中国会：
团结则存，分裂则亡。

实行抗战的正确道路则胜，固执错误的抗战道路，则抗战局面会更恶化，失败的危险是没有取消的。

在这样负责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中或者“立功”，或者“犯罪”；或者“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人民是好的裁判官，决不是几句“我是统一”，“你是封建割据”的调调所能解决的。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斗争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也正因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了正确的道路，所以它便较容易的找到抗战中的正确道路。

回顾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理解到，为求得中国的彻底解放，必须解决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所提出的三个课题：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民族解放；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以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除中国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压迫，把生产力提到更高的阶段，以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中国人民的社会解放。前两个课题的解决是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后一个课题的解决是社会

主义革命性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来制订自己的政纲，把中国民族彻底解放和三大课题的解决，放在唯物的现实的与科学的基础上，而不让其解决方案停留在主观的空想的与公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三个课题或者说三大任务是彼此联系着的，但是每个课题的解决中，参加的阶级力量不一样。因此必须在民族解放道路上的每个阶段，具体的估计情况，分析阶级关系，来制订它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的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二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的。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并且是在和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有过陈独秀投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又有过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苏维埃运动时期中，有过盲动主义，李立三路线及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战时期中，又有过新的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没有找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或者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是小资产阶级冲动，以愿望当政策，跳过革命的必经阶段，以为中国解放的三大课题立即可以同时解决；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或者是

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克服与反对这些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壮大起来，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个斗争中生长起来。

毛泽东同志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订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反对了张国焘的反对国共合作，同时又反对了陈独秀主义，在湖南下乡调查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大革命失败后，即手创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确定了苏维埃的各个政策与红军的战略战术及红军军政工作办法，又抗击了李立三路线及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战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又提供了抗战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党内党外对抗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错误思想，反对了党内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战路线的投降主义，写作了出名的小册子《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等著作。在最近又发动了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以教育共产党人更好的掌握马列主义，更好的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它既不像那些简单抄袭书本搬运理论，把理论当教条而自命为马列主义，把主观主义当作马列主义；也不像那些以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来投机，抄袭一些中国封建时代的古书，同时偷运一些外国最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论为中国“本国货”，把封建思想与法西斯主义当作中国民族解放的理论。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请看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是怎样发展的，来当作我们的一个例子吧！列宁自己说：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于一九〇三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产生的。而这个——只有这个——革命理论底正确，不但是由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明，而且特别是由俄国革命思想界的迷惑、游移、错误和失望底经验所证明。大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五十年内，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处在空前野蛮与反动的俄皇专制压迫之下，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如渴思饮，它用了惊人的奋勉精神与缜密态度来探索欧美关于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世纪里，受到了空前的痛苦与牺牲，表现了空前的革命勇气，它表现难以设想的努力，它专心致志从事探究，它在半世纪里经过训练、实验、失望、审查、参照欧洲经验等等折磨，它真正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才获得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革命者不堪俄皇政府底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所以革命的俄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其国际联络之频繁及其对于各国革命运动底形式与理论之熟悉，为世界任何各国所不及。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固的理论基础上所产生出来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十五年（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的实际历史。这种历史经验的丰富世界上没有伦比。因为在这十五年内，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多的革命经验，革命运动各种形式——合法的与非合法的，和平的与激烈的，秘密的与公开的，小组的与群众的，国会主义的与恐怖主义的种种形式——彼此交替，都没有这样迅速和复杂，任何一国都没有在这样短促的时期内，积聚这样多的现社会一切阶级斗争底形式、方法以及斗争所带的色彩；而且因为俄国底落后与俄皇制度的残暴压迫，这种斗争特别快地成熟起来了，特别迫切和顺利地领会和

采用了相当的欧美政治经验的‘新发明’。”（列宁：《左派幼稚病》）

这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过程，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俄国革命经验相结合，便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成长，也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有了同样的过程。

中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与二十世纪，由于中国的落后，外有帝国主义的相继侵入，民族独立丧失，内有满清及军阀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最近百年来的历史都充满着民族解放与革命斗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战争。同时百年来中国进步的思想界也同俄国一样在寻找革命理论，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号召旗帜，义和团以原始民众暴动为其色彩不用去说他，后来又有康梁立宪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欧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他们也都同俄国一样都费尽心血在欧美的“新发明”中寻找挽救中国解放中国的革命理论，也是经过失败、痛苦、经验与教训之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看见了俄国共产主义挽救和解放了俄国之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共产党人是这样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这用不着说明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也深刻认识了马列主义这个革命理论之作用，承认中国革命非学“俄国方法”、“非以俄为师”不能成功。所谓“俄国方法”便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方法。所谓“以俄为师”，便是以列宁主义为师。这是孙中山先生经过失败与痛苦的过程后而认识到的。虽然孙中山先生并未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可惜的事，然而他在晚年能够进到认识“俄国革命

的好方法”，已经是难得的可宝贵的事。

由于中国的落后，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的七十年，在布尔什维主义出现后差不多二十年，中国才找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主义之思想，便建筑在这个马列主义的坚固的基础上。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自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共产主义也已经有二十二年的实际历史，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压迫之残暴比之俄皇政府有过之无不及。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之丰富，斗争形式之复杂，民族的、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破裂与再形成；城市的、乡村的；合法的、非法的；对外的、对内的；武装的与和平的。武装斗争延长了二十余年，革命是在战争中。这些斗争形式不仅很快的交替，并且有时在中国不同地区同时进行。这些斗争形式之复杂也至少不亚于俄国，假若不是更复杂更错综的话。所有这些都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实他的理论与经验，创造出建筑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中国共产主义。可是，中国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是落后的，与欧美是比较远隔的，中国共产党一产生后便全部投入革命的热潮，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产生后还经过曲折，经过经验，经过成功与失败，经过克服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主义更加生长起来成熟起来，这是不奇怪的事，也是必然的事。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当着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经验日益完备的时候，反共分子又觉得不安，想出了一些借口来反对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其最流行的便是：“中国共产党

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与机会主义，这是共产党自己承认的，可见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不适合于中国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德国人马克思和俄国人列宁的理论，因此不合国情的。”

这又是极端浅薄的说法，这是利用中国落后，这是以人民民族解放意识之提高来进行投机事业。

任何一个革命的理论，任何一个革命的政党都是在外部内部的斗争中形成起来壮大起来，有时是处于占少数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在创造自己的理论与政党时，是在工人运动中，在第一国际中，反对巴枯宁、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布朗基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列宁与斯大林创造布尔什维主义与联共党，是在反孟尔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就说国民党的历史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其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方面是正确的，然而也经过了内部斗争，民国元年反对了宋教仁和汪精卫的投袁路线，可是孙中山当时在国民党内是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民国十二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又实行了自我批评，确定了“以俄为师”，反对了当时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分子。同样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主义是在反对与克服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这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检查错误，克服错误，正表示一个政党的严肃性，也表示这个政党的进步与老练，怎样能够作为反对这个政党的理由呢！

至于说马列主义是“从外国输入”，这仅仅是利用中国的落后，利用中国与外国的隔离，和以民族意识来作投机生意，这是上面已经说过了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但仅仅是基础，它对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搬运的公式主义进行过不

调合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列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它必须而且已经创造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民族解放的问题，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上三大课题的理论。并且，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抗战的烽火中，对于“外国东西”一般的可能产生“排外主义”（一切外国东西都是不好的）与“洋奴主义”（一切外国东西都是好的），但共产主义者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民族解放的坚决战士，“排外主义”与“洋奴主义”决不能安到共产党人的头上去，“排外主义”是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封建遗毒的守旧主义的本色，至于“洋奴主义”又恰恰是买办资产阶级应有的身份。孙中山不是吸收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晚年吸收列宁主义的“好方法”而形成他的三民主义吗？现在反共分子不是在偷运德日意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压迫民众的方法吗？

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

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五日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解放日报》
刊印。

朱德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致蒋介石等电

(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

重庆蒋委员长，参谋部何总长，军令部徐部长^{〔1〕}钧鉴：

自五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职部进迫，职部均一再退避，所有经过情形，均经呈报，并电胡副长官宗南制止在案。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慨自抗战以来，职军奉命改编，驰赴战场作战，六年于兹，虽毫无补给，而未尝稍懈。陕甘宁边区为职军唯一之后方，少数留守部队，亦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陈、周、徐、郭^{〔2〕}诸联络参谋，久驻延安，以及胡副长官派来胡、侯^{〔3〕}二联络参谋等，实所目睹，备致赞美。詎意近日形势突变，南线友军已作发动内战之积极准备。沿固原、平凉、长武、邠县、栒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洛川、宜川之线，除原有封锁部队十余师外，近复由河防阵地调动增加之兵力不下六七个师，声言大举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边区军民闻此意外事变，莫不奔走相告，骇异莫名。窃思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

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除电胡副长官呼吁团结外，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 叩

午鱼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 〔1〕指何应钦、徐永昌。
- 〔2〕指陈宏谟、周励武、徐佛观、郭仲容。
- 〔3〕指胡公冕、侯声。

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刘 伯 承

我国国民政府与蒋⁽¹⁾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已六年于兹。本师即在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及朱、彭⁽²⁾总副司令直接指挥之下，深入敌后，且现已与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广大民众血肉结合，坚持敌后抗战，成为敌人不可摧毁的力量。

我们与敌人斗争的过程，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七七”抗战起到武汉失守（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止。

这一时期，即敌人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的时期。当它由平津陆续攻陷大同、石家庄、太原、济南、新乡以后，其重点就转移到徐州、武汉的会战去了。它向华北进攻时，主要是依托铁路，进行“突贯攻击”与“分进合击”，及占领一地后，则注重于巩固战略要点和后方交通，逐步进行其歼灭我游击战争的围攻。先之以大烧大杀，煽动土匪会门，成立伪皇协军；继之以治安维持会的建立，以图消灭或驱逐我军，确实控制华北，变为殖民地。

这一时期，我八路军奉命开入山西，协同友军作战。本师

* 这是刘伯承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写的文章。

即在同蒲路北段及正太路沿线之敌军的侧背，进行攻击，以配合正面友军的防御。其间，以策应忻口战役，袭击阳明堡烧敌飞机，和在正太路南侧之七亘村、黄崖底等处所进行的诸战斗，曾给了友军以很大的助力。迄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主力向南撤退，而华北同胞惨遭屠杀之际，我党我军为要从敌人侧背牵制敌军，以掩护友军起见，为要结合华北广大之人民，保卫自家，保卫华北起见，曾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实行坚持敌后斗争，以加强协助友军作战。此时，本师即一面坚持晋东南所有阵地与敌苦战，另一面则分遣部队，更深入敌后——冀南、鲁西北出击，特别着重于发动群众游击战争，摧击敌后交通，以使友军得以从容转移，严阵作战。迄武汉失守之日为止，本师在晋东南作战，最著者为破坏了正太路，粉碎了敌人对晋东南六路围攻和九路围攻，抑留了敌人增调徐州会战的兵力。同时，深入冀南、鲁西北的部队，亦结合当地民众，摧毁了各地伪政权，远在冀察政权时，地图变了颜色的冀南，即于此时被我军克复，并消灭了伪皇协军及土匪会门武装六七万人，策应徐州与武汉会战，并曾组织对平汉路、道清路与津浦路的大破击十余次，截断敌人在徐州会战中的接济。我军这样的在晋冀鲁豫间与民众结合抗战，特别是民众抗日武装蜂起响应，驱逐敌人，遂开始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与日寇尖锐对立，肉搏斗争。

第二个时期——从武汉失守到华北“百团大战”（民国二十九年年底）。

这一时期，即华北敌酋杉山元所实施的“治安肃正”时期，也就是对我进行所谓总合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力战”的时期，而其在政治上着重于挑拨抗战的团结，

在军事上则回师增援华北（仅在本区周围者已达八万），强化交通，割裂我根据地，建立治安军、警备队，进行所谓分散配置奇袭“牛刀子战术”的“扫荡”期。其目的在彻底消灭我军，由“治安肃正”进入华北殖民地秩序的建设，以便进攻西安、重庆、昆明。

这一时期，我军结合华北民众，对敌进行全面的全力的斗争，人民给了我军以“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在军事上，则以主要的游击战间以运动战，进行频繁的反“扫荡”与破击交通线上之敌。当时本师在“粉碎敌人囚笼政策”口号之下，粉碎了敌人大的“扫荡”就有十次之多，而破击战则更为激烈。冀南的交通斗争，甚至在民国二十九年的全年进行着，其中尤以阻滞敌人修德石路为最残酷。在山西，则收复了邯（郸）长（治）公路，破击了白晋铁路。有名的“百团大战”，曾痛击了华北敌人，打断了它进攻西安、重庆、昆明的阴谋。

第三个时期——民国三十年到现在。

这一时期，即敌人在“百团大战”震撼之后所谓“治安强化”的时期，也就是总力战强化时期。现敌人已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特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加强人力物力财力的掠夺（尤其是壮丁、粮食的掠夺），建设伪军，整顿伪组织，求其“净化”。对我边地则跃进“蚕食”，对我腹地则“铁壁合围”。所到之处，显明的交通线封锁沟与潜伏的特务组织都构成网状，以期实现其抢光、杀光、烧光的政策。这尤为敌酋冈村宁次的“杰作”。

这一时期，我“三三制”民主政治的建设日有成绩，因而各阶级团结对敌的力量遂日益增强。在“精兵简政”之后，我

们正规军、游击队、人民武装等结合人民而成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正发挥党政军民一元化斗争的威力。在三十年与三十一年两年中，就本师作战来说，即达七千九百七十六次（冀南较多），而其中有十九次是大的反合围“扫荡”战。至于反“蚕食”与交通斗争，则成为日常工作。我游击队进入敌占区，结合民众，作反奴役反配给与反抢粮抓壮丁的斗争，同时对敌伪内部进行政治攻势，收效很大。

现在敌占区与抗战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大，形成相互插花、夹杂斗争的情势。我们相信，我军能与华北人民永远血肉结合，更能够一致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结成一元化的对敌斗争，一定能够坚持这一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与友军呼应作战，直到反攻阶段的到来。

我们概述的三个时期斗争经验，可以提出某些战术原则的问题来。

第一 战术社会性的扩大

这里又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战斗争的成员问题，另一个是斗争的战术问题。

由于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摆脱亡国奴命运的残酷斗争，所以参加斗争的成员，必须是每一个中国人，而不单是某些少数人，尤其不是几个军人。几个军人，只能是侧重于武装斗争的成员，但他又不能限于武装斗争。为了动员广大的民众成为斗争的成员，一定要在民族抗战中建设民主政治，把广大民众的利益与民族利益结合一致，否则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广大民众愿意进行自己做主人成员的抗战，而不愿少数人垄断抗战。现在我们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就是由抗战与民主结合发动起

来的，今后更应循此途径，发挥全民族的力量，走到抗战胜利。

战术被运用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武装斗争，而且应普及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斗争。军事战术与政治策略的含意本来就是一样的。今天抗战斗争的成员增多了，要对敌人的军事、政治、文化、特务等“总力战”、“歼灭战”的斗争，也错综复杂起来了。我们抗战的每一成员，必须掌握各种斗争的战术，不过个人都应抓紧个人斗争业务，而侧重于掌握其自己的某一斗争的战术，并一般地掌握其他斗争的战术，以便与之结合（如战争、生产、教育等）而成一元化的斗争。单纯军事观点、脱离广大民众的军人，已成过时的人物了。

第二 “敌进我进”

“敌进我进”，就是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当敌寇攻占华北，友军南退，人民涂炭之时，我军曾在战略上进入敌后华北，结合民众斗争，掩护友军，因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即日寇痛呼为“盲肠炎”者。假若不是这样，要想敌人不去进攻西安、重庆、昆明，不在华北完成殖民统治的秩序，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又假若我们在反“蚕食”、反“扫荡”中，在战役战术上，不以一部或主力到敌人侧背作战，强化游击与政治攻势，而能巩固根据地，也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敌进我进”是结合敌后广大民众作解放斗争的战术，而且我军在大后方又领不到弹药已四年于兹，“敌进我进”的战术，对于我们实成为舍己为国、至大至刚的行动，原非脱离民众、空谈爱国者所能做得到的。曾经有人进入敌人后方，结果未能立足，或被敌

人驱逐与消灭，甚或变节投降，而自绝于抗战胜利之路，这没有别的道理，就是自私自利，高悬于广大民众的头上，甚或压迫民众的缘故。

日寇的作战见解，是建筑在“敌退我进”之上的。故在抗战之初，以为我军只是掩护主力，收容部队之散兵，其次则认为游击队尚可聚歼，以后才喊出“八路军在占领区如此滋蔓，实乃皇军心腹之患”。这是由于日寇的作战要务令上并无“敌进我进”的条文。

第三 “群众性游击战争”演变中的威力

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地指示：“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一般是执行了这一指示，因而取得了相当的胜利。我们在上述的第一个时期，在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中，特别在日寇用兵狂妄的有利条件下，曾常以正规军队作大踏步的进退，取得了运动战的胜利。在第二个时期，在地方军队、人民武装初步建立时，在敌人增兵华北厉行“扫荡”、实施“囚笼政策”的条件下，曾以主要的游击战间以运动战，取得了反“扫荡”与破击战的胜利。在至今第三个时期，在地方部队、人民武装逐次壮大，在敌人强化交通与封锁沟墙，跃进“蚕食”、合围“扫荡”的条件下，则一般是发扬“群众性游击战争”。但这并不是说，在群众性游击战中，不抓到敌人分散的弱点，不给以消灭的打击；相反地，正需要而且正容易抓到敌人分散的弱点，给以消灭的打击。只有如此，才能制止日寇狂妄的分散。不过，在这里战斗的机动性是日益加强了，尤其是指挥员，在敌我利害时机变换很快，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示的条件之下，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

今年五月，在冀南馆陶格子网内王七坟的游击部队，于一小时内干脆地消灭了敌伪军一百余人，足够机断行事的本领。

无论敌人在其“蚕食”与“扫荡”中，曾现出许多花样，如“捕捉奇袭”、“反转电击”、“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最近又添上了“釜底抽薪”、“三角合截击”及“前进与截击”、“包围与扫荡”之类，然而异族正规军协同动作的特质，不断在群众游击战争万目监视之下，遭到无规律而准确的袭击，也无法以施展其长，其伤亡于冷枪、冷炮、地雷的人马，也通常大于正规对战的数目。因其兵力如集结过大，则易遭我适时分遣的消耗；如分散过小，则易遭我适时集结的消灭。日寇军中一句谚语：“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这就是日寇无可奈何的呼声。

然而，群众性游击战争威力之大，并不只限于战斗，而且还有政治攻势。政治攻势不只是燃起了敌占区同胞的抗日热潮（日寇正感叹：三军可夺帅也，中华民族不可夺志也），而且也燃起了日军反战热潮。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日寇“十八春太行作战”，正是它慑于政治攻势的表现。

第四 交通斗争

交通斗争，就是敌我双方各自打通自己的交通，打断对方的交通。日寇海陆战地辽阔异常，为作战输送的需要计，为控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力计，海陆交通已成为不可打断的生命线，如被打断，必演成肢解的死亡。但在我们看来，则成为或者是让日寇交通线紧紧缠死，或者是破坏交通线的问题。

现日寇倡导大陆作战的战术，以开发生产，打通交通线而

确保之为主。去年十月华北敌军参谋长安达也说：“华北堡垒已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了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之外长城线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最近敌占区城市饿饭，敌军闯入根据地，拼命抢粮运走。这些都说明敌人对交通战斗到了如何紧张的程度。

敌人的交通线和遮断壕如此之长，堡垒如此之多，意在确保交通与束缚我游击战与运动战而消灭之。然而这长这多的工事，陷入于中国的人山人海之中，更形兵少防宽，就不能不以一个日本兵监视几个伪军来守备。于是，日寇防止中国人的敌视伪军与防止日本兵反战等问题出来了。

我们一面在政治攻势上抓紧了这个问题，另一面则以军队的战斗力，结合广大民众的劳动力，进行了大众的破坏与技术的破坏。单以民国二十九年一年的破路而论，本师破坏铁路、公路即已达一万二千余里之长。从此交通斗争即成为此修彼破、彼修此破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到打出日寇的那一天将不会停止的。

第五 对现代技术兵器的斗争

日寇是具有空军、装甲车队、炮兵和毒气等现代化的军队，唯武器论者曾夸大其作用，以造成过恐日病。我军是由人民在革命武装斗争中生长成的军队，武器窳败且久不得弹药的接济，然而竟能在敌后坚持抗战者，除结合群众斗争外，在作战上曾根据敌人诸技术兵种的性能，抓其弱点，利用和改造了地形，也利用天候与时间，特别发展了自己军队善于“机动”与“坚决”的擅长，不但防御了日寇的技术兵器，而且也摧毁

或夺取了这些技术兵器。迄今抗战第六周年为止，本师烧毁与击落了敌人的飞机四十二架（其中以袭击阳明堡及长治时为较多），也毁了敌人装甲汽车三十七辆，坦克二十辆，汽车一千二百三十七辆（其中尤以响堂铺、香城固与破击正太路诸战斗为较多）。至于日寇使用毒气，也是经常的事，而尤以在辽县、榆社两次战斗使用者为多。但是辽县、榆社两城，仍于当时在我们坚决攻击之下收复回来了。我们现有的炮兵部队，大多数是夺自日寇而成立的。其他如机关枪、步枪之类，则夺自日寇者为尤多。这样以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将来也会有的，而且在某种时机也会更多的。

第六 侦察与防谍

侦察使我们明了敌情，防谍是塞蔽敌人耳目，并束缚其爪牙，使其无法危害抗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重点应放在侦察之上。

我们正在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军民都需要明了敌情，尤其要防范日寇特务机关、宪兵、警察、新民会等各方来的阴险万状、无恶不作的间谍活动。一般人所知道的，如日寇有劫持大批民众作间谍者，有以抗战面目拐骗陷入者，有混入经济系统作间谍者，有在伪组织骨髓中作高级间谍者，有便衣武装挺身队潜入腹地袭击暗杀者，然而这还不过略露一斑而已。我们的侦察防谍，应成为大众的运动，并在大众的侦察防谍的基础上，建立军机的侦察防谍。因此，首先应使民众尤其是人民武装和营兵部队深刻了解：侦察防谍乃群众性游击战争有力保障，并知道如何察明敌军行动，如何识别间谍，防止他们破坏抗战团结、军事组织，及防止其察明我军企图部署。特别是营

兵部队，应严守军事秘密，尤其是爱护文书应如其爱护眼珠一般。我们是抗战军人，即使被日寇、汉奸、叛徒施行任何威胁，甚至以死相威胁，亦不应泄露半点军事秘密。对于营兵部队与人民武装，应分别定出几条防谍守则，以资遵守。特别要表扬民族烈士坚定不移、宁死不泄露军事秘密的光荣行为。

我们在日寇后方所谓“兵站基地”——华北坚持斗争，是站在全国军队前线。在日寇未被击败溃走之前，我们与敌人肉搏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必然是极其残酷与极其复杂的。本师抗战第五周年，全年战斗统计约四千次。而今年第六周年，全年则突然增到约八千次。于此可以预见今后敌我斗争的严重情形，敌我的战术竞赛，将随之而更新颖更丰富的发展，急需我们在斗争中注视研究与发展战术。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朱德、彭德怀。

克服困难，迎接胜利^{*}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徐 向 前

今年的“七七”，已是我中华民族反抗日寇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第六周年了。以今天的大势看来，也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最后一年头了。同时也是困难更多的年头。回忆过去的六年抗日战争过程中，我们的广大领土被日寇占领盘据；成千万的同胞，被日寇蹂躏杀戮；难以数计的物质财富，被日寇抢掠焚烧。这一切血海的冤仇，滚沸着每一个爱国同胞的热血，激励着每一个爱国志士的勇气，这是我们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然而毫不应讳言的，这一切的损失也给予了我们在坚持与反抗中很多的困难，虽然这些困难已是胜利来临前的困难了。只要我国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能团结一致，全国军民能同心协力，反攻的措施能积极准备，向抗战建国民主自由的大道迈进，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胜利的来临也是可以拭目而待的了。

目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曙光已在东升，自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伟大的胜利以后，已使纳粹德国常常自夸的军事机构已陷于麻痹。近来北非盟军的胜利，更促进了德、意法西斯崩溃的降临，而盟友美国在太平洋已开始了局

* 这是徐向前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写的文章。

部的反攻，也使日寇喘息不安。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更加巩固，欧陆第二条战线很快的可以建立，苏美英等盟国军火生产的不断激增，在我国内对敌正面进攻的阻挡，我华中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对敌人不断“扫荡”的粉碎，这一切都证明同盟国家正向胜利之途迈进。再环顾那些法西斯侵略主义者集团：它们常常得意叫嚣的速决战与闪击战是失败与破产了，和平挑拨阴谋的攻势是幻灭了，法西斯统治者内部的倾轧，分歧的日益激烈，兵员日益枯竭，物资日益困难，军火生产日益萎缩，士气日益衰退，民心日益反战。这一切都在证明，轴心国家——法西斯侵略者的丧钟已在高鸣，而崩溃的末日已降临其头上了。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反侵略的民主国家——同盟国家的胜利的基础已是稳定不移，胜利在望已是无可再怀疑的，而法西斯侵略主义者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命运了。然而我们决不应忘掉了一件事情，目前敌人仍然是强大的，诚如斯大林说的：“德国正面临着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德国的毁灭已经到来了，认为毁灭会自己到来，会随潮水漂来，这是幼稚的。要希特勒德国的毁灭成为事实，还需要从西方和东方再来二三个与过去五、六月中加诸希特勒军队头上的那样打击，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及可能性来粉碎敌人。”胜利是日益接近了，但法西斯侵略者是不会自动放下侵略的血手的。当其末路来到之时，他们会更加拼命挣扎的，同时还应知道希特勒德国的失败，也就是日本的失败，但这并不等于说，希特勒德国的毁灭，就会使日本的毁灭自然而然的跟随着来的。这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本着规定方针首先击败纳粹德国，而同时在太平洋上亦不让日寇坐大，积极的实现其逐步进攻的方针；而我国的正面的战争能够阻挡敌人不再使其深入，而敌后的游击战更能艰苦的坚持。

打垮德国，驱逐日寇，使其无条件的投降，是必须再接再厉，经过严重的斗争，和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得到的。

深入我国国土的日寇，它虽然会随着德国的覆灭而覆灭，但它仍然是强大的。它侵略了我国广大的土地，他占领了缅甸、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太平洋的肥沃岛屿。它对占领地正积极地在扶植傀儡政权，狡诈的在允许缅、菲“独立”的假支票下进行收买人心，加强统治，以便进行极残酷的剥削，使这些地方的人民作日寇驯服的奴隶，来支持侵略的战争。它在国内竭力和缓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竭力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造成迅速最高度的增产战争物资，作为支持长期战争的准备。对我国正面进攻的企图仍未放弃，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加紧不断的连续大“扫荡”。这一切都证明日寇仍拼命挣扎，作长期战的准备，而它的力量仍然是相当强大的。所以要使日寇无条件的投降，要想把它送进毁灭的坟墓去，是须要我同盟国家，尤其是我国全体军民的艰苦奋斗与极大努力的。

自然，日寇的危机正在逐渐逐日深化。日寇在我国虽然占领了不少的土地，但敌后的人民始终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军队站在一起，与敌誓死奋斗，愈战愈强。六年以来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消耗了敌人的大量人力物力，打垮了敌人企图将华北变成面的占领的幻想。敌人虽然在敌后的“扫荡”中对那些顽固、动摇、悲观失望的民族败类如李长江、孙良诚、厉文礼等的投降引以自夸，称为“赫赫战果”，但这些分子的投敌对敌后抗战的坚持上，并没有给予什么了不起的损害，反而更引起了人民的警觉，巩固了抗日的阵营，提高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日寇虽然在太平洋海战初期，以海盗式的袭击手段，对英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一胜利幻影很快的被同盟国家的努

力打击而归于消逝了。过去美国在所罗门初步反攻的胜利，现在日寇在阿图岛二千余人的覆没，太平洋上盟国局部反攻的开始，日寇海空军优势的逐日丧失，特别是双方空军力量对比的变化，英美空军占据了上风，日寇海空军损失的难于补偿，这证明日寇以前的胜利只是失败的前奏。其次对于占领地傀儡的扶植，政治欺骗的假予独立的花样，这不过是更进一步加紧剥削的具体化。这种骗术，不管在中国以汪精卫的汉奸的三民主义面貌出现的也好，在缅甸以巴茂面貌出现也好，在菲律宾以瓦尔加斯的面貌出现也好，总之日寇侵略屠杀剥削的血手是掩盖不了被占领地人民亲身经历的血腥统治的。最近日寇虽然在不断歌颂其占领地的太平，但也不能不泄露出美军在菲岛仍继续进行与菲华人民合作坚持抗战的消息。试问没有菲岛人民的支持，美国留在该地的军队还能单独支持这样久的时间么？再次，日寇所谓的“企业整备”、“超重点的生产”，企图达到劳动动员上的强化，实行日本人民已再不能维持生活的“简素化”，强迫日本人民增加两手已空空如也的储蓄，高叫增强其钢铁、石炭、轻金属、船舶、飞机的飞跃生产。在日寇那样物资穷困的国家，而侈言飞跃的增产，那真是自欺欺人之谈，想从枯瘠的人民身上再来榨出丰富的油脂，恐怕是幻想吧！日寇对日本人民的欺骗压榨，只可一而再，再而三，恐怕无穷尽的如意榨取，是不能达其企图的。无怪东条在叫嚣思想战问题之严重，也无怪那次义雄也在高喊对于“从内部来瓦解军队离间军民，酿成反战思想之策动必须采取断然严厉的措置”的欺骗乏术而出以更残酷高压政策了。对速决战的破产，与美国在太平洋攻势的局部开始，日本的统治者又在叫嚣“大战还在后面”与“战局之严重性”的哀鸣了！

那么日寇在其困难危机的严重化下，在太平洋战场上南进

窥澳之路既不通，西进攻印之图又不易，北进反苏又不敢，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就束手待毙不成吗？那么日寇最后打算究竟怎样办呢？俗话说得好：“雷公打豆腐，只拣软的欺。”日寇企图挣扎的出路，恐怕主要是加紧占领区的残酷压榨与对我正面进攻和敌后“扫荡”了。根据今年半年以来战况的表现来推测及敌寇在湘北、鄂西的窜扰来看，战况虽有时紧时弛之现象，但长江南岸石首、华容、藕池口、弥陀寺等地仍被日寇占据，作为其掩护长江水路交通及前进侧翼据点，或溯江而上西向深入，或南下迂击长沙之企图似仍未放弃，还有乘机而动之可能。但这一作战企图的实现，日寇根本存在之困难点即为兵力本已早感不足，若作战线和交通线愈拖愈长，困难愈多，而兵力愈行分散，其泥脚也愈陷愈深，更不易拔出。那末日寇这企图，既因兵力有限而难于实现，即使再可能多占一些土地，而其政略企图即因我国抗战阵营的坚固亦无所施其伎俩，且英美在太平洋上力量的迅速增加与局部反攻的开始，和我军正面抗战的积极阻挡，日寇这一作战企图的实现困难实多。无怪乎日寇在湘北鄂西的蠢动窜扰，似乎只在虚张声势，而大举进犯的企图，似在踌躇不前了。

日寇在太平洋上动态以现势而论，似已被迫转攻为守了。在我国的动态，对正面再大举深入之图如果难于实现的话，而它的企图必然会加强对占领地的统治与掠夺。因此对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是必然会更加频繁与残酷了。这种残酷性、频繁性具体表现在：全华北敌人大小据点已有九千三百余个，碉堡有二万九千余个，在某些地区平均二里半有一个碉堡，点与点之间的敌人已达到目视相望、火力相连的程度（见钟人方《敌后斗争的新形势》）。自然，这种现象主要是指平原地区而言的。另外，在敌人的“扫荡”次数与时间上也可

看出形势是更加残酷紧张了。敌人的大“扫荡”，一九四一年共六十四次，一九四二年七十五次，而今年只四个半月的统计即已达到五十二次（见钟人方《敌后斗争的新形势》）。这种具体材料可以证明，敌人扶植伪政权与伪军，加紧“扫荡”，企图肃清我军，扩大并巩固其占领区，加强其经济掠夺，积极准备长期战争，这样来企图挽救其必然要失败的命运。

综观以上的情况，我们应当清楚的指出，抗战的六周年是迎接胜利的一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尤其是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处在敌人的不断“扫荡”与我们不断的反“扫荡”中，这种“扫荡”与反“扫荡”在反攻未到来以前是会更加频繁与残酷的，而斗争的环境还是很艰苦的。我们应当看清这种情况，我军全体指战员应更加团结一致，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作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领导下，与敌后的全体人民结成一体，克服一切困难，粉碎日寇的“扫荡”，争取反攻的早日实现，迎接胜利的早日到来。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加强团结，准备反攻^{*}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贺 龙

我国的抗战，在极有利的国际形势下，进入了第七年。正如我党中央的宣言所说：“当此抗战六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之际。”敌后每一个抗战军民，看到这种情况，听到这个声音，都显出愈益奋发的精神和百倍的提高最后胜利的信念。

我党中央又告诉我们：“毫无疑义，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敌人与实现解放还须给出绝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胜利与解放是不可能的。”完全不错，胜利是不会自己到来的，我们不能坐待胜利，我们要加强对敌的打击，粉碎敌人的“扫荡”与“蚕食”政策，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以迎接反攻局面到来，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敌后的每一个军民，都将在我党中央的号召下，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加倍地努力。

去年此日，我党中央号召我们：“熬过困难的两年，迎接将来的胜利。”并告诉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要组织民兵，到处打敌人，疲劳敌人，消灭敌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也都已经这样做了。正因为

^{*} 这是贺龙为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写的文章。

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在极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来纪念抗战的第六周年。

我们能够拿来回答我党中央的号召，及告慰全国军民的，不是滔滔不绝的空话，而是用血和肉所创造出来的铁的事实。

过去的一年，敌对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是采用“蚕食”政策，并配合着不断的“扫荡”，企图缩小并消灭我根据地。其“蚕食”的方法是：（一）从政治上来瓦解我们，除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宣扬“皇道乐土”等等以外，并派遣汉奸、密探，打进我根据地来，进行破坏活动；或利用封建迷信团体来发展汉奸组织，或利用伪组织、伪军的亲戚朋友关系，来发展维持会；或利用根据地内少数不明大义的地主豪绅，并经过他们，收买地痞流氓，秘密组织维持会等。其目的都是为着推翻我抗日政权，建立伪政权。（二）从经济上来破坏我们，一方面是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破坏根据地的春耕秋收；另一方面是群众必需品的绝对封锁与奢侈品的大量倾销。其目的是使根据地的军民无法生活下去。（三）配合着上述阴谋，就是实行军事上不断的“扫荡”，毁灭我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镇压群众的抗日情绪，并威胁人民走入维持会的道路。

针对着敌人这一毒辣的政策，我一二〇师各部队，在朱、彭^{〔1〕}总副司令的领导下，配合着晋西北的广大民众、党政机关和新军决死队等，开展了反“蚕食”、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一年来，与敌进行大小战斗一千二百一十二次。在这些战斗中，我主动攻敌的次数为被动应敌的次数三倍半以上，共伤毙敌伪五千八百余人（民兵游击小组的战斗，均未计算在内）。在历次战斗中，我指战员之英勇精神，写下

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去年敌“扫荡”我三分区时，我七团的第七连，据守大柏山，千余敌军分十一路向我包围。从晨至晚，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我阵地仍屹立不动。战士们的子弹、手榴弹打完了，便用石头滚；敌人迫近来了，便用刺刀肉搏，没有刺刀的则用枪托打，一直坚持到黄昏以后，我始安全突围。驰骋于大青山的我骑兵支队，在一年三季都要穿棉衣的酷寒地区，在马不能解鞍，睡不能解衣的严重环境下，与敌进行残酷的斗争，坚持着自己的阵地。我们的战斗英雄吴士正同志（排长），一个人就打死了敌人五十余名，内有军官两名，而自己却没有受过一次伤。至于民兵和游击小组的动作，也是很积极的。离石的游击小组，每月作战平均十余次；岚县的游击小组，经常跑出三四十里，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捉拿汉奸；岚北民兵曾捉到敌人派出的敌探。各县民众之参加破路、破电线的斗争，动辄数百人。今年二月间，离岚公路七个据点之间的敌人电话线，为我彻底破坏百余里，使敌费时一月始修复起来。

捕捉敌探汉奸，摧毁公开与秘密的维持会、伪政权等，一年来也获得不少成绩。仅一个分区的统计，破获敌探达三百余人，摧毁维持会六百余个自然村和四十余个行政村，并在摧毁敌伪组织后，建立起了抗日的政权来。因此，我抗日根据地，不仅没有在敌人的“蚕食”政策下缩小，反而得到了一些发展。在接近敌区的民众，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为避免敌人“三光”政策的“恩惠”，只得在敌人不易到的山上打许多秘密的小窑洞，预先把路挖断，把粮食用具藏到那里，平时在本村进行生产，敌人来时就躲到山上去。这样就减少了群众的损失，并使群众的斗争更加能够坚持。

与山地的反“蚕食”斗争同时，在平川我则展开武装工

作队的活动与对敌的政治攻势。成千成百的人参加这一工作，他们穿着便衣，依靠当地群众的掩护，甚至昼伏夜出的深入到敌人的据点附近及中心地区，进行争取敌伪军，争取敌占区民众的艰苦工作。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也收到不少的成绩，并表现出我指战员英勇牺牲的精神。在某地，我们的武工队员七人，被敌发觉及包围了，便立即拔枪抵抗，直到全部牺牲，也没有一个动摇的。×分区的×××同志，被敌捕去后，虽遭严刑拷打，手中的许多个关系，一个也没有说出来，且在狱中还写信出来说：“请组织放心，我绝不向民族的敌人低头”等语。

为支持长期斗争，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号召下，我们除作战外，还进行了生产运动。除开最前线的警戒部队，其余在机动位置的部队及后方机关，全部都参加了生产工作。为解决吃饭问题，我们进行了开荒。晋西北荒地虽没有陕甘宁边区这样多，部队也不能全部参加生产，但我们一个旅也有开数千亩地的。在边区的三五九旅，今年开荒突破十万亩以上，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成绩。为解决穿衣问题，我们自己并发动群众纺纱织布，并大批养羊，解决冬季的皮衣，现已做到能够大部自给。弹药的来源，除依靠缴获敌人的以外，我们自己开设工厂，翻造子弹，自造手榴弹、地雷，成绩并且不坏。我们又组织采药队，用中药来代替西药。结果，我们虽几年来得不到政府任何接济，仍解决了坚持抗战的各种物资困难，并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时又帮助了群众的生产工作。许多群众都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部队，打仗能行，种地也能行，种起地来，连我们庄稼人都赶不上。”今年以来，各部队更展开拥政爱民运动，进一步实现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要求。

以上只是简单的说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是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并坚持根据地的大略情况。我们毫不讳言，我们的斗争是异常艰苦的。世界上也难找出第二个像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部队：一面要拿起枪杆子和敌人打仗，战斗下来又要拿起锄头进行生产。但这还不说，而我要说明的是，几年来在没有分文接济的情况下，我们拼着一口气为国家民族出力，牵制了侵华敌军的一半以上，支持了敌后的残破山河，竟还有人骂我们是“奸军”，是“匪党”，造谣污蔑，无所不至。且企图从后方来打击我们，不惜置我们于死地。真不知这些人是何居心？值此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之际，值此最后胜利的曙光在望之时，我希望这些人，好好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着想，好好为你们自己的前途着想。“反共”是干不得的，过去的痛苦经验还不够警惕吗？短短的六年就把过去的惨痛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吗？请你们深夜扪心，回头想想吧！不打日本，专打中国人，究竟是什么道理！

诚然，到胜利之路，还有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能从反共运动上找到丝毫出路，相反的，反共的结果必身败名裂，自取灭亡。为克服今后抗战中的困难，我党中央在自己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上，已明白提出四项基本办法：（一）应该加强作战；（二）应该加强团结；（三）应该改良政治；（四）应该发展生产。以上四项，是克敌制胜的唯一良策，是顺乎国际形势和人民要求的正确主张。六年来敌后的坚持，尤其是过去一年来敌后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这种做法才是对的，只有使这些变成为我们的国策，才能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

敌后军民对今后的抗战没有别的奢望，唯一的希望就是：应该加强团结和积极准备反攻。具体说来，就是我党中央所提

出来的四项基本办法。舍此途径背道而驰，那我们就不敢赞同，也一定不能赞同。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七日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决定 发动宣传反击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 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 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 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四) 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 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

中央书记处

午齐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反对内战 保卫边区的教育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

为了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积极的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继续加紧的清除奸细，中央总学委有以下的通知：

(一) 将中共七七宣言、朱总司令通电、托匪汉奸张涤非假造民意的消息、解放报七月九号社论、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文件（可以参考其他文件，如解放报七月六号刘少奇同志的文章和八号王稼祥同志的文章），在各机关、学校、部队、民众团体的广大群众中，展开热烈深刻的讨论。讨论时间，一般的规定为一星期。讨论方法，可以采取群众大会、军人大会、支部大会、干部会、小组会、大座谈会、小座谈会、漫谈会、作报告、上课、集体阅读、集体问答、自由辩论、个人研究、学习晚会等各种方式，根据具体环境、具体对象灵活运用。

(二) 在讨论文件中，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反特务斗争上，提高干部与群众的阶级觉悟。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与非无产、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

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号召全体党员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的批评、纠正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与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如果战争真正爆发，估计一部分幼稚动摇的党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发生逃跑叛变的行为，因此目前更要加紧进行教育，指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各种对我之有利条件，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各种不利条件，以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同时指出我们也有各种困难及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以坚定其战斗的决心。

（三）在进行干部与群众的教育中，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利用这次国民党正要进攻边区的时机，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目前特别应注意下列工作：

（甲）从思想上去瓦解敌人。拿国民党撤退河防进行内战的具体行动，拿国民党三十三三个将级军官的投敌叛国的具体事实，与欢迎日寇奸细吴开先到重庆并仍作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具体例子，打破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实质上是日寇的第五纵队，号召他们不要再为日寇第五纵队服务。告诉他们国民党区域内民情隔阂，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等具体事实，打破他们认为“国民党尚可依靠”的心理。说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救国的功绩，实行民主自由、丰衣足食的事实，与他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他们晓得不应破坏与不可战胜的道理。号召他们在此紧急时机赶快出来坦白自新，党的宽大政策是开着门的，但如果甘为第五纵队服务，观望等待，企图进行阴谋破坏工作，则将以军事时期的严厉办法处理之。

（乙）加紧反特务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各机关、学校、保卫部门的同志应写反特务斗争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号召自首分子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充当日寇第五纵队的实质，反对国特破坏抗战团结、挑拨内战、杀害青年、破坏共产党、八路军与边区的罪恶，号召全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

（丙）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别工作，将精密细心调查研究的个别解决，与有准备的坦白大会、劝说运动结合起来。加紧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有计划的教育干部，达到百分之十的干部学会反奸工作。

（丁）各保卫部门应继续加紧审讯工作，在监狱中进行反省运动与控诉运动。

（戊）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九条方针（见《防奸经验》第六期），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四）加强警戒工作，严格的执行枪支登记制度与各机关学校的警卫制度。各机关学校应立刻建立有名有实的自卫军，彻底检查过去机关自卫军的工作，纠正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徒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一切办法，使自卫军真正成为保卫自己警戒敌人的组织，并适当的进行军事教育。

（五）改造机关党的支部组织，使各机关学校的首长（特殊者例外）兼任党的组织负责人，使党、政、学的工作一元化。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质问国民党*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毛泽东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首先看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个集团军，都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

这不能不使人们发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

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那末，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日本人这样欢喜你们的背，而你们丢了河防不管，让它大段地空着，你们的心就那么放得下去呢？

在私有财产社会里，夜间睡觉总是要关门的。大家知道，这不是为了多事，而是为了防贼。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配以重炮，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吗？

或者照你们的另一种说法，你们并不爱好什么团结，而却十分爱好“统一”，因此就要荡平边区，消灭你们所说的“封建割据”，杀尽共产党。那末，好吧，为什么你们不怕日本人把中华民族“统一”了去，并且也把你们混在一起“统一”了去呢？

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

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末，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

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其次看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为了反对共产党，办了几百个特务大队，其中什么乌龟忘八也收了进去。即如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亦即公历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抗战六周年纪念的前夕，中国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出了这样一个消息，说是陕西省的西安地方，有些什么“文化团体”开了一个会，决定打电报给毛泽东，叫他趁着第三国际解散的时机，将中国共产党也“解散”，还有一条是“取消边区割据”。读者定会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

原来这件事出于几百个特务大队中的一个大队。它受了特务总队部（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指令，叫一个以在国民党出钱的汉奸刊物《抗战与文化》上写反共文章出名、现充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的托派汉奸张涤非，于六月十二日那天，就是说还在中央社发表消息这天以前二十五天，就召集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所谓电文。

这个电文，延安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但其内容已经明白，据说是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还有“马列主义已经破产”云云。

这也是国民党人说的话儿呢！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

现在中国境内党派甚多，单单国民党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叫汪记国民党的，立在南京以及各地，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也有一个什么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有一批特务大队。此外，还有日本法西斯党遍于沦陷区。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

难道你们以为共产党太多了吗？全中国境内共产党只有一个，国民党却有两个，究竟谁是多了的呢？

国民党先生们，你们也曾想一想这件事吗？为什么除了你们之外，还有日本人和汪精卫，一致下死劲地要打倒共产党，一致地宣称只有共产党是太多了，因此要打倒；而国民党呢，却总是不觉得多，只觉得少，到处扶植养育着汪记国民党，这是什么缘故呢？

国民党先生们，让我们不厌麻烦地告诉你们吧：日本人和汪精卫之所以特别爱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者，就是因为这个党这个主义当中有可以给他们利用的地方。这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时期，孙中山先生把它改组了，把共产党人接受进去，形成了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

盟，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这个主义，也只有在同一时期，经过孙中山的手加以改造，成为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除此而外，这个党，这个主义，在排除了共产党、排除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条件下，就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的爱好，因此日本法西斯和汉奸汪精卫也爱好起来，如获至宝地加以养育，加以扶植。从前汪记国民党的旗子左角上还有一块黄色符号，以示区别，于今索性不要这个区别了，一切改成一样，以免碍眼。其爱好之程度为何如？

不但在沦陷区，而且在大后方，汪记国民党也是林立的。有些是秘密的，这就是敌人的第五纵队。有些是公开的，这就是那些吃党饭，吃特务饭，但是毫不抗日，专门反共的人们。这些人，表皮上没有标出汪记，实际上是汪记。这些人也是敌人的第五纵队，不过比前一种稍具形式上的区别，借以伪装自己，迷人眼目而已。

至此，问题就完全明白了。当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所以绝对不肯在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日本党和汉奸党也值得解散者，是由于不论在思想上，在政策上，在组织上，你们和他们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还有一条要质问国民党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破产”的只有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别的都是好家伙吗？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前面已经说过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怎么样呢？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又怎么样呢？中国境内不论张记李记的反革命特务机关的反革命主义又怎么样

呢？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难道在你们看来，一切这些反革命的东西，都是完好无缺，十全十美，惟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破产”干净了的吗？

老实说吧，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敌人汉奸要解散新四军，你们就解散新四军；敌人汉奸要解散共产党，你们也要解散共产党；敌人汉奸要取消边区，你们也要取消边区；敌人汉奸不希望你们保卫河防，你们就丢弃河防；敌人汉奸攻打边区（六年以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线对岸的敌军，炮击八路军所守河防阵地没有断过），你们也想攻打边区；敌人汉奸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汉奸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你们也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敌人汉奸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你们也是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敌人汉奸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你们也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何其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至于此极呢？你们的这样许多言论行动，既然和敌人汉奸的所有这些言论行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

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

我们向一切不愿撤离河防进攻边区 and 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第三次 反共高潮迅速破产的原因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

德怀同志：

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致蒋、胡电^①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令胡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致朱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重庆外国人是与蒋、胡同时（五日）得到朱总电，故能于“七七”纪念日引起质问及各大使干涉。太南打击刘进尚非其时，望用一切方法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毛泽东

午元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六日朱德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分别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的电报。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 中国共产党而战！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

秦 邦 宪

没有几天以前我们庆祝了我们党的英勇奋斗的二十二周年。这二十二年奋斗的历史总结正如中共中央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所说：

“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

二十二年的中国历史及中共党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将没有这二十二年的英勇壮烈的民族解放斗争，没有中国共产党将没有这六年坚持的爱国战争，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中国的命

运，将是悲惨的耻辱的殖民地奴隶的命运。如果不相信，请翻一翻历史。拿最重要的关节来说吧：如果没有民国十年中国共产党之组成及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决心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那末，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奋斗，将继续局处一隅，而不会面目一新，蔚成雄伟澎湃的近代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之奋不顾身的奋斗，则杨刘^{〔1〕}不能除，北伐不能成，曹吴^{〔2〕}不得倒；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之坚决反对，则“九一八”时汪精卫这汉奸早已在不抵抗主义之下断送了全中国，则“九一八”以后，尚不知会有多少个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公忠体国，则西安事变决不会有和平的解决，蒋介石先生决不会自由；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的主张，发动爱国战争的主张（你喜欢说“催战”也罢！），则最后关头之关不知究在何处何时，“七七”之变能否引起伟大的抗战，实属疑问；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辛苦支持，牵制敌人半数兵力，则今日抗战局面如何，西南西北半壁山河能否支撑，不敢悬测。二十二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没有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有抗战的胜利，不会有独立自由强盛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是二十二年历史的铁案。因之，每一个真正愿意献身中华民族解放，献身中国工人阶级及劳苦群众解放的人，应该自愿自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我们共产党决不把人党规定为国民的义务！也决不强迫别人加入！）至少也应该爱护这个忠于民族，勇于奋斗，不谋私利，尽瘁人民福利的组织。然而，不然，竟有人提出“溶共”于先，诬蔑为“奸党”于后，挑衅磨擦、阴谋破坏、阴险毒辣、淋漓尽致，一若共党不除，死不瞑目者！驯至今日，竟嗾使走狗鹰犬，叫嚣解散共产党，尽撤河防大兵，准备实行内战，大有不

惜牺牲垂成之抗战大业，以中国之命运为孤注，发动“剿共”战争，以求得死而瞑目的模样！真是咄咄怪事！

事之更为卑鄙无耻者，乃是以堂堂的执政政党之国民党，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地进行政治斗争，而学鼠窃狗盗，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密令各地特务机关散布谣言，不曰“共产国际解散乃因中共封建割据，引起盟国间不睦，为避拖累计而出此”，即曰“共产国际解散后，共党内部分裂，某某某某，坚主解散共党组织，不日将就中枢某项要职”云云，无耻下流，真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然而，这种白昼见鬼的造谣，是值不得一驳的。国际解散，其原因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文件中阐明甚详，勿庸赘述。中国共产党之团结，二十二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提高了责任感上更提高了这种团结的程度。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士敏土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虫豸之造谣所能损伤其毫发的。即就造谣手段说，也拙劣得惊人。前者不过是套用讣文滥调“中共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国际……”而已，后者更是照自己的尊容替别人画像的荒唐手法。老实说，只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流氓集团中，才会出通敌叛党、为虎作伥的汪精卫之流。虽然，政治流氓们对于造谣这类市井无赖的惯技是颇为熟习的，可是，依此看来，未见高妙，实在是值得向戈培尔、八获报道班长之流再请教一番的，如果你一定要跟吃人生番希特勒和匪首东条走的话。

可是，听不听由你，我们还是诚恳地奉劝，不要走这条路的好。法西斯的路是走不通的！法西斯已成了人类公敌，凡有血气，莫不想寝其皮、食其肉。斯大林格勒、北非二役全军覆灭后，希特勒灭亡的命运已定，且为期不出一年。希特勒一倒，东条亦决无自救之路。既有前车之鉴，又何必重寻覆辙

呢？共产党是消灭不得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一天有工人阶级，一天就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长城、国家柱石，消灭共产党就是自坏长城、自掘坟墓。共产党之能否合法存在，是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鲜明区别之一。你要消灭共产党吗？那末就将失去四强之一的地位，而甘心作匈牙利、罗马尼亚、泰国之类三四等轴心喽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十年内战，殷鉴不远！不错，“剿共是无期徒刑”，当此民族爱国战争的时代，堂堂军人不在抗日战场去立功建业，而甘受这种特殊的铁窗风味，又何苦来。内战是打不得的，暴寇深入，山河破碎，幸赖国内团结，方能支持六年。一旦启衅，兵连祸结，汪逆坐大，日寇乘隙，宋明惨祸，必将重现。以吴三桂之功，尚不免受戮，以洪承畴之忠，尚不免列入贰臣传，即令不为子孙万代计，也该替自己的前途打算打算！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实行三民主义，始终不渝的。并且直到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还是“为了克服今后抗战中的更大困难与准备配合盟国实行对敌反攻起见，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亲密团结，携手合作，共同来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繁荣的、和平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岂非妙事！悬崖勒马，犹未为晚！化戾气为祥和，易干戈为团结，这是我们恳切希望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动刀枪的话，一定要发动罪恶的反共战争的话，那末，我们每个共产党人一定将和人民一道为保卫民族，保卫人民，保卫我们的党而奋斗！

我们有值得保卫的东西：有二十二年英勇奋斗历史的伟大的党，给全国人民指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光明大道的党，为全国人民所热爱的党，唯一能救中国的党；我们有从游击队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强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有亲手在艰难困苦中缔造的而今天已经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边区；有在血战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由我们流血牺牲而获得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底已经奠定的胜利基础，还有我中华民族的前途及万世子孙的命运。

我们有保卫的力量：我们有八十万党员，我们有五十余万在党领导下的军队，我们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有二十二年斗争的经验，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我们有无数身经百战的坚强干部。最后，异常重要的，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

军事威胁，不足以慑服共产党；挑拨离间，不足以分化共产党。相反，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杨希闵、刘震寰。

〔2〕指曹锟、吴佩孚。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对付国民党各派军队的原则 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

山东分局并告北局：

午支电悉。(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磨擦仗均须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断其借口及诬蔑。

中央书记处

午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自从朱⁽¹⁾总司令七月四日与七月六日致电胡宗南与蒋介石先生呼吁制止内战危险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七七”六周年纪念的时候，边区形势极度紧张，延安三万民众，举行大会，发表通电，响应朱总司令的主张，并提出名正言顺的要求：（一）要求政府撤消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二）要求政府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三）要求政府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四）要求政府审判日本奸细吴开先。同时，在通电中，延安民众大会号召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中国。自从大会通电发出以后，边区各地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热烈响应，人民对于日寇第五纵队的罪行表示最深刻的义愤。从千百万人民中发出的这种壮烈的正义的呼声，就把日寇第五纵队特务匪徒的阴谋拆穿了，这些匪徒所小心准备的“闪击”也因而被事先暴露了。这些渺小的害虫，由于原形毕露，理屈辞穷，而更觉得胆寒了。相反的，广大的人民，对于当前的危险，却有了警惕，有了准备，动员了自己的力量，因而造成了胜利自卫的先决条件，不致受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但是，能不能说内战危机已经过去了呢？完全不能。不但内战危机的根源仍旧存在，而且每一分钟都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这就是因为，在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执行延安民众大会

所提出的四条要求，其中关于撤退军队一项，不但原有包围边区的军队未撤动一兵一卒，就是新从河防及西安一带调上来准备作进攻主力的军队，亦未闻有撤退消息。

内战危机，决不是凭空而来的，这是由于国民党的队伍中，有一批汉奸第五纵队，有一批法西斯匪徒，他们看见自己的祖宗希特勒、东条将要灭亡，拼命想法挽救其祖宗的命运，因而丧心病狂，挑拨内战，要使抗战大业功败垂成。越是国际形势好转，越是反法西斯力量胜利，他们就越是着急，越是拼命挑拨内战。完全不是偶然的。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学习满清康熙的《圣谕广训》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强迫人人诵读。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这本“经典”公开威吓说：“军政时期不能停止”，而其所谓“军政时期”，即是指“剿共”内战而言。这本“经典”，对抗日则轻描淡写，但却要强迫全国人民人人诵读。从这本书里，可以看见什么呢？可以看见：我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在日寇第五纵队的包围之下，现在是异乎寻常的醉心于实行法西斯专政，醉心于“剿共”内战，公然主张“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由此可见，最近内战危机的发生，其根源历历可寻，而要想根本消弭内战危机，则除了彻底铲除日寇的第五纵队外，再也没有别的道路。这些害虫一日不铲除，则内战危险一日存在，反共的“闪击战”时刻可以爆发。越是国际形势对我国有利，对日寇不利，则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活动将越发着急，越发猖狂，内战的危险也将越发严重。

延安民众大会，除了要求撤消包围边区的军队以外，还要求惩办特务机关，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和审判日本奸细吴开先，乃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些要求的达到，乃是消弭内战危

机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我们说是最低限度，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叫人相信，国民党是真正在一心抗日，真正不要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不再来问问国民党人：

第一，你们对于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为什么不肯惩办呢？难道他们对抗战有功么？可否请你举出事实，证明那几百个反共特务大队做过一件有利抗战的事情，让我们人民心服呢？据我们看来，特务机关从抗战开始起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好事，恰恰相反，他们只在反共反人民的反动事业上用功夫，他们里面什么乌龟忘八蛋都有，成了包庇奸细藏垢纳污的渊藪。很多鼎鼎大名的特务头子，投降敌人，替东条匪首与汪精卫大汉奸服务。他们平日食国家俸禄，无一人为国家尽节，一经招引，立即投降，并且尽率其特务小喽罗，无须改组机构，就能为敌服务，而敌人对他们也信任不疑。我们请问：这样的特务机关，有什么资格食国家的俸禄？有什么必要豢养他们？现在他们企图发动祸国殃民的內战，制造白日见鬼的反共谣言，提倡“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谬论，你们为什么还舍不得惩办这些忘八蛋？

第二，你们对于三十三个投敌叛将，为什么不肯讨伐呢？写个讨伐令，在时间上说，用不到花一点钟，在政治上说，划清敌我界限，足以振奋士气，教育国民与军人的爱国精神，寒敌寇汉奸之胆，提高我国国际信誉，利益非常之大。过去不这样做，已经不好。现在，延安民众大声疾呼的提醒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不做呢？你们在口头上也爱说什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难道容忍大批叛国军官，毫不责备，毫不声讨，这就叫做“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么？难道这些叛国行为，倒是符合于你们所说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么？

第三，你们对于日本密使吴开先，为什么不予逮捕审问呢？吴开先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奸细，被日汪捕获，讲好条件，纵令回渝，实施勾引，仍然押其妻母于上海。你们不把吴开先逮捕审讯，反把他待如上宾，究竟是为了什么原故呢？你们这样对待吴开先，人们就怀疑你们一面抗战，一面又与敌人秘密勾搭，实行这样的两面政策，正和你们一面讲什么“精诚团结”，一面又实行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政策一样，你们对于人民的这种怀疑究竟怎样解释呢？

我们诚恳地向一切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注意这些极端严重的问题。撤退准备进攻边区的军队，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审判日汪密使吴开先，这四条都是在精诚团结与民族至上的原则下所不能不办的。

在全国人民方面，应该大声疾呼，起来督促国民党实行这四条。如果这四条做不到，那末，抗战危机与内战危机是不会消灭的。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

毛泽东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 一文给董必武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必武：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¹⁾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²⁾），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³⁾，日前检查渝办⁽⁴⁾）。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收到此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

二、在渝办、报馆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

三、搜集此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

四、新华尤其群众^{〔5〕}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

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 泽 东

马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胡宗南、徐永昌。

〔2〕指周恩来、林彪。

〔3〕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晚至七日上午，国民党当局为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派军警包围了报馆。

〔4〕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5〕指《群众》杂志。

刘少奇关于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 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陈饶：

元电悉。

(一) 恩来^[1]、林彪诸同志已回延安，在重庆与蒋关于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结果。蒋在三月间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作准备，最近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宣传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大军于边区附近，企图压迫我党作城下之盟。但进攻的危险尚未完全过去。

(二) 数年来，由于蒋介石顽固派在大后方实行极端反动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使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及与人民的矛盾大大发展，现在大后方是民不聊生、民变蜂起，而国民党对之毫无改善的根本办法。如此下去，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力量只有继续削弱崩溃。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在将来组织有力的对日反攻，实大成问题。而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

(三) 在上述情形下，我们应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与三民主义的方针下，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

的影响，并且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和提高我党的威信。最近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等文章，你们应广为散发，并在党内外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并借此在党内加紧阶级教育。

（四）你们除开召集民众大会发出反对内战拥护共产党与陕甘宁边区通电外，对于顽固派的武装进攻，仍应照过去的方针，准备坚决的武装自卫。在盛家桥、黄姑滩的敌人撤退后，你们应准备在这里打击桂军对于你们的进攻。

刘 少 奇

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

论 时 局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时评）

目前国际时局的发展，和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那批大人先生们的自私自利的算盘是矛盾着的。

中共中央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明确地指出目前的世界局势是：“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并指出：“只要欧洲大陆能够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则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是毫无疑义的。”而“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的失败与世界各民族的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最近几星期来世界战局的发展，更加证明了我党中央这一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一带粉碎德寇的“夏季攻势”，并向奥勒尔线举行红军的夏季攻势，均获得新的伟大胜利。同时，英美盟军又在西西里登陆成功，这一切均显露了同盟国的无敌力量和轴心国的日暮途穷。由此发展下去，法西斯的垮台必不在远，这已成为无可置疑的定论。

可是奇怪得很，中国抗战营垒内一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狭隘利益的大人先生们，他们虽口口声声说中国也属于同盟国，有时也替苏英美盟邦的胜利说几句好话，然而他们的内心，总是在馨香祷祝德意法西斯不要垮得太快。他们幻想着今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势”还会获得一些胜利；欧陆第二战场不

会建立，或至少不会早日建立。他们甚至仍然梦寐不忘于所谓“日苏必战论”，希望日寇进攻苏联。他们对日寇的算盘是：以苏联的陆军打日本的陆军，以英美的海军打日本的海军，以苏英美的空军打日本的空军，中国则保存实力，坐收成果。只待日苏战争爆发，他们的手就可以空闲起来，可以放手大打共产党。六七月间的调兵遣将，急急忙忙地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除了投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以为中国共产党可以“使用压力，迫其分化”之外，是还想投这个德日两国“夏季攻势”之机的。

我们愿意忠告这些沉醉于幻想中的大人先生们：你们的算盘是打错了。你们可以冷静地看一看，你们的幻想还有哪一点没有被冷酷的事实所推翻呢？

首先，看一看苏德战场的形势吧！希特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迟至七月五日，才算在库尔斯克、别尔果罗德一线发动一次攻势。他在狭窄的阵线上，集中了庞大兵力，什么虎式坦克、佛第兰德炮车等最新式武器都拼拼凑凑地拿出来使用。他企图一举楔入苏军阵地，包围和消灭库尔斯克方面突出地带的红军。然而结果究竟怎么样呢？狼奔豕突的法西斯匪徒，处处碰到红军的迎头痛击。他们支付了惨重的代价——坦克二千九百辆、炮车一百九十五辆、卡车五千辆、飞机一千三百九十三架和七万余法西斯官兵的生命，但是终于无法前进一步。不出一星期的时间，英勇的红军就把德寇的攻势打垮。并且不给敌人以片刻休息的机会，接着便来一个有力的进攻，在两星期内，推进五六十公里，三路进迫奥勒尔城郊。现在红军攻势，正在广大的战线上扩展着。发动了对红军的夏季攻势而惨遭挫败的德寇，现在只得高嚷着“这次战斗，是久已准备好了的苏联夏季攻势”，而实行着自己的“弹性防御”了。那些希望德寇

“夏季攻势”能够胜利的人们，曾经无耻地说：“夏季攻势是和德国相连、而和苏联不相连的名词。”然而战争的进程偏和这些人开玩笑，德寇的所谓“夏季攻势”不出一星期就被打垮，而苏联的夏季攻势，则是真正的攻势，具有方兴未艾之势，奥勒尔即将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苏联既能守，又能攻，而德寇则攻既遇到惨败，守亦不能自固。“夏季攻势”这一名词过去似乎为德寇所专有，可是现在这个名词已经永远和纳粹匪徒分离，而和苏联红军相连起来了，和英美盟邦相连起来了。这件事真使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大失所望，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须知这批大人先生们的失望，就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类的胜利，让一小批人永远失望下去罢，谁叫他们沉浸在那些不但完全不合事实，而且带着反革命的自私自利的幻想里面呢！

关于欧陆第二战场是否会开辟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西欧和南欧的形势。在西欧，过去三个月中，英美空军在德国工业中心地区投弹在三万吨以上，这种轰炸现在仍在以毫不放松的姿态继续进行着，这岂不是不但为了摧毁德寇军事工业，而且为了替盟军在西欧登陆打开道路么？在南欧，盟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和继续进军，这不是它在南欧登陆的序幕吗？西岛素以“设防巩固、不可攻克”著称，而盟军从地中海各根据地（北非、马尔他岛、班泰雷利亚岛等）跨海进攻，最短距离亦不下百公里，盟国大军竟能克服困难，在该岛登陆成功，而且不出半个月，已占领全岛之大半，轴心兵无斗志，狼狈奔逃，退守西西里东北一角，其全部就歼之期，已迫在眉睫。这一战役不是说明英美盟军已有充分的登陆作战经验，其士气非常旺盛，而轴心军则天天后退，其士气非常衰落吗？那些幻想欧陆第二战场不会开辟的人们，也许会这样想：去年没有开辟，所以今年也不会开辟。对这些人，我们不妨请他们睁开眼睛，看

一看今天欧洲形势的新的特点：“目前是在苏英美三国第一个联合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在苏英美三国的陆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的时候，苏联从东线英美从西线举行第二个第三个更伟大的联合作战，给予德意法西斯以最后决定性的打击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中共七七宣言）红军在东线的进攻和英美在西西里的进攻，正是苏英美第二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伟大的第三个联合作战，我们估计必然会要到来，而且可能是很快的到来。不错，由于去年第二条战线没有开辟，苏英美战胜法西斯的决战，推迟了一年。同盟国家和世界反法西斯人们对于这一历史的教训，是深切了解的。现在他们都恳切地盼望“在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他们正在为这一目标加紧战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这批大人先生们，真是“嗜好与俗殊酸咸”，他们的希望和判断，总是和全世界一切正义人士相反的。他们以自己的自私自利的经验当作方法论，以此去衡量世界上的一切事件与一切人，这种方法论就是阿 Q 方法论。阿 Q 根据他自己的极端狭隘的经验，从乡下跑到城里，乡下叫板凳城里叫条凳，他说，城里的叫法是错的；乡下煎鱼放葱片，城里煎鱼放葱丝，他又说城里的煎鱼法是错的。我们的这批大人先生是不愿意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他们以为罗斯福、丘吉尔也和他们一样不愿开辟第二战场。结果呢？结果也必然会使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失望。但这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们好的不学，专门要学这种狭隘经验主义的自私自利的阿 Q 方法论呢？

我们的大人先生们提倡的所谓“日苏必战论”，也和上述两个问题具有相同的性质。不错，日寇对于苏英美三国巩固团结、对德意实行决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这个决战“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德寇在势穷

力蹙之际，当然也极希望日寇攻苏，以期减轻苏联加在它身上的重担。中共中央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对于这个问题也估计到“日本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想进行侵犯苏联的冒险行动”，并且日寇在“满洲”的军备至今没有任何的减少，因此我们至今仍不能说日寇侵苏的可能性已经完完全全地过去了。然而事情是日益对于日寇不利的。在前年莫斯科危急与去年斯大林格勒危急两个时机中，日寇不敢发动侵苏，那末，在今年苏德战场上德军的所谓“夏季攻势”已经让位给红军的真正的夏季攻势，欧洲第二战场快要建立，日寇攻苏的时机益见不利的时候，日寇是否愿意为希特勒火中取栗，甘心把自己的脑袋向苏联的铜墙铁壁上去撞，遭受比张鼓峰、哈桑湖悲惨百倍的结局，这就大成问题了。何况美国生产力猛进不已，在太平洋上进行巨大反攻的威胁，使日寇日夜戒备，坐卧不安。即以造船吨数而论，日寇一年所造，只抵得美国的一个月。在南太平洋上，日寇空中劣势显著暴露，连日以来美机数百成群轰炸日寇各根据地，予以重大损失。自新几内亚至新乔治亚绵亘数千公里的岛屿世界中，美国海陆空军稳打稳扎，步步进逼，为将来的大进攻准备有利阵地。在中国战场上，正面战事虽然毫无生气，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机会主义政策，然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人民游击战争，却每天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活跃着，使日寇无法巩固其所谓“兵站基地”，后顾之忧，与日俱增。日寇在这样几面受敌的困境中，他若还敢向苏联进攻，那就无异是自促其更快地死亡。观于敌酋东条抑制极端少壮派的行动，和他在中国、南洋各地仆仆风尘，目前日寇的大部分力量，似乎是化在准备对付美国的大反攻上面；日寇正在开足矮步，与美国竞赛军备，仍苦望尘莫及。因此，引领盼望日寇在今年夏季侵犯苏联，以便自己完全腾出手来打击中国共

产党的那批大人先生们，其算盘未必那么如意。他们在红军七天击破了希特勒的所谓“夏季攻势”，英美又于七月十日攻入西西里的时候已经冷了半截，因此，他们自己在六月及七月上旬所积极地神秘地准备着的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反人民的“夏季攻势”，也有偷偷地暂时歇手之可能，虽然，一切抗日人民不应该有一刻放松这种注意，即是说，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随时准备着对于中国真正抗日的革命力量举行袭击的。

我们还要问问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就使日苏打起来，你们真的就可以放手开辟国内第二战场，毫无牵挂地拔去共产党这个眼中钉，然后坐收抗战的渔利么？世界上的算盘是没有这么如意的。日苏即使打起来，日寇在中国的这点兵是不会撤走的，中国是它的所谓“高度结合地带”，又称“兵站基地”，岂肯轻易歇手？中国既有一个对外战场，又开一个对内战场，左右开弓，你们自己就有好结果么？决无什么好结果的，只会使中国灭亡得快罢了！从古至今，采取两面政策的人们未有不失败的，俄国的资产阶级与英国的张伯伦就是前例。

但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老早就是带着矛盾的两面性的。在抗日期间，这种两面性，表现在他们一面抗日，一面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政策上。在抗日方面也是两面的，一面抵抗日寇的进攻，一面则抵抗得不积极，并且还时常和日汪密使勾勾搭搭；在反共反人民的方面，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与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乃至希特勒、墨索里尼，有其共同点的。在对共对人民方面，也有其两面性，即是从内战时期的单一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蜕化为抗日时期一面利用共产党与人民，一面又打击共产党与人民的两面政策。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明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期间的这种两面性，他们就无法建立自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正确的革命的政策，而将使自己的头脑陷于不清醒、陷于麻痹、陷于右倾或“左”倾的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抗战期间，克服了党内同志间各种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思想，而使得自己的政策纳入完全清醒的完全正确的轨道上，并将一步也不放松地坚持这种政策，直到争取抗战完全胜利与民族完全解放的目的地。全党同志都应注意研究时局，研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动向，研究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政策的动向，而使自己的头脑完全清醒起来，坚决执行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抗日的最后胜利与民族的完全解放是没有疑义的。

本文刚写完，接到墨索里尼已于七月二十五日倒台的消息，这是整个法西斯反革命时代归于结束的开始，这是整个轴心国总崩溃的开始，欧洲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本文来不及详说，当于另文加以分析。

根据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 在敌后斗争的八项政策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

德怀同志：

(一) 周、林⁽¹⁾返延，七大准备开会，请你及罗、薄、聂、吕⁽²⁾来延参加大会，希预为布置。太行、太岳、北岳各区须重选代表若干，中央另有通知。

(二) 敌后整风有进步，可于七月九日北局关于整风经验及关于思想意识二文见之（已交广播）。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

(三) 审查干部之方针为：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四、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五、调查研究；六、分清是非轻重；七、争取失足者；八、培养干部；九、教育群众。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其详另有说明。

(四) 蒋、胡⁽³⁾进攻边区计划，被我及时揭破，见我有备，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五）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六）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在陕甘宁边区，对敌斗争改称军事教育作为第八项）。

（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八）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此电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几个区党委负责同志。

毛 泽 东

午三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林彪。

〔2〕指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

〔3〕指蒋介石、胡宗南。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七大”代表 赴延出席大会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

北局、太行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

(一) 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在彭、罗、蔡、聂来延期间由邓小平代理北局书记，以宋任穷为一二九师副政委并代理政治部主任，以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以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以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薄一波职务由北局指定人代理。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苏振华职务由黄敬代理。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

(二) 太行、太岳、晋察冀各根据地各再推选代表十人至十五人，山东、冀鲁豫、冀中、冀南各再推选代表五人至十人来延出席大会，各地名额由北局及各分局决定分配及推选，不必召集大会选举。各地代表须各区党委或地委或部队的负责同志，但任何有政治问题的人均不得为代表。

(三) 出席大会代表须于最近期间起程来延。

（四）来延诸人不得携带任何秘密文件。

中央政治局

八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周恩来

同志们：

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斯福、丘吉尔大西洋宪章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到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国中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

* 这个演说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解放日报》。

工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从美国、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无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灭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地

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地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若作战迟疑、心怀二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1〕}，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日寇广播竟公开地提出条件诱降^{〔2〕}，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回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以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

末，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

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国中究竟哪个是抗战积极的军队？哪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哪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哪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的力量和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

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们这种鬼话，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

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地梦想我们党会像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张国焘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悛，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

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会是中国共产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然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我们。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投降日本侵略者，一九四三年五月带着日本招降蒋介石的条件，由南京到重庆，蒋介石曾亲自接见。

〔2〕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日本大本营报道部部长谷萩那华雄发表对蒋介石的诱降谈话，内容是：倘同意停止抵抗，参加反美、英之战线，则日军将由中国撤退，承认中国之独立。

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国民党的本质 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 的教育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一、目前边区周围局势暂较缓和，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已告一段落，保卫边区与审查干部的工作虽仍须继续进行不懈，但趁此时机利用活生生的事实与群众中已经激发的感情，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应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而为达此目的，三朝两日，轻描淡写，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济事的。因此，中央总学委决定

自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

二、规定在此期间以学习以下五个文件为中心：

- (一)《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 (二)《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
- (三)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
- (四)王稼祥同志《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 (五)刘少奇同志《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

并参考《解放日报》七月一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七月十二日社论《质问国民党》，七月二十七日社论《论时局》，及其他有关的文章。

三、为使这一学习能够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规定八月五日至十五日浏览阶段，八月十六日以后再进入讨论阶段。中央总学委决定在浏览阶段结束，讨论阶段开始前召集一次会议，反映浏览情况，研究讨论方法，望各单位学习领导机关注意准备意见。

中央总学委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

毛 泽 东

中央党校第二部今天开学。同志们大多是从前方来的，从战场上回来的；一部分是从边区各地来的，从工作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延安的，离开工作来学习的。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末，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今天开学，我主要地来做这样一个宣传。

我们要执行什么统一的意见，达到什么统一的目的呢？就是刚才彭真同志说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干部标准的四条：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我们要按着这四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要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你们各位很长的时间都在工作中，没有机会学习和研究，身体有的还不大好。这次到党校来，不仅得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使长期工作疲劳的同志有一个休养的机会。休养好了，学习好了，将来出去做事情。

在你们现在学习的时候，正是世界处在很大变动的时候。世界的变动各个时期都有。中国的社会已经有过几次大的变动，由原始社会进到奴隶社会，再由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又由封建社会进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的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三次，现在要改变第四次。

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同过去法国、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的二月革命除外）由封建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是不相同的。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已经有三千多年了。直到现在，我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封建关系仍占统治地位。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在完成这一转变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要放弃领导权。

我们的党校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党校第一部的同志从去年一直学到现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整顿三风，接受路线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这是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在思想上争领导权。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

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国民党有五十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做过一些好事，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它并没有完成。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意见。那时国民党中的一些人赞成国共合作，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便要打击共产党，打击群众。果然，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逐渐掌了权，一九二七年他一到南京就明令“清党”，镇压共产党，打击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抗战时期是在国民党反动十年之后，打内战十年之后。抗战是不是革命呢？抗战是革命。可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又搞法西斯。中国的法西斯同外国的法西斯不同，外国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法西斯是买办的、封建的，它没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没有侵略的性质，但它是反对人民的。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不愿意人民起来抗战，奉行片面抗战的方针。他们认为抗战是政府的事，老百姓只要出兵出钱就行了。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是全面抗战的方针，认为只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我们同他们斗争。你不要老百姓起来，我们要他们起来，一个要，一个不要，便有斗争。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开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

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我们是要农民还是不要农民？如果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一致，就是说完全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俘虏，把老百姓当牛去挤奶汁，有这样的共产党吗？可能有，但不应当有。那末，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的。在我们党内就曾经有一部分人离开过农民，牺牲农民群众的利益去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脱离了农民，甚至连中等资产阶级也脱离了，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当前的敌人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妨害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我们主要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国民党天天反对我们动员人民，它还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对这些我们就要斗就要争，其中就包含着争夺领导权。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办党校也是为了要换这个朝。

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头一个换朝，不知道第二个换朝。头一个换朝他们有经验，叫做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赞成；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赞成；反特务斗争，他们赞成；不让胡宗南进攻边区，他们赞成。但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的那个头一个换朝。中国革命已经经过了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革命都属于头一个换朝。头一

个换朝在抗战胜利以后是不是马上就完成了呢？还不会。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出去了，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还没有完成，就是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实施也还是不充分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艰难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搞了四十年，没有成功。后来我们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艰难曲折的。国共合作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搞了三年多；接着是国民党的十年反革命；现在抗战，国民党搞两面政策，一面抗战，一面反共。所以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

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当然，我们共产党也要进行宣传，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不要犯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干这两个革命，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季米特洛夫讲得好，这要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反对胡宗南进攻、六年抗战以及十年内战都是斗争，

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斗争，就是要从这些斗争中来考验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

刚才讲了两个革命，而要完成这两个革命，就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这四条标准的革命政党。我们党成立二十二年了，经历了三个革命时期，但还没有造就好，我们党还不统一，水平也还低。如果我们的党更统一了，水平更高了，那末可以断定，中国革命就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从今天做起。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

的宗派主义。我们在山头上斗争的时间很长了，十年内战时期共患难，现在又有六年抗战，这便结成了班子，各个班子的活动是不统一的，而且水平较低。但是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要进行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

同志们！完成这两次革命不是像煮一顿饭或造一所房子那样简单，而是要推翻我们的阶级敌人。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要压迫我们，我们就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不是推翻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今天还在抗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我们也不愿意同他们打仗。但是，看样子国民党是下决心要同我们打了，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想要消灭我们。因此我们要警惕，不要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上了他们的大当。在座的很多人都是经历过那一次的，不仅有我，还有周恩来同志和别的一些同志。我们都和国民党人在广州开过会，那时候他们对革命的道理不懂得，什么力量也没有，是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搞起来的。搞起来以后，就一脚把我们踢开了。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的那本书上还在骂共产党。这次国共合作，我们可不要再上当了。

在党校的两年中，你们要参加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马、恩、列、斯的著作。此外，军事班还要学军事课，文化班还要学文化课。一共是六门课。今天开学以后，你们就要开始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有的人已在前方参加过整风了，但是还没有在延安参加过整风。你们参加整风以后，一只

眼睛就亮了；参加审查干部以后，另一只眼睛也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可能胜利呢？另外，还要学党史的历史，党的二十二年的历史都要学习，进行分析和研究。关于学习的方法，季米特洛夫讲过，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

今天开学，我就是讲清楚这个方向，使同志们可以安心，这样学下去对你们有帮助，对全党有帮助。我们要干两个革命，要使两个革命在我们手里取得胜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并且要学好本领，为劳苦大众办好这两件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发动 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 给董必武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

董：

甲、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不知重庆月来舆论如何？望电告。

乙、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1]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不久将有通电、文章广播，请预为准备。

丙、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群众^[2]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毛泽东 周恩来

真 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2〕指《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

毛泽东关于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等问题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

荣臻同志及分局各同志：

（一）说拥政爱民及吴满有方法不适用于晋察冀是不正确的。拥政爱民是红军以来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即使执行得有成绩的地方仍须检查其缺点，使之更进步。恰是最近几年各地发生了严重偏向，军队轻视党政民欺压党政民之事不断发生，晋察冀亦不是例外。你们正须彻底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于党政民的一种骄气、傲气，必须深刻检讨，开展自我批评，才能使军队与党政民打成一片，更好的对付敌人。（二）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此种方法（特别是劳动互助方法）你区正须提倡。（三）分局对整风至今没有正确认识，对中央两个“四三”决定及各项整风指示未曾认真研究，这是由于你们自己在思想上没有打通，因此必须从你们自己的思想检讨做起，发展自我批评，认真整好你们自己的三风，才能在全体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

毛泽东

未文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关于击退国民党第三次 反共高潮后的形势和 我党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

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的进行不声不响的对于我军的军事进攻；对于日军及伪军则采取消极态度，同时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的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文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程度，降敌者日益增多。英美两国舆论对于国民党抗战不力与政治黑暗日益不满。国内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和我们

同样受压迫，同情我党的倾向在增长中。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毛 泽 东

八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

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例，对于这些部门，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学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的（逮捕审讯）约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

长，均须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乃是广大的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地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调查研究，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之轻重，或

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搜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

争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查出二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都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的，许多人且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

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形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豫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至八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二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为将来准备了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好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在此次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

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分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反动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地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针与经验，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并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创造你们自己的经验。

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掺杂着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他部门及其他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或地方，便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

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周 恩 来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里，须先回答一些疑问。

有人问：为什么早不说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偏偏现在来说？我们回答：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过去只是

因他的发展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

于是又有人问：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不能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警告了我们的。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的思想么？即在对外，国民党还不是有人在提倡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

么？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因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各国民族特性及国际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专政本身，在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说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削弱，资产阶级在内政方面已经不能采用旧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就只得采用恐怖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为什么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呢？为什么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而不提取消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呢？我们回答：这就因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尚存在，尚未走到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抗战旗帜尚未倒下，国民党尚能影响一部分虽然是日渐减少的人民，尚不敢公开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不仅因为抗战，而且也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不能独立，因而也不敢公开承认）。故我们只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不反对那些愿意抗战愿意民主的国民党员，并且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反对那些反动派。故我们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并且还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而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故我们只主张解散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并不主张取消国民党组织。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于写出一本《中国之命运》，提出最反动的取消中共的主张，故我们今天乃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及其实质。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警醒和教育，首先对于我们党内也是一

种警醒和教育，并且这是最实际的肃清党内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否有它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呢？我们回答：有的。下面，我们就分段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打着抗战旗帜、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于是他要消灭共产党，便装着“不诚无物”的样子，很沉痛地说“不解决中共问题，死了也不瞑目”，其实这正是他“无物不诚”之处。于是他要取消边区，虽经过他在庐山谈话会承认，经过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他也可一手取消，这又是他“有物不诚”之处。

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时候，要人民盲从他不抗日而安内。抗战初期，要人民盲从他片面抗战。现在，又要人民盲从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其实，他在内战时，早夸下海口：“剿共失败，必将自杀以谢国人。”可是从来也没见他实行过。失败时要实行连坐法，但也没“坐”到他头上。抗战前，他也曾夸下又一海口，说“我可以相信，如

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战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何止六十万，也没看见他有什么高明策略打败日本。而现在绝对服从他命令的嫡系军队更不止六十万，他反而倒要勾搭日本了。可见他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如出一辙！

蒋介石在心理建设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其实，他的买办性是依赖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又发展为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他强调诚，但他是最不诚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这次抗战合作，对苏对共对人民，也就是对革命对抗战，他都没有诚意。并且他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1〕}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们不给孙夫人^{〔2〕}居住自由，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养病自由，得苏联帮助而反苏，得共产党帮助而反共，得人民的帮助而压迫人民，满朝囤积、遍地贪污而不惩，通敌叛国、走私吃饷而不办。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谈什么忠孝！搁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谈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这哪能说到信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炸民变，这哪能说到和平！所以他这套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

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在《中国之命运》中，有所谓“孟子起

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的话，故《皇朝经世文编》及陈弘谋《五种遗规》两书乃得大用。

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³⁾的湘、淮军传统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外认为不能单独抗日，必须依靠外援。他公开说：“（日本）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哪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到梧州、邕宁。”“他（指日本）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哪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国家作战呢？”因此，他的抗战国策，早就定在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吞并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的上头。但现在日本既

未征服俄罗斯，又不能吃下美国，反倒压在中国头上，于是他便着急起来，一方面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以便内战，另一方面便要与日本勾勾搭搭了。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内坚持武力统一，主张“军主政治”。他统治十八年，从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变直到今天，他几乎无一年不在战争中，而且无一时不在打内战的主意。北伐前有“三二〇”，北伐后有宁汉分家，宁汉合作。内战中有党内战争，党外战争。抗战中又有削除异己，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公开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故“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这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的自白了！但是他居然还假惺惺地说：“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不要说中共及其领导的武力和边区是抗战的，是革命的组织、武力和政权，就连其他党派既没有武力，也没有政权，为什么也是一点自由没有，而且到处受压迫，更不要说“发展和成功”了。甚至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真正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孙夫人，还不也是不自由而受压迫么？所以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好，都是蒋记的，早已不是孙中山改组时的国民党，也不是思想自由或各派共存的国民党了。

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所以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

最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他一方面侈谈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憧憬于《礼运》大同之篇，所以实质上他是在民生主义的幌子下，存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经济买办经济的思想，也就是农业中国工业外国的思想。他这种经济思想，不仅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然地使中国经济更加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华民族更难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

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三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是有他们的历史来源的。蒋介石常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学生，其实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经背叛过一次，现在又一次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

我们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来看，蒋出身于封建家庭。辛亥革命，他一出手便在军阀张宗昌之下当排长，奉陈其美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的革命果实。这时，孙中山是以革命党和新军、会党的结合而成功，而陈其美、蒋介石却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初期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结帮卷入交易所的投机浪潮中。后来这种传统，更为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他人物所发展。于是，这一买办集团，遂成为统治后二十年中国的核心。虽然蒋介石在广东也反对广东的英国买办，可是戴、陈留在上海，一开始便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蒋介石一到长江流域，便投入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怀抱，首先揭旗反苏、反共、反工农。所以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未真正承认，也从未真正实行过。

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真正崇拜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在办黄埔之初，他是反对苏联顾问的，等到得到苏联军火帮助，他又高叫第三国际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然而不久，三月二十日围攻苏联顾问在广州的东山

住宅的，也就是他。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他领兵东征，便与许崇智发生地盘的争执。他赶走汪精卫，更是军阀行为。他率兵北伐，对待各军，更是排除异己，拥兵自私。所以，不待宁汉分裂，他已经发展起新军阀的思想和行为了。不过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等到一旦反革命，他便成为直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而他所领导的集团，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

十年内战，便是他这个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具体表演。不论是对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党内战争还是“剿共”，他都用了这一套手法，并且从德、意、日那里学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新法宝。十年中，他派了不少的黄埔学生去学，并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务人员直接来教。

从西安事变到抗战六年，他更是精彩地表演了这一套手法。不要忘记蒋介石代表的那部分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革命性一面，但更不要忘记他那反动性的另一面，而且这一面他愈玩愈精。有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所以他在这次抗战当中，居然敢演局部的内战，同时又能见风使舵，故作悬崖勒马的惊人之举。不过，我们不要为他迷住，戳穿这套西洋景，也就没有什么奥妙。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针锋相对的办法，便是最好的对策。

四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这纲领我们可以为它归纳成为十二项：

- 一、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
- 二、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排斥英美自由主义；
- 三、通敌反共，破坏抗战，利用外援，进行内战；
- 四、压迫各小党派，欺凌少数民族，不顾华侨痛痒，漠视灾民苦难；
- 五、凭借武力，削除异己，组织特务，篡夺党权；
- 六、摧残民权，剥夺自由，利用保甲，实行独裁；
- 七、依靠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工业生产；
- 八、滥发法币，抬高物价，垄断民生，剥削劳动；
- 九、集中土地，损害民食，捆绑壮丁，损伤民力；
- 十、放任贪污，强征捐税，纵容走私，任意检查；
- 十一、焚书坑儒，荼毒青年，威迫利诱，斫丧人格；
- 十二、紊乱法纪，败坏道德，摧残文化，毁灭民族。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这十二条纲领，当然不是公开宣布的，也永不会公开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它是一条一条一项一

项在实行，而且只有比这多，不会比这少。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之软弱处，也正是它的无耻和卑怯处。蒋介石国民党拿着这样纲领在实行，如何能将抗战领导到胜利？无疑地，要将中国领导到分、到烂、到乱、到垮，将抗战领导到失败。

我们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进步的，我们决不容许抗战失败。我们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加强领导权的争取，这首先就必须壮大和巩固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有力地领导别人，制止中间分子的动摇，孤立顽固分子，而坚决地实行我们的抗战十大纲领和“三三制”的施政纲领。

讲到策略，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策略是依其纲领的方向，依照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灵活运用的。

如对日的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协。

如对英美的哄吓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便其内战。

如对苏的冷冷热热，以冀达到为它牵制日本，便其解决内争的目的。

如对地方势力、各小党派威迫利诱，以图达到离间我们、孤立我们便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对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元老时好时坏，来看他们是否对统治者怀有贰心。

如对进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明压暗勾，以逼其离开我们，反对我们。

如对工农劳动大众监视侦察，隔断其与我们的一切来往。

最后，对待我们，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而其策略亦时软时硬。不过软的只是敷衍一时，决非真正好转，同时，也是为下一步硬的做准备；在硬的做不通时，也可暂时软一下。论时期，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

“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抗战后，表面上转向团结，但是先暗斗而后明争，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转到取消共产党。他的特务政策，也与这三时期相适应。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

五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它的组织的。它的组织寄生在国民党内而篡夺了党，寄生在三青团内而统治了团，寄生在军队中而管制了军队。这就是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有三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在国民党内，那就是CC。他胚胎于一九二六年，创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为其灵魂和核心。从中央直到地方有调统局、调统室。CC的势力也就是特务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他掌握着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宣传方针以反共为第一。国民党经费，一九四三年度预算为二万万八千四百万元，大部分是用在特务的党务活动上，而特别费并不在内。

第二个系统是在三青团内。那就是以复兴社为前身而转成今日三青团内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胚胎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黄埔军校同学会，创始于“九一八”后之力行社，后改复兴社，至抗战初并入三青团，而康泽所领导之别动队及特训班加入进

来，成为三青团的特务灵魂。

第三个系统是在军事系统内，那就是政训处和军委会调查设计局。贺衷寒的政训处有一批军队特务，连军官都厌恨他们。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是戴笠一手组成的，创始于一九三二年，初期为戴笠复兴社之特务组，现在羽毛丰满自成一系了。军统局的组织最庞大，人、钱均多。军统局本身分处，下分区、站、组、队。他的组织触角最广，军队中有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各级情报参谋，军事机关中有调统专员，边区有军事督导组，保安团队中从保安处长、第三科长直到下层情报人员，全国的整个警宪系统除少数几省外，都在其控制之下。全国整个税收系统，有其缉私队和检查处来管。全国交通机关，有其监察处和检查站来管。国内外外交系统乃至武官情报人员，都归其管辖派遣。全国经济系统有其稽查和特工人员。敌伪沦陷区工作归其管理。破坏我军、我区的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也归其布置。与CC平行进行。

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一特务统治的世界，而且国民党特务还与日特、伪特勾结在一起。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要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

中国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四维八德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道德规范。四维，指礼、义、廉、耻；八德，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2〕即宋庆龄。

〔3〕指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

朱 德

加强教育，提高战斗力，训练自己成为国家民族的劲旅，成为党无战不胜无坚不摧的铁军，乃是我们部队目前重要的任务，特别是环境比较安定的部队，更应如此。

军事教育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比如说，我们的部队目前需要教些什么，怎样教法，什么人教等问题，都需要根据部队的真实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不然情况不真，方法不对，教育仍然是没有办法搞好的。

我们部队各个部分之间，从历史上来说，成立有先后久暂之分；从武器装备上来说，有优劣之别；从处境来说，有在前方浴血抗战、坚持敌后的，也有在陕甘宁边区守卫河防、屏障西北的。但一般地说，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久经战斗与训练的部队。他们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与相当程度的军事素养。但也由于环境不定，作战频繁，勤务过多，加之过去教育上存在着一些弱点，因而在练兵中，很多基本的东西还未能按部就班、结结实实地教好练好。我们的部队既非新兵，也非“干部兵团”。因此，一方面对他们

* 本文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不能实施训练新兵的一套，只能是进行补习教育，即根据情况，缺什么就教什么，需要具体地教，不是一般地教；另一方面补习教育的内容，也不是一般的战术原则或大的东西，而应着重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应使每一个战士能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技术。用步枪的就应学好步枪的保管、使用，练好射击、刺杀。用手榴弹的，就应学好投弹。其他如机关枪、炮等都应如斯。务使物有所用，人与技术密切地结合。为此，对那些拿着武器而还不会用的人，应该教会他们。已懂要领并会使用的人，则应复习。同时，学这些东西与学习政治、文化及一般战术战略原则不同，不需要多讲而需要多练，经常地练，反复地练，要练得有劲、有力、准确、熟悉。应改变过去重训不重练的偏向。因为战士的技术教育，道理讲几次也就够了，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道理把技术练好。仅知其道理，则技术还是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比如说：刺杀你不练，就没有劲，就拼敌人不过；射击你不练，就不会准确，就打不倒敌人；投弹你不练，就投不远、投不准。假定使用技术的人，不能用自己的技术去杀伤敌人，便不可能对技术产生高度的信心，战斗力便不会发扬到最高度。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家总是特别强调技术的作用，他们说：“只有掌握良好的技术，才会有旺盛的士气。”而我们则应把这句话改过来说：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因为旺盛的士气，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是经常保持着的，不畏难，不惧险，进攻在前，退却在后，视死如归。但也必须看到，我们军队之所以会有如此旺盛的士气，乃是依靠政治上的优势，而技术上则缺乏基础，这不单是我军的装备不如敌人，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很多同志对现有技术的掌握还非常不够。因此，过去不知有多少可爱的同志作了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牺牲，不知有多少可以全部歼灭敌人的机会而未能全部歼灭。这

个血的教训应该好好地接受。可以设想：假定我们能进一步地掌握技术，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那末我军士气必然会更加高涨，作战能力与信心必然会更加提高，给敌人的杀伤必然会更加大，自己的损失则会更少。但我们所谓技术教育，并不是指那些现代化的新技术而言，而是如何把现有的技术练好，务使每个战士在现有条件下，既能在部队中集团作战，又能在分散时各自为战。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有些新的技术装备，用新的技术给敌人以更大的杀伤，给国家民族多尽一点力。而且我们也相信，总有一天八路军、新四军会获得新的技术装备。但今天我们也决不幻想新技术装备会凭空而来。因此部队的技术教育，固然也不妨教育部队特别是干部以一般新技术的简单知识，但主要的还是要把现有的技术练好。假定每个战士都能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武器，发挥其威力至最高度，那末我们的教育便是一个空前的胜利。

学习技术，也和学习其他的東西一样，必须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来，应由低级到高级，由浅而深。比如射击瞄准，应该先近后远；学习动作，应该先简后繁。确确实实，学一个算一个。学好了一个之后再转入另一个。只有这样才能使动作准确、有力，熟练生巧，才能使学者信心日高，胆量日壮。切不可潦草从事，求数量而不重质量。

为了搞好部队的技术学习，尚有二事是需要举办的：其一为开展军事体育运动，锻炼体力，养成尚武精神的问题；其二是在部队中有计划地开展教育战线上练兵运动的问题，如以连或团为单位，选择几个最好的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作为大家学习的标准，名称叫“神枪手”、“贺龙投弹手”等，均无不可。对这些人，部队中应该有计划地培养、教育（如上特别课等）、奖励（精神的、物质的、开会时讲他、报纸上登他

等)、提拔他们,务使大家觉得学好一门技术是无上的光荣,因而自愿地向这些人学习看齐,造成竞技之风。另外也应以连或团为单位,规定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务使大家必须完成才算及格。例如射击规定一百米或一百五十米的距离,五十厘米环靶,必须命中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七十才算及格等。这样就可以把个人与集体的成绩联系起来,不会把运动搞成个人突出。这里也和其他的工作一样,对那些教学好的同志,固然应该奖励,而对那些消极怠工、不好好学习的人,也应该毫不客气地展开批评,甚至斗争。要克服游击主义习气,务使大家重视学习,关心学习,积极起来,不如此,教育的高潮便不能形成。

至于教员问题,我们还是要依靠现职干部,而不要指望从哪里请来一批教员教,因为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这里我们固然要反对有些同志自满自足、不学无术的现象,使他们晓得自己的知识确实还不够得很,需要学习;但着重地要反对那种强调现职干部水平低下不能教人的说法。不错,我们很多干部未进过军事学校,文化程度也确实不高,讲起话来,做起事来,都有点“土里土气”,因此你要他去教书本上的东西,去教他未见过的新技术知识,那当然是不行的。但他们都是身经百战、当兵多年的人,他们有打仗与使用武器的经验。所以只要教育计划不是那样好高骛远而是切合实际的,只要上级能在教育的过程中多进行具体的帮助,那末,完全可以相信,我们现有的干部不仅可以教,而且还可以教得好。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计划与要求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实事求是。一切的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其他事情如此,军事教育亦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八（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六十二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五十六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百分之十。其详情如次：

第一，日寇侵华全部兵力，就一九四三年六月份材料，共计二十七个半师团，十五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如以两个旅团折合一个师团计算，共为三十六个师团兵力。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者为二十一个师团，占总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国民党军队所抗击者为十五个师团，占总兵力百分之四十二。此种比例，仅就分布状况计算。如按作战实情计算，则共产党军队所抗击者较上述数目还多些。至于海南岛、广九路区域共产党游击部队所抗击的敌军，尚未计算在内。

第二，华北敌军十一个师团，十个独立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合计为十七个师团。共产党军队（八路军）抗击了百分之八十三，国民党军队仅仅抗击百分之十七。计：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柴山），分布于大同、归绥、朔县、集宁地区。第二十七师团（原田雄吉），分布于天津秦皇岛段北宁路沿线。第三

十六师团（冷本），分布于晋东南沁县、晋城、潞城地区。第四十一师团（清水规矩），分布于天津、沧县、献县地区（主力近有南调讯）。第五十九师团（柳川），分布于山东泰安、淄川、惠民、丘县、寿张地区。第一百一十师团（林村），河北定县邢台段平汉沿线、及德石路西段。独立第一旅团（小松），河北河南交界之沙河、淇县、大名、林县地区。独立第二旅团（中田），察哈尔万全、阳原、蔚县地区。独立第三旅团（毛利末广），山西忻县、五台、繁峙、宁武地区。独立第四旅团（津田酒），山西榆次、盂县、辽县地区。独立第六旅团（奥村），北平附近。独立第七旅团（正井义人），山东河北交界之德州、庆云、蒲台、章丘地区。独立第八旅团（喜田），河北石家庄、邢台、广宗、宁晋地区。独立第九旅团（池上贤吉），冀中衡水、武强、饶阳、晋县地区。独立第十五旅团（田中信南），河北定兴、定县、平汉路两侧。

以上共六个师团，九个独立旅团，全部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所抗击。

以下五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为共产党军队（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之敌军：

计：第十七师团（酒井康），江苏碭山、淮安、赣榆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七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三十。第三十二师团（石井衣雄），山东济宁、滕县、临沂、莒县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八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二十。第三十五师团（板西，又谓是柏壬），开封、新乡、滑县地区，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三十七师团（长野义佩），晋南三角地带，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三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六十九师团（井上真卫），山西临汾、离石、清源、沁源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七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三十。独立第五旅团

(内田银之助)，胶东半岛，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七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三十。独立骑兵第一旅团（榜相），归绥、包头、固阳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二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八十。独立骑兵第四旅团（左久坞为人），河南山东交界之永城、太康、民权、城武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四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六十。

第三，华中敌军十三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合计十四个半师团。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击百分之四十七，国民党军队抗击百分之五十三。计：第六师团（神田正钟），武汉、黄冈、黄陂地区。第十五师团（酒井直次，有被击毙讯），南京、镇江、高淳、巢县地区。第五十八师团（下野一霍），鄂中汉川、云梦、潜江地区。第六十师团（小林元），上海镇江段京沪路沿线。独立第十二旅团（允影），苏中阜宁、宝应、江都、海门地区。以上四个师团，一个旅团，全部为共产党（新四军）所抗击。

第十三师团（内山英太郎），宜昌、沙市、当阳地区。第三十四师团（大贺茂），南昌、德安、安义地区。第七十师团（内田孝行），浙江金华、桐庐、嵯县地区。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

以下六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为共产党（新四军）及国民党所共同抗击。计：第三师团（山本三男），豫南信阳、湖北孝感、随县、礼山地区，共产党及国民党各抗击百分之五十。第二十二师团（太城三治），沪杭甬铁路沿线，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二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八十。第三十九师团（澄田睐四郎），鄂西钟祥、荆门、江陵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二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八十。第四十师团（青木敬一），湘北岳阳、鄂南通城、大冶、咸宁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三十，

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七十。第六十八师团（中山淳），南浔路北段及九江、蕲春沿江，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三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七十。第一百一十六师团（武内俊二郎），湖口、芜湖沿江，共产党抗击百分之四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六十。独立第十三旅团（早渊），安徽合肥、蚌埠、滁县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六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四十。独立第十七旅团（高品彪），湖北沔阳、监利、华容、石首地区，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三十，国民党抗击百分之七十。

第四，华南敌军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计：第十八师团（牟田口廉地）之一旅团及第五十六师团（渡边正夫），滇西腾冲地区。第五十七师团（中野莫光），广九路沿线。第一百零四师团（菰田彦一），广州、从化、三水地区。独立第十九旅团（松井贯一），粤东潮汕地区。雷州独立旅团，雷州半岛。以上大体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但广九路及海南岛地区，中共领导之游击队亦抗击了敌军一部分。

第五，目前日寇在华军队，均不足编制定额。各师旅团之间，亦均参差不齐。约计敌目前在华兵力三十六个师团，只有六十万人左右。国民党三百余万依靠外援并借全国财富所供给之军队，抗击日军不过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只有五十万人，凭借甚劣之装备（政府不予补给）与各个财富甚差之抗日民主根据地，反而抗击了日军三十五万人。此外，尚有伪军六十二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叛国降敌伪化的，一般地国民党是不打这些伪军的，几乎全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为共产党所抗击。

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就和各同盟国配合作战上说，究竟是共产党起了大的配合作

用，还是国民党起了大的配合作用？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了。

根据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全国伪军六十二万余人，大部为国民党军队所伪化，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仅在广东方面有约六万伪军任其自生自长，除共产党打了一部分外，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兹将伪军情况概述如次：

全国伪军除伪正规军外，尚有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全国伪正规军三十二万七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人，共计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人。计华北伪正规军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十七万八千人。华中伪正规军九万四千八百人，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华南伪正规军二万三千二百人，伪地方武装三万六千八百人。除华南伪军外，华北华中敌后全部伪军皆在敌寇之驱策下不断的配合敌寇对共产党“扫荡”与“清乡”。数年来，伪军参加正面战场向国民党军队作战者，只有一次，即一九四三年夏季湘北鄂南之战，有伪武汉行营直属之一个师（第二十九师）参加。华北华中伪军对正面战场一贯是和国民党军队和平相处，对共产党军队则配合敌寇积极进攻。因此，华北华中全部伪军共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人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占全部伪军（包括华南）百分之九十强。而国民党方面所牵制（不是抗击）者，仅华南伪军六万

人，不过占全部伪军百分之十弱而已。何况华南伪军中，亦有一部分为共产党之游击队所抗击，并非全部被国民党牵制。

甲 华北方面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总兵力约六万人。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以上七个集团军，均位于冀东之迁安、遵化、丰润、滦县地区。第四集团军陈志平，位于鲁西之东平、东阿、长清地区。第六集团军齐荣，位于保定地区。第八集团军徐贯一，位于胶东平度地区。第一百零二集团军高德林，位于冀南豫北之安阳、邯郸、武安地区。教导集团军田申，随总部住于北平。该部为华北伪军中战斗力较强者，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在鲁西之定陶、菏泽地区率部投敌。现总司令部设于开封，辖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兵力约三万人。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均位于濮阳、东明、考城地区。该部投敌后，积极配合敌寇，向共产党进攻，其战斗力亦为华北伪军中之较强者，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一九四三年春季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率部投敌。现辖三个师，总兵力一万二千人，全部仍在原地区活动。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

该部原为国民党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在豫北陵川地区率部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现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总兵力二万五千人。总部设于汤阴。所属各部，分布于滑县、淇县、林县地区。编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二师副师长，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现兵力四千，位于鲁南临沂、郯城地区。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兵力四千三百人。该部为骑步兵混合，位于绥远固阳地区。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国民党骑九旅之团长，于一九三三年率部投敌。现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总兵力三千人。位于绥远百灵庙地区。

八、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后被敌杀害）。白逆原为国民党之师长，于一九四〇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现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总兵力二千人。位于绥远之固阳、百灵庙地区。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杨诚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团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现第一师位于武乡，第二师位于崞县，军部位于太原。总兵力五千一百人。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国民党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一九三八年率部投敌。现辖两个纵队，活动于山西属离石、中阳、太原地区。总兵力三千人。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总兵

力三千人。活动于归绥、固阳地区。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国民党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总兵力四千五百人，活动于包头地区。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活动于豫北之武安、内黄地区，总兵力三千五百人。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一九四三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现位于遵化、迁安地区。战斗力比华北其他伪军较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伪小股正规杂牌军尚多，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一九四三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师长，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山东诸城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郝逆原为傅作义部之特务营长，抗战后率部投敌）。以上各杂牌军，直属各省敌伪长官指挥，总兵力四万二千人。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乙 华中方面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部队分布于南京、杭州、天长、合肥、扬州等地，各驻一个师。总部设南京。兵力共一万五千人。编制装备略同国民党。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率部投敌，该集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分布江苏之泰州、江都、靖江地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一九四一年三月率部投敌），一九四二年十月被扣，番号被取消。所辖四个师另一独立旅直属伪绥署指挥。部队分布于江苏之东台、盐城、如皋、南通一带。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分布于江苏之泰兴、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地区。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兵力三万四千人。编制装备，与伪第一方面军同。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共一万人。部队分布于湖北之随县、应城、信阳、云梦、咸宁地区。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现

辖伪保安第三师，活动于鄂南之天门、汉川地区，兵力三千。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总兵力一万五千人。部队分布皖北之宿县、亳州、苏北之沐阳、灌云及豫东之太康、商丘等地。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一九四二年夏季率部投敌。现驻苏北灌云地区，兵力三千八百人。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二千人，担任浙东杭甬铁路沿线守备。第十三师丁雪山部，已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第五战区第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团长，一九四一年八月率部投敌。部队驻皖中无为地区，兵力二千人。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兵力一万人。装备战斗力为伪中央军之冠。

十、一九四三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因尚未查明投敌后之番号，故未列入。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四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一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

丙 华南方面（包括海南岛）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

头。兵力六千人。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总兵力一万七千二百人，分布于广州、南海一带。

三、华南伪地方军三万六千八百人。

以上华北华中伪军共五十六万余人，全部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一枪不打。只有华南伪军六万人，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但共产党亦抗击了一部分。

由此可知，蒋介石先生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十六个师团共六十万敌军中，国民党仅仅抗击十五个师团，计二十五万人（百分之四十二），共产党则抗击了二十一个师团，计三十五万人（百分之五十八）。至于那六十二万伪军，几乎全部都为共产党所抗击。很明显的，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已亡了，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根据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刊印。

毛泽东关于消灭党内外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各负责同志：

为彻底消灭党内党外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各种错误思想，应根据解放报发表的各种文章、文件，专门进行两个月党内及民众中的阅读、讨论、演讲、座谈，深入党员群众及工农兵群众，并争取各中间阶层，将各重要文章、文件、新闻印成总集，发干部阅读。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及最近发表之《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与《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及某些最重要文章，应各印成单行本，向我区、敌区人民广为散发。华北应向平津等地散发，华中应向上海、武汉等地散发。望将此事看作极重要事件，联系反特务斗争，由各负责同志亲自主持办理。

毛泽东

未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昨日本报发表了两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即《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这两个文献以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无耻谰言和荒谬宣传，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真理：即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没有了中国。

近年来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外进行了无数的狂妄的荒谬宣传。在国际宣传上，便是拼命宣传国民党抗战的“丰功伟业”，似乎今日反法西斯盟邦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国民党对日抗战之赐。不信，请看蒋介石先生今年“七七”告国民书，他大言不惭地说：“这一年来，在浙赣、在滇西、在苏鲁、在冀察、在大别山、在太行山、在各战区、以至最近在鄂西的战斗，牵制了日寇凶横的侵略军队，使他不敢窥印度，不敢侵澳洲，也不敢向北跨越阿留申群岛，以切断美苏联络（注意：此处留下了西伯利亚一个缺口，暗示日寇可以进攻苏联），在此时期，我们盟邦圆满执行战时生产的计划，顺利增强各战场的战力，因之（！），纳粹侵略者继斯大林格勒一役败衄之后，复大败于北非。”好一个丑表功，好一个大牛皮！原来斯大林格勒与北非的大胜利，竟也是由于国民党牵制了日寇得来的！可是，事实是铁面无私的，查一查看，到底国民党牵制了多少日寇军队

呢？数字告诉我们：总共不过十五个师团，二十五万人，还不到斯大林格勒一个战役所歼灭的纳粹侵略者三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七十三。

跟着这一宣传而来的就是：“中国不能赤手空拳作战……中国需要更多的武器和军火”，“中国既为联合国之一员，自有权利期待美国供给军火”，“飞机，飞机，更多的飞机”之类的叫喊（上引语均系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美国说的话）。不错，中国不能赤手空拳作战，可是，请问，第一，抗战以来，盟国所供应的军火，算起数目来不可谓少，这些军火难道牵制这区区二十五万敌人就消耗光了么？第二，中国不能赤手空拳作战，难道八路军新四军就能赤手空拳作战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一粒弹一支枪也不供给呢？八路军新四军既是抗日军队之一部分，亦自有权利要求政府供给军火啊！问题中心不在盟国供给不供给军火，而在供给了的军火用在什么地方去。如果美国的飞机不用来轰炸东京、大阪、平、津、沪、汉的日寇，却用来屠杀甘肃、伊盟、贵州、渭南的人民，如果苏联的军火不用来杀敌，却用来武装包围边区的部队，那么，怎能怪盟邦要求中国提出不作内战之用的保证呢？六年来，盟邦将近十六万万美元的借款援助，只不过牵制了敌人十五个师团，而且还天天喊要援助，要军火，要飞机，这不是所谓“三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么？

在国内宣传上，便是污蔑八路军新四军为“游而不击”，称之为“奸军”、“叛军”，辱骂共产党“组织武力，割据地方”，是“新式封建”，是“变相军阀”，称之为“奸党”，并且大肆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事实胜于雄辩，两个文献所列举的数字与事实，完全粉碎了这种荒谬绝伦的无耻宣传。

事实证明了：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而是

国民党反动派不游不击。事实指明：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抗击了日寇二十一个师团，三十五万人，占百分之五十八，国民党仅仅“抗击”日寇十五个师团，二十五万人，占百分之四十二。共产党抗击了伪军五十六万，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六万。两项共计，共产党抗击了敌伪军九十一万，国民党仅仅“抗击”与牵制敌伪军三十一万。但是国民党拥有三百余万军队，相当好的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则连游击队在內不过五十万，不到国民党的七分之一，装备尤为落后。国民党抗战以来得到盟邦的援助计苏联三万万美元，美国七万四千七百八十万美元，英国一万万一千八百五十万英镑的各种借款；共产党则非特毫无外援，而且国民政府不发八路军新四军一文薪饷、一粒子弹。国民党现在统治的地区（沦陷区不计）尚存十多省，二万万以上人口，共产党则其所有抗日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均在敌后，人口不过二千余万。不仅如此，共产党军队的作战地区，是国民党军队远在五六年前就抛弃了的敌占区，那里据点林立，碉堡密布，而自己却无巩固后方，其所以能坚持者，全赖依靠人民，不惜牺牲，进行昼夜不息的战斗；去年一年（抗战第六年）八路军新四军大小战斗计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次之多，每日平均七十五、六次。这难道就是“游而不击”么？而国民党军队呢？依凭着战壕工事，依靠着大后方，实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平时全线无战事，发发“无战斗之战报”；敌来则仓惶溃退，纷纷投降，敌去则广发捷报，大肆喧嚷。这当然不是国民党军队将士，贪生怕死，相反，国民党军队中确有许多真诚卫国的热血男儿，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的不游不击政策，以致军心涣散，士气消沉，许多热血男儿，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种事实，早已喧腾于国际论坛，敌寇亦毫不讳言，说国民党军队“已逐渐由抗

战向观战转移”。这难道还不是不游不击么？

事实证明：不是共产党是“新式封建”和“变相军阀”，而是国民党反动派是老式封建和道地军阀。污蔑共产党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的无耻妄人，其所持唯一理由为“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但是问题却在组织什么样的武力，割据什么人的地方。共产党组织的是抗日的武力，割据的是日寇占领的地方。中国现在不是在抗战吗？既然在抗战，为什么不要组织抗战的武力？中国不是半壁河山已经沦陷了么？不是要收复失地么？为什么不能从敌寇占领地方去“割据”几块抗日根据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不是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说过的么？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敌人而“组织武力”，并从敌人手里“割据地方”，这不是实行“守土卫国之责任”是什么？蒋介石排除异己，敌视人民，既不愿意承认人民组织的抗敌武力为国军，又将行政院三百三十三次会议上已经通过的承认边区的决议不予发表，自己不实行诺言，却来骂边区为“割据”。所有抗日游击队与抗日根据地天天请求蒋介石给予委任，他却死也不委任。他却凭借他自己委任自己的权力（人民是从来没有委任过什么蒋介石的），扩充军队至三百余万，却总共不过牵制了三十一万敌伪军，不游不击，守土无能，抗战不力，卫国无术，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不“组织武力”，那么，九十一万敌伪军又叫谁去抗击？如果共产党不“割据地方”，则非但敌后全部沦亡，再没有招展中华民国国旗的干净土，而且南渡君臣能否偏安巴蜀，不早已成了问题吗？这种“组织武力，割据地方”，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假如没有共产党，假如共产党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不去“组织武力，割据地方”，或者学蒋介石一样，组织庞大武力，割据庞大地方，而守土无

能，卫国无术，拥兵自卫，据地自私，抗战不力，贻误国事，那么，中华民国不早已完了么？

蒋介石又称共产党为“封建”，八路军新四军为“军阀”。则试问什么是封建？什么是军阀？以政治表现简单地说，封建是专制独裁，摧残民权；军阀是把持军队，残民以逞。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民主政治，设立了人民普选的参议会和民选政府，贯彻了减租减息，废除了封建奴役，人民有抗日的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政权是“三三”制的，努力于抗日、生产、教育。军队是志愿募集，用以打击敌人的。试问这是军阀么？这是封建么？国民党呢，在自己统治的区域中，实行一党专政，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新专制主义，实行保甲制度，取消了一切人民应有之自由权利，封建地租，原封不动，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政治是一党政治、特务政治、专制政治。士兵是捆绑来的，军队是用以铲除异己，镇压人民的，对抗战是不游不击的、是完全消极的。试问这不是封建是什么？这不是军阀是什么？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公开宣传孔孟道统、曾胡衣钵，难道不是事实吗？所有事实都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才是封建，才是军阀，而且是祖述孔、孟、秦始皇以至西太后的传统的老式封建，是承袭中国近代军阀开山祖曾国藩、胡林翼以至袁世凯、张宗昌（蒋介石曾当过张宗昌的排长）的衣钵的道地军阀。不过还找来了一批“外国”的法西斯主义，充实一番，中西合璧，造成了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又名新专制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万万取消不得，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大骂共产党为“奸党”、“奸军”，想必他们自己是“忠党”“忠军”了？可是问题是在

什么是忠，忠于什么？今日之中国，忠奸之界，惟在抗日。抗日者忠，忠于民族。那么，请看事实：国民党以三百余万大军，十六万万美元之外援，加上全国之财富，仅仅对付日本十五个师团，还是依靠了共产党的助力，依靠了共产党抗击九十一万敌伪军，否则除抗战初期抵了几下之外，恐怕连一个师团也打不了，早已逃之夭夭，变成流亡政府，或者早已降敌，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不信，请看事实：国民党在共产党抗击了九十一万敌伪军这种绝对有利的条件下，它的高级军官仅仅在两年内，投敌叛国者，竟有五十八人之多！国民党中央委员投敌叛国者，自副总裁以下竟有二十余人之多！全国伪军六十二万，绝大多数是由国民党军队变成的；汉奸吴开先堂哉皇哉坐飞机而来，日谍陶希圣居然校阅蒋著《中国之命运》……凡此一切，都是“忠”么？“忠”到连三十一万敌伪军也打不了，降将如毛，降官如潮，敌探满朝，可谓“忠”也已矣！至于共产党，以仅仅五十万军队，在全无一点接济之下，与九十一万敌伪大军血战，但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指挥员，没有一个投敌的中委，没有一连一排叛变为伪军的军队，没有一个日谍汉奸能在共产党统治区域逍遥法外……凡此一切，难道是“奸”么？如果是“奸”，那么，这是对昭和天皇、东条首相、汪精卫委员长的奸，对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奸，但对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解放事业，则是继往开来存亡继绝的大忠大孝，这难道还不清楚么？

虽然如此，我们尚不忍说，国民党人都是奸党，因为在整个国民党中，确还有热血爱国忠实于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人士在。可是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呢，我们却不得不说是准奸党，即近乎汪精卫之党，准备当汉奸之党，因为不仅汪记政府，汪记军队，汪记国民党，均是由这个同一的国民党出身，而且在

这个国民党中央现在还有人每天由蒋记加入汪记，另有大批人还正在准备着摇身一变，把自己变为张精卫、李精卫。

至于中国共产党呢？那末，事实证明了：（让我们套几句《中国之命运》来作本文的结束吧！）“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亦将不见中华民国名词了。”

根据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锄奸的 群众路线给邓小平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

小平同志：

（一）你们采取群众的锄奸路线，进行反特务斗争，这是正确的。延安经验证明，广大群众的反奸大会，是反对特务、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最好方式。这种方式应与首长负责、调查研究、个别解决的精细工作密切的结合起来，普遍的运用到各个地方去。

（二）群众反奸大会的内容，不是内战时期的公审大会，而是动员群众反奸、号召特务悔过的坦白大会，不是为了枪决特务分子，而是为了感化争取特务分子。这一点必须使干部认识清楚。否则就会发生错误。

（三）估计参加大会的群众，在愤激的情绪下，不顾宽大政策，不分轻重缓急，不分坦白分子与顽固分子，提出枪毙一切特务的过左要求，是很难免的，但领导机关必须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伤害了群众反奸斗争的积极性与仇恨心；另一方面要坚持宽大政策，坚持不杀少杀的方针，不要被群众的热情冲昏头脑，把坦白运动大会变为处决特务分子的大会。应当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党的宽大政策，并且使群众从亲身经验中晓得只有采取宽大政策，才能使特务分子敢

于向我悔过坦白，才能使反奸斗争更深入彻底。

至于罪大恶极坚决不愿改悔的个别特务头子，应当接受群众的要求，处于极刑，但不必在坦白大会上当场枪毙，不必急于杀掉。因一杀即将使许多其他地方顽固与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畏罪而不敢坦白自首。必须杀掉者亦可待清理完毕时，再开群众的公审大会，另行处理。

（四）你们在群众反奸大会上，是怎样进行的？得到一些什么经验？新发现一些什么重要案件？你们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的特务没有？如何进行清查的？希望电告我们。

中央书记处

九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 各党派不要受蒋介石欺骗等问题 给董必武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董：

(一) 解放报日内发表评十一中社论，当作我党的表示。
(二) 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三) 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请假不去，以示对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之抗议。

毛 周
二十九日

附：董必武关于国民党拉拢小党派问题 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毛周：

(一) 蒋今日上午在参政会讲话，关于实行民主政治说得

很多，宣布组织宪政促成会与党派协进会，据说他的态度很像诚恳的样子。

（二）昨日熊子明往汪山见君劭⁽¹⁾云：蒋已允组织招待各党派的协议机关，梁漱溟也可以请来，即邀君劭下山偕左⁽²⁾今日出席。

（三）主席团接我不出席声明后，请一无关重要的人劝我出席。我又去函云：有人利用参政会作反共宣传，我决不出席。王世杰告诉李璜说，审查会对军事报告决议，原有一段提中共问题说了不几句，昨已修改，我希望政府谋政治之解决，中共实践其诺言两句，别无他案，劝我今日出席。我因主席团既无新的表示，置之未理，后探悉审查会修改草案不是改短而是加长了。这证明王世杰不直接找我，而告诉李璜转我，又是劝我再出席的一次阴谋。

（四）蒋已允杨杰赴美研究军事。

（五）从上面几件事情看：

1、蒋对小党派取组织（拉拢）手段，极力接近张、左（自参政会报到以来，到山上找张三次，以联络感情，对我党出席与否装出冷淡样子）。

2、王前请我出席，是哀的美敦式的，我退席后，王无积极表示。

3、对杨杰亦表好感，前日请杨吃饭。

4、其作用在分化我党与小党派团结，派杨赴美研究军事，使小党派与地方军人中少一道桥梁。

董

二十五日亥

注 释

〔1〕即张君勱。

〔2〕指左舜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 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一) 秋收已到，各根据地须责成各级党政检查减租政策实行情形。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及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造出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在报上发表社论及减租运动的模范消息。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与政府的法令是领导与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产生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及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现在根据地已缩小，我党在根据地上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共生死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二) 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军群众与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党委、政府及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有关明年全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

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及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苏区称耕田队或互助社),吴满有运动(农业劳动英雄),赵占魁运动(工业劳动英雄),黄立德运动(机关学校种菜英雄),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手工制造及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及为着改善伙食的大师傅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均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家庭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注重节省开支的保守的单纯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与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及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及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

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民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吴满有生产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放粪）推行于各地，而说吴满有方法不应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及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与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原则下，把一切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与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与方法。今年的全部根据地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公私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实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与日用品，准备与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民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及民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

民与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与党政民方面自己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与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批评自己，而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四）此指示主要地说明今年减租、明年生产及明春举行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性。其他各项政策，迭有指示，现不重述。但应知道：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地而不是残缺不全地（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但是只要全党同志认真地实行了十大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我们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难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 二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毛 泽 东

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集了十一中全会，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召集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两个会议的全部材料现已收齐，我们可以作一总评。

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欧洲轴心国是感到了这一变化的；希特勒采取了最后挣扎的政策。这一变化主要地是苏联造成的。苏联正在利用这一变化：红军已经用席卷之势打到了第聂伯河；再一个冬季攻势，不打到新国界，也要打到旧国界。英美也正在利用这个变化：罗斯福、丘吉尔正在等待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国去。总之，德国法西斯战争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处在总解决的前夜，而消灭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它对于中国，则是对共产党“扫荡”，对国民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党诱降。

国民党人亦感到了这个变化。他们在这一形势面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本来，国民党人的主意是叫苏联独力去拼希特勒，并挑起日寇去攻苏联，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拼死或拼坏，叫英美不要在欧洲闹什么第二第三战场，而把全力搬到东方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国共产党打掉，然后再说其他。国民党人起初大嚷“先亚后欧论”，后来又嚷“欧亚平分论”，就是为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年八月魁北克会议的末尾，罗斯福和丘吉尔叫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去，讲了几句话，国民党人又嚷“罗丘视线移到东方了，先欧后亚计划改变了”，以及“魁北克会议是英美中三强会议”之类，还要自卖自夸地乐一阵。但这已是国民党人的最后一乐。自此以后，他们的情绪就有些变化了，“先亚后欧”或“欧亚平分”从此送入历史博物馆，他们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国民党的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操纵的这次参政会，可能就是这种另打主意的起点。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三种：

（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六、七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十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三百多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做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

“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

下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十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

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

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

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权的国民党人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十月一日同盟社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蒋介石先生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宣称：“应宣明中央对于共产党并无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弃武装割据及停止其过去各地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并望其实践二十六年共赴国难之宣言，履行诺言中所举之四点。”

蒋先生所谓“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应该是讲的国民党，可惜他偏心地和忍心地污蔑了共产党。因为自武汉失守以来，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机。在华北，派遣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而八路军仅仅为自卫而作战。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是何应钦白崇禧以《皓电》（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朱、彭、叶、项，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一律开赴黄河以北。我们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其他部队则事实上无法移

动，但仍答应在抗战胜利后移向指定的地点。不料正当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一月四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打尽”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国民党军队果然将该部新四军实行“一网打尽”，蒋先生并于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军全军，审判叶挺。自此以后，华中华北一切有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抗日根据地内，所有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只是自卫。第三次，是从本年三月至现在。除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北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外，蒋先生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发动了全国各地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请问这不是“破坏抗战之行为”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该宣言称：“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组现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民主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改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和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是我们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裂国共合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裂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实践自己的诺言，因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三，原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状态，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承认了的区域，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我们天天请求你们承认，你们却老是不承认，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负呢？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党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现在乘着蒋先生又在十一中全会上要求我们实践诺言的机会，我们就要求蒋先生实践这个诺言：采取法令手续，承认早已实现民权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并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若是你们依然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就是你们叫我们继续“割据”下去，其责任和过去一样，完全在你们而不在我们。第四，“红军名义及番号”早已改变了，早

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践了。只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现在是直接受共产党中央统辖，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一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反革命命令，宣布该军为“叛军”而“解散”之，并使该军天天挨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但是该军不但始终在华中抗日，而且始终实践四条诺言中第一至第三条诺言，并且愿意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要求蒋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复该军番号，使该军获得实践第四条诺言之可能性。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文件除上述各点外，又称：“至于其他问题，本会议已决议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尽可于国民大会中提出讨论解决。”所谓“其他问题”，就是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取消法西斯特务机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碍民生的经济统制和苛捐杂税，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扶助中小工业、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政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中曾称：“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蒋介石先生既于这个宣言发表之第二日（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谈话，承认这个宣言的全部，就应该不但要求共产党实践这个宣言中的四条诺言，也应该要求蒋先生自己及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实践上述条文。蒋先生现在不但是国民党的总裁，又当了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以“国民政府”为表面名称）的主席，应该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条文和一切蒋先生自己许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无数诺

言，认真地实践起来，不要还是把任何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是一味高压，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要看事实，不愿再听骗人的空话。如有事实，我们是欢迎的；如无事实，则空话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其中大多数，正是你们自己的诺言。你们如能实行这些要求和诺言，则我们向你们保证继续实践我们自己的诺言。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

三个方向。

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我们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 以示缓和给董必武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董：

二日电悉。(一)五日解放报发表《评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参政会》长文，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五日文内并指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二)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¹⁾时除申述上述态度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延安所得情况，胡宗南声言打下延安不成问题，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又由渭南开至邠州，三十六军由甘南开至平凉西峰镇线，伊盟大筑飞机场，董钊赴榆林指挥反共，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要求撤退若干军队。(三)见王世杰或邵力子时，除申述上述意旨外，还应说：内战必投降是死路，愿彼方善处，我党准备对付任何险恶局面，但首先愿意继续合作。着重指出董钊赴榆林威胁甚大，刺激最深，延安不能不准备自卫。

毛泽东

五日晨于延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附：董必武关于同王世杰会谈情况 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

毛主席：

刚与王世杰谈，他说：他自己本可不管，但看到目前时局激荡得很快，不得不设法谈一谈。蒋此次用大力渡过危机，参政会的决议不是了不起的，一面是督促政府执行政治解决方针，一面是劝告十八集团军，措词虽有些不好，实际是没有什么。他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时局不恶劣下去。我说：事情的演变解释指出：自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党认为中共孤立无援，内部分裂（这是张道藩、潘公展公开讲的），胡军增兵进攻边区。我声明我党的基本态度，还是七七宣言所说的，而今年宣言，与去年宣言基本精神还是一样，有人批评周^[2]回去变了，但周正是打仗状态到延的，在打仗时骂已是次要问题，并指出十一中全会决议由头很厉害。他说：如照延广播所说，中央政府老早不应该要了。我说，我们欢迎政治解决，故出席参政会，而参政会又来一决议，这更加一裂痕。我再三说，我党坚决拥护抗战，绝对不愿内战，没有任何对国党不利的企图，并列举过去国党困难时，均没有乘机作什么。又解释四点诺言，指出他们对诺言的曲解。他未作声。后来他问：三四月间周、林^[3]和何、张^[4]所谈的意见。我把大概情形谈了，并说何当时就搁下不谈了。他说：首先要把双方的刺激停止。我说：这是要双方做才行。他说：只要大家肯做是可以做到的。他问：还有什么方法。我说：至少要把包围边区的状况解除，胡军七月

增兵现仍未复原防，使延安与外通气，如此才能慢慢谈。其他我即指出，国党有人说延安容易威胁你们，如存此心什么事都弄不好，试想边区不到二百万人，能养多少兵，怎样能威胁。他说：要先停止双方刺激，使感情不恶化，再分步骤。并说：他有出国希望，愿在出国前与蒋谈，如蒋愿意即代约我与蒋见面。他曾再三声明，反共宣传不是蒋的意思。后来他提到参政会驻会委员及宪政筹备会事说张、左^{〔5〕}提到我党。我说现对此我无兴趣，最主要还是把目前紧张状态和缓。他要我同邵力子谈谈，最后他问我的职权，我答以只管重庆事情，关于延安的事，可以转达，谈话至此。我估计蒋必会在双十节去找我以使

我们拥护他，见蒋时应如何表示请速示。

董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周恩来。
- 〔3〕指林彪。
- 〔4〕指何应钦、张治中。
- 〔5〕指张君勱、左舜生。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和印发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 国民参政会》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一) 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你们收到后，除登报外，应大量印成小册，广为散发，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

(二) 《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互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报纸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中 宣 部

十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

毛 泽 东

我们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各种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切要的有十条政策，这十条政策要联系起来执行。

一、对敌斗争。陕甘宁边区要准备对胡宗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蒋介石的磨擦进行斗争，即军事上要作准备，使军队在政治上更巩固，在军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开展大练兵，全体官兵都要紧张地转到大训练的运动中去，训练得一个人能打两个敌人。边区现有五万军队，都训练好了，还不能打仗吗？须知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红军改编时只有四万五千人，现在边区有了五万兵而且训练精了，还不好办事吗？大练兵要认真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士兵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高干会议以后，就是各旅的团长、政委的责任了。要学习六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今年阴历过年要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再颁布一次公约，首先从军队做起，然后是党政，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二、精兵简政。这是重要的一条，已在实行。

三、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如果有的领导同志心里有气，就应向大家谈出来，加以分析，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团结和统一。凡是对这一条执行得还不足的，应当立即搞好。

四、拥政爱民。每年来一次，检查一年的缺点、错误，向人民作自我批评，要每年颁布公约。中央准备颁布一个统一的各地都实行的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各十条的公约。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护军队的。

我们的军队和军队中的干部是“闯州过府”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见闻广博而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组织者与宣传者，是最有觉悟的。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

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人民。只要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好，人民的态度是没有不好的。过去留守兵团有的负责人，总是说边区人民不好，不爱护军队。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替人民干了些什么事？首先应当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就是要实行这种方法。

五、发展生产。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备战，备荒。

我要特别讲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三十五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半劳动力，这也是一支劳动大军。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

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部队、机关、学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产方式，例如一个连队就可以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形式。根据杨家岭的经验，将运输队改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红制，即公家以八辆大车，二十二个驮骡和全部用具，作为八十股，二十二个运输队员作为二十股，按斤由公家发运输费。其结果是运输力由每月只运十九万斤提高到三十八万九千余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而且工具节省了，牲口受到爱护，替公家节约了大量经费。这个办法在中直军直各机关学校中普遍运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运输营一百头牲口二十辆大车，在未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运输一百二十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力提高到一百八十五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工厂、农场。我们的农场按伙种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办法，当然不按伙种而用自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六、整顿三风。边区做得有成绩，还要继续做。

七、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要继续开展。

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时事教育，这次大规模地进行了三个月，还要继续做，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

九、减租减息。许多根据地开展得不彻底，边区有些地方也没有做好，还要继续搞。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我们还是实

行减租减息，不实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

以上十大政策，坚持贯彻下去，就能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能对付国共关系可能的破裂。当前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是四项：第一，对敌斗争，即打敌人，挤地方；第二，发展生产，即弄饭吃；第三，整顿三风，即整歪风；第四，审查干部，即反特务斗争。这四件做好了，党就可以巩固，现在还只是相当巩固，而不是十分巩固。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据聂荣臻同志回来说，晋察冀挤了一些地方回来，晋东南挤了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回来。六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些才行。蒋介石如果要挤我们，要挤边区，我们就准备非同他挤不可。

讲到生产，弄饭吃，全党干部非学会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学会。过去这是总务处长、财政厅、建设厅的事，现在各部队首长、各机关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都非学会不可，连文人学士如周扬、陈伯达、范文澜等也都学会了。

部队生产，今年二月王震同志订计划时，计划每人开荒六亩，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平均每人开荒十八亩。这种群众的创造，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军队自己可以发饷，我们养千万的军队都有办法了。

每一个旅应当建立一个后方。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进不来，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产班。这

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像朱^{〔1〕}总司令所讲的好好地搞一个革命家务。

抗战以来，国民党用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我们的反特务斗争，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

要实施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与审查干部这三项工作，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去年的高干会议分清楚了两条路线，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错误，但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两种态度要分清。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和一二〇师小干部会等，都是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正确的分析，把统一的东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个侧面，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又如财经问题，不作分析工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要做详细占有材料与详细分析的工作，何况我们呢？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

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2]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

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

〔2〕即陈绍禹。

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

朱 德

一 练 兵

练兵要有个目的。练到什么样子才算是一个好兵，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呢？一个是要勇敢，一个是要有技术。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勇敢，你怕死，那就打不成仗。过去我们的红军很勇敢，很好，可是技术不够高明。勇敢再加上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我们练兵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又勇敢又有技术，这样，打起仗来就有把握了。

勇敢是怎么来的？首先，要有阶级觉悟。有了阶级觉悟，无论物质条件怎样差，和敌人一交手，他还是很勇敢。因为他要为本阶级服务，要同敌人拼命。这种勇敢，是整个部队的勇敢，又是阶级的勇敢，并不仅是个人的勇敢，当然也包括个人的勇敢在内。所以我们的部队打起仗来，大家都勇气十足，前仆后继，连炊事员、饲养员也在攒劲。旁的军队就不是这样。其次，要有物质力量，也就是说我们的体力要强，要跑得动。如果你体力不好，再有勇气，再勇敢，也是空的。体力这个东

* 这是朱德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论军队的管理问题》的节选。

西是练得出来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练出来，知识分子很文雅，只要练，也可以练出来，工农就不用说了。

再讲技术问题。技术有各种各样，我们要一门一门地练，勤学多练，就可以练成功。比如打枪，练上一年就可以练得好；甩手榴弹，有一年或者五六个月的工夫也就可以练好。我们每一个战士要练成神枪手，练成第一等的投弹能手，人家甩三十公尺，我们甩五十公尺，我们能打得到他们，他们却打不到我们。所以，一定要练好技术，有了技术就可以壮胆，就可以更加勇敢。只要能够把勇敢和技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使最落后最胆小的人也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就达到了我们练兵的目的。

怎样练兵呢，练兵没有旁的巧妙，首先是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别的事情也要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练兵更要这样。练兵是谁去练？第一是班长，第二是排长，第三是连长，任何一个动作都要靠他们以身作则。我们当连长排长的大部分是党员，他们的政治热忱可以影响士兵的政治热忱，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影响那些不觉悟的人。有觉悟要革命的这些干部，可以表现出很多美德，如大公无私，互相帮助，谦虚等等。他们就可以去影响别人。相反，如果你政治上不觉悟，自私自利，甚至还做了坏事，那就糟了，那也会影响下面的人跟着你学。所以，好的表现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好，坏的表现也可以影响下面的人学坏。参加革命的人，有工人、农民，但也有二流子。有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革命而来的。要把他们变过来，靠什么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我们用自己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的实际表现去影响他们。是不是一定要给他们上课？当然，上课不可少，但也不能光靠上课。要在日常生活中、闲谈中，在一起走路、吃饭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举一

动、一言一行去影响他们。这样的影响有时比正式上课还要好。这是有经验的。我也当过排长、连长。在我当连长的时候，还谈不上阶级友爱这一套，只知道民族国家危亡，要救国，我们就拿这个道理去宣传，从政治上影响下面的人，他们无形中就接受了。军事上也是如此，首先自己要把动作搞好，做出模范动作，下面的同志就会模仿你。你做什么样子，他就学什么样子。这比上正课、比有计划地去教育有时还要好。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我也去挑，挑到半山上我就挑不动了，肩膀也压痛了，虽然如此，但是你一挑他们就都来抢着挑，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我们练兵带兵在各方面都要以身作则。要战士们打枪打得好，自己就要首先打得好，要战士们投弹投得远，自己也要懂得投弹要领，一般的动作自己都要带头去做。这是第一个练兵的好方法。

练兵必先练心，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封建地主阶级要工农给他们当兵，又要压迫工农，他们讲的练兵必先练心，是要你把心完全向着他们，忘记自己本来的阶级，反过来替他们去压迫工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讲练兵必先练心，是要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要他们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怎样受压迫，怎样受剥削，为了解除自己所受的压迫剥削，要怎样团结起来，怎样练好本领。他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再看一看社会的情况确是那个样子，一点也不假。从此以后他们的心就完全为革命了，就一心一意地学习技术，一心一意地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所以练兵必先从政治着手。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还是同过去国民党军队那样的练法差不多，认为只要强迫战士们做就行了。这是要不得的。以后指挥员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连长更要特别注意。连长不仅要练战士的军事技

术，而且要练军心，做好政治工作。这个工作政治指导员当然负责，连长也要负责。这是第二点。

第三，还要练体力、练技术。用什么办法练体力呢？首先是体操（徒手体操、军事体操、持枪体操、器械体操）、跳高、跳远。愈动体力愈好，体力愈好愈爱动，这样就愈练愈好。开始练的时候会痛，休息三天五天，然后再练。痛的时候正是长体力的时候，不要怕痛就不干了，痛了还是坚持练，包你以后就不痛了。吃点苦有什么了不起。经常练下去体力就会加强，大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怕痛了，就愿意去练了。我们打仗拿枪杆子，体力要周身发展均匀，吊杠子是很好的训练。体力发展均匀了，要怎样用就怎样用。日本练兵的方法有些我们要学。他们先搞一个月的体操，各种操都搞，这一个月都是练体力。六个月的练兵是很有作用的。体力搞好了，拿枪就稳了，爬山、跑散兵都行了，这也就是技术。我们的老兵技术不高的，要想办法补起来。技术是有各种各样的，我这里不一一去讲了。总之，我们要培养很多神枪手，培养最好的炮手、最好的机枪射手，各种技术都要练好。

第四，要把士兵们的个人生活习惯改造成为集体的生活习惯。集体的生活骤然是过不惯的，要慢慢地才能养成习惯。集体生活对练兵是有很大作用的。通过文化娱乐、上课、出操、开会等进行教育，这是我们军队所特有的优点。

我们练兵有这四个方面：第一，以身作则；第二，做政治工作，就是练心；第三，加强体力和技术；第四，生活集体化，过有规律的生活。做好这四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练兵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二 带 兵

怎样带兵呢？我讲十二点意见。

第一，还是要干部以身作则。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这里不重复了。古人说：“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历史上带兵的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的很少。红军里的干部个个都是名将，他们都能够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

第二，要建立家务。共产党的家务是什么呢？现在有一个物资局，但共产党最大的家务不是物资局，是我们那几杆枪。没有这几杆枪，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中国革命就得靠枪杆子。现在我们有边区，人家所以还同我们打交道，就靠这枪杆子。这一点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了解，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不了解，那就很成问题。我们军队的指战员都要懂得这个道理。一个连长要知道这一连就是自己的家务。要把兵带好，就要建立和管好自家的家务。这个家务有什么东西呢？有枪，有子弹，有手榴弹，现在又增加了一些马、猪、羊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家务。我们要建立家务，就要爱护武器、保管好武器，保证我们的枪、子弹、手榴弹打得响。固然，有奸细破坏，手榴弹就打不响；就是没有奸细，你把它放在水里还是打不响。枪很久不擦也打不响，你怨什么奸细？以后应把爱护武器、保管好武器看成是全连每个人的任务。每个人拿的武器都要好好保管，连长、指导员、管理员大家都要好好保管。有了这个家务，才能同敌人拼，再赚来新的家务。连长、排长、士兵都要把这个家务看成革命的最好的工具。假使没有了这几杆枪，我们仍旧要受剥削受压迫，并且还要被人家割掉头。有了枪，我

们就可以打倒敌人，解放全中国。

第三，政治上的保证。带兵带得好，要有各方面的保证，首先是政治上的保证，就是靠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战士的阶级觉悟提得很高，告诉战士们无产阶级怎样痛苦，工人农民怎样受压迫受剥削。不仅指挥员会讲，战斗员也会讲这一套。有些战士，他们讲得非常好。把敌人的士兵俘虏过来马上也给他们讲很多的道理，劝他们加入我们的连队。经过劝说、宣传，他们就说：“好，我不走了，就在你们这里。”同志们，你们看，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说服他们不跑了，硬是跟上我们一起打到底。政治上一觉悟，大家的阶级友爱出来了，互相帮助的精神也出来了。那些新过来的士兵就感觉到在敌人那个军队里非常不好，到我们的部队里来非常好；感到过去真是搞错了，现在真是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很快乐的家庭。那个时候，到我们部队来的多，逃跑的非常少。那时门上又没有卫兵，如果有人要跑，什么时候都可以跑，但他就是不跑，那真是带得好。我在前面讲过，练兵主要是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带兵也主要是靠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懂得只有在革命军队里才有出路，他不但不跑，而且还拼命干。这样，兵就带住了，部队就巩固了。这就是政治上的保证。这种政治上的保证工作不只是靠指导员个人去做，还要靠党组织发动大家共同去做。

第四，军事上的保证。军事学不好，带兵也带不好，也会有人跑掉，会多死人。飞机防不好，一个炸弹掉下来就死几十个人；奸细防不好，他就煽动几个人逃跑；警戒不好，敌人来袭击又死掉几个人。打仗当然要死人，但是要避免无谓的损失。带兵的人，对一个人也不能轻易损失。这就要求从政治上保证不逃跑，从军事上保证少伤亡。平时也要好好警戒，防备

奸细，经常清查。这样，我们的队伍就可以避免无谓的减员。

第五，供给上的保证。要搞好生产，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假如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身体顶不住，有的就会跑。今年在这方面没有出问题，原因之一是我们生活搞得好，做到了丰衣足食。

第六，卫生上的保证。要保证战士们的健康，使他们懂得最起码的卫生常识。比如，要开窗，许多人在一个房子里开一天会，不开窗子，门也关起来，空气不够，好人也会关病了，身体弱的人更受不了；早晨要起早，要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冷了要生火；吃东西要把它煮熟；喝开水不喝冷水。这些都是普通的卫生常识，搞得好就不会害病。这也是带兵要注意的问题。一旦有人害了病，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连的领导亲自去看一看，这在政治上、在发扬阶级友爱上会起很好的作用。病了的人看见连领导看他来了，心里就舒服，再请医生看一看就好了。以后要把这个形成制度，一定要去看望病号。打仗负了伤的，更应该去看，他需要什么东西，尽可能给他解决，不要把这看成是特殊。

第七，组织上的保证。我们带兵是靠党组织来保证。连里有支部、有党员。支部在行政管理方面、了解敌情方面要起保证作用。连长应把支部当作带兵的核心、领导的核心。连长不能同支部对立起来，不能闹别扭。要互相配合，把连的工作做好。过去在游击战争的时候，指导员起了政治委员的作用，因为那时的连长很多是政治上不强的，有的还是老兵油子出身。现在的指导员同那时的政治委员作用不完全相同了，他的职责是同连长共同负责全连的工作，而主要是做好连队的政治工作。指导员同连长很好地配合，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使一个连队像一部机器，支部、指导员、连长密切配合，共同带好这

一连兵。

第八，纪律要严密。没有严密的纪律，兵就带不好。纪律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主要是这些，但又不仅是这些。过去的三大纪律，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是群众纪律；打土豪归公，这是经济纪律；服从命令是军事纪律。过去靠这三条带了几年兵顶了事。现在的纪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规定了的一切事项一定要执行，这就是我们的纪律。大家都遵照规定的办法去做，就有条不紊。遵守纪律也要靠干部以身作则。谁也不能犯纪律，谁犯了纪律谁就要受处罚。国民党是只许州官放火，下面的老百姓点灯都不行。我们要的是上下一致遵守的自觉的纪律。这里讲的纪律要严密，就是说犯了一点就处理，不算总账，算总账杀头就不好。犯一点批评几句，该处罚的就处罚，办法又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犯纪律的人就会逐渐少了。

第九，赏罚要严明。哪个做得好就要赏，哪个犯了纪律就要罚，要大公无私。搞生产劳动的有些人成了模范、英雄，我们军队打仗牺牲了那样多的同志，难道就没有一个英雄？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英雄，掷手榴弹的英雄，射击的英雄，等等。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一搞，各色各样的英雄就会产生出来。我们在六年的抗战当中，有很多的英雄，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表扬提倡。当赏的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去奖赏、去表扬。这是讲赏的问题。关于罚的问题，上面已经讲过了。

第十，职责要分明。在一个连队里，连长与指导员的职责要分清楚，支部书记的职责也要明确。除上面规定的以外，还可以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一些规定。规定职责时要从实际出发，看需要做些什么，看是否能够做到。总之，要各尽各责，做到自己能管自己。

第十一，生活要有规律。我们是过军队的生活，要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按时做事。比如我这个人，过了一辈子军队生活，到起床时就要起床，晚上开会到十二点钟以后，第二天照常按时起床。这样的习惯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又卫生又有规律。军队的生活是最严格的，应该养成这种生活习惯。对战士，要教导他们，使他们养成过集体生活的习惯，并且愿意在革命队伍中过集体生活。此外，特别要提倡文化娱乐，使会唱歌的唱歌，会唱戏的唱戏，这对于我们带好部队都有好处。

第十二，组织好学习。我们的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学校，有些学校恐怕还没有这样好。我们队伍中无产阶级成分很少，绝大多数的人是农民出身的。这些农民出身的同志，只要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改造，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很好的战士，甚至可以担负重大的革命任务。经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训练，他们可以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道理了解得相当清楚，各方面的知识也增加了。大家努力这样做，每天都会有进步。我们很多的干部都是从士兵提拔起来的，我们有的师长是从勤务员逐步培养起来的。我们很多有才能的干部就是从连队里慢慢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能力培养得相当强，能做事，也有知识。组织好学习这件事，我们当连长、指导员的要看得很重要。各级组织都要认真把学习搞好。

这十二条如果都能做到，而且结合得很好，那末，带兵的问题可以说差不多解决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

《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 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一)《解放日报》与新华社自十月五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后，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战虽暂告一段落，但各地的阶级教育（即十大政策中的时事教育），仍应毫不放松地有系统地进行之。在阶级教育中一般应达到如下目的：

(1) 在事实方面，暴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特务机关之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是残酷的剥削压迫与进攻，对敌伪是消极观战勾勾搭搭。其结果是：势必使许多部队走到投降（举庞、孙⁽¹⁾等为例），将这些事实与共产党忠于人民的政策对照起来。

(2) 在思想方面，说明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之荒谬反动，严格区别蒋介石主义与孙中山主义，区别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今天我们在对外宣传上仍应强调孙中山的进步性（即在此种宣传中亦不允许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混同起来，新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在纲领上虽基本相同，但其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但在对内教育上，则应清算孙中山的历史与思想，打破知识分子及某些党的干部

对孙中山之不合事实的幻想。应该在所有新党员新干部（包括非党干部）中进行彻底的人生观教育，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个人主义的、以及所谓超阶级的人生观，与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马列主义的人生观严格对立起来，不允许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含糊。

（3）在前途方面，说明世界前途与中国前途都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法西斯反共分子特务机关的。这种前途不是渺茫的前途，而是显然可见的前途。在群众中间，要继续宣传我们是坚决反对内战的，但是如果内战起来，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下，一定仍然能够取得抗战与革命的胜利，灭亡的只有反动派。“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口号在今天是不适用了的。在干部中间更应指出：今天的形势是在我党历史上空前有利的，根本区别于大革命时期与内战时期。世界形势不同（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的革命高潮，苏联的无比强大与不孤立），中国形势不同（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对日战争仍在继续，同盟国反对中国内战并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处于：对敌伪、对友邦、对中共、对人民、对内部的五大矛盾中，国民党在各种困难中的削弱），我党力量不同（有几十万武装与许多根据地，有了大革命、内战与抗战三个历史时期的经验，特别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因此，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为了进行这一教育，应采取干部会议、小组讨论、群众大会、文字宣传、戏剧宣传、音乐、绘画种种方法。一切机关、部队与学校（从党、政、军的干部学校、训练班，直到中、小学、冬学、夜学、识字班），均应无例外地进行，但应根据对象分别采取不同内容与方法。在干部中，应配合整风与审查干部工作进行之，用号召思想坦白，暴露错误思想，粉碎反动思想武装的方法，达到帮助坦白运动与

审查干部之目的。在人民中则应配合减租斗争与防奸斗争进行。同时并应利用种种可能将我们的宣传与宣传品传播到伪军与顽军中去。

(二) 在上述方针之下，各地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特别是宣传机关，应立即着手用大力准备在今年的十月革命节，进行普遍盛大热烈的纪念，用报纸、传单、标语、图画、音乐、戏剧及干部会议、群众大会、群众游行、民兵、自卫军检阅等方式，庆祝红军的伟大胜利，庆祝法西斯主义的溃败，庆祝世界与中国的光明前途，宣传人民大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要在干部与人民中极大的提高对于革命事业的胜利信心（但在宣传的文电中不必骂国民党）。宣传内容本部即以党播陆续播出。

中央宣传部

西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注 释

(1) 指庞炳勋、孙殿英。

论敌后抗战*

(一九四三年十月)

聂荣臻

华北敌后之抗战，迄今已六年多，斗争之残酷实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就华北之一角——晋冀察边区而论，其尖锐复杂而剧烈之斗争形势，实远处大后方的人士所想象不到的。迄抗战六周年为止，共计作战一万七千四百余次，共毙伤和俘虏敌伪二十三万五千余人。我亦伤亡六万四千多人。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是从一点一滴之流血斗争中得来的。

几年来敌我在武装斗争方面，曾经过许多发展与演变阶段。一九三八年武汉陷落之前，敌人即已开始对我举行进攻，屡次集结优势兵力，以正规战术作战，攻我一面（如阜平、涞源等地）。武汉会战之际，敌同时大举进攻我五台、阜平，且将“扫荡”华北与进攻武汉相提并论。在战术上改取分进合击的数路“围攻”方式，仍然未脱离机械的军事教条之束缚。我以游击战、运动战相辅与之对抗。因之使敌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阵线，而常于扑空之余，遭我痛击。一九三九年，敌集结相当优势兵力为一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方式袭击我之中心地区（如灵寿之陈庄及涞源之黄土岭等役），但均遭受歼灭性之打击。进攻陈庄之敌，全军覆没。阿部中将则随其部下葬

* 本文原载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八卷第十七期。

身于黄土岭，就是敌寇所谓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敌因屡次惨败，故自一九四〇年起，乃实行所谓“极度分散配备”，以控制平原各大村镇与山地各要点，以冀窒息我军，奈兵力不足，再加分散配备，则弱点愈多。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展开后，我军大举出击，不仅敌在山地之若干据点被我拔除，即沿铁道的封锁据点亦均遭我猛烈破坏。在战术上不仅展开广泛游击式战斗，而且局部的展开对敌阵地之攻击。于是敌之分散配备亦告失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乃复调集大兵“分进合击”，向我大举“扫荡”，并一度侵占我阜平。但经我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打击之下，使占据阜平之敌于弹尽援绝之后，狼狈败窜。

一九四一年敌酋冈村宁次鉴于既往之失败，乃谋改弦易辙，实施所谓“铁壁合围”战术，以中条山与晋察冀为全年两大战役进攻目标。经长期之准备，企图先荡平中条山根据地，截断敌后我军与主力之联系。结束后，立即转其凶锋指向我边区。战斗一经开始即分十数路直扑而来，山沟小道，无所不至，反复“围剿”。在战术上则与“三光”政策并用，杀戮焚掠，凶残无比。然经我将士之浴血抗战，卒挫敌锋，纵敌酋冈村亦不得不承认失败，并谓：“荡清八路军，非短时间所能奏效”，而只得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等遁词聊自解嘲，其窘态可想见矣。之后，敌复强调“高度之分散配备”，增筑碉堡及封锁沟墙，其密度几至逐村皆是。封锁既成后，乃实行其对我根据地之“蚕食”政策。直到今天，“蚕食”政策亦经多次演变，初则“步步推进”，继则“分区扫荡”，“分割蚕食”，以达其“蚕食”之目的。一九四二年冀中区之“扫荡”战，即属此种性质。然敌此种紧缩“蚕食”之目的，至今已付重大代价而犹未遂其所欲，且将永不能为所欲。至其分散配备之结

果，愈使敌军兵力之分散，由于纪律之废弛，则其腐化堕落、厌战、反战之情绪亦继长增高，战斗力亦日趋低落。如此，我军纵在堡垒如林，沟墙如网之广大战场上仍能纵横驰骋，游击战争之火，更广泛燃烧于敌占区。变敌后为前线，远近交攻，敌我交错，我之先锋更早已越长城、榆关而插入伪满边境，震撼敌人之心脏。战局之发展将益增敌寇惶恐，而促其败亡。

六年余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自一九四一年起敌即开始其所谓“总力战”，此“总力战”之表现最显著者，即敌寇所进行之“治安强化运动”，自一九四一年起前后已举行达六次之多，其中心则各期不同。就我边区而言，敌寇在其“治安强化”运动中，集中于人力物力之抢夺，及政治上思想上之诬蔑造谣，企图达到其“以华制华”之目的。敌以兵力不足到处抓捕壮丁，扩编伪军，充实守备兵力。现敌占领区大部分均由伪军防守。此等伪军一部分为失业或流亡者之集团，敌寇本拟利用之于一时，结果多与愿违；而今敌寇去之不能，欲“肃”之又不胜其“肃”。若干地区，如大清河以北，与其说是敌寇“治安区”，毋宁说是伪军统治地。另一部分伪军，则大部为农村之壮丁，被强迫捕捉而来。他们既无战意，又无战力。尤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敌寇必败之势日渐明显，造成伪军普遍动摇，日寇也明知其不可信，然不得不利用之于一时，此乃其严重之危机。敌寇对物力之掠夺，乃图达成“以战养战”之目的。敌曾以“开发资源”、“确保农产”、“勤俭增产”等类口号相号召，但实际上敌寇之所为，适得其反。敌寇到处挖沟筑堡，强占与毁坏人民田地房屋不知凡几。而苛捐杂税，勒索掠夺，更层出不穷，加之壮丁之被捕走或逃亡，致使敌占区农村或有地无人耕，或有人无地种，或有人而无心

耕，终至“增产”成为空言，经济之危机日趋严重。而我对敌之经济封锁，更使敌寇之经济困难有加无已。敌寇明知敌后人民是与之尖锐对立的，乃极力进行所谓“思想战”，宣扬所谓“皇道精神”，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七分政治”之一切欺骗假面具，早被其“三分军事”之残酷暴行暴露无遗。“三光”政策之下，遍地血腥，使广大中国人民益增与敌不共戴天之深仇。数年来，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正不知涌现几多民族英雄，其惊天动地之壮烈事迹，传遍人民之间，记不胜记。于是敌寇“思想战”亦宣告破产。此外，敌寇所擅长者乃在政治上挑拨离间，破坏我军民之间关系，离间我抗日军队之团结，更无一日放松，且以此为谋略之重要部分。我们回答敌人的，却是更千百倍的提高了我们的警惕，肃清了各种潜藏的“第五纵队”分子，加紧抗日阵营的团结，粉碎敌寇的阴谋。

六年余敌后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不战不能存，不战更不能胜。我军采用之战术基本上为游击战，但此种游击战决非等闲的“游击战”，更非一般墨守战术教条者所可比；也不是仅守过去游击战争的“老一套”经验。游击战术发展至今日，乃是在既有的战争经验基础上，再从六年余抗日战争中，不断获得新的经验，而高度发展之结果。斯大林说：“在战争中不进步者即将为敌人所击败。”这虽指现代最优良之军事装备与作战技术而言（我们固然没有现代化优良装备），但我之战术，必须适应我现有装备而力求改进，其理则一也。

一、我民族自卫战，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复杂配合之战争，若根据单纯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决难取胜。尤以我军远处敌后与大后方断绝，得不到任何补充，仅凭简陋之武器与强敌周旋，若忽视各种斗争

之配合，则不仅我军事上不能取胜，敌且从其他方面以攻我。须知敌以不义之侵略战，对我正义之保卫战，政治上之优势在我而不在敌。故我须以政治上之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之军事优势，从而在各种复杂斗争中改变敌我之优劣形势。

二、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的生活，真正能动员、组织并武装广大人民，才能真正发挥总力战之力量，并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之整体。否则孤军苦战，必难获胜。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有全国总动员之号召。我们坚持敌后抗战，六年来恪遵此种号召，认真动员组织与武装广大人民，参加抗日各种斗争，故能坚持敌后作战以至今日，且将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三、团结乃战胜敌人之唯一武器，军队与军队间，军队与人民间，均应以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为总的第一目标，消除任何不团结的现象，反对任何减削自己力量的行为，不予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四、坚持敌后战争，必须创立赖以凭依的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以遂行独立作战之战斗任务。无论武装部队，地方政权，民众组织以及经济文化等设施均必须有完善具体之整套办法，更须完全适合敌后斗争之环境，不能囿于成规，固守旧习。如不明此理，武断专行否认各种建设，则抗战之胜利与建国之成功，都不过徒托空言。我晋察冀边区行政当局不仅有其各种设施维系敌后人心，团结并组织广大人民，在保卫祖国的旗帜之下，获得温饱，使敌占区同胞心向祖国，精神上有所寄托，其作用亦非常巨大。

五、在这样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要能够领导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对敌作战，就必须有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利

益的政策。我们所坚守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精神，不但为少数人着想，更为大多数人着想，为全国人民抗战利益着想。

六、在敌后作战之部队有成功者，有失败者。因此，我们就必须有严正之赏罚制度，虚心检讨其成功或失败的缘由，得出经验与教训。如果赏罚不明，墨守成规的军队，纵令其有充裕之补给与优越之装备，仍不免要遭受不必要之损失。这种事实，不可不使我们深刻反省。

当此总反攻时期愈形接近之今日，胜利虽已在望，而今后之困难亦必更多，敌后斗争之艰苦程度更将十倍于往昔。因此，我们亦必须以十倍于往昔之努力以支持日益艰苦的敌后斗争。我深切的期望今后我不倦战斗之敌后部队能获应有之补给与援助。更望全国各党各派全国军民能够真正亲密团结，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之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使民主和平之新中国得以早日实现。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聂荣臻军事文选》刊印。

毛泽东关于认真执行中央审查干部 决定给邓小平等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小平同志，北局各同志，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

据彭、罗^[1]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务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許多人。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引起你们严重注意的，你们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在基本根据地内，你们必须认真研究并坚决执行中央八月十五日关于反特务斗争指示（原名审查干部指示），密切地指导各级干部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正确路线，废止历史上传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你们在基本根据地内，在反特务问题上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的特殊性，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环境与延安环境的区别。如果要强调的话，则应懂得正是在前方战争环境中，更应执行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的方针，才能在严重环境下正确地保证反特务胜利。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不用公审大会，而用调查、研究、解释、劝说、斗

争、开坦白大会的方法，弄清一切暗藏的特务分子；而用极大的热忱、很多的方法（千方百计），争取他们转变为好人。即使是最大最坏的特务头子，亦须争取为我们服务。群众不了解此种宽大政策的作用时，须向群众作明确解释。

过去北局所作反特务指示，凡与中央方针不合者应停止实行，而全部实行中央方针。中央曾于九月十八日有电询问你们关于反特务情况，未见回答，请将下列问题迅速电复：（一）你们对于中央“八·一五”指示认识如何；（二）你们对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有何怀疑之处；（三）你处反特务斗争具体经过如何。（此电所述一年内实行一个不杀方针不适用于直接危害军事行动而需紧急处置的军事间谍，再则在游击区内亦不适用坦白运动，须将嫌疑分子调至根据地处理。）

毛 泽 东

十一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罗瑞卿。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 文艺政策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个真理已为各根据地的无数事实所证实。因此各根据地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看成是有普遍原则性的，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无论是在前方后方，也无论已否参加实际工作，都应该找到适当和充分的时间，召集一定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联系各地区各个人的实际，展

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地方与部队中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普遍负责领导所属范围内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学习运动，并检讨本身过去对文艺工作的自由主义或认识不足等缺点。须知只有经过这个学习与批评，才能使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与文艺家成为可能，而这种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家的产生，对于根据地人民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又须知在今天的文艺战线上，与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其他战线一样，不但存在着保持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分子，而且还混有若干为敌人反动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他们过去利用我们的尊重文化人（这是对的）与若干同志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是错的），散布思想毒素，进行反对人民的破坏革命队伍与革命文艺队伍的纯洁性的活动，不经过认真的学习运动并使这些分子觉悟，则文艺事业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巩固都将遇到困难。

（三）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内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其已发展者则应加强指导，使其逐渐提高。各根据地有演出与战争完全无关的大型话剧和宣传封建秩序的旧剧者，这是一种错误，除确为专门研究工作的需要者外，应该停止或改造其内容。报纸是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大的益处。那种轻视新闻工作，或

对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由于过去许多根据地的文艺运动都曾不适当地强调提高，故在执行这两项工作或其他任何工作中，目前的方针都应该特别着重普及方面，如戏剧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指导地方与部队的群众剧团或群众戏剧活动，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在这一方面，专门化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刻觉悟到过去对这个任务的不认识或认识不足，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今后应以十分的热情与恒心来开始这个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工农（首先是工农干部，八路军与工厂工人）的学习条件较好，更应以大力有系统地进行之。

（四）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中央总学委对此已有明确指示。鉴于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受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在他们中间尤须深入地宣传这个文件。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开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生产展览大会，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鞭子的、拿剪刀的人们所开的劳动英雄会议。在苏联，劳动者已经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被人尊重。在我们这里，革命以前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现在他们也受到了无上的尊重。但是就我们全中国来说，除了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十几年前，我在西安看过一出戏，叫做“三回头”，说有一个姑娘不肯嫁给一个耕地的农民。在中国的旧小说里、旧戏剧里，在旧社会的一切著作中，农民一向是被贱视的，这就是说，中国旧社会一向是看不起工农的，看不起劳动者的。然而现在在我们这里，劳动者却受到空前未有的尊重。他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

今年我们边区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我们把消费合作社变成供给合作社，又由供给合作社变成了生产合作社，又把消费、供给、生产三者统一起来了。这许多创造，许多发明，使我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

的。我们现在吃得好，穿得暖，去年一周只吃一次肉，今年一周能吃七次肉。现在大家都穿上新棉衣。这就是丰衣足食。这是什么人搞的？就是这些劳动英雄们手里拿着锄头、斧头、鞭子、剪刀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他们，便没有丰衣足食。离开了他们，就不能生活。他们有本领、有办法，人数又这么多。离开了他们，便没有社会，便没有国家。劳动英雄的代表们，只有你们才配被人尊敬，被人爱护，你们才是真正的人才，人人应该向你们学习。你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不仅保证了我们全边区的丰衣足食，而且由于你们和全边区人民在后方努力生产，衣服多了，粮食多了，还使我们能更好的援助前方抗战。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要号召大家向劳动英雄学习，学习劳动英雄们的创造。譬如今年延安的变工队，首先在一个地方组织起来，别的地方也跟着组织起来。吴满有那个村子，除了老得不能动手，小得不能做事的外，全体村民都参加了变工队，因此吴家枣园今年比去年增产细粮百分之八十。这是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创造。又如劳动英雄赵占魁，以身作则影响全厂工人，结果今年全厂出品比去年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这是劳动英雄赵占魁的创造。在农业、工业、运输业以及在纺织业中，都有许多成绩，值得我们大大奖励。这是我们全边区劳动英雄们的伟大创造。一年前毛主席总结了过去群众生产的经验，指示了生产运动的方向，经过边区党政军民全体干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才有今天的收获。

我们为什么得到这样大的收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在我们边区，老百姓掌握了政权，这就是民主。我们边区的民主，是有充实的具体内容的。这些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有计划的发展生产，组织变工队，工厂合理化，发展合作社，提倡生产竞赛，奖励

劳动英雄，人人都有事做、有饭吃，人人丰衣足食。这就说明边区老百姓不仅得到了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而且得到了经济上的物质果实，他们自己创造，自己享受，所以他们的劳动热忱和积极性就更加高涨起来了。譬如关中新正一区九乡一个七十九岁的老汉王世英亲自开荒三亩，新宁县三区一个六十九岁的老汉王伯强开荒八亩，庆阳三十里铺一个五十七岁的瞎子叫他孙子牵他到地里开了四亩五分荒。全边区不论男女老幼都积极参加了生产，达到丰衣足食。这就是民生主义，也就是真实的民主。他们努力生产，所以更有力量帮助前线打日本，这就是真实的民族主义。

这些都是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血汗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换得来的果实。他们会发挥自己的一切力量，拿起自己的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这个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之，只要协力同心，我们会有办法的。像古话所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办什么事情都要和劳动大众一齐搞才搞得好的，不是一个人包办得了的。

最后，我们要求劳动英雄回去的时候，把明年生产计划搞得更好，并且推动他人努力生产，使明年生产所增加的粮食棉花等要比今年所增加的数量还多一倍。今年吴满有一村增产细粮百分之八十，如果全边区都能如此，就可增加细粮一百五六十万石。我们要奖励劳动英雄，今年顶好的劳动英雄，我们要奖他一头大犍牛，让他们牵着牛回家去，号召大家都努力生产，个个成为劳动英雄，来完成明年的生产任务。

根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刊印。

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如果边区去年以前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够显著，还不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足以完全证明这一点，那末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大家亲眼看见了的。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还有我们的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

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因为战争紧张，也因为领导机关注意不够，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号的指示以后，各个地方也都在准备发动明年的生产运动了。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明年可能造成广大的运动，并且必须造成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

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份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

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

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还存在有一种军阀主义作风，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作风，因为国民党军队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但是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

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还必须继续去克服。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这种毛病都是有的，那里的党和军队必须注意克服这种毛病。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展开，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的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

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通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选录在这里的季米特洛夫、曼努意斯基等同志的几段文章，其总的精神就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这些文章虽然多数还是一九三五年写的，较近的也是一九三九年的，除了少数几段之外，也不是专为中国而写，但其反机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则至今仍完全适用于中国，值得每个同志深切注意。季米特洛夫等同志在这里用马列主义的革命立场解决了统一战线是积极政策而非消极政策，统一战线与投降主义的严格区别，统一战线下右倾的增长与反右倾的必要，团结中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民族战争与民主民生的密切联系，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确路线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中央都曾从同样的革命立场达到同样的正确结论，但也曾有些同志从相反的立场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一面可以帮助同志们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一面也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那些机会主义的错误怎样绝对背离了马列主义，怎样绝对背离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从而加以彻底的克服。因在整风学习中有吸收国际经验之必要，故选录此种文件以供研究。

书中的小标题和旁点，都是我们加的。

中央总学委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

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积极政策

季米特洛夫论不可忘却布尔塞维克的积极精神

同志们！我们在报告内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内故意抛开关于革命前途的响亮话。可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理由像从前那样乐观来估计革命发展的速度，而是因为想叫我们的党不要去倾心于革命空谈或徒然争论前途的估计而忘却布尔塞维克的积极精神。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听其自然的立场，我们并不是以旁观者的资格，而是以积极参加人的资格来观察和估计革命发展的过程。我们的党是一个干革命事业的党，我们在每个运动阶段上执行适合于革命利益及适合于当时具体环境的任务，精明估计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程度，这也就最能替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造成必要的主观条件。……

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们，离开此地回国之后，务必传布一种坚固的信念，确信我们共产党员对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命运，对本国人民的命运，对整个劳动人民的命运，负有责任。

世界是工人造成的；世界是我们工人的世界，而不是社会寄生虫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现在的统治者，不过是暂时的人物。

无产阶级，却是人类世界真正的明天的主人翁。它应当行使自己的历史职权，在每一国，在全世界，取得管理的机关。

（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七次大会闭幕词》，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一六三——一六四页）

曼努意斯基论七次大会策略立场的实质 是革命的积极政策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策略立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无产阶级……必须实行革命的积极政策。……革命的积极政策，便是削弱资产阶级阵地的政策，便是破坏其帝国主义的各种设施的政策，破坏其进攻苏联的准备，破坏其向工人阶级的进攻，破坏把资产阶级专政变为法西斯化的企图，同时这一政策，又是巩固无产阶级阵地的政策。资产阶级对内对外的侵略，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上面现在十分紧张的表现出来。在反对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当中，无产阶级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以反对最凶恶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务须把主要的火力去反对目前战争的挑拨者与罪魁的那些国家。在这些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各国内部各派资产阶级互相间的矛盾，但是应当以革命的精神来利用这些矛盾，切不可反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切不可减弱无产阶级自己的阵地。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当在那些决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及社会革命的各种社会派别、阶级及民族中，扩大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战线。过去有些劳动阶层，因为受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影响，曾经动摇到反动方面去，并保证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现在由于无产阶级这种重要的政策，及其对于事变进程之积极的参加，毫无疑义的，将会使这些劳动阶层重新回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所有这一切，便要求共产党适当地改变方针。……正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派的政策之破产，共产党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同时对于工人运动命运的责任，现在都放在共产党员的身上。共产党不能只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团体，应当成为在各国国内以及全世界的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因素；共产党应该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政策，消灭由于社会民主党政策所引起的无产阶级失败的不良影响；共产党应使无产阶级走出孤立的地位；在群众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中，共产党应当使群众得到显而易见的实际胜利；应当准备条件，使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获得最后胜利。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无希望与无前途的立场，共产党应当针锋相对的提出斗争与胜利的实际前途，以提高工人阶级对于本身力量的自信心，并使工人阶级在觉悟上深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当权人物，只是暂时的人物，而世界真正的主人翁，则为无产阶级。第七次大会决议的实质，正在于此。（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三八——四〇页）

反对对统一战线作投降主义的曲解

有些人以为我们集中火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因而就要减弱我们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论据，恰好等于有人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因而就减弱群众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恨。如果不加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那末，究竟能否顺利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呢？不能够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日益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形式。不是人道的、民主的资本主义，而是野蛮的、反动的资本主义，法西斯

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用主要的火力去反对法西斯主义，能不能顺利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呢？不能的，因为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最反动的、最抱极端国家主义的与最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分子之公开的和凶恶的专政形式。我们推翻这些分子的政权，也就是击破整个资产阶级的阵地，因为资产阶级与财政资本的最反动的、最抱极端国家主义的与最具有帝国主义性的分子有不可分离的阶级体系。

统一战线决不取消对反动势力的批评

有些人以为我们提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缔结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就是修正了列宁对于社会民主党作用的论断——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主要的社会支柱；同时也就是放弃了斯大林的论述——法西斯与社会民主党并非互相对立的，而是同胞兄弟。真的这样么？若是德国与奥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而是与法西斯主义互相对立的，那末，法西斯主义无论在德国或在奥国，都不能取得政权。如果不再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支柱，而成为与法西斯主义相对立的，那末，这就是说不会有系统的对法西斯主义让步和投降了，而是与它斗争了，而且当法西斯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就不去打击共产党，反而与共产党缔结战斗的同盟以反对法西斯主义了。然而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阶级合作的一切政策，为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都证明了下述立论是正确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同胞弟兄。社会民主党之与资产阶级同盟的一切政策，促成群众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失望，便利于法西斯运动的顺利发展，这又证实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即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正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

的同胞弟兄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所以它使中欧工人群众遭受失败，并促进法西斯的反动向全世界进攻。正因为对法西斯主义实行有系统的退却的政策，德奥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使自己处在被追逐和被侦缉的地位；也因为这一政策，使社会民主党的千百万工人及其团体，现在均被迫而处于非法的地位。因此，不仅德奥两国的工人阶级，而且资本主义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开始与社会民主党同胞弟兄的政策分裂，转而实行与法西斯主义互相对立的政策，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要求社会民主党不再成为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全世界上正在发展的统一战线运动就在这种意义上。

共产党员若是不估计到工人阶级中及社会民主党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动，若是不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帮助该党中的优秀部分及其群众走上与法西斯主义互相对立的战斗政策的道路，并使社会民主党不继续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而为其社会的支柱，那末，共产党员就不是革命家，而是空洞的学说家。正因为法西斯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数百年来对资本主义的一个仇恨的焦点，所以我们共产党员现在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工人阶级战斗行动的总目标。我们这样去干，不但没有把我们反对别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放在次要的地位，反而由于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会促成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形式的颠覆。

社会民主党说道，共产国际这样去干，无论如何是改变了它以前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态度，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对者变成拥护者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么？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像社会民主党首领一样，未曾绝对地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从来不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未曾绝对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统一战线决不赞成投降政策

社会民主党人说，共产党人既然宁肯要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愿有法西斯主义，因此，共产党人也赞成“小害”的政策了（编者注：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动理论，说一般的资产阶级统治害处总比法西斯主义小些，因此无产阶级可以向它投降）。是的，我们共产党人宁肯有“小害”，而不愿有大害。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此。我们所以揭露社会民主党的“小害”政策，因为这是贩卖资产阶级民主制和直接帮助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政策。试回忆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布吕宁政府——准备法西斯主义上台的政府——时期的立场吧。当时这个政府颁布了种种法令，如减少工资，剥夺工人的政治权利，并使维马尔共和国法西斯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借口“小害”政策，而拥护这种种法令。法国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对于法国的布吕宁——杜美格政府所采取的路线，是否也是如此的呢？不是的，他们在法国作了斗争，反对法国颁布这类法令，并且依靠统一战线的斗争推翻了杜美格的政府，使法国资产阶级遭受失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布吕宁结成同盟，反对共产党，但是法国社会党的工人及共产党人却彼此团结一致，以反对杜美格，——其不同之点，就在于此。（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四五—一五一页）

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季米特洛夫论统一战线下的右倾危险

共产党的统一、革命团结性和战斗决心，不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宝贵的资本，而且是整个工人阶级最宝贵的资本。我们是决心与社会民主党及其组织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的；同时，我们毫不调和地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思想和实际，因此我们也就要反对这种社会民主主义之侵入我们本身队伍里来的任何表现，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将来还要这样做。……

我们应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来铲除和消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的毒，同时我们应当尽量加紧防备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它的一切具体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统一战线广泛发展的过程中，右倾机会主义会跟着增长起来的。而且现在就已经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降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队伍中的作用以及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表示调和。切不要忘记：统一战线策略乃是用具体例子来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人，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政策是正确的与改良派政策是不正确的一种方法，而并不是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实际之调和。为要使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得到成效，就一定要在我们的队伍里经常反对降低共产党作用的倾向，反对合法主义的幻想，反对那些以为法西斯主义会自动消灭和统一战线会自行实现的自发论和自流论，反对决定胜负时的任何动摇。（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报告》，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九一一九五页）

共产党应当极坚决努力地消灭关门主义底一切残余，因为关门主义，在现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它妨碍共产党实行自己的真正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应当加强自己的警觉性，来对付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并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底一切具体表现。要知道，在广泛地应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右倾危险将会增长起来。为建立工人阶级底统一战线和统一行动而进行的斗争，要求具体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人，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政策底正确和改良派政策底不正确，要求每个共产党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去反对抹煞共产主义

与改良主义中间原则上差别的一切倾向，反对削弱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反对不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资产阶级从事阶级合作的思想和实际，反对以为社会主义可以用和平的合法的方法来实现，反对在消灭法西斯主义事业方面以及在实行统一战线方面的自流理论和自发思想，反对降低党底作用，反对在决定胜负行动时的丝毫动摇。（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案第六节）

曼努意斯基论右倾表现于取消反投降派的斗争

为了使法西斯侵略者遭受失败，现在需要什么呢？

第一，需要坚决的反对投降主义者，一直到完全揭破他们，孤立他们，以至于粉碎他们为止。投降主义者不仅是和资产阶级妥协的妥协者，而且是和最反动部分的资产阶级妥协的妥协者，是和法西斯主义妥协的妥协者。投降主义者是工人运动中的法西斯走狗，他们为欺骗群众起见，戴上“和平主义”的假面具。社会民主党底反动首领，在一九三三年把德国民众引到法西斯专政屠刀下，而欺骗着群众，说他们是把群众从国内战争中挽救出来。……（曼努意斯基：《国际形势与反法西斯运动》，一九三九年在联共十八次大会报告，《新华日报》馆本三〇页）

在几个共产党中，在实现工人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策略时，发现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倾向，这种倾向是表现于抹煞反对投降主义分子的斗争，表现于把所谓民主国家底作用理想化，而掩盖这些国家底帝国主义性质。这种倾向之发现——尽管它还是在萌芽状态中，——就是说明有加紧反机会主义斗争之必要。（同上书，四九页）

统一战线不能没有斗争 季米特洛夫论以斗争求团结

如果以为对反动领袖采用忠告、规劝、祈祷的方法，就能达到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这是幼稚气的想法。如果一切主张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人不进行百折不回的斗争以反对公开的和隐藏的统一的仇敌，那就不能达到这种统一。

有时候社会党员底队伍中发现这样的声音，说共产党员对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领袖们底行为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批评，就使统一战线之建立发生困难。然而如果不坚决批评那些用尽一切方法来妨碍建立统一战线的人，试问是否能够达到统一战线的建立呢？如果我们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极重要的这种问题，不公开说出全部真理，那末我们成了什么工人运动的行动家呢？

并不是那种不说或掩饰工人运动队伍中反动领袖底有害行动的人会帮助工人阶级底统一事业。谁借口于似乎为着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底利益而不去反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仇敌，不去批评那种使工人运动屈服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谁就是对于工人阶级很坏的效劳者。

谁认为既然有了人民阵线，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进行斗争反对仇视工人阶级的理论和观点以保护工人运动底原则基础和根本利益，谁就是一个不好的为工人阶级统一和为反法西斯反战的人民阵线而斗争的战士。统一战线的事业并不会由于上述那种斗争而遭损害，它只能因此得到益处。而且这一种斗争，乃是真正开展和巩固反法西斯反战争（指侵略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编者）的人民统一战线底必要条件。

统一战线必是有原则的联合

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共产党员彻底地和坚持地为建立人民统一战线而斗争时，他们所进行的，并不是无原则的联合政策，而是有原则的政策。

当我们坚决地为保护民主权利与自由而反对反动势力与法西斯主义时，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者，以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底资格来进行的，而不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改良派的资格来进行的。当我们起来保护本国人民底民族利益、保护民族底独立与自由时，我们并不变成国家主义者，并不变成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而是以无产阶级革命者、以本国民族的忠实子孙底资格来进行的。当我们起来保护宗教自由而反对法西斯压迫教徒时，我们并不放弃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解除了任何宗教迷信的人生观。

当共产党员实行反法西斯反战的人民阵线底政策，去与劳动者其他的政党和组织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的仇敌，为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民主权利、为和平与自由进行斗争时，共产党员并不忘记用革命手段去推翻业已过时的资本主义和实现使工人阶级以及全人类得到解放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需的事情。

把实行人民阵线政策去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运动干部的理论水平，与精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底伟大学说——精习这种行动指南，把上述各项彼此正确配合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学好的，而且要日常的把这件事情教导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由于看到个别树木就看不见森林”，这是不可容许的。使实际与理论脱离，使目前迫切任务底执行与工人阶级将来的前途及斗争的目的彼此分开，这是不可容许的。不应忘记：人民阵线运动愈开展，运动底策略问题愈复

杂，则对于局势以及对于斗争力量对比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愈加必要，愈加要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可靠指南针。（季米特洛夫：《国际无产阶级底统一乃是目前时局底最高使命》，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二〇五—二〇七页）

曼努意斯基论只有小资产阶级才幻想不要斗争

统一战线的实质，并不在于两党（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缔结某种形式的协定，在该协定有效期内，为划分工人运动的“势力范围”起见，两党暂行停止彼此相互间的斗争：这是你的势力范围，那是我的势力范围，谁也不妨碍谁，以便彼此相安过着邻友的生活，谁也不生气，谁也不得罪谁。只有小资产阶级看重其安逸太平生活的人，才能这样提出问题，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人，决不如此。协定及公约，都是辅助的事情，而统一战线的基本事情，是要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人共同发动以反对资本——共同的敌人，而这种发动的前提，是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转到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没有阶级斗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一大批群众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及改良派工会之内，又因为这些群众尚为他们党的纪律和工会的纪律所约束，所以必须与这些团体缔结协定，以便应用统一战线去发动群众斗争，以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六一—一六二页）

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参加民族战争？

季米特洛夫论必须以独立立场

积极干预本国的外交与国防

现时，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在那些直接遭受侵略威胁的

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对于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本国国防事业，应有正确的态度，这正是一个极关重要的策略问题。无产阶级及全体劳动群众，应当注意这些问题，因为本国政府，对于危害和平的法西斯侵略者究竟采取什么外交政策，它的这一外交政策究竟是有利或妨碍集体安全制，本国政府究竟是袒护法西斯侵略者的走狗，抑是采取有效的取缔他们的办法以及本国政府究竟如何保障人民不至遭受战争的浩劫等；所有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绝对不是无关痛痒的。

不关心国防问题，让资产阶级政府任意操纵这些问题，是于和平事业丝毫无补的立场。当权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一向都是把国防问题当作他们独占的事业，当作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显然不是偶然的。必须永远消灭资产阶级这样独占国防问题的现象。

对于这些问题，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政策。无产阶级政党，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应堕入资产阶级的立场，可是同时，它却应当以自己的政纲与要求，积极干预本国政府之外交政策与国防事业。

必须为政权军队民主化与工农切身利益而斗争

工人阶级乃是最积极反对法西斯侵略而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忠勇战士，它应当将本国国防问题，与扩大工农主权利的要求，与拥护工农切身利益的要求，最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实行政治制度民主化，只有实行军队民主化，驱逐法西斯蒂及其他一切反动的军官，只有满足工农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然后方能加强民众反对法西斯蒂侵略和保卫国家的能力。工人阶级的代表，应当赞助那些足以阻挠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投降法西斯侵略者的行为；足以防止资产阶级政府叛卖本国

人民独立自由利益的具体步骤。……

时至今日，工人阶级已经应当积极而独立参加解决战争或和平这样迫切的问题了。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与改良主义者不同，工人运动革命领袖之所以与反动领袖异趣，绝对不是因为改良主义者及反动领袖注意这些迫切问题，而我们革命者，却不注意这些问题；而是因为改良主义者对于这些问题，也如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总是完全拥护资本家的利益，而我们共产党人则拥护劳动群众的利益，拥护人民的利益。

这是一个灵活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采取这个策略，也就是具体运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一般策略的方针；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在法西斯侵略国具体存在的时候，这样灵活的策略，是异常必要的。（季米特洛夫：《为和平而奋斗的统一战线》，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一八〇——一八二页）

曼努意斯基论民族战争的三条件：

人民战争，民主民生，反对投降派

共产国际从同样具体的立场出发以对付各国的作用，关于保护弱小民族及弱国（这些国家的独立性大受法西斯侵略之威胁）的问题，共产国际就通过了非常重要的决议。若是借口说弱小民族及帝国主义强盗的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将它们混为一谈，那是不正确的。因此，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曾宣布受帝国主义大国侵略的弱小民族及弱国，有“保护民族独立的权利”。大会以全力指明，这类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而在这种场合，共产党人的责任，便在于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与站在这种斗争的前线，而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帝国主义敌人的失败。可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第一，应当使民族独立的战争

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如像中国苏维埃那样；应当武装全国人民，以便用雅各宾手段，用革命的办法来进行战争。

第二，为吸收全体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最广泛的与最有成效的革命自卫起见，共产党人应该以全力进行斗争，扩大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巩固工人、农民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以及争取少数民族真正与完全的平等。如果不完成这种条件，则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共产党人应该号召全体人民敏锐地警惕本国资产阶级，并组织劳动群众反对出卖祖国及人民的卖国贼。共产党人所以应该揭穿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因为它进行战争，而是因为它进行战争不甚坚决又不甚努力，而且采用不适当的方法，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且害怕民众而与帝国主义敌人实行妥协。（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五五——一五六页）

爱尔科里论拥护民族战争

决不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

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底提纲内着重说明：参加和赞助民族解放战争，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赞助民族解放战争，并“和资产阶级暂时合作”。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因为实行这种暂时合作，就放弃阶级斗争，即是说，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合作当作改良主义的合作。况且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虽然在某个时候不得不用武力去保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可是一看见战争有变为人民战争的危险，看见工农群众像怒潮一般起来要求满足他们的阶级要求，它就总是想滚到敌人营垒中去。

因此，当我们拥护一切受帝国主义所侵略的弱小国家底民族自由，拥护一切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小国人民底进步的爱国

天良时，我们是绝对不拥护资产阶级底反动政策的。我们拥护弱小民族独立的政策，只能如此。欧洲有些小国，像荷兰比利时这一类国家，它们的民族独立显然受到德国法西斯蒂侵略的武装干涉的战争底威胁。但同时，这些国家底资产阶级又压迫广大的殖民地。毫无疑义的，在这些国家内，我们拥护民族自由的政策和解放殖民地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实际斗争，是始终不能分开的。“自己要想做自由的民族，决不能奴役其他的民族”。我们根据马克思底这个指示，奋不顾身地为力谋在全世界彻底实行民族自决原则而斗争，以此证明，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积极反对法西斯混世魔王的一个进步势力。（爱尔科里：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报告的结论，见《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四——一八页）

无产阶级是反法西斯反侵略的领导者

季米特洛夫论无产阶级的作用与责任

在创立反对法西斯侵略和掠夺的强有力的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国际无产阶级。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使得工人阶级成为这个战线的发起人、组织人、领导人。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伟大的力量。它的先进部队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战胜了沙皇制度与资本主义的黑暗势力，并建设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国际工人阶级热烈的关心着：最后粉碎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剥削与奴役的链子。它是法西斯主义与一切反动势力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是反对一切压迫、反对奴役他民族、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最坚决而最彻底的战士。

工人阶级是代表它自己的民族的台柱。由于它在国家生产事业中所起的决定作用，由于它的数量、集中化与组织性，它

是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最可靠的堡垒。

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唯一阶级，武装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先进的科学，武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这个学说照耀着反对战争与法西斯力量、反对法西斯野蛮与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之路。

这一切都使得工人阶级负起历史的责任来。为了使得它能实现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组织人与领导人的作用，它需要认识它自己的力量，并善于利用这伟大的力量来团结劳动群众。伟大的列宁的指示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说工人阶级首先要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粉碎那些以为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没有资产阶级来决定人民的命运，人民就不能过下去的可恶成见。工人阶级需要深切地觉悟到：必须坚决倡导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捷克的出卖和慕尼黑的阴谋，再一次地确切地指示出：工人阶级不能放任帝国主义当局与金融巨头，在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防问题上，无监督地一意孤行。事实向工人阶级有力地指出：要负起决定这些问题的任务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应该由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来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把人民群众仅仅看作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益的名义之下，把人民投入战争的深渊。而他們又想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头脑为所欲为地来支配人民，但是工人阶级热烈关心着，不把自己的命运、自己国家的命运，交给统治阶级的手里去决定。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已经了解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中除了工人阶级外，没有另一种力量能够负担起反对外国法西斯主义侵略的领导作用，和能够负起忠实的、坚定的、坚持到底的作用。

以帝国主义派的上层分子为首的统治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是以他们贪欲无厌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在历史上有无数例子，证明这些阶级为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财产特权，而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外国的奴役者。慕尼黑的谈判，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新而显著的例子。

工人阶级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并且也不能有其他的利益。这是从资产阶级国家内工人阶级本身的地位中所产生出来的。法西斯强盗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任何打击，首先就是对于劳动群众、对于工人阶级的打击。捷克的例子就有力地证明出这一点。捷克资产阶级的投降分子，在把自己国家出卖给德国法西斯强盗，是起了不少的作用，他们迅速地就与自己国家最凶恶的敌人一鼻孔出气。法西斯的打击，是以全力来打击人民、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

从这里，我们就要随时得到教训。而共产党员要毫不厌倦地向群众、首先是向工人阶级，解释他们在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自己国家的事业中的作用和责任。（季米特洛夫：《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二六二—二六五页）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团结的中心

季米特洛夫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

在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因为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底变更，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在建立广大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時候，必须首先注意到该国群众反帝斗争所处的特殊条件，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底程度，无产阶级在这种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

在中国，因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很大一部分领土上，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区域，组织了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强盗的进攻以及国民党实行无耻的卖国，中国伟大民族底生存，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瓜分中国的斗争中的统一中心，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统一和团结一切反帝势力，来进行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斗争。

因此，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及个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

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底这种提议，我敢代表本大会全体代表底意见，来以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底名义，向中国一切苏维埃，向中国革命人民，致热烈的兄弟的敬礼。（掌声雷动，全场起立）我们向在千百次战斗中锻炼过的中国的英勇红军，致热烈的兄弟的敬礼。（掌声雷动）同时我们很诚恳地向中国人民说：我们坚决拥护你们的英勇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决意帮助你们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的压迫，帮助你们谋得完全的解放。（掌声雷动，全场起立，高声欢呼，继续好几分钟，各国代表一致高呼欢迎口号）（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报告》，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七三一七四页）

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党员底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人民战线。为了这件事情，必须吸收极广大的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日益厉害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反对残酷压迫，为驱逐帝国主义者，为争取国家底独立而斗争；必

须积极参加民族改良派所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必须努力在具体的反帝纲领上去与民族革命的组织 and 民族改良的组织实行共同的发动。

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的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的中心。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了自己解放斗争底利益起见，应当尽量拥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解放斗争。（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第五节）

曼努意斯基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解放和统一

中国苏维埃运动，直到现在还在主要的工业中心以外的区域发展，因而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上，苏维埃运动负有较重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竭力使苏维埃运动成为统一中国的政治中心，与领导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并在反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愿与决心捍卫祖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各派军队成立真正的合作。为建立这种广大的反帝战线起见，中国共产党向各政党各派军队提议在下述条件之下缔结共同的作战协定以反对侵略的帝国主义者：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实现政治上的自由，武装人民，组织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奴役者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反帝战线提出这样的政纲，并不是玩弄手腕。若是把保护本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事情来玩弄手腕，那简直是犯罪。可以同敌人玩弄手腕，但绝不可以对人民玩弄手腕，因为共产党人正是奋不顾身地保护人民的民族

自由和生命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亦只有共产党人才有权利代表人民说话，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朋友，因为只有他们用自己的命运及生命来做人民事业的代价，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末，以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即是最受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人民的子弟来说，那就更正确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事业及其民族解放的纲领，证明它深刻地了解中国苏维埃对于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本国人民担负着伟大的政治责任，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担负着责任。只有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给以布尔塞维克的联系，只有这样勇敢地运用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战线，只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参加作战的领导，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才能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求得中国的完整与统一……（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总结》，见《为统一战线而斗争》一八八一—一九〇页）

中国共产党为民族与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季米特洛夫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与反机会主义斗争

虽然有这样困难的环境和巨大牺牲，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不屈不挠地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由于它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武装起来了，维护党的统一有如生命，不害怕以布尔塞维克的态度来揭发自己的错误，在错误中学习并适时地改正这些错误，不允许在自己的队伍中混入着异己分子，把各种各色的投降者和阶级敌人的内奸驱逐出党。

但是，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党，因

此它很明白了解，不管它现在已经达到了多么伟大的成绩，可是还只是走向中国人民解放的第一个严重的步骤。因此，它现在正用一切力量来解决现在阶段上自己的最严重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共产党成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锋，联合现在很分散的中国人民的力量使中国不遭受分割和完全被奴役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尽力于停止内战及与国民党和一切政治派别一切武装力量合作来组织抵抗日本侵略的事业，正得到全世界中国人民之友的赞许、同情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作为目前条件下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其最凶恶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最好方法，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估计实际环境和确切提出适合于中国解放斗争现阶段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便利，在苏维埃区域政策上实行一些必要的改变，同时继续巩固苏维埃，因为苏维埃现时是国内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于自己所进行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一切力量的方针之坚定性与彻底性。……

党要依靠着民众的意志来有系统地为着与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任务，因为许多国民党的领袖和它的军事的政治的行动家一味仇恨共产党人，以致陷于日本的圈套，不去与共产党和红军一起反对日本强盗，反而将武装力量消耗于犯罪的“剿共”战争和军阀内战，共产党要动员全国的舆论，使一切真正的爱国者都拒绝这种亡国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要更巩固与工人、农民、一切劳动者和拥护民众利益的分子的联系，坚决出来拥护他们起码的权利和迫

切的利益。在“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口号之下来动员他们进行斗争。

党要继续不倦的巩固红军，提高它的战斗力，因为红军愈加强大，就能更快的创立全国联军（抗日联军），就使中国人民更顺利的抵抗有新式武装的日本军阀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道路上还会遇到内部的困难。它要克服关门主义分子的抵抗，这些分子不懂得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它同样要反对机会主义投降派；这些分子预备牺牲党与红军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把它们与其他的组织和其他的军队混合。中国共产党将光荣地、忠实地执行一切反日协定的义务，可是它不愿意盲目地相信同盟军和不愿走上投降的道路。

特别在现在环境之下，敌人在加倍努力侵入到共产党内来进行破坏党并妨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时候，中国布尔塞维克完全懂得克服这些困难的基本条件是巩固自己的党，巩固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九三六年，见《季米特洛夫文选》一九〇—一九三页）

曼努意斯基论在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第二个支部，在自己国家和自己人民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支部，就是中国共产党。它现在有××万×千个党员，它不仅和工人们，而且和广大农民群众联系着，它在知识界中，特别是在学生中，也有巨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武装部分。这个党是在多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火焰中受过锻炼的；它在过去积聚了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它有丰富的组织广大游击运动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中国现今的民族战争是非常宝贵的。

它拥有实行瓦解敌人力量的高度技能，善于深入敌人后方，和在敌军内部进行广大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现时开展得最快的，是在游击运动所包括的区域里，在日军后方。

它在巩固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保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基本条件——的事业上，作出意志坚强和行动机敏的模范。中国共产党的强处，就是它那造就和提拔新干部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底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鼓掌）（曼努意斯基：《国际形势与反法西斯运动》四一一—四二页）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贯彻执行毛泽东 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

各级党委：

毛泽东同志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会上的讲演和十月在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不仅告诉我们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针（把群众组织起来）与办法（用合作社形式）可以使生产力提高一倍，可以使穷苦变为富裕，可以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可以坚持长期的抗战，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大革命，而且告诉我们实现这个方针与办法的正确作风就是要有群众观点，要依靠群众，要与群众结合在一起，不要沾染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就是只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东西，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与军阀主义作风，这种毛病，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或多或少都是有的。因此，各根据地党委收到此讲词的广播后，应大量传播。并在党政军各级组织中，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规定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 和拥军月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军区政治部：

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一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各地各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及政治部，对自己根据地内及自己部队内应迅即进行动员的准备工作，此项准备工作应是考虑周密的，而不是草率应付的。

中央书记处

亥蒸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毛泽东、彭德怀关于目前 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 给邓小平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小平同志：

甲、亥江电^①悉。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山东、华中应如何注意，待朱瑞、陈毅到延了解情况后再告。

乙、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丙、太岳、中条，整风、生产全无反映，望注意检查督促。

毛泽东 彭德怀

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邓小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给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电报中说：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战争影响、普遍灾荒及我们的生产工作很差等原因，经济上大都已接近枯竭。“我们各区过去对生产领导不够，没有注意积蓄问题，无论军民都经不住灾荒、敌人的严重打击。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食、资财的积蓄”。电报还建议中央指示华中和山东注意积蓄物资或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 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全边区农民们、工人们、战士们、及一切机关学校的同志们！

我们一百八十五个人，是从边区农村里、工厂里、部队里和机关学校里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代表。我们来到延安开会是为了交换生产经验，互相学习本事，好在明年更大规模地发展边区生产。在开会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李正副主席⁽¹⁾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那么热烈地招待我们，指导我们，和我们握手，请我们吃饭，把我们看得像自家兄弟姊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实在高兴，实在欢喜。在旧社会里，咱们受苦人是被人看作牛马的，可是现在劳动却变成光荣了。自从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打日本，发展生产，咱们才翻了身，再不受人压迫，还做到丰衣足食，有吃有穿，现在又当了劳动英雄，处处受人尊敬。想想从前，看看现在，咱们怎能不感谢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呢？！咱们怎能不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和各位首长呢？！在大会闭幕的时候，让我们向毛主席、向朱总司令、向高司令、向贺师长、向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们说句心里的话吧：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

在毛主席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底下，今年一年边区的生产可是发展结实了。咱全边区一年开了一百万亩荒地，多打了十六万石细粮，安置了八千户移难民，改造了四千五百个二流子，种了十五万亩棉花，打了六十万驮盐，运输牲口比去年增加了十五六倍，办了许多像南区合作社一样的群众合作社；咱们的部队，一面对敌作战，一面自己生产，结果有的做到了部分自给，有的已经做到完全自给，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咱们的机关、学校也自己努力生产，结果自给了由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七十六。咱们的工厂自己制造了许多日用必需品。这些大家在生产展览会上都是看到了的。咱全边区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作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像这样美满快乐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热火朝天，大家动手的群众生产运动，我们从来没听说有过。这是哪里得来的呢？都是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全边区人民努力劳动的结果。

今年的生产虽是很有成绩，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年年防荒旱，夜夜防盗贼”这句俗话。为了应付战争，防备灾旱，我们明年更要加劲生产，更要多打一些粮食。政府提出“耕三余一”的任务，我们号召全边区老百姓加倍努力，做到“耕二余一”，就是说，咱们种两年庄稼，要长余下一年吃的粮食，好来有力量消灭日本鬼子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好来防备跌下年成。

我们在二十天大会商议的结果，觉得要办到这个任务，必须实行毛主席的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必须做到：

第一，普遍发展变工、扎工。全边区的农村都要向淳耀县

的白塬村学习，他们把全村七十二户男女老少和牲口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节省出三千个人工和驴工，每家比去年多打了一石粮食。都要向延安的吴家枣园学习，他们把全村十八户的人力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多打了一百二十石粮食。都要向安塞的马家沟学习，他们组织了全村的人力、牲口变工，开荒任务超过一倍。

第二，实行移民政策，增加新的劳动力。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赤水的冯云鹏学习，他今年安置了一百七十四户共六百多个难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切困难，建立了十四个自然村。都要向郿县的徐克瑞、延安的马丕恩学习，徐克瑞一个人从绥德号召了五十多户移民搬到郿县。新来的移民难民都要努力生产，向赤水县的王向富、胡文贵学习，他们移来一年，就作到打粮一二十石，有吃有穿。都要向盐池的高仲和学习，他移来一年，打盐二千五百驮，折合粮食一百三十石，作到丰衣足食。

第三，明年要把全边区的二流子都改造成好人，一面由政府督促，一面由群众劝说。我们号召全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盐池的刘生海学习。他过去是个二流子，没吃没穿，老婆也要离婚，自从前年春上转变之后，努力生产，到现在已经有九个牲口，打了二十多石粮食，被选举为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劳动英雄，并且帮助两个二流子转变过来。

第四，发动能劳动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劳动妇女都向米脂的郭凤英学习，她和男人一样，她能种庄稼，又会纺织。

第五，多开荒地，深耕细作，增修水利，发展副业。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延安的吴满有学习，他今年一家开了三十二垧荒地，多打了四十石粮食。都要向绥德的刘玉厚、刘培润，

安塞的杨朝臣，延安的申长林，曲子的孙万福学习，他们多积粪，多上粪，多种，多锄，溜崖，盘畔，早起晚回，辛勤劳动，多打粮食。都要向志丹的马海旺学习，他自己利用空闲修好二十多亩水地，又推动全村修成六十亩水地。都要向清涧的白德学习，他一个村喂了几百条猪，开了四个粉房，还发展了其他副业。

第六，多种棉花，发动妇女纺线。凡是能种棉花的地方的老百姓，都要多种棉花，都要向吴堡的郭秉仁学习，他今年种了一亩地的棉花，收了四十四斤净花，还收了三斗芝麻，一千斤萝葡、蔓菁，并推动全村平均每家种棉花一亩。全边区的纺织妇女，都要向绥德的刘老太太学习，她除了自己努力纺线之外，还组织了一百八十多户妇女纺线。都要向绥德安锦城学习，他组织了附近六十里内的妇女纺线，一共赚了二百多石米。

第七，办好合作社。全边区的合作社，都要向延安县的刘主任学习，他办的南区合作社，给老百姓谋了几千万元的利益，老百姓人人喜欢。都要向淳耀的田荣贵学习，他在四个月内从一个乡的合作社发展成一个县的合作社，从一万元股金，发展到八百万元股金，为老百姓谋了许多利益。

第八，组织运输队，多运盐出口。盐是咱们边区的重要的出产，要繁荣边区，就要大量运盐。全边区的运输队，都要向延安县的刘永祥学习，他在南区合作社帮助下，利用公盐代金，组织了七百多条牲口的公私合作运输队，运回食盐一万八千驮。不但省下老百姓去驮盐，而且凡是出公盐代金的人，都能分到很多红利。

第九，我们一面努力发展生产，一面还要节省粮食、储存粮食、多种洋芋，拿洋芋代替粮食，少制酒，少造糖，不要糟

蹋粮食，遵守政府法令，不准粮食出口。并要学习关中劳动英雄张清益的办法，到处发起义仓运动，救济困难，防备荒年。

明年我们的部队也要加紧生产，从半自给走到全部自给。我们号召部队中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习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这些劳动英雄们的榜样，一面时刻准备消灭敌人，一面又不放过一点时间努力生产。他们有的开三四亩荒地，有的一天挖一百多斤甘草，是我们全体代表最佩服的劳动英雄。我们的工厂里要创造出更多的赵占魁运动者，每个工人都要学习赵占魁、袁光华、李凤莲等劳动英雄，学习他们努力生产，增加成品，爱护工厂，节省原料，使我们边区做到日用必需品的完全自给。我们机关学校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学习黄立德、佟玉新，要和他们一样努力生产，节省公物，使机关学校经济能达到半自给。

我们除了用一切力量和办法加紧生产以外，我们大家还要“夜夜防盗贼”。“盗”就是日本鬼子，就是时时威胁边区准备袭击我们的反动派；“贼”就是汉奸、特务的暗中破坏。我们若是不防备他们，这些“盗贼”会破坏我们的边区，破坏我们劳动的结果，破坏我们丰衣足食幸福快乐的生活，叫我们重新做牛做马。因此我们要训练自卫军，展开防奸运动，人人学放枪，打手榴弹，安地雷，盘查放哨，清查坏人，不让一个破坏分子混在边区。在这里，我们号召全边区的老百姓，都向葭县的阎开增学习，他亲自送他儿子去当民兵，为了保卫地方，保护公家工厂，他日夜不睡地查哨侦察，他领导群众破获了特务，捉拿了扰乱边区的反动便衣队。都向米脂的冯光祺学习，他为了保卫边区，自今年四月起就没有在家里睡过觉，他自告奋勇领导着一支自卫军，他曾破获了特务机关和破坏分子准备暴动的阴谋。他们两位，一方面是努力生产的劳动英雄，一方

面又是自卫军和防奸的英雄。每个劳动英雄都要向他们看齐，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他们学习。

我们到会的代表们，都有决心把我们自己住的村乡变成模范村、模范乡。吴满有同志已做出计划，要把他的乡明年造成模范乡，我们大家一致响应他。我们彼此已经定好互相比赛，看看哪一个能争取到这个最光荣的胜利。我们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学生、机关工作人员都来互相竞赛，看谁在生产运动中走到前边。

现在天下大势正在大变化，日本鬼子快要垮台了，咱们的抗战快要胜利了。可是抗战前途还有许多困难和危险。让我们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明年更加努力，大家组织起来，加紧生产，保卫边区，做到家家户户丰衣足食，来迎接抗战的胜利吧！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刊印。

注 释

〔1〕即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

毛泽东等关于反特务斗争 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 给华中局等的电报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华中局并转一、二、三、四师，山东分局，五师：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

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康 生

亥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学习 《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 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赞扬我党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轰轰烈烈坚忍奋斗百折不回的伟大成绩，赞扬我党以坚固的马列主义为基础而在一九二一年开始产生的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发展与巩固，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

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受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

- （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
- （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 （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
- （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经过七大，我党将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大与更高度的一致，向着彻底战胜敌人解放中国的大路迈进。

中央政治局

十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研究 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给饶漱石等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¹⁾、林枫同志：

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的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不要专为此事召集全根据地的高干会，可以先在你们附近组织若干人研究，然后就讨论别的工作机会在全区高干会上传达及讨论。因中央所编《两条路线》一书来不及送给你们，可就你处找得到的关于内战与抗战时期表现两条路线（正反两面）的文件选出若干篇（不要多）给干部看。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中央书记处

亥俭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注 释

〔1〕即罗荣桓、邓小平、程子华。